



中国的 国际发展合作 在全球南方的 性别影响

蔡一平 ◎ 主编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

中国的 国际发展合作 在全球南方的 性别影响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

蔡一平 主编 2024 《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在全球南方的性别影响》。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苏瓦（斐济）。

© 2024 DAWN 根据知识共享 CC BY-NC-ND 4.0 的版权许可，本出版物可免费使用。但是仅可用于非赢利目的使用，且需注明作者和 DAWN 的署名，禁止修改本出版物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本出版物中的论文，仅代表文章作者本人的观点。

目 录

作者简介.....	5
致 谢.....	10
前 言.....	11
导论：南方女性主义关于全球中国的知识共建.....	13
中国的发展合作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妇女的影响.....	50
中国的参与在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影响：汤加和瓦努阿图的 “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案例研究.....	72
厄瓜多尔及秘鲁的中国矿业项目：性别影响和妇女的能动性	97
中国在非洲的矿业投资和采掘主义的性别影响：津巴布韦比基 塔矿区研究.....	120
赋权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女性：评估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对 女性小农户生计、能力建设和社会规范转变的影响.....	149
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对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中国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与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 双边安全条约的比较案例研究.....	172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软实力参与中的性别问题.....	196
跨国民间组织针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项目的 倡导行动中的性别问题：机遇和挑战.....	217
结论与展望.....	244

作者简介



蔡一平是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她与 Vanita Mukherjee 共同主持 DAWN 的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SRHR)的主题分析团队。蔡一平曾任职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2006-2008年)和《中国妇女报》(1995-2005年),撰写了大量关于妇女人权与发展问题的文章。她的研究重点是跨国女权运动,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女权运动,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媒体和传播。她于2013年至2016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亚太民间社会咨询小组成员,也是2014年5月成立的亚太民间社会组织区域参与机制的顾问。她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全球与国际研究系博士候选人,研究主题为性别与全球中国。



安妮塔·蒙图特(Annita Montoute)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大学(UWI)圣奥古斯丁校区国际关系研究所(IIR)的高级讲师兼代理主任。她曾担任发展政策管理欧洲中心的研究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加勒比对外关系以及中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她拥有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教师,拥有亚瑟·刘易斯爵士社区学院的教育研究生证书。



杰奎琳·拉瓜迪亚·马丁内斯(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博士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师。此前,她曾担任哈瓦那大学副教授和胡安·马里内洛古巴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她曾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演讲,并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欧洲讲学。她是哈瓦那大学“诺曼·吉尔万”加勒比研究中心成员,也是“大加勒比地区危机、解决方案和替代方案”(CLACSO)工作组协调员。



黛博拉·麦克菲 (Deborah McFee) 自 2005 年起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圣奥古斯丁校区性别与发展研究所工作。自 1998 年以来，她一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英语加勒比地区从事性别与发展领域的工作。黛博拉参与了三项加勒比地区国家性别政策的制定，并与米歇尔·罗利教授共同编辑了《加勒比性别研究评论》(CRGS) 2017 年特刊，题为“工具还是武器？：加勒比地区的政策制定、性别公正和社会变革的政治”。她在同行评议的期刊发表多篇文章，研究议题涉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性别政策和政策制定，重新思考加勒比地区的性别主流化，以及卢旺达种族灭绝后的妇女、性别、人类安全和国家性别政策。2011 年，她担任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ICTR) 的客座研究员，在性别与人类安全，以及强奸作为反人类罪方面开展研究。黛博拉拥有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全球治理与人类安全系、麦考马克公共政策与全球研究研究生院的博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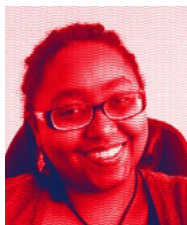


瓦塞马卡·鲁图 (Vasemaca Lutu) 是斐济的独立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是太平洋岛国的发展研究。她此前的研究项目关注的一些重点领域包括贫困、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地缘政治、以渔业部门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和预警系统、儿童保护、残疾、家庭暴力、性别主流化、气候变化，以及职业健康和安全有关的工作场所政策。她还是位于斐济第二大岛瓦努阿岛的“Bia i Cake 妇女合作社”的成员，这是她所在村庄的妇女团体，其使命是“通过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建立替代性生计”。她拥有瑞典马尔默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硕士学位，目前是斐济瑙索里南太平洋航空培训学院 (SPATI) 的见习飞行员。



黛安娜·卡斯特罗·萨尔加多 (Diana Castro Salgado) 是拉丁美洲可持续发展组织 (Latinoamérica Sustentable, LAS) 的研究员，该组织是厄瓜多尔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并致力于在此背景下保护环境和当地社区。黛安娜是拉

丁美洲研究项目的博士研究生，拥有厄瓜多尔的安第西蒙玻利瓦尔大学(Universidad Andina Simón Bolívar-Ecuador, UASB-Ecuador)的国际发展合作硕士学位。自2014年以来，黛安娜一直研究拉丁美洲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融资机制。她的博士研究追踪了这些项目对国家、环境和当地发展的制度能力的影响，并深入研究了厄瓜多尔的案例。黛安娜就此主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和一本专著。她还曾在厄瓜多尔多所大学工作，并参与了关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国际研究计划。



希比斯特·卡萨(Hibist Kassa)是莱斯特大学环境未来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员。她是南方农业网络研究公报的副主编，该网络是一个由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人员组成的洲际网络。希比斯特拥有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加纳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以及政治学、地理学和自然资源开发学士学位。她在非洲女权组织和政策研究机构任职十余年，曾经是 DAWN 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她目前正在撰写关于小商品生产以及手工和小规模采矿的书，该书即将出版。她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议题涉及手工采矿政策、土地、社会再生产、非洲的帝国主义和冲突、以及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学。



辛齐勒·芬古(Zinzile Fengu)是一位充满热情的研究员和独立顾问。她拥有津巴布韦卢帕内州立大学语言和传播学士学位、监测与评估特别荣誉学位，并获得了发展学硕士学位。她在人权领域有超过12年的工作经验，在创伤治疗、游说和倡导，以及女权运动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目前正在攻读发展学博士学位，她的论文研究重点是津巴布韦的女权主义组织。她的研究兴趣是从女权主义视角分析环境问题、采矿业、生计、灾害管理以及性和生殖健康权利。



李明德 (Itunu Grace Ishola) 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中国学硕士项目2022级燕京学者，主修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重点是中非教育合作、人力资本开发和公共外交。她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获得汉语语言和国际教育学士学位，能说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她通过广泛的实地研究、观察和对中国各地的参与者进行采访，为中非关系领域做出了贡献。李明德是知名的北京大学非洲学生会 (PUASA) 现任副主席。此前，她曾担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联络官，负责2019年至2020年尼日利亚在华学生的事务。此外，她还是北京非洲侨民网络学术委员会成员，并担任美国非洲青年侨民组织的行政助理。



帕特里夏·桑戈·波拉德 (Patricia Sango Pollard) 是所罗门群岛性别平等、妇女权利和社会包容方面的独立研究员。她曾于“所罗门群岛妇女权利行动运动”这一组织任职，具有管理经验。她也在多个倡导妇女权利和儿童保护的组织里担任董事会成员。目前，她为多家所罗门群岛的地方和组织以及发展合作伙伴提供有关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的咨询建议。她最近的作品之一是于2023年与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合作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建设和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政策文件，其重点关注所罗门群岛。她2014年毕业于南太平洋大学，获得发展学硕士学位，她的硕士论文主题是发展援助对所罗门群岛性别平等项目的影响。



高文·克尔卡尔 (Govind Kelkar) 是一位女权主义学者，中国政治经济学博士。她是印度社会发展委员会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也是印度“性别与发展研究与创新中心” (GenDev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的执行主任，并在2013年5月至2020年3月曾担任美国西雅图的“农村发展研究所” (Landesa) 的高级顾问。与此同时，高文教授还担任了荷兰“能源国际” (ENERGIA International) 的国际研究协调员，以及斯瓦米纳坦研究基金会 (Swaminathan Research Foundation) 性别与能源方面的研究负责人。她是泰国曼谷亚洲理工学院的杰出兼职教师。高文

教授现任中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名誉教授、印度德里中国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她撰写了十六本著作和许多学术文章。她与人合作的近著《猎巫：文化、父权制和结构转型》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



丽都·阿格瓦尔 (Ritu Agarwal) 是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她拥有德里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学位和尼赫鲁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云南省微观层面的土地转型。目前她正在研究省级层面，特别是云南省的转型问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农村政治经济学、城市化、财产权、性别研究以及中国的省级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阿格瓦尔博士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她是云南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访问学者。她还曾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为她的研究工作收集材料。



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 (Laura Trajber Waisbich) 是一位南南合作专家。她在发展学、外交政策和人权领域拥有十多年的研究和政策倡导经验。她是一位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拥有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她目前是英国牛津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的讲师和拉丁美洲中心巴西研究项目的主任。她还兼职于三个巴西智库：南南合作研究和政策中心 (Articulação SUL)、巴西分析和规划中心 (CEBRAP)，以及伊加拉佩研究所 (Igarapé Institute)。

致 谢

本书是女性主义研究学者们多年来合作努力的结晶。首先要感谢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的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Elizabeth Cox、Fatou Sow、Lydia Alpízar Durán、Sonia Corrêa、Vivienne Taylor、Kamala Chandrakirana、Claire Slatter、Corina Rodríguez Enríquez、Flora Partenio、Gita Sen、Kholoud Al-Ajarma、Kumudini Samuel、María Graciela Cuervo、Masaya Llavaneras Blanco、Vanita Mukherjee。她们在该项目筹划之初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提供了指导，特别是她们的深入评论和反馈大大改善了项目的研究框架和项目的综述报告。DAWN感谢本书的论文作者们——Annita Montoute、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Deborah McFee、Vasemaca Lutu、Diana Castro Salgado、Hibist Kassa、Zinzile Fengu、Ishola Itunu Grace、Patricia Sango Pollard、Govind Kelkar、Ritu Agarwal 和 Laura Trajber Waisbich，感谢她们对此项研究自始至终的承诺和热情投入，以及她们在本书的修改和编辑这一繁琐过程中显示出的耐心。

DAWN 对为本研究框架的制定和案例研究的审稿作出贡献的各位项目顾问表示深深的致谢！她们是：Peggy Antrobus、黄思然、T. Tu Huynh、苏茜(Susie Jolly)、李英桃、刘海方、Claire Slatter 和张传红。

这个历经多年的跨区域研究项目能够顺利实施，离不开 DAWN 全球秘书处和传播团队的辛勤工作，以及他们在幕后的默默付出。他们是 Sharan Sindhu、葛友俐、Lilian Bing、Sala Welelakeba、Kajal Matthew、Nailagovesi Vakatalai、Ana Rakacikaci、Simran Singh、Ricardo D'Aguiar、Leda Antunes、Giulia Rodrigues、Marla Rabelo、Raquel Cappelletto。Matthew Gill 负责本书英文稿件的校对。DAWN 的项目专员于音和张丽珍为研究框架的制定和项目的协调做出了贡献。

本书中文版由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简称“资源小组”)组织翻译。资源小组是一个致力于社会性别与发展领域相关资源的翻译与共享的志愿者小组。参与本书翻译和校对工作的小组成员有：蔡凌萍、冯媛、付蕾、韩扬、李悦、孙李娜、杨欣妍、张帆、赵瑾娜。黄长奇参与了部分翻译问题的讨论。张玉婷负责翻译工作的整体协调和组织，并统筹最终的译稿。在此一并致谢！

前言

从南方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即本书中所称的全球中国——是不可否认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投资和劳动力已经进入了全球南方的社区，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自然环境。中国的发展合作模式重塑了许多全球南方政府处理发展问题的做法，以及与其他国际发展伙伴的交往方式。中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方针重塑了地区内部和跨地区的地缘政治。然而，全球南方关于中国的对话，特别是在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受到偏见、障碍和盲点的严重限制。为了实现经济和性别公正，并确保可持续和民主的发展，南方女性主义者需要与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和盟友建立新的突破性关系。

本书中的论文，不论是从分析的深度还是覆盖的广度来说，都说明了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成果。书中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全球中国的地理覆盖范围之广，及其在全球南方参与领域的多样性。它们还说明了女性对中国在其社区开展的项目的不同反应：一些妇女要求项目提供更好的可及性，另一些妇女则要求项目完全停止运营。本书还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全球参与的新趋势及其性别维度，中国的软实力策略及其性别影响，以及针对中国在全球南方开展的项目中的跨国倡导工作和缺乏性别考量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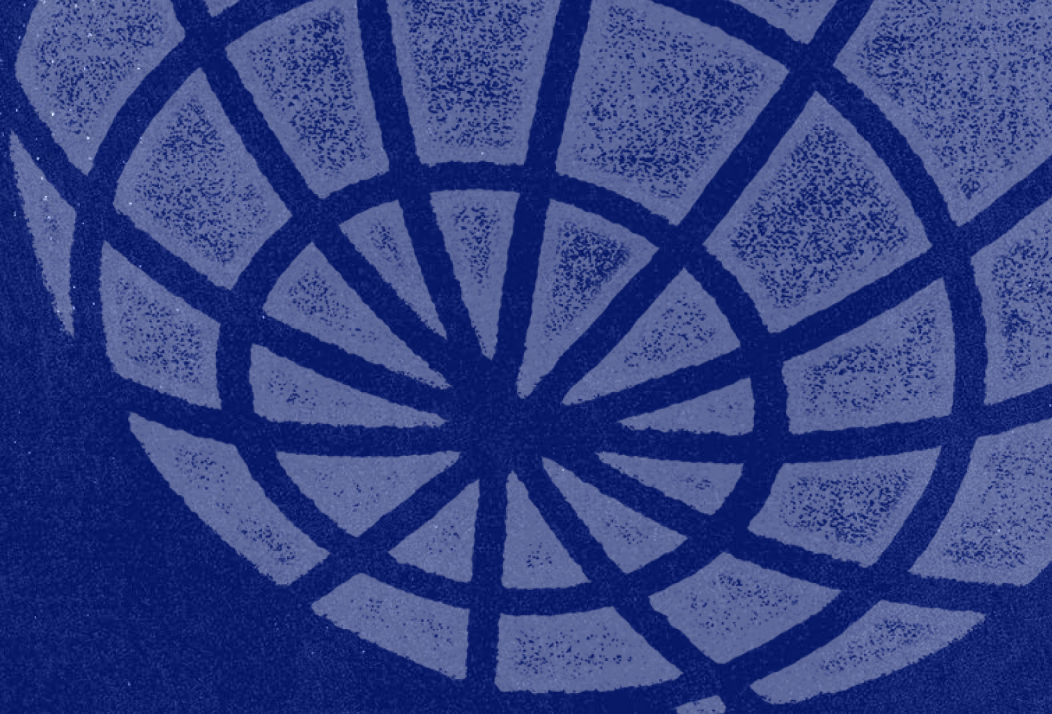
阅读这本书，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对全球中国的性别维度及其影响的深入理解之路刚刚开始，幸运的是，面对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扎实的起点。书中所包含的知识不仅仅提供了经验事实；它的也为读者勾勒出了一
种思考全球中国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应用于全球南方的不同地方背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本书能成为未来全球中国的研究者和活动家的参考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本书讨论的议题之外，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本身也意义重大。除了发表研究成果外，本研究项目的目标还包括建立一个关于全球中国性别问题的南方女权主义知识社区。这一社区建设的使命至关重要，并对我们培

养自主理解和有意义的参与该问题的能力产生长期影响。尽管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立足点日益牢固，但其内部仍在不断变化。为建立一个南方女权主义学者的学术社区打下坚实基础，能够积极地共同创造知识，以响应中国国内外变化，这是一项重大而及时的成就。它可以带来创新的集体行动模式和团结的生态系统。但新的起点总是充满挑战的，考虑到长期以来存在的脱节，有必要搭建这些桥梁。这一点，体现在蔡一平的导言章节中对参与本项研究的学者们不同观点的描述中，她强调创造对话和反思的空间，而不是追求共识。在这个空间中，关于“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方法的二元概念是一个有趣的辩论领域。随着来自全球南方女性生活现实的经验事实越来越多，以及对这个知识社区——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的信任度不断提高，我们将能够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进行自己的独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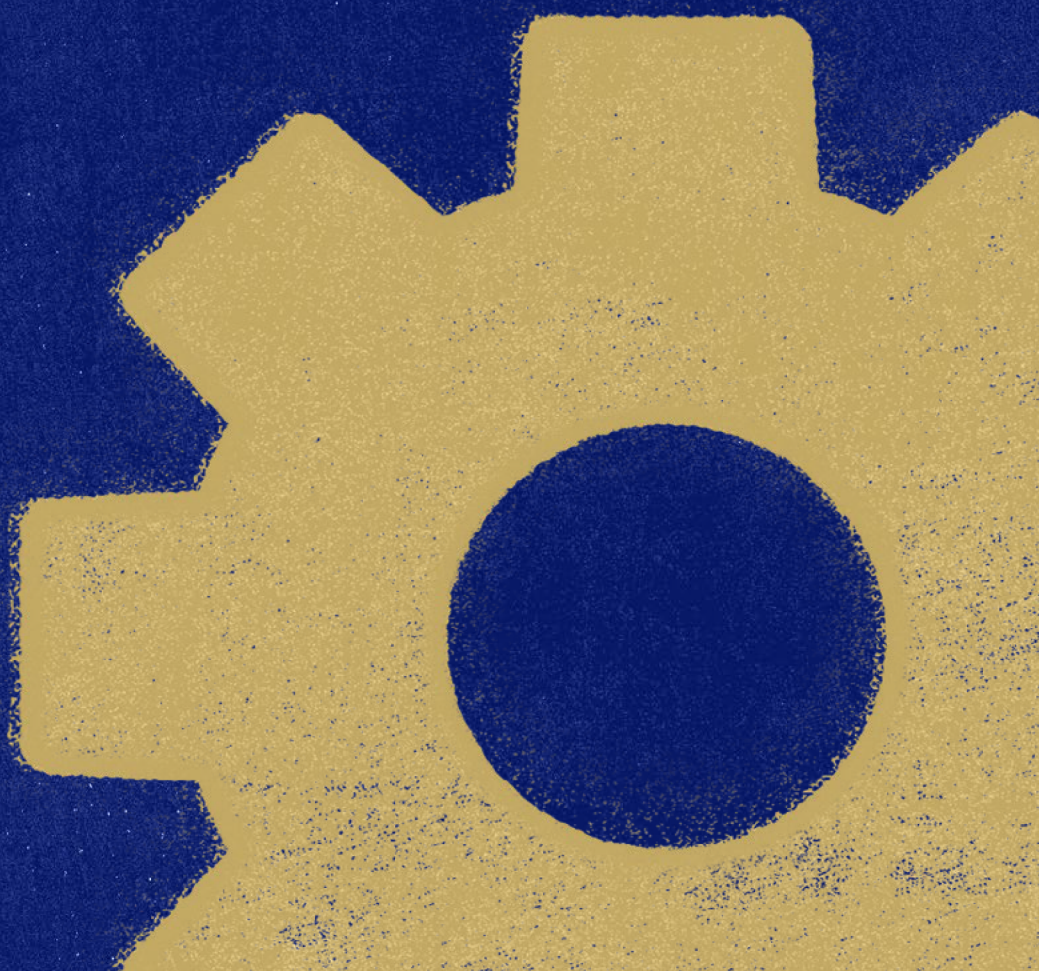
本书及其出版过程有望弥补我们在理解和参与全球中国这一议题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也许正如 DAWN 所期望的那样，这本书将有助于以有意义的方式重新构想南南关系，从而真正促进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

卡玛拉·钱德拉吉拉娜(Kamala Chandrakirana)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共同协调员(DAWN General Co-Coordinator)



导论：
南方女性主义
关于全球中国的知识共建

蔡一平



1. 背景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研究者和媒体对这一主题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他们的主要关注点聚焦于中国的海外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BRI）”，以及在全球政治和地区动态迅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全球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和人权方面的影响（Yeh 2016，李静君 2017，Ohashi 2018，Beeson 2018，Franceschini 和 Loubere 2021，阿马尔 等 2022，Haug 等 2024）。然而，目前的研究中对性别方面的关注仍然不足（苏茜 2016，蔡一平和李英桃 2021）。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近期加大了对全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承诺，包括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供资金，以促进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第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习近平 2015 和 2020），并在中国国际合作政策文件《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首次提及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作为优先领域之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DAWN 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在 2022 年至 2024 年期间开展了一项研究项目，分析中国在全球南方参与中的性别影响。这项探索性研究汇集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包括非洲、亚洲、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学者，她们拥有广泛的知识 and 多学科的背景。这八个案例研究探讨了中国的全球参与对全球南方妇女带来的深远和多维度的影响，以及政府、企业、民间社会 and 当地社区等各个部门如何互动。

本文简要介绍了这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的合作过程及其主要成果。此外，本文还反思了这项研究对全球中国（Global China）这个方兴未艾的新研究领域的贡献。迄今为止，该领域迫切需要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那些以全球南方妇女和边缘群体的经验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以加强该领域的发展。此外，这项研究还阐明了南方女性主义对国际合作、南南关系的重新构想，以及在迅速崛起的全球南方和变化中的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如何将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议题整合到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去。

2. 审视近年来中国的全球参与的趋势与影响

由于这项研究本质上是探索性的，因此 DAWN 有意识地避免给作者强加主

题或解释模式。我们宁愿让每个案例的研究者自己来确定她们的研究问题、假设和方法。作为第一步，DAWN 撰写了一份分析框架文件来指导这项研究（蔡一平和于音 2022）。该框架文件侧重于分析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参与的轨迹，特别是自 2010 年以来的新趋势，以了解性别在这一参与中的地位。它回顾了中国在性别与发展、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国家政策和实践，以及学者和民间社会的相关研究和分析。它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中国全球参与的新趋势是什么？（2）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如何定义社会性别概念，并在其发展合作实践中如何实施？（3）南方女权主义的合作如何加强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并创造关于全球中国的新知识和理论？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展，在研究这些新趋势和影响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悠久历史。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贸易关系早于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的被殖民化的进程，这种殖民化进程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中国被欧美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自 1956 年与其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苏联断绝关系以来，中国与前殖民地和新兴独立的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Yu 1977）。这种政治立场从万隆会议（1955 年）到不结盟运动（NAM），并延续至今天的联合国中的“77 国集团 + 中国”（G77+China）。这段历史意义重大，因为它在当代中国的全球参与中，特别是在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中，不断被回顾和重新叙述（Franceschini 和 Loubere 2021，习近平 2024）。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将当前中国的全球参与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理解，即建设富强的国家和建构公平的世界秩序，中国的这两个愿景长久以来就存在，并且二者相互交织。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愿景相似，中国领导人认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现代化和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济增长，打造强大的经济，以赶超发达国家（Huang 2016）。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一直在倡导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然而这一政治议程在联合国一直被发达国家搁置一旁（Prashad 2007，Getachew 2019）。

最后，当今中国的全球参与应该放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毛泽东时代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和第三世界理论（third world theory）回应了冷战以及中苏争端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议程的推动（林春 2019）。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全球参与是“南方崛起”（联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3) 现象的一部分, 并受到中美竞争的影响; 因此, 中国的全球参与应该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面临多重危机的情境下, 在全球治理亟须改革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DAWN 的研究框架文件将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参与划分为三个时期: (1) 1978 年至 2000 年: 通过实施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2) 2001 年至 2012 年: 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 加速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 (3) 2013 年至今: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 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和新开发银行 (NDB, 或称金砖国家银行) 等新国际金融机构的成立, 中国的全球参与持续扩展。与此同时, 为了应对来自全球南方和北方的阻力与竞争, 中国自身也在不断进行适应与调整。

这项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国全球参与的最新阶段。DAWN 的研究框架文件确定并分析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全球影响的三个新趋势: (1) 捍卫多边主义和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体系; (2) 通过发展融资、援助和贷款重塑全球发展合作的格局; (3) 创建和加强以南南合作为重点的新双边和多边倡议与机制,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 (GDI)、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 - 东盟自贸区等。

2.1 捍卫多边主义和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参与

1971 年,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取代了代表中国的台湾当局 (Choudhury 2020)。自此以来, 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积极参与这个最重要的多边政府机构, 并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特殊地位来日益增强其全球影响力和参与全球治理 (Haug 等 2024)。近年来, 中国政府在捍卫多边主义方面变得更加积极和直言不讳 (Abdenur 2014, Chan 2015, Stephen 2021)。与此同时, 它利用联合国体系作为平台来合法化并放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效益 (Liu 2021a, Haug 2024), 并通过 2021 年启动的全球发展倡议将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与联合国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相结合。一些研究者把中国看作联合国系统中负责任的国际参与者, 而另一些人则对其在该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 尤其是对于其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Brooks 2018, Foot 2020, Worden 2020, Oud 2020, Inboden 2021, Haug 等 2024)。正如中国在其《未来峰会及第 79 届联合国大会会期声明中的立场文件》中所阐述的那样, 中国认为自身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追求和平发展和

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中扮演着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同时捍卫其国家利益（中国外交部 2024）。

2.2 重塑国际发展融资与合作的格局

2013 年，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其海外经济合作，以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大总体目标。从那时起，中国在发展融资支出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及其他主要强国。根据 AidData 的一份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平均每年中国在海外发展项目上的支出为 850 亿美元，而美国的支出仅为 370 亿美元（Malik 等 2021）。

关于中国发展融资的主要批评和争议集中在债务陷阱外交以及贸易、贷款和投资交易缺乏透明度的问题上（Singh 2021, Kinyondo 2019, Tower 2020）。由于中国的外援和贷款基于无附加条件、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原则，对于那些政治不稳定、政府预算不足或腐败程度高的国家来说，它们对此表示欢迎（Condon 2012）。其他批评则源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矿业和能源项目对社区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项目协议的不透明和过高的债务负担；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SIAs）及其他尽职调查措施流于形式；以及投资可能导致高冲突地区不稳定的风险（Tower 2020）。

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融资和合作深刻影响了全球发展融资的实践和话语，打破了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主导的格局。七国集团（G7）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宣布了“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倡议，并于 2022 年 6 月 26 日启动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动员 2000 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本，用于该伙伴关系的四个领域——健康与健康安全、数字连接、性别平等与公平、以及气候与能源安全（白宫 2022）。所有这些新倡议预计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与中国形成全面竞争。

2.3 创建和加强新的国际多边机制

近年来，中国启动并创建了新的多边发展机构和基金，首先在区域层面开展合作，并逐步扩展到全球层面。中国在这些论坛中的角色也从最初的共同创始者和参与者，逐渐更多地转变为发起者和主办者。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中国试图“通过建立与一系列国际机构平行的结构来重新调整国际秩序”；另一些

人则认为，这是对美国霸权主导的不平等全球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再）平衡”（Abdenur 2014, Stephen 2021）。

中国 - 非洲合作论坛（FOCAC）、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ASC）、中国 - 加勒比经济贸易合作论坛（CCETC）、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17+1）以及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等平台，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议程制定空间。新开发银行（NDB）（2014）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2015）的建立，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多边主义的决心，毫无疑问，它们重新分配了现有组织的权力和资源，使其影响力和职责更加多元化，为服务接受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并通过为受援国提供替代性的资金渠道，增强了中国的谈判能力（Stephen 2021）。

中国创立的多数新机制都是基于南南合作框架。全球南方的概念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其中许多位于南半球，包括亚洲、太平洋、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全球南方较低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水平以及对全球北方的依赖，是经历了五百年的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果（Mignolo 2011）。然而，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南方找到妥协与合作的共同基础（Ramachran 2016, Weiss 等 2016, Waisbich 等 2021）。尽管如此，如何区分中国推动的多边主义与由全球北方主导的多边主义，仍然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3. 探讨中国全球参与中的性别问题

3.1 社会性别在中国国家发展话语和人权框架中的定义

对中国的全球参与相关的官方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性别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术语通常被交替使用。女性常常与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一起被纳入脆弱群体之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与之相悖的是，与此同时女性的潜力和主体性又得到了广泛认可。政策认为，发展女性的能力和保障她们的健康能够使女性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最终实现性别平等。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性别平等与女性赋权被归类于青年和妇女部分，与医疗健康、技能培训等相关。在更新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2-2024年）中，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讨论沿用

了之前的路径，强调通过能力建设和交流发挥女性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潜力。在《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中，性别平等等同于妇女发展，而维护妇女的权益则仅提到促进健康和保健。

国家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官方话语认为，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而妇女解放应是民族解放的内在组成部分（Liu 2021b）。这种框架也与中国官方的人权立场相一致，后者优先考虑发展权（RtD）。发展权主张，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追求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前提。相比之下，主流的西方国际人权话语则侧重于个体权利和自由。在中国的发展合作项目与传统北方捐赠者资助的项目之间，可以观察到这些不同的视角。中国以在国际层面热情倡导发展权而闻名，并展示通过经济增长和减贫实现人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作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7 和 2021，Oud 2020）。中国认为，其投资有助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发展，并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然而，批评者指出，这些投资忽视了环境和社会（包括性别方面）的影响，对劳动者产生负面影响；并且未能促进受援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Osondu-Oti 2016）。

对性别平等和妇女参与发展的这种理解，在中国政府参与联合国相关问题的国际谈判和外交活动中的官方立场也可以观察到（蔡一平和李英桃 2021）。中国政府积极加入了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承诺的全球共识，其中包括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2015 年通过的《2030 年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一些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在谈判中的做法不同，中国政府并不阻止“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这一表述，亦未将其替换为“男女平等”（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然而，它对支持性取向和性别认同（SOGI）相关的表述则较为谨慎，认为在该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尚缺乏共识（蔡一平 2021 和 2024）。中国政府在性别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其在外交上长期坚持的“求同存异”原则。然而，这种模糊性更可能源于中国并不认为性别相关问题是优先事项，也不是必须在国际论坛上加以捍卫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与其他更突出领域如贸易、投资、安全、人权、反恐和气候变化相比，中国对外政策中尚未就性别相关问题形成一致和连贯的立场（蔡一平 2021）。

3.2 无附加条件与国家的域外义务：中国南南合作中的性别框架

中国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等多项国际人权条约,这些条约都包含性别平等原则。像所有签署和批准这些公约的国家一样,中国有义务定期向相关条约机构报告在实施这些条约方面取得的进展。尽管这些义务主要适用于国内管辖,但国家也确实承担域外义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家在商业活动背景下的义务的一般性意见第24号(2017)指出,该公约在三个层面上确立了国家缔约方的具体义务——尊重、保护和履行。这些义务既适用于国家的国土范围内的情况,也适用于国家缔约方可能行使控制权的国土以外的情况(第10段)。当一个国家可能影响其领土以外的情况时,域外义务便会产生,这符合国际法所施加的限制,通过控制居住在其领土内的企业及/或受其管辖的活动,从而可能有助于在其国土以外有效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28段)(E/C.12/GC/24, 2017年8月10日)。

作为该公约的签署国,这些条款适用于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发展项目。国际金融机构(IFIs)已制定了一些关于性别的负责任投资的政策,这些先例可以为中国金融机构所参考(赵芷芊等2021)。近年来,中国政府各部委共同发布了多项关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对外投资和融资指南(LAS网站,日期不详)。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仍然存疑(Delfau和Yeophantong 2020,谢世宏等2021,《全球中国人民地图》网站,日期不详)。

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遵循不干涉主权和内政、无附加条件和平等互惠的原则,并且是南南合作框架的一部分。中国在全球南方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集中在三个主题上,即:医疗健康、教育和经济赋权。这种方法在《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得到了最佳体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该文件强调了中国在改善全球南方的母婴健康项目方面的努力,以及职业和技术培训,以提高女性的就业率及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参与。该文件并未提供全面的方法或战略来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中性别主流化问题。同样,医疗保健、培训、交流和教育是中非合作的主要活动。《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包含了一些更具体的内容,例如增加女性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专业培训、通过中国制造业投资为女性创造就业机会、加强生殖健康、让女性参与信息技术行业、培训女警以及组织女性政治家与高层官员之

间的交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指出：

“根据非盟《2063年议程》的优先事项和《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战略(2018-2028)》，双方同意在尊重不同传统和文化的基础上，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等方面合作，特别是在就业、领导力、体面劳动、创业、教育学习、农业、健康、融资、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等领域。”(中国外交部2024)。

3.3 在承诺与现实之间：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投资与贸易对性别的影响

中国性别平等方面的国际承诺与其在跨国贸易、外国投资和海外援助项目中的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对受援国性别平等状况缺乏充分了解，以及中国和受援国在履行其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方面缺乏强烈的政治意愿(陆海娜等2018)。在中国投资的老挝和柬埔寨农业公司(黄思然等2018)以及中国在越南、缅甸和孟加拉国投资的纺织和服装企业(梁晓辉2019)中，管理人员和当地女性工人的性别意识普遍较低。例如，在中国投资的纺织行业中，管理人员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缺乏性别敏感性导致了工资收入上存在性别差距、缺乏母乳喂养和儿童保育设施，以及缺乏防止和管理职场性骚扰的机制(梁晓辉2019)。

现有文献表明，在负责任投资的框架下的表述中，女性被视为有价值的经济资产。这种话语和实践认为，通过改善女性的权利和赋权，可以实现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投资。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投资者身上，而非受影响的当地社区及这些社区中的女性和边缘化群体的经历与视角。此外，许多研究局限于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和企业社会责任(CSR)框架，忽视了国际投资者、东道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以及当地社区之间多维度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研究也很少关注性别议题与阶级、种族、年龄、文化、性取向与性别认同(SOGI)和宗教等议题的交叉性，而这些交叉性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性别影响至关重要。因此，DAWN的此项合作研究旨在通过使用新的分析框架和南方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来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相关内容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进一步阐述。

4. 研究方法

4.1 “全球中国”作为一个分析概念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扩张和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在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些影响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框架。第一组研究采用政治经济学框架来分析中国在全球的参与，尤其是中国的国有资本如何重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和消费（So 2010，李静君 2017）。第二组研究则深植于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这些学科中，重点考察中国对全球治理结构以及国际发展合作话语和实践的影响（Abdenur 2014，Yeh 2016，Haug 等 2024）。

旨在调和这两个框架之间的内在联系，近年来“全球中国”作为一个新概念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之作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全球参与，并分析这一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利益相关方，包括日益增长的抵制情绪（李静君 2017 和 2022，Franceschini 和 Loubere 2022）。总体而言，这一概念放弃了“中国走出去”的海外投资战略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整体战略的假设，认识到中国的全球参与在多个领域呈现出多种形式。除了国家的海外投资外，还涉及诸如移民、全球媒体网络、高等教育、技术转让、多边的区域和全球信用机构，以及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海外的扩展。“全球中国”这一概念使研究者能够运用跨学科和跨领域的视角，结合人类学、地理学、文化研究、移民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性别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等方法论，对这一主题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Choudhury 2020，Xu 2022，Repnikova 2022，Lu 2022，Gong 2022，Chen 2022）。因此，“全球中国”这一概念为理论创新和方法论的重新定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它也需要对中国的全球参与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因此，DAWN 的这项研究以“全球中国”为总体概念，旨在了解中国的全球参与及其性别影响，这些影响是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和受影响社区等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持续互动和协商的结果。首先，这一概念使研究者能够识别和探讨各自背景中最为相关和紧迫的主题，包括中国在矿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中的投资，到中国的软实力，再到地方和跨国公民抵抗运动。其次，这一概念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驳斥了在关于中国全球参与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魔鬼

抑或救世主”二元对立框架(Rofel 和 Rojas 2022)。最后,正如本论文集集中的每个案例研究所展示的那样,这一概念鼓励学者在研究中采用跨学科的方法。

4.2 从南方女性主义视角的探寻

南方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应该基于历史、地理、情境和文化,去创造、交流和构想知识的形式,并呼吁实现南北知识的民主化(Byrne 和 Imma 2019, Uchendu 等 2019)。南方女性主义学者批评主流的发展话语和实践,认为全球南方的妇女被新自由主义发展议程所利用,而新自由主义发展议程继续扩大了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差距(Sen 和 Grown 1987, Kabeer 2005, Bernal 和 Grewal 2014)。

该理论借鉴了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Mohanty 等 1991),南方女性主义认为,为了抵抗无处不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建立全球南方女性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的团结与开展对话非常重要。同时,它质疑并拒绝“全球姐妹情谊”(Morgan 1984 和 2003)这一理想化概念,因为该概念忽视了国家、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之间的交叉性和结构性不平等(Mohanty 2003)。

DAWN 认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所带来的性别影响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动态过程,是各方参与者的活动、互动与争论过程中的共同产物;因此,要理解这种性别影响,必须要在多个地点进行即时和全面地评估,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并且这种评估需要立足于南方国家的现实。作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网络,DAWN 坚信来自全球南方女性的视角和经验应当是这些分析的中心,而这只有通过对话、协作和团结才能实现。

为了突出全球南方女性的自主声音,本研究特意邀请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合作开展了八个案例研究。这些案例通过分析中国全球参与带来的性别影响的不同方面,为加深对全球中国的了解做出了贡献。具体案例研究包括:

- 《中国的发展合作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女性的影响》,作者:安妮塔·蒙图特(Annita Montoute)、杰奎琳·拉瓜迪亚·马丁内斯(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黛博拉·麦克菲(Deborah McFee)
- 《中国的参与在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影响:汤加和瓦努阿图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案例研究》,作者:瓦塞马卡·鲁图(Vasemaca Lutu)
- 《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中国矿业项目:性别影响和妇女的能动性》,作者:黛

安娜·卡斯特罗·萨尔加多(Diana Castro Salgado)

- 《中国在非洲的矿业投资和采掘主义的性别影响：津巴布韦比基塔矿区研究》，作者：希比斯特·卡萨(Hibist Kassa)和辛齐勒·芬古(Zinzile Fengu)

- 《赋权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女性：评估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对女性小农户生计、能力建设和社会规范转变的影响》，作者：李明德(Ishola Itunu Grace)

- 《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对女性、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中国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与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的比较案例研究》，作者：帕特里夏·桑戈·波拉德(Patricia Sango Pollard)

-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软实力参与中的性别问题》，作者：高文·克尔卡尔(Govind Kelkar)和 丽都·阿格瓦尔(Ritu Agarwal)

- 《跨国民间组织针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倡导行动中的性别问题：机遇和挑战》，作者：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Laura Trajber Waisbich)

每个案例研究在区域或国家背景下探讨以下一个或多个问题：

(1) 性别在中国的全球参与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2) 中国的投资和援助项目如何影响当地社区的性别平等、妇女的生活和人权？

(3) 作为一个新兴的参与者，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发展项目在性别政策和性别相关影响评估方面与传统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有何不同？如果有，具体表现如何？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4) 面对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南方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如何加强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倡导，并实现社会和环境正义？

此次合作研究的目的旨在挑战当前在研究中国的全球参与中普遍存在的狭隘框架，即：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从而摆脱西方的种族主义和对知识生产的霸权和控制。这项研究还旨在要求南方和北方的国家和企业部门对维护南方妇女和南方人民的人权和福祉尽到责任。

4.3 知识的共同生产

南方女性主义的合作并非新鲜事，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 Byrne 和 Imma (2019) 所提醒的，全球南方是多元和灵活的。这要求南方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行动的知识生产是去中心化和去殖民化的。DAWN 将这一研究

视为一种典型的南方女性主义合作知识生产的项目，因为它为对话、批判、辩论和反思彼此的立场提供了空间，而不是追求共识。DAWN 召集了一个研究顾问小组，该小组由 DAWN 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DAWN 合作伙伴及其他专家组成，她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提供宝贵支持，包括对分析框架提出意见、寻找可能的研究者、对案例研究的初稿进行同行审议，以及在作者会议、网络研讨会和宣传活动中作为评论员出席，以传播研究成果。根据分析框架所提出的问题，每个案例研究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专业特长和资源，自行决定研究主题、调查的具体问题和适当的方法。同时，为了促进这一合作研究，DAWN 创建了共享文件夹，包含有用的参考资料以供研究者们使用。DAWN 组织了两次聚会，一次线上，一次线下，让研究者和顾问小组成员可以交流观点，提出研究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并进行坦诚的对话。例如，学者们经常在“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方法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当一些中国项目被叫停且未实施时如何评估其实际影响，以及一些概念和类别（如新殖民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新帝国主义和北京共识，等等）是否可以在没有适当的背景化和问题化的情况下应用于本研究。这些对话、辩论和自我反思不仅加深了对每个案例所研究的问题的理解，也加深了研究者对自身立场的理解。因此，这样的合作研究有助于加强学者之间的团结和协作，而这正是本研究项目的愿景和初心，即：通过知识的共建和分享，建立一个南方女权主义知识社区和从性别视角分析全球中国这一议题的知识网络。

本研究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进行的，因疫情导致的旅行不便和非常有限的研究经费，使得研究者们进行现场调研来收集第一手实证数据变得极其困难。一些研究者表示，他们对难以获取关键知情人的反馈，以及缺乏相关数据表示沮丧。此外，当前的地缘政治和中国与西方之间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可能会使任何有意义的对话变得不可能，甚至毫无意义。研究者们认为这些是本研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此外，本研究的主题“全球中国”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之中，因此需要女性主义学者持续不断的集体努力，来分析和了解其复杂的动态。最后，关于本研究的标题“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性别影响”，如前所述，在中国官方文件中，“性别平等”和“男女平等”经常互换使用。然而，本项目中的研究者们认为妇女(women)和性别(gender)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不能替代后者。后者被理解为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尽管如此，案例研究必须将重点缩

小到女性身上。但研究者也注意到女性的多样性，并试图在分析中考虑到性别角色和规范产生和延续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结构背景。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在深入探讨了具体的案例、项目或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大局和更广泛和交叉的视角。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介绍八个案例研究的主要发现，以及基于这些研究结论，如何从性别的视角评估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并重新想象南方女性主义对性别和发展的愿景。

5. 主要发现和反思

这八个案例研究来自全球南方不同的地区——亚洲、太平洋、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涵盖与中国全球参与相关的广泛问题，如软实力、矿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及民间社会的角色。本研究项目的议题涉及之广是经过考量的。DAWN 让研究者根据自身状况自行决定最相关和重要的主题。这需要考虑他们所掌握的资源，能否收集到所需要的数据，采用哪些合适的研究方法，以及他们与利益相关者的个人联系如何。尽管研究结论存在多样性，但所有这些研究结论都回应了项目的框架文件中所提出的关键指导性问题。本文从这项研究的结论中，总结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共同议题。

5.1 主要发现

5.1.1 关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带来的性别影响，这八个案例研究显示的结果好坏参半。这些影响因项目的性质、主要参与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与当地社区互动而异。从太平洋到加勒比海再到非洲，女性通过中国所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道路和卫生设施的建设）以及农业合作项目，直接和间接受益。汤加和瓦努阿图都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当这些国家面对台风、火山爆发和海啸给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害，中国迅速作出响应，帮助重建房屋、建筑物、道路、桥梁和通信线路。此外，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食品、其他必需品、水箱和帐篷，并派遣了医务人员（请见本书中鲁图的文章）。改善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通过提供就业和商业机会，满足了女性的实际需求，从而为实现性别平等目标和女性经济赋权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涓滴”策略是

否能在社会中带来具有变革意义的性别平等变化仍然有待观察，特别是在缺乏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的有意义参与的情况下。

同样，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的参与主要出现在男性主导的建筑行业。在庫瓦医院项目中，女性从医院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中受益匪浅，其中许多服务都是女性及其子女的迫切需求。医院内的护理培训课程，女性参加的比例很高，因为护理行业以女性为主。但在 eTecK 工业园的案例中，该项目并未考虑促进女性就业或推动女性拥有企业或女性创业（参见本书中蒙图特等人的文章）。

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案例研究评估了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对女性小农户的益处。一方面，由于制度性障碍、难以获取贷款和职业隔离，女性小农户在培训后的收入和生计机会改善有限。另一方面，尽管直接经济影响有限，但培训提高了女性小农户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意愿，促进了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参见本书中李明德的文章）。相比之下，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采矿业投资的案例研究发现，这些项目与之前的其他跨国公司经营的矿业项目一样，给社区和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由女性承担（参见本书中黛安娜·卡斯特罗的文章，以及卡萨和芬古的文章）。此外，每个案例研究都具体分析了导致这些影响的因素以及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这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作者表明，在本研究进行之中以及完成之后，观察到近年来中国企业为改善环境和当地社区居民的福祉所做出的努力，有的已经初现成效。遗憾的是，这些最新的进展可能无法完全反应在案例研究中。因此，这些案例研究也可以视作为中国的海外发展项目留存的一份历史记录。

5.1.2 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已被纳入中国最新的国际合作的国家政策文件作为优先事项，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并未将性别或妇女问题放在全球参与策略的重要位置，也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或指南来实施这一政策（参见本书中蒙图特等人的文章，以及鲁图的文章和李明德的文章）。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协议的案例研究指出，尽管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资助国，但中国尚未制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WPS）议程的国家行动计划（参见本书中波拉德的文章）。在太平洋地区的汤加和瓦努阿图，除了建设学校、道路和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外，作者没有看到任何支持社区层面性别平等的一带一路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公司与当地妇女和女童的互动也很有限（参见本书中鲁图的文章）。

所有案例研究都重申了分析框架所确定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官方国家政策的承诺与实践中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指导方针和实施策略而存在差距。我将在下面的“重新思考南南关系和发展援助的附加条件”这一节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此外，在考察了中国软实力中的性别问题后，作者认为，如果不对中国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权力关系进行根本性转变，结构性父权制将继续存在，那么，任何试图“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可能都无法如愿以偿（参见本书中克尔卡尔和阿格瓦尔的文章）。

5.1.3 这些案例研究将女性及其能动性置于分析的中心。研究表明，女性往往站在反对中国矿业公司和水电大坝项目抗争的最前线，在某些情况下，她们通过地方行动和跨国倡导成功地停止了这些项目。这些案例研究中的大多数都采访了女性、女性组织和女性活动家，并放大了女性的声音。在本书中，黛安娜·卡斯特罗对秘鲁和厄瓜多尔两个采矿项目的案例研究表明，女性在地方层面的代表性不低，并且一些女性领导人拥有很高的公众合法性；然而，她们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她们的参与还非常有限，有时甚至不为人所知。韦斯比奇（Waisbich）在本书的文章中指出，在反对中国投资的肯尼亚发电厂和东南亚水电大坝的运动中，这些成功的跨国运动的领导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提出性别问题，也没有讨论或优先考虑性别问题。

本书的作者们指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持续存在、将环境影响等其他问题作为优先议题的战略考量、运动中对性别问题的淡化以及缺乏性别意识和相关政策指导，这些都是导致性别盲点的因素。

5.1.4 这些案例研究立足于全球南方国家妇女的现实和经验，将关注点从中国转向接受中国发展融资和投资的东道国，从而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对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承担责任。提升受援国和受影响社区的能力建设非常重要，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与中国进行互动和谈判，增强对投资者以及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对环境与人权的问责（参见本书中蒙图特等人的文章、鲁图的文章、卡萨和芬古的文章）。地方上的社区活动家、国家层面的行动者和东道国的相关机构，他们都在挑战存在社会和环境争议与风险的项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迫使一些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政府和商业参与者重新考虑投资计划和政策优先事项。在肯尼亚的拉穆案例中尤为突出，其中还包括了多边机构的广泛参与，包括共同融资机构、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等。他们的参与使得肯尼亚的倡导团体开展

与中国相关的倡导活动之外，也开展更广泛的跨国倡导活动从而施加更多压力（参见本书中韦斯比奇的文章）。

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应加强与当地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和女性权利组织的伙伴关系与合作，以确保它们在国际发展合作过程中对性别平等的承诺，使妇女发展能落到实处并且满足国家的发展需求。这些研究案例明确呼吁，应该加强妇女运动的跨国倡导和南方国家之间的女性主义联盟与团结（参见本书中卡斯特罗的文章、克尔卡尔和阿格瓦尔的文章）。

5.2 对研究结果和主要发现的反思

自本研究项目启动以来，DAWN 一直刻意避免提出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假设。相反，我们让每个案例研究的作者自行确定他们的研究问题、假设、总体概念和方法。随着项目的进展和研究成果的问世，我们现在确实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从性别视角出发审视这项研究中展现出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关键问题，并且把这些问题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探讨，即：在当前风云诡谲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扮演着何种角色。

5.2.1 重新思考南南关系和促进南南合作中的性别议题

中国并不是全球发展融资中唯一的新兴角色，但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中国宣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2023）。同时，中国避免被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捐赠国。中国的外交政策基于长期以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该政策是由周恩来总理在 1953 年中印谈判中提出的，随后在 1955 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上扩展为万隆十项原则。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还遵循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不干涉、无条件性和互惠原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a）。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冷战政治，指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特定领域基于相互需求进行合作，分享知识、技能以及倡议，以实现各自和 / 或共同的利益，如农业、城市化和健康。自 1978 年召开首次高级别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及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以来，南南合作不断发展。

在当前背景下，特别是自 2019 年 3 月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高级别南南合作会议（BAPA+40）以来，南南合作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重要框架，其

活力被进一步激发，以补充传统的南北合作（Mawdsley 2014，Gray 和 Gills 2016，联合国 2019，Haug 2022，Waisbich 和 Mawdsley 2022）。南南合作的目的是为南方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其实践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如伙伴关系与团结、相互尊重与互惠互利、尊重国家主权、相互平等、无附加条件、不干涉内政以及增强多边主义（G77 和中国 2019，联合国 2019）。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推动下，南南合作的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出新趋势，例如，它吸引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各种非国家参与者，推动南南合作以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当前南南合作的新趋势给人们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在推进保障人权的作用方面，南南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人权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南南合作如何具体而有意义地在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吸引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包括女性权利倡导组织的参与？因为南南合作强调其包容性和重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

BAPA+40 会议的成果文件承认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性别平等目标以及为女性和女孩赋权方面的贡献，并鼓励进一步尝试将性别视角纳入这些合作模式（联合国 2019）。遗憾的是，该文件并未提供关于如何将性别观点纳入南南合作中的性别主流化实操手册；这种知识只能产生于广泛的实践探索。

本书中的这些案例研究考察了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实践，并促使我们从性别视角重新思考南南合作。首先，将性别视角纳入南南合作，有助于将南南合作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发展合作。自南南合作产生以来，它的特点主要是以国家为中心。大多数万隆原则提及的都是国家主体（除了“促进互利和合作”这一原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1978 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主要聚焦于国家之间的合作。DAWN 的研究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不足和局限性。正如这些案例研究所展示的，虽然中国优先考虑国家间的联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南南合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家关系的范畴。

其次，将性别视角引入南南合作可以加强以整体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既满足妇女发展的实际需求，又最大程度地促进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的战略需求，超越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发展权和人权话语上的对立。正如一些全球南方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融资可能有助于改善社会和经济权利，但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当地社区的参与，这些投资可能会阻碍公民和政治权利（Osundu-Oti 2016，Kamga 2018）。性别视角与人权方法可以相辅相成，促进整体的发展和

人权的提高。正如韦斯比奇的案例研究所示，尽管权利导向的倡导在中国的政策倡导工作中可能尚未找到一种容易和直接的方式，但它肯定有助于在未来为性别问题寻求可见性创造空间(参见本书中韦斯比奇的文章)。

第三，在南南合作中引入性别视角可以增强问责制，而这种问责机制离不开这些国家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的努力与合作。这要求更多的民间社会团体和受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接受监督的不仅是政府(迄今为止，政府是南南合作的支柱)，还需要关注其他参与者，例如商业部门。在关于中国-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案例研究中，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小农户提供培训的就是一家中国企业。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指出，在民间社会团体之间，尤其是妇女组织之间，建立更多更好的南南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公民社会的南南关系可以使中国组织听到发展中国家团体与在海外的中国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经验。

5.2.2 挑战将性别问题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附加条件，并质疑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框架

过去十年，国际发展合作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标志包括2011年在釜山举行的第四届援助有效性的高级别论坛，以及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的发展融资有助于填补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据估计，每年的资金缺口在2.5万亿至4万亿美元之间(联合国2024)。中国的发展融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和教育领域，以满足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需求。这些正是 DAWN 此项研究所分析的重点领域。

目前还很少有研究探讨中国援助项目与传统捐助项目对性别的影响。张传红和黄振乾(2023)的研究比较了世界银行(WB)和中国在非洲的援助项目，并得出结论——世界银行的援助增加了当地对性别平等的支持，其结果在不同部门和性别之间效果也有所不同。那些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部门在接受外国援助之后，在提高妇女对性别平等的态度方面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有助于向当地民众传播性别平等的社会规范。相比之下，中国的援助没有显示出类似的效果。

与传统援助相比，中国的发展援助通常被接受国视为更具吸引力，因为它区别于其他捐赠国或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附加任何政策条件(Li 2017)。援助的附加条件是指捐赠国或捐赠机构要求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改变政策、或引入某些政策、或进行结构性调整，作为获得其资金的要求

和条件。支持援助附加条件的倡导者，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有助于确保接受国采纳强有力和有效的政策，通常意味着财政紧缩政策，或促进受援国的民主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期不详)。然而，实证证据表明，援助附加条件是否能促进非洲及其他地区的民主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历史背景(Kentikelenis 等2016, Li 2017, 张传红和黄振乾2023)，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附加条件带来的结果。

此外，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捐赠者施加的条件并未导致性别平等和女性地位的改善。相反，它加剧了女性和最边缘化群体的困境。由于援助的附加条件通常涉及紧缩措施以及对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教育公共融资的削减，这严重削弱了受援国的政策选择和能力(Alemaný 和 Dede 2008, Muchhala 2024)。当附加条件涉及人权和性别问题，改革性别歧视的习惯法、同性恋权利等问题，它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有争议，并遭遇受援国政府的抵制(Lange 和 Tjomsland 2014, Provost 2023)。

为什么许多南方国家政府不再是顺从的发展伙伴，而是采取更自信的立场？这种新的自信部分源于南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崛起，部分是因为像中国这样的新捐助者提供了新的资金资源。这当然受到全球南方国家政府的欢迎，但这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女性来说是好消息吗？本研究特别关注评估中国发展合作中的不附加条件这一政策对全球南方国家女性的意义，并探讨性别问题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可能，融入这一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主流化战略被传统援助国、多边发展机构和国际发展非政府组织广泛采用。性别主流化的定义是指“评估所有领域和所有层面的任何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的过程”(联合国1997)。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证据表明，性别主流化政策和战略的实施主要依赖于受援国政府的配合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大力支持。

本书的案例研究显示，与传统发展伙伴相比，中国参与者没有采用性别主流化方法，与当地社区或妇女非政府组织很少互动(参见本书中卡斯特罗、鲁图、波拉德、韦斯比奇和李明德的文章)。例如，所罗门群岛的居民并不了解中国-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具体内容，因为该文件从未公开，而2017年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安全条约则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参见本书中波拉德的文章)。在汤加，汤加公民社会论坛的一个妇女团体在发展伙伴的支持下，在其社区发起了性别平

等意识宣传项目；然而，她们不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也不知道一带一路项目中是否有关关注汤加妇女发展的项目（参见本书中鲁图的文章）。

在此背景下，采用何种方式，可以促使中国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发展合作中考虑性别平等，同时又不违背其无附加条件和干涉内政的原则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探究一下“女性主义外交政策”这一新兴趋势，可能会有所裨益。

近年来，一些国家将其外交政策重新标签为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瑞典在2014年率先推出（随着2022年新政府的上台，瑞典当前已经退出了这一政策），随后加拿大（2017年）、法国（2019年）、墨西哥（2020年）、卢森堡（2021年）、西班牙（2021年）、智利（2022年）、利比里亚（2022年）、哥伦比亚（2022年）和德国（2022年）等国相继跟进，这些国家声明其外交政策将把妇女和女孩置于工作的核心，并确保女性主义视角将成为政策的中心。一些妇女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女性发展机构（IWDA）和国际女性研究中心（ICRW），汇聚了女性主义学者、活动家和政治学家，并组织了相关讨论。女性主义外交政策遵循四个“R”的原则，即：权利（rights）、代表（representation）、资源（resource）和现实（reality）。

这意味着要检视女孩和妇女是否与男孩和男人享有同等的人权，妇女在地方和联邦政府中是否得到充分代表，以及国家预算是否关注性别问题，并分配了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女孩和妇女的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政策不会立即改变现状（瑞典政府办公室 日期不详，ICRW 日期不详，Köhler 2022，Foteini 2023，Ridge 等 2019，Conley 2022，联合国妇女署 日期不详，Thompson 2020）。各国需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实施这样的政策。总体来看，在过去十年中，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非常简单化、选择性强且不系统；也就是说，这一政策并没有反映在与外交相关的行动、战略、政策中，甚至也没有反映在跟外交有关的大部分融资中。此外，女性主义外交政策没有解决诸如紧缩政策和援助附加条件等宏观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性别和其他政策的背景，并直接影响着女性的福祉。

使用意识形态来指导外交政策并非新鲜事。这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反帝国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中观察到（Choudhury 2020），也在1970年代末期吉米·卡特总统将人权理念融入美国外交政策中有迹可循（Moyn 2010，Donnelly 和 Whelan 2020）。女性主义外交政策应该对现存的根深蒂固的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等级进行变革，倡导经济福祉，尊重环境，并确保和平。这应该是各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同时采取综合性和交叉性的方法解决这些

问题。遗憾的是，在现实政治中，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与其理想相去甚远。在日益两极化和对立的世界中，女性主义议程被当作武器，用于对某些国家实施制裁，有时甚至被用来交换其他政治利益。因此，女性主义外交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误解为仅仅是提高性别意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成为维护霸权和超级大国地位的工具。例如，在一篇关于推进女性主义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中，作者问道：“美国能否利用在诸如‘妇女、和平与安全（WPS）’议程等领域的进展，成为一个引领性别平等议题的超级大国？”（Graham 和 Corrado 2021）。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和加沙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使得这些女性主义外交政策倡导变得更加困难。

5.2.3 迈向南方女性主义的合作与团结，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公正发展

在这里需要重申，正如许多研究者和倡导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附加条件。指出当前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倡导中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女性主义原则和女性主义政治，这些原则和政治深深植根于广大妇女、不符合性别规范者、以及受压迫和边缘化群体所经历的反对父权制和不公正的不懈斗争和行动中。从上述分析和本项研究的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附加条件还是女性主义外交政策框架都不是将性别问题纳入中国参与全球南方的可行途径。如果是这样，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DAWN 的本项研究正是旨在从全球南方的经验和视角出发，提供新的思路和创新的行动。

从所有案例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实现性别平等和实现妇女人权不是一种需要附加的条件，而是一个应纳入各国发展议程的目标。这也是各国政府通过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积极努力实现的目标，以及通过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妇女人权公约和政策框架做出的庄严承诺。毫无疑问，国际发展合作也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助力。为此，这一进程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承担责任。尽管中国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商业协会发布了越来越多的指导方针，以促进在海外经营的公司取得良好业绩，但在性别相关问题基本上仍付之阙如。关于中国投资的矿业项目的两个案例研究显示，中国公司未能妥善应对当地社区在透明度、问责制和人权等方面的要求，并且缺乏有效的尽职调查、全面风险评估、对话和补偿机制（参见本书中卡斯特罗、卡萨和芬古的文章）。在本书中蒙图特等人的文章强调，尽管中国应该承担其相应的责任，但加勒比海国家的政府应被视为“积极行动的主体，作为独立的主权

国家，在执行与中国相关的发展项目时，完全有能力塑造和影响项目的性质和内容”。

研究表明，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方面，可以并肩携手相向而行。他们都担负着各自的责任，有义务履行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承诺。在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30 周年之际的当下，重新审视这些承诺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需要继续探索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定位性别问题。可喜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例如，2024 年 4 月 29 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合作成立了全球妇女发展合作交流培训基地。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承诺通过提供培训、为妇女就业和创业提供资金、支持联合国妇女署以及促进全球妇女合作与交流来增加对妇女国际发展合作的支持（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2024）。这一新成立的机构是一个良好的交流与倡导平台，可以促进将性别问题更好地融入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之中。

一直以来，中国和全球南方女性主义者积极利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定期审议机制进行倡导，并加强全球南方女权主义的团结。妇女组织——生态行动（Acción Ecológica）和合作行动（Cooper Acción）于 2023 年 4 月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影子报告。该报告提请委员会关注中国政府履行其域外义务和对该公约的承诺，即：在其国家领土之外保护妇女的人权，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在秘鲁和厄瓜多尔运营的采矿项目中对当地妇女带来的影响（Acción Ecológica 和 Cooper Acción 2023）。妇女组织的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建立监督机制，以监测、调查和制止因在其境外运营的中国国有公司矿业活动而导致女性权利受到侵犯。令人鼓舞的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对中国第九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有两段内容回应了这一呼吁。其中提到“在 2021 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确定了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八个合作领域”，并呼吁中国政府“确保《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明确规定《公约》的基本保障”（联合国 CEDAW 委员会 2023）。这一结论性意见已经由妇女组织翻译并在社区分发，作为进一步宣传倡导的工具。这只是女性主义南南合作的一个例子，它将研究与行动相结合，将本地、国家和全球层面相联系。

参考文献

阿德里安娜·厄塞尔·阿布德努尔(Adriana Erthal Abdenur)。2014年。《中国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南南合作中的合法性和多边主义》。(China and th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Legitimacy and Multilateralism i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DS Bulletin 45 (4): 85-101。 <https://doi.org/10.1111/1759-5436.12095>

生态行动组织(Acción Ecológica)、合作行动组织(CooperAcción)。2023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85届会议中国审议影子报告。可在联合国条约机构数据库下载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EDAW%2FCSS%2FCHN%2F52211&Lang=en (2025年1月20日访问)

塞西莉娅·阿莱曼尼(Cecilia Alemany)、格莱希亚拉·德德(Graciela Dede)。2008年。《附加条件削弱发展权：基于妇女和人权视角的分析》，由 WIDE、AWID、DAWN、IGTN 出版。

保罗·阿马尔(Paul Amar)、罗丽莎(Lisa Rofel)、玛丽亚·阿米莉亚·比特利(Maria Amelia Viteri)、康塞罗·费尔南德斯-萨尔瓦多(Consuelo Fernandez-Salvador)、费尔南多·布兰克里(Fernando Brancoli)主编。2022年。《热带丝绸之路：中国在南美的未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The Tropical Silk Road: The Future of China in South Ameri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比森(Mark Beeson)。2018年。《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学：“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大战略》，载于《经济与政治研究》，6:3，240-256。(Go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I and China's evolving grand strategy,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6:3, 240-256) <https://doi.org/10.1080/20954816.2018.1498988>

维多利亚·博纳尔(Victoria Bernal)、茵德帕尔·格雷瓦尔(Inderpal Grewal)主编。2014年。《将 NGO 理论化：国家、女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Theorizing NGOs: States, Feminisms, and Neoliber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莎拉·M·布鲁克斯(Sarah M. Brooks)。2018年。《人权的未来会是“中国制造”吗?》，载于《中国制造期刊》(博客)。(Will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Be ‘Made in China’ ? In Made in China Journal) 2018年7月7日。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8/07/07/will-the-future-of-human-rights-be-made-in-china/> (2024年9月30日访问)

戴尔德蕾·C·拜恩(Deirdre C. Byrne)、泽艾托伊乐·伊玛(Z'étoile Imma)。2019年。《为什么是“南方女权主义”？》，载于《议程》，(Why ‘Southern Feminisms’ ?, In Agenda) 33:3, 2-7。 <https://doi.org/10.1080/10130950.2019.1697043>

蔡一平。2021年。《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与中国参与全球事务有何关系？》。载于《女性主义研究》(What Do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 s Rights Have to Do with China’ s Global Engagement? In Feminist Studies) 47 ; 第2期。450-462。

蔡一平。2024年。《在合作与解放之间：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权力转移》，载于《全球政策》，(Between cooptation and emancipation: Chinese women’ s NGOs and power shifts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Global Policy, 15(Suppl. 2)15(增刊2), 148-159。 <https://doi.org/10.1111/1758-5899.13369>

蔡一平、李英桃。2021年。《从性别角度看全球中国》，载于 IDEES。第52期。“世界危机前的中国”。(Global China from a Gender Lens, IDEES. No. 52. “China before a World in crisis” .) <https://revistaidees.cat/en/global-china-from-a-gender-lens/> (2024年9月30日访问)

蔡一平、于音。2022年。《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对性别影响的分析框架》。苏瓦：DAWN。(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the Gender Impact of China’ s Global Engagement in the Global South. Suva: DAWN.) <https://www.dawnfeminist.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20230202-China-Analytical-Framework.pdf> (2024年9月30日访问)

陈智宏(Gerald Chan)。2015年。《中国关注东盟》，载于《亚洲安全与国际事务杂志》(China Eyes ASEAN. In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 (1): 75-91。

陈卫炜。2022年。《中国与非洲：埃塞俄比亚案例研究揭穿投资神话》，载于《对话》。(China and Africa: Ethiopia Case Study Debunks Investment Myths. In The Conversation.) <http://theconversation.com/china-and-africa-ethiopia-case-study-debunks->

[investment-myths-177098](#) (2024年10月1日访问)

G. · W. · 乔杜里 (Golam Wahed Choudhury)。2020年。《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 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劳特利奇出版社。(China in World Affair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RC Since 1970. Routledge.)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CIDCA)。2023年。《王毅：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http://en.cidca.gov.cn/2023-07/12/c_902381.htm (2024年10月2日访问)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CIDCA)。2024年。《“全球发展合作交流培训基地”揭牌仪式暨全球妇女发展合作研讨会在京举办》。2024年4月29日。<http://www.cidca.gov.cn/20240429/84700be0b2694f20bace5e7acb1fc094/c.html> (2024年8月9日访问)

麦迪逊·康东 (Madison Condon)。2012年。《中国在非洲：不干预政策给西方发展困境带来的影响》，载于《弗莱彻人类安全杂志》，第27卷，5-25页。(China in Africa: What the Policy of Nonintervention Adds to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Dilemma. In The Fletcher Journal of Human Security. Vol. 27. 5-25.)

M. · 康雷 (Mikaela Conley)。2022年。《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数量增加。它们重要吗？》载于《蓝色通行证》(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Increase in Number. Do They Matter? In PassBlue)，2022年2月14日。<https://us4.campaign-archive.com/?e=cc2f9fa8a0&u=5d5693a8f1af2d4b6cb3160e8&id=b43bc511b7> (2025年1月20日访问)

卡伦·戴尔福 (Karen Delfau) 和皮查蒙·尤凡通 (Pichamon Yeophantong)。2020年。《知识状况：湄公河地区的妇女与河流》。美国奥克兰：国际河流。(State of Knowledge: Women and Rivers in the Mekong Region. Oakland, USA: International Rivers.)

杰克·唐奈利 (Jack Donnelly) 和丹尼尔·J·卫兰 (Daniel J. Whelan)。2020年。《国际人权》，第六版，劳特利奇出版社。(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ixth Edition, Routledge.)

罗斯玛丽·福特 (Rosemary Foot)。2020年。《从内部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国？》，载于《东亚论坛》。2020年8月3日。(Shaping from within: A U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ast Asia Forum. August 3, 2020.)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8/03/shaping-from-within-a-u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2024年9月30日访问)

帕帕杰奥蒂·福泰尼 (Papagioti Foteini)。2023年。《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指数：对女权主义承诺的定性评估》。华盛顿特区：国际妇女研究中心。(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dex: A 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Feminist Commitment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on Women.)

伊万·弗朗西斯基尼 (Ivan Franceschini)、尼古拉斯·罗贝里 (Nicholas Loubere) 主编。2022年。《全球中国作为方法》，第一版。剑桥大学出版社。(Global China as Method. 1st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999472>

伊万·弗朗西斯基尼 (Ivan Franceschini)、尼古拉斯·罗贝里 (Nicholas Loubere) 主编。2021年。《一带一路考古学》。载于《中国制造》期刊。第6卷，第2期。(Archaeolog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Made in China Journal. Volume 6, Issue 2.)

阿多姆·盖塔楚 (Adom Getachew)。2019年。《帝国之后的世界构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瑞典政府办公室、外交部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日期不详。《瑞典的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手册》。(Handbook: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雪莉·格雷汉姆 (Shirley Graham)、梅根·E·科拉多 (Megan E. Corrado)。2021年。《如何推进美国女权主义外交政策》。(How to Advance a Feminist U.S. Foreign Policy.)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1/03/how-advance-feminist-us-foreign-policy> (2023年1月23日访问，网络链接现已失效。)

凯文·格雷 (Kevin Gray)、巴瑞·K·吉尔斯 (Barry K. Gills)。2016年。《南南合作与全球南方的崛起》，载于《第三世界季刊》。(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4, 557-574。

77国集团和中国。2019年。《77国集团和中国主席国巴勒斯坦国在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上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表的声明》(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Group 77 and China by the State of Palestine, Chair of G77 and China, at the Second UN High-Level Conference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2019年3月20日。

塞巴斯蒂安·豪格 (Sebastian Haug)。2022年。《超越主流化？联合国对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的支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于《亚洲建设和平杂志》。

(Beyond Mainstream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UN Support for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Asia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第 10 卷第 1 期。15-44。

塞巴斯蒂安·豪格(Sebastian Haug) 2024 年。《相互合法化的尝试：联合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载于《国际事务》。(Mutual legitimization attempt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hina' 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0:3 (2024) 1207-1230。 <https://doi.org/10.1093/ia/iiae020>

塞巴斯蒂安·豪格(Sebastian Haug)、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麦克斯-奥托·鲍曼(Max-Otto Baumann)。2024 年。《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转移：中国在联合国》。载于《全球政策》(Power shift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China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Global Policy), 15 (增刊 2), 5-17。 <https://doi.org/10.1111/1758-5899.13368>

黄思然、刘皓雪、周璇、张宏福。2018 年。《中国农业海外投资性别影响调研报告 -- 以中国农业企业投资海外老挝、柬埔寨为例》。商道纵横。 <https://syntao.com.cn/newsinfo/2110671.html> (2025 年 1 月 20 日访问)

黄益平。2016 年。《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动机、框架和评估》，载于《中国经济评论》40 (9 月)：314-321。(Understanding China' s Belt & Road Initiative: Motivation,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In China Economic Review 40 (September): 314-321.)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6.07.007>

拉娜·S·尹伯顿(Rana Siu Inboden)。2021 年。《中国在联合国：扼杀公民社会》，载于《民主杂志》，第 32 卷，第 3 期，124-135。(China at the UN: Choking Civil Society.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2, No. 3, 124-135)

国际妇女研究中心(ICRW)。日期不详。美国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a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icrw.org/publications/toward-a-feminist-foreign-policy-in-the-united-states/> (2023 年 1 月 23 日访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期不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性》。(IMF Conditionality) <https://www.imf.org/en/About/Factsheets/Sheets/2023/IMF-Conditionality> (2024 年 10 月 2 日访问)

苏茜(Susie Jolly)。2016 年。《为什么性别和性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核心》，载于《公正很重要》，福特基金会。(Why Gender and Sexuality are Central to China' 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lobal South, Just Matters, Ford Foundation)

<https://www.fordfoundation.org/news-and-stories/stories/why-gender-and-sexuality-are-central-to-chinas-relationships-with-the-global-south/> (2024年9月30日访问)

奈拉·卡比尔 (Naila Kabeer)。2005年。《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对千年发展目标1的批判性分析》，载于《性别与发展》，13:1，13-24。(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1, In Gender & Development, 13:1, 13-24.)

塞尔吉斯·D·卡姆加 (Serges Djoyou Kamga)。2018年。《关于实现发展权的一些思考》，载于《历史指南针》。(Realiz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Some reflections. In History Compass.) <https://doi.org/10.1111/hic3.12460>

亚历山德尔·E·肯帝克兰尼斯 (Alexander E. Kentikelenis)、托马斯·H·斯塔勃斯 (Thomas H. Stubbs)、劳伦斯·P·金 (Lawrence P. King)。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性和发展政策空间，1985-2014年》，载于《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3:4，543-582。(IMF conditi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space, 1985-2014,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4, 543-582) <https://doi.org/10.1080/09692290.2016.1174953>

阿贝尔·金永多 (Abel Kinyondo)。2019年。《中国正在重新殖民非洲吗？坦桑尼亚的视角》，载于《世界事务》182 (2): 128-64。(Is China Recolonizing Africa? Some Views from Tanzania. In World Affairs 182 (2): 128-64.) <https://doi.org/10.1177/0043820019839331>

加布里埃尔·科勒 (Gabriele Köhler)。2022年。《女权主义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 <https://www.icrw.org/publications/toward-a-feminist-foreign-policy-in-the-united-states/> (2022年7月20日访问)

拉丁美洲可持续发展组织 (LAS)。日期不详。《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和社会指南汇编》(Compila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Guidelines for Operations abroad) <https://latsustainable.org/en/chinese-guidelines/>

李静君 (Ching Kwan Lee)。2017年。《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工和外国投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李静君 (Ching Kwan Lee)。2022年。《全球中国20年：为什么、如何、以及那又怎样？》，载于《中国季刊》250 (六月): 313-331。(Global China at 20:

Why, How and So What? In *The China Quarterly* 250 (June): 313-331.)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22000686>

李晓隽。2017年。《条件性还有效吗？中国的发展援助与非洲的民主》，载于《中国政治学评论》。第2卷，201-220。(Does Conditionality Still Work?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I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 201-220) <https://doi.org/10.1007/s41111-017-0050-6>

梁晓晖。201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的性别平等问题：以越南、缅甸、孟加拉国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为例》，载于《中国法律前沿》14 (4)：478-499。(Gender Equality in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Case Studies on Chinese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in Vietnam, Myanmar, and Bangladesh.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14 (4): 478-499)

林春。2019年。《中国的新全球化》。载于雷欧·帕尼奇(Leo Panitch)和格雷·阿尔博(Greg Albo)主编的《社会主义纪事》第55卷：《世界颠倒了？》。纽约大学出版社、每月评论出版社。150-172。(China's New Globalism. In Leo Panitch and Greg Albo (eds.) *Socialist Register Vol. 55: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onthly Review Press. 150-172)

刘乐【音译】。2021年a。《联合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载于《国际论坛》，第4卷，27-48。(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4, 27-48)

刘奕德(Petrus Liu)。2021年b。《北京共识时代的性别思考》，载于《女性主义研究》47 (2): 341-371。(Thinking Gender in the Age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In *Feminist Studies* 47 (2): 341-371.)

陆海娜、梁晓晖、王陈平。2018年。《“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性别平等》。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http://www.csc9000.org.cn/d/file/p/2021/08-19/9902874f39db60ec64729dc46c2a33e6.pdf>) (2025年1月21日访问)

阿马尔·A·马励克(Ammar A. Malik)、布莱德利·帕克斯(Bradley Parks)、布鲁克·罗素(Brook Russell)、林佳慧【音译】(Joyce Jiahui Lin)、凯瑟琳·沃什(Katherine Walsh)、凯拉·所罗门(Kyra Solomon)、张晟【音译】(Sheng Zhang)、泰彬·埃斯顿(Thai-Binh Elston)、赛斯·古德曼(Seth Goodman)。2021年。《投资“一带一路”：基于13427个中国发展项目的新全球数据库的分析》。援助数据。(Bank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sights from a new global dataset of 13,427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AidData.)

艾玛·莫兹利 (Emma Mawdsley)。2014年。《人权与南南发展合作：对“崛起大国”作为国际发展行为体的思考》，载于《人权季刊》。2014年8月，第36卷，第3期，630-652页。(Human Rights and South-Sout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Rising Powers” 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ctors. I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August 2014, Vol. 36, No. 3, 630-652)

钱德拉·莫汉蒂 (Chandra Mohanty)。2003年。《女权主义无国界：去殖民化理论，实践团结》。杜克大学出版社。(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钱德拉·莫汉蒂 (Chandra Mohanty)、安·卢梭 (Ann Russo)、罗德斯·托雷斯 (Lourdes Torres) 主编。1991年。《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罗宾·摩根 (Robin Morgan) 主编。1984年。《姐妹情谊是全球性的：国际妇女运动文集》。铁锚图书。(Sisterhood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Anchor Books.)

罗宾·摩根 (Robin Morgan) 主编。2003年。《姐妹情谊是永恒的：新千年女性文集》。华盛顿广场出版社。(Sisterhood is Forever: The Women’s anthology for a new millennium.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塞缪尔·莫因 (Samuel Moyn)。2010年。《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上的人权》。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出版社。(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沃尔特·米格诺罗 (Walter D. Mignolo)。2011年。《全球南方与世界秩序》，载于《人类学研究杂志》。第67卷，第2期，165-188。(The Global South and World Dis/order.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Vol. 67, No. 2, 165-1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年)》。http://www.focac.org/eng/zywx_1/zywj/202201/t20220124_10632444.htm (2025年1月21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年)》。http://www.focac.org/eng/zywx_1/zywj/202409/t20240926_11497783.htm (2025

年1月21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未来峰会和第79届联合国大会的立场文件》。https://www.fmprc.gov.cn/eng/zy/wjzc/202409/t20240920_11493896.html (2024年9月23日访问)

布米卡·穆查哈拉 (Bhumika Muchhala)。2024年。《从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全球南方的公平与正义》。第三世界网络。(A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Lens Towards Equity and Justice in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Network)

大桥英郎 (Hideo Ohashi)。2018年。《中国开放政策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倡议》，载于《当代东亚研究杂志》，7:2，85-103。(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7:2, 85-103) <https://doi.org/10.1080/24761028.2018.1564615>

阿道拉·奥松杜 - 奥蒂 (Adaora Osondu-Oti)。2016年。《中国与非洲：人权视角》。载于《非洲与发展》。第41卷。第1期，49-80。(China and Afric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In Africa Development/Afrique et Développement. Vol. 41, No.1, 49-80)

马琳·乌德 (Malin Oud)。2020年。《和谐融合：中国与发展权》，载于纳德格·罗兰德 (Nadège Rolland) 主编《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秩序——中国对世界新秩序愿景的实践》。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特别报告第87号。(Harmonic Convergence: China and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Nadège Rolland (ed.) An emerging China-centric order -- China'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 in Practic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pecial Report #87.)

维杰·普拉沙德 (Vijay Prashad)。2007年。《深色国度：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新出版社。(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The New Press.)

克莱尔·普罗沃斯特 (Claire Provost)。2023年。《反 LGBTQI 的进步资金？援助捐助者和“女权主义”政府如何资助乌干达极端反同性恋法案的支持者》。新闻与社会变革研究所。(Progressive cash for the anti-LGBTQI backlash? How aid donors and 'feminist' governments have funded backers of Uganda's deadly Anti-Homosexuality Bill. The Institute for Journalism and Social Change.)

伯特兰·G·拉玛查兰 (Bertrand G. Ramacharan)。2016年。《规范性人权的传递，

北方和南方》。载于《第三世界季刊》，第37卷第7期，第1234-1251页。(Normative human rights cascades, North and South.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7, 1234-1251.)
<https://doi.org/10.1080/01436597.2016.1154438>

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2022年。《重新思考中国的软实力：埃塞俄比亚孔子学院的“务实诱惑”》。载于《中国季刊》250 (六月)：440-463。(Rethinking China’ s Soft Power: ‘Pragmatic Entice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Ethiopia. The China Quarterly 250 (June): 440-463.)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22000340>

爱丽丝·瑞志(Alice Ridge)、卡罗琳·兰伯特(Caroline Lambert)、乔安·克劳福德(Joanne Crawford)、瑞秋·克莱门特(Rachel Clement)、林奇·托马斯(Lyric Thompson)、莎拉·甘马奇(Sarah Gammage)、安妮·玛丽亚·戈麦斯(Anne Marie Goetz)。2019年。《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关键原则和问责机制》。(Feminist Foreign Policy Key Principles &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WDA、ICRW、纽约大学。

罗丽莎(lisa Rofel)、罗鹏(Carols Rojas)主编。2022年。《新世界秩序：中国与全球南方》。杜克大学出版社。(New World Ordering :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Duking University Press.)

吉塔·森(Gita Sen)、卡伦·格罗恩(Caren Grown)。1987年。《发展、危机和另类愿景：第三世界妇女的视角》。新女权主义图书馆。(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Third World Women’ s Perspectives. New Feminist Library.)

谢世宏(Shawn Shieh)、周龙炜(Lowell Chow)、黄钟、岳晋飞。2021年。《了解和减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风险：尼泊尔和赞比亚的证据》。ODI : 《思考变革》。(Understanding and Mitigating Social Risk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s BRI: Evidence from Nepal and Zambia. ODI: Think Change.)
2021年4月1日。 <https://odi.org/en/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and-mitigating-social-risks-to-sustainable-development-in-chinas-bri-evidence-from-nepal-and-zambia/>

阿吉特·辛(Ajit Singh)。2021年。《“债务陷阱外交”的神话与中国发展融资的现实》。载于《第三世界季刊》42 (2): 239-253。(The Myth of ‘Debt-Trap Diplomacy’ and Realitie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https://doi.org/10.1080/01436597.2020.1807318>

阿尔文·Y·索(Alvin Y. So)。2010年。《全球化与中国：从新自由主义资

本主义到东亚的国家发展主义》。载于贝尔赫·贝尔贝罗格鲁 (Berch Berberoglu) 主编《21世纪的全球化》，第133-154页。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Globalization and China: From Neoliberal Capitalism to State Developmentalism in East Asia. Berch Berberoglu (ed.)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133-15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106390_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北京宣言》。2017年12月11日。http://english.scio.gov.cn/scionews/2017-12/11/content_50096884.htm (2024年10月1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https://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paper/202101/10/content_WS5ffa6bbbc6d0f72576943922.html (2024年9月30日访问)

马修·D·史蒂芬 (Matthew D. Stephen)。2021年。《中国的新多边机构：框架和研究议程》，载于《国际研究评论》23 (3): 807-834。(China's New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3 (3): 807-834) <https://doi.org/10.1093/isr/viaa076>

全球中国人民地图。<https://thepeoplesmap.net>

白宫。2022年。《事实简报：拜登总统和七国集团领导人正式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Formally Launch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2022年6月26日。<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6/13/fact-sheet-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at-the-g7-summit-2/>

里瑞克·汤普森 (Lyric Thompson)。2020年。《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框架》。华盛顿特区：国际女性主义中心女性研究。(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 Framework.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https://www.icrw.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FFP_Framework_EN_June2021update.pdf (2024年10月2日访问)

杰森·G·陶尔 (Jason G. Tower)。2020年。《冲突动态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对和平道路上冲突的忽视》。载于《分析》97。德国柏林：世界粮惠组织。(Conflict Dynamic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gnoring Conflict on the Road to Peace. Analysis 97. Berlin, Germany: Brot für die Welt.)

乌切楚库·乌钦杜 (Uchechukwu Uchendu)、格里特·若茨 (Griet Roets)、米歇尔·范登布鲁克 (Michel vandenbroeck)。2019年。《绘制尼日利亚伊博族妇女研究中的性别结构图：拥抱南方女权主义理论视角》，载于《性别与教育》，第31卷，第4期，580-524。(Mapping constructs of gender in research on Igbo women in Nigeria: embracing a southern feminis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Gender and Education, Vol. 31, No. 4, 580-524)

联合国妇女署。日期不详。《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导论》。(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An Introduction.)

联合国。1997年。《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3号(A/52/3/Rev.1)

联合国。2019年。A/RES/73/291。《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2019年4月15日。<https://www.unsouthsouth.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N1911172.pdf> (2024年10月2日访问)

联合国。2024年。《2024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Financ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2023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对中国第九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EDAW/C/CHN/CO/9。2023年5月31日。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2013年。《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 (Laura Trajber Waisbich)、艾玛·莫兹利 (Emma Mawdsley)。2022年。《南南合作》。载于凯琳·西姆斯等主编。《全球发展手册》。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82-92。(South-South Cooperation. Kearnin Sims et al., eds. Handbook of Glob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82-92.)

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 (Laura Trajber Waisbich)、苏普里娅·罗伊乔胡里 (Supriya Roychoudhury)、塞巴斯蒂安·豪格 (Sebastian Haug)。2021年。《超越单一故事：“全球南方”的复调》。载于《第三世界季刊》，42:9，第2086-2095页。(Beyond the single story: ‘Global South’ polyphonies.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42:9, 2086-2095.)

托马斯·G·韦斯(Thomas G. Weiss)、帕拉维·罗伊(Pallavi Roy)。2016 年。《联合国与全球南方，1945 年和 2015 年：作为序幕的历史?》，载于《第三世界季刊》，37:7, 1147-1155。(The UN and the Global South, 1945 and 2015: past as prelude?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7, 1147-1155.)

安德列亚·沃登(Andréa Worden)。2020 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于纳德格·罗兰德(Nadège Rolland)主编《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秩序——中国对世界新秩序愿景的实践》。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特别报告第 87 号。(China at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Conjur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Nadège Rolland (ed.) An emerging China-centric order -- China’ 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 in Practic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pecial Report #87.)

习近平。2015 年。《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全球领导人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会议上的讲话。https://www.fmprc.gov.cn/eng/xw/zyjh/202405/t20240530_11340950.html (2024 年 9 月 30 日访问)

习近平。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二十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https://www.fmprc.gov.cn/eng/xw/zyjh/202405/t20240530_11341460.html (2024 年 9 月 30 日访问)

习近平。2024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406/28/WS667e6f2ea31095c51c50b638.html> (2024 年 9 月 30 日访问)

许亮。2022 年。《从性别角度考察中国 - 非洲的邂逅：中国家族企业、黑人女工和南非生产的性别政治》，载于《中国季刊》250(六月)：356-75。(Engendering China–Africa Encounters: Chinese Family Firms, Black Women Workers and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Production in South Africa. In The China Quarterly 250 (June): 356-75)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22000431>

叶蓓(Emily T. Yeh)。2016 年。《引言：中国在亚洲的发展和投资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载于《欧亚地理与经济》，57:3, 275-285。(Introduction: The geo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in Asia. I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7:3, 275-285)

于子桥(George T. Yu) 1977年。《中国与第三世界》。载于《亚洲调查》17 (11): 1036-1048。(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Asian Survey 17 (11): 1036-1048) <https://doi.org/10.2307/2643352>

张传红、黄振乾。2023年。《外国援助、规范的传播和地方对性别平等的支持：世界银行和中国对非援助项目的证据比较》。载于《比较国际发展研究》。第 58 卷，584-615。(Foreign Aid, Norm Diffusion, and Local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China’ s Aid Projects in Africa.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58, 584-615)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116-023-09381-4>

赵芷芊、郭虹宇、白蕴雯。2021年。《开展性别友好的投融资：金融机构政策与实践参考框架》。北京：创绿研究院。

中国的发展合作对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妇女 的影响

安妮塔·蒙图特(Annita Montoute)

杰奎琳·拉瓜迪亚·马丁内斯(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

黛博拉·麦克菲(Deborah McFee)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引言

由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勒比地区之间关系日益增长的兴趣，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文献和评论文章也随之产生。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和报告，把对中国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分析置于更广泛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C）框架内（Gachúz Maya 和 Urdinez 2022，Piccone 2020，Dussel Peters 2019，Gil Barragán 和 Aguilera Castillo 2017，Niu 2015，Domínguez 等 2006）。在关注加勒比英语区时，倾向于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重点是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中最大的经济体牙买加，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Gonzalez Vicente 2021，Gonzalez-Vicente 和 Montoute 2020，Minto 2019，Bernal 2013）。这些研究也都优先关注经济和贸易关系，妇女与性别议题则在文献中缺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学术文献中的性别盲点和性别偏见，也存在于中国 - 加勒比相关的政策辩论和实践中。

为弥补此缺失，本文试图通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以下简称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 e TecK 凤凰公园工业区（e Teck Phoenix Park Industrial Estate）和库瓦医院（Couva Hospital）这两个案例，来考察中国在加勒比地区发展合作中的妇女议题。本文填充的另一个缺失是，在绝大多数的宏观层面分析之外，进行了微观层面分析。为推进这项探讨，我们提出的指导性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合作项目对妇女的影响是什么？即，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作，是否以及如何为妇女赋权？通过研究具体的项目并专注于社区和妇女，本论文更偏向采取从自下而上的方法，而不是研究中国发展合作中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方法。

1. 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作的途径

中国的发展合作是以南南合作的概念为基础，它是基于共同利益、基于参与合作国家的需求、以及为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互利互惠，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中国的发展合作旨在减少贫困和改善人们的生活，以减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培育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国际发展合作”是指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边和多边行动。中国将合作理解为一个多维度进程,其中包括传统实践,例如提供技术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通过优惠贷款提供融资,促进贸易,投资于战略领域以及参与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合作项目通常得到政府间协议的支持(Laguardia Martínez 2022)。中国发展合作挑战了传统模式,而推行其自己对于南南合作的做法,即把贷款、信贷、投资、贸易、专业培训和技術转移等等都放在一个项目之中。中国发展合作的愿景和实操,与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投资项目有重合部分。因此,在中国与全球南南合作伙伴的合作中,这两种数据难以分类,因为投资相关的数据和发展合作项目相关的数据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

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关系的合作范围,已在2008年和2016年两份中国关于拉美和加勒比的政策文件中列出。中国也将加勒比-中国经贸合作论坛(Caribbean-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Forum)作为促进与加勒比地区关系的平台。另一个途径是外交协商,即中国外交部和建交的加勒比国家的外交部之间的协商。

中国的发展合作遇到了很多批评。中国对发展合作模式和议程的表述,通常与公民社会和其他批评者大不相同。阿夫拉·雷蒙德(Afra Raymond)指出,中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发展合作,存在着言辞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他批评一家中国公司的项目,那是一个由政府提供土地的保障性公共住房建设,他报告说房屋的成本超出了低收入人口(本项目的目标群体)可负担的范围(AfraRaymond.net,《财产问题——新公共住房》2019年5月29日)。

对中国参与加勒比地区经济建设的另一个批评是,中国企业正在削弱该国承包商,但并不是以其自身的内在竞争力,而是由于所拥有的各种特权(Kelly 2019),包括获得低息信贷、设备材料的减税与免税优惠,以及获得廉价中国劳动力的独家途径(Gonzalez-Vicente 和 Montoute 2020)。

在更广泛层面上,加勒比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的性质对该地区的长期发展构成了威胁。巨大的贸易赤字,从中国进口成品,和从加勒比出口原材料,都在重复经济依赖的历史模式(Montoute 2013, Girvan 2011)。中国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发展合作方面排除了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加勒比国家,而加勒比各国与中国主要基于双边性质的关系强化了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因此削弱而不是加强了区域融合。此外,雇佣的大多数劳动力都来自中国,不利于促进技术转移

(Montoute 2013)。

2. 中国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立场

根据官方发布的《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 70 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妇女与性别平等的发展被阐述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要素，并被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份报告列举了一些政策举措作为例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妇女工作的指导方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保障妇女权益的立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推动妇女事业的工作机制，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国策的政府机制，加强妇联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的桥梁纽带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9)。

在中国，性别是指男人和女人，这反映了一种性别二元论的解释。性别平等及其相关工作，倾向于聚焦妇女在发展中平等参与机会的结构性、实质性机制(蔡一平和李英桃 2021)。中国的立场是“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人的一项特有权利”，一如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表述。对中国而言，“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显现充分的发展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6)。1980 年，中国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2021 年 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其中，首次将促进性别平等阐述为中国未来国际发展合作的优先领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中国已经阐明其立场，即欢迎妇女参与整个发展过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6)，与此同时，可能有必要检视政策文件的内容、其贯彻实施的程度，以及意识形态中的社会性别规范中的现存差距，因为这些差距对理解每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至关重要。此外，在中国的海外发展合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将促进性别平等和公平原则置于核心地位，这一点并不明显。因此，尚不清楚中国的各个项目是否有具体要素来确保妇女赋权，以保证这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贯穿在项目的设计中，以确保和促进从国家到社区各层面的发展过程中的妇女参与和赋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调研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案例。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是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创始成员国之一，1974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基于本研究的目的，本论文选取了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这两个合作发展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中国对这两个项目提供了优惠的贷款。本文着重分析这两个中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合作发展项目，也依据了加勒比地区有关收集分性别数据的政策。这样的数据让我们能解读政策对不同性别的社会经济影响。因此，我们的分析集中于政策对妇女现实生活的影响。

3. 概念框架：在中国对加勒比的发展合作中纳入性别平等与妇女的能动性

本文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妇女的权利是人权(联合国1995)。妇女的人权是不可剥夺、不可或缺和不可分割的普世人权的一部分。保护这种权利要求对经济发展采取具体的、目标导向的方法，以便有空间考虑到妇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处境。我们认识到妇女(women)与社会性别(gender)是不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概念。一个不能取代另一个。妇女是指生理女性者，要注意的是，妇女是被塑造的，是被不同的社会、历史和经济环境塑造的(Andermahr等2000)。所说的生理性别为女性者，是基于事实上调查中的数据与分类都是基于参与者的生理性别而非社会性别。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社会性别则被理解为更复杂的社会建构。归根结底，本文试图应用的性别的概念，考虑到本地区的后殖民主义的处境，并包含了社会性别内涵的现实的各个面向，以便从性别视角拓展对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作项目的理解。

社会性别理论的建构，及其运用于探索分析妇女地位的过程，主要见诸于加勒比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形成中，它是聚焦加勒比地区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一种形式。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并非狭隘地认为所有妇女都被男性压迫(Alexander和Mohanty 1997)，而将男性视为可能的盟友。它认为帝国主义和全球不平等是妇女遭受压迫的根源。最后，它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复杂相互作用构成了性别不平等的制度基础(Barriteau 2012, Parpart 2013, Hooper 2000)。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理论并不是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存在的沟壑的对抗，而更多是主张跨国的、比较性的、关系型的理论，并在其中回应全球各种形式的新老帝国主义

(Alexander 和 Mohanty 1997)。恩汀·巴里托 (Eudine Barriteau) 基于加勒比的后现代主义著作 (2003) 中对性别的定义, 提供了一个文化相关性更高的框架来研究加勒比女性主义者如何组织起来, 与加勒比国家、人民, 以及全球投资模式在该地区的各种结构进行对话。

巴里托的理论建构中, 社会性别制度主要具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意识形态维度, 一个是物质维度:

- 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维度, 展示出一个既定的社会中, 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观念是怎样被构造、被维系的。

- 正是观念中构造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造成男人和妇女在获取资源上存在差异, 并且在社会内部被分配给予不平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 从而使性别社会关系的物质维度得以维系 (Barriteau 2003)

- 巴里托将社会性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 但并没有将妇女和社会性别混为一谈, 她阐明了社会性别制度下男性气质如何被建构而成, 以及后殖民时代加勒比国家在践行不平等中所扮演的角色 (Barriteau 2003, 第9页)。这种制度性的不平等, 一直是加勒比女权主义者们多年以来呼吁改变的对象。

上述对社会性别的界定提供了一个视角, 通过此视角, 可将性别议题放置于社会结构、公共政策及全球投资模式框架内进行必要分析。此类分析将性别与多个领域叠加起来。首先, 在发展的语境中, 性别被用来建立不同的议题: 即, 男人、妇女、男性气质和 / 或女性气质, 以及建立起这些议题在全球治理结构中 with 性别权力关系的交叉点, 比如与权力、种族、阶级、肤色、宗教、等级制度及男性女性群体之间的性别权力关系的交叉点。这种对社会性别的界定也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意识形态框架, 政策制定空间及具体参与方式正是建立在关于性别的种种深层假设之上的。

就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活动而言, 以下三个背景对我们理解及描述中国对本地区妇女的影响至关重要, 它们分别是: 本地区女户主家庭比例较高, 妇女失业率更高且持续时间长, 以及性别隔离的格局 (Seguino 2003, Seguino 和 Grown 2006)。

在国际妇女运动中, 加勒比女权主义活动家曾长期参与调研全球贸易中的不平等条款, 提高加勒比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以及提高诸如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小岛屿国家的政治经济中的性别敏感度。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由西印度大

学凯夫山分校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at Cave Hill) 的约瑟琳·马西亚 (Joycelin Massiah)^① 主持领导的加勒比妇女项目 (Women in the Caribbean Project, WICP)^② 即表明, 加勒比妇女的社会角色具有双重层面工作的特性: 既在家庭内部工作也在家庭以外工作, 并且这种经济的必需性, 其存在超出了西方将男性作为养家者的狭隘建构, 因而那种建构不适用于本地区 (Anderson 1986)。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本地区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阐明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日益自由主义的贸易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加剧本地区不平等的性别盲视和性别中立的政策现状。

虽然本地区认识到随着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而来的自由流动, 为部分男性和妇女提供了机会, 但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在规划和制定公共政策时, 需要评估衡量其他人可能因之失去的生计、工作和生意 (Massiah 1990, French 1994)。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 该地区社会活动家曾对结构调整 (structural adjustment) 及类似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发出过最响亮的批判之声。他们呼吁投资及经济活动应了解性别公正与平等, 并承诺在贯彻执行中保持性别敏感。他们揣测, 中国资本流入本地区只会加剧经济上的不平等, 而该地区的广大妇女将首当其冲受到其社会和经济效应的影响 (Wedderburn 2006)。

进入 21 世纪,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加强, 投资大幅度增加, 要想理解其对妇女生活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可以获取相关数据, 帮助我们探究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中国的绝大多数业务集中在建筑行业。作为男性主导的行业, 中国男性以工人角色进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这让人无法清楚看到妇女就业和中国资本流入本国之间的明确关联。必须注意的是, 尽管有妇女在不少此类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 但该行业仍然是由男性主导。这在加勒比 - 中国经贸合作论坛中更为明显, 惠及加勒比妇女的赠款集中在提供培训方面, 尤其是为加勒比国民提供高等学位教育方面, 以及对基建项目的影响进行性别分析方面, 即分析基建项目作为一种手段, 通过扩大满足基本需求的供应来改善妇女生活境况。

对本文调研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工业园区能够在国家层面增加创业机会。工业园区项目呼应了经济多元化战略, 以促进制造业、物流行业及新兴产业的发展, 这些行业比较依赖工厂和制造业的发展。

对于在这些工业园区工作的妇女群体, 现存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区隔模式被

强化了。妇女除了作为工厂工人受雇之外，本来多由妇女持有和经营的小微企业方面，她们得到的空间很有限。也就是说，妇女除了向占多数的男性工人提供饮食之类的服务外，园区里的就业情况基本上反映了加勒比就业中传统的性别区隔模式。妇女大多集中于服务行业，男性则集中于技术工种。不过这其中的重要一点可能是，园区功能类似劳动力贮水池，为流动女性提供了可以停留一时的工作机会。

4.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主要的研究目标，是从性别视角来了解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作，因此选择了解释主义模式 (interpretivist paradigm)。解释主义基于的一个假设是，世界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本质上是主观的。因此，本文研究方法具有某种相对主义的本体论和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基于此，这种方法适用于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即旨在解释社会现实。自然而然地，定性研究设计与这种研究范式是一致的。定性研究有五种类型：民族志、叙事研究、现象学、扎根理论及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适用于需要深入理解某种现象的调研 (Ebneyamini 和 Sadeghi Moghadam 2018, Creswell 2007)。本文涵盖对两个案例的深入描述及分析：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

为了与案例研究的定义保持一致，并深入理解现象，我们利用不同数据收集工具进行了三角测量，包括文献回顾及半结构化访谈，还使用了目的性抽样及滚雪球式抽样。为了准确理解妇女的观点，我们考察了一个权利为本的妇女组织，2023年2月25日这个组织举行月度会议时，进行了文件回顾及焦点小组讨论。此外，我们于2023年3月3日访谈了该组织的筹资总监。

需要注意的是，该机构的工作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改善治理结构，迫切需要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这样可以确保代表性及透明度成为治理过程的核心驱动力。

5. 案例分析：库瓦医院和 e TecK 凤凰公园工业区

5.1 库瓦医院

库瓦医院（原库瓦儿童医院，目前作为库瓦医疗综合培训机构运营）是中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开发的一个项目。它由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提供优惠贷款，由上海建工（加勒比）集团（SCG）^③ 建造。负责建造该项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机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UDeCOTT）^④。该项目于2012年启动，2015年完工但未启用。2019年，它被更名为库瓦医疗综合培训机构，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西印度群岛大学（UWI）共同持有，有300名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学生在该机构接受培训。该医院目前为公共卫生部门唯一的付费机构（《每日快讯》2018）。

库瓦儿童医院于2015年3月在前人民伙伴政府执政期间竣工，并于8月14日，即2015年大选三周之前，由前总理卡姆拉·佩尔萨德-比塞萨尔（Kamla Persad-Bissessar）揭幕。然而，这个开张只是仪式性的，因为该机构并未实际投入使用。随着2015年9月政府更迭为人民民族运动，卫生部长宣布，由于政府的财政吃紧而缺乏足够资金运营该医院。他们报告说，鉴于施工仍在进行中，对医务人员和市民来说不合适不安全，因而不能投入使用。将该机构由儿童医院改建为医疗及综合培训机构的理由是，这可以扩大医院的用途和职能，包括科研功能，并可以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以吸引国际客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快讯》2018年10月1日）。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根据公共卫生资产评估，卫生部决定将该医院用作治疗新冠患者的医疗机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电邮通讯，2023年3月3日）。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负责医院的维修维护（对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的采访，2023年2月27日）。

库瓦医院提供的诊疗及服务包括：诊断及影像学、外科手术、烧伤及整形、重症监护、母婴护理、分娩、儿科门诊、成人门诊、儿科康复、药房和实验室，以及为急诊患者提供直升机通道的停机坪（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2023年2月27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电邮通讯，2023年3月3日）。

库瓦医院的工程开发过程中，曾于2012年5月进行两轮公共协商，两次都位于库瓦社区名为 Preysal 的社区中心，目的是为社区及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

收集社区反馈。在这两次协商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介绍了施工建设、设计规划，以及项目的基建开发等基本信息。卫生部与来自不同行业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商讨，以确定医院的终端使用者，简介未来可以提供的服务范畴，可以接待的病人的大致数量，照顾每个可能的病例所需的材料，可预期获得的服务，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电邮通讯，2023年3月3日）。

据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称，医院的未来受益者会是所有社会群体。除了旨在为能源部门服务的烧伤病房外，该医院还为所有国民提供服务，配备有很多专门为妇女提供的服务和医疗设施。其中包括加勒比地区第一台乳腺癌治疗仪器，以及一个培训护士（其中大多数都为妇女）的设施。展望未来，数字建筑技术有望为妇女提供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机会，而无需她们在建筑工地上从事重体力劳动（对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的采访，2023年2月27日）。

5.2 凤凰公园工业区

凤凰公园工业区缘起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的广阔的愿景目标，即持续的高质量国外直接投资（FDI）与国内投资是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吸引此类投资的主要方式渠道之一，是提供战略空间场所让投资者在此运营和彼此合作。上述观点基于以下观察经验：在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方，通常都建设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来吸收投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的观点是，为提高竞争力与实现繁荣发展，出售工业用地和经济空间场地是必要的。根据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BCEG，以下简称北京建工）的预测，在该园区运营的10家中国工厂每年将产生约2亿美元的营收。该园区将为60至80个工厂提供厂房，直接雇用4500多名员工，每年贡献GDP约16亿美元。

该工业园区是一个政府间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提供总共1.04295亿美元的贷款。这家国有企业与e TecK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而共同开发此项目，由北京建工（BCEG）承建。该项目占地133英亩，包含五个工厂厂房，每个厂房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

在2019年，应环境管理局要求，在施工之前进行了两轮焦点小组形式的协商。第一轮协商是与园区附近社区的成员，具体为居住地距离工业园一到五公里范围内的社区居民。此次协商仅有工业园区附近的社区参与，因为普遍认为未来

工业园区建设及运营后，这些社区受到的影响将会最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贸易与工业部，2023年8月29日）

与社区协商的目的是解决社区的担忧并识别他们的需求与要求（对北京建工的访谈，2023年2月27日）。居民担心目前非法占有国有土地者的土地使用权问题，健康问题，安全问题，施工期间诸如粉尘等职业健康和环境安全（HSSE）风险，以及该项目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产生的影响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建筑行业就业机会、零售生意（食品、建筑材料等）及销售都会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周边社区都将受到噪音和粉尘的负面影响（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9日）。

另一轮是与一般公众进行的协商，包括了该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以及园区附近的社区。该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承包商、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国家机构及本地企业（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9日）。其他参与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环境管理局（EMA）与职业健康与安全局（OSHA），分别涉及环境保护和健康与安全主题。协商并没有具体就妇女或男性群体进行意见搜集（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9日；对北京建工的采访，2023年2月27日）。

北京建工指出，在协商过程中，有一些妇女表示有意愿在工业园区开设企业。但由于该项目仍在持续推进中，协商的一些成果尚未落实（对北京建工的采访，2023年2月27日）。

另外针对该项目进行了一项可行性研究，以便弄清楚该项目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非能源部门发展实体基础设施的可行性（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9日）。

在承包商北京建工（BCEG）与雇主 e TecK 之间的合同中，有一项条款是关于本地的内容，其中规定承包商一方保证使用60%的本地劳动力，并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本地制造商与供应商处采购至少50%的原材料。北京建工遵守了这两项规定。本地劳动力覆盖了从非技术工种到专业人员的不同层级。本地平均劳动力雇佣率一直保持在70%到90%之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贸易与工业部电邮通讯，2023年8月29日）。

2023年2月，贸易与工业部长保拉·戈皮-斯科恩（Paula Gopee-Scoon）宣布，四家中国企业和八家本地企业签署了协议，将在 e TecK 的凤凰公园工业区运营。本地企业是：Pillai's Tools Company Ltd（物流与配送）；阿里五金与金属制

造商(制造业);南方反射玻璃公司(制造业);全球烟草公司(制造业);Valcom EMI Ltd 公司(分销);Pour Me One Brewery 公司(食品与饮料);Centaur 建筑服务公司(制造业);Ramps Logistics TT 公司(物流);Pricesmart TT Ltd (物流与配送)。中国公司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制造业);东莞市莎米特箱包有限公司(制造业);MSK Seafood (物流与配送);FCMC 公司(物流与分销)(《新闻日报》, 2023)。

迄今,该项目已经为行政管理、工程及建筑行业的男性和女性创造了就业机会。一旦工业园内的各企业开始运营,园区附近社区和更广范围的社区居民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e TecK 表示,他们支持所有为妇女赋权和平等提供实现条件的项目(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9日)。贸易与工业部表示,很多技术人员为妇女(贸易与工业部电邮通讯,2023年8月29日)。

北京建工的展望是,随着进入园区的投资与雇佣机会增多,妇女的就业机会将会因此增加,即妇女可以受惠于工业园本身。十家中国投资商已确认或开始在工业园区进行业务运营。其中一家已经在生产行李箱包。据北京建工称,该箱包企业被鼓励雇用女性员工。另一家企业将生产妇女卫生用品,该企业可能会雇佣女性员工。其他将要在园区运营投产的企业包括 SMJ 与 Pricesmart,该两家企业将会雇佣大量女性员工(对北京建工的访谈,2023年2月27日)。

此外,北京建工坚信,虽然没有提供优惠给妇女群体,但欢迎她们通过购买土地或租赁厂房来投资。持有小型企业的妇女有可能从相对较小的可投资地块中受益。妇女被鼓励在工业园内的生产制造企业中从事运营管理工作及接受培训(对北京建工的访谈,2023年2月27日)。

e TecK 凤凰公园工业区设计目的是为从事制造和装配的企业提供技术基础设施与厂房厂址,在某种意义上,这与致力于妇女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的行动目标相去甚远。虽然对园区管理及服务业人员的性别审计显示妇女从业人员数量显著,但工业园的业务主营并非妇女传统务工经商领域。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中国合作项目的这两个案例,分析其对妇女的影响,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组织和关注妇女议题的活动家在这两个项目中的参与都十分有

限。就 e TecK 工业园而言，没有发现其主营业务与传统上妇女经营的领域有所交集。在项目设计之时，并没有进行社会性别需求或影响分析，并未考虑妇女的具体需求。在这两个案例中，加勒比妇女的社会性别需求，即与她们在工作场所之内承担着照料和工作的双重角色相关的性别需求，并不是项目设计规划的一部分。

本研究并未在妇女就业与中国资本进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间建立明确相关性，尤其是工业园区案例，其项目宗旨并非妇女就业议题。即使该项目能够增长小微企业的空间，但此情形并非出于有意设置的策略议程。采购流程中也未曾包括怎样吸引妇女持有和经营的企业，或为妇女创业提高可能性。据报告，雇主(e TecK)和承包商(北京建工)遵守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采购条例与法律，以及他们各自的合同义务，但其中都未具体提及促进妇女创业。

就库瓦医院案例而言，妇女显然可以从其提供的各项服务中获益良多，许多服务都能够满足妇女及其子女的迫切需求。设在医院的护理培训设施，妇女接触使用的比例非常高，因为护理专业从业人员大多为妇女。

基于调研结果，我们认为，除了中国支持性别平等、妇女赋权与能动性的政策立场之外，有必要将这一政策立场转化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之中。

中国应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发展合作全过程，将其作为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的战略方针。中国可以更积极主动地促进性别主流化，评估发展需求，确保在发展合作倡议框架内通过项目制定、实施、监测及评估对性别平等议题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措施促进性别主流化：

1. 开展研究，了解受援国及受援社区妇女的现实境况。
2. 考虑分性别搜集数据及设置指标，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性别相关议题。
3. 将能够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妇女女童能动性的项目，列为最高优先重视。
4. 对生育健康及妇科领域予以最高优先重视。
5. 对提供社会性别敏感的商品及物资的项目，给予最高优先重视。
6. 与发展合作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开展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与社会性别敏感的对话。
7. 在进行每项发展合作倡议或项目时，考虑如何识别、阐述妇女女童的具体需求与利益。
8. 在人力资源开发、职业培训及技术合作相关的发展合作倡议或项目中，着

重强调性别平等的方式方法。

9. 对提高妇女就业能力、促进妇女适应技术变化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项目，给予最高优先重视。

10. 将以性别平等为导向的方法纳入到人员及文化交流中，确保项目设计规划考虑到当地妇女女童的利益需求，确保妇女可以积极参与决策及落实的全过程。

11. 与受援国的妇女组织进行对话，确保在发展合作规划的监测、评估及反馈中包含当地妇女的视角。确保有多元经历的妇女群体参与讨论非常重要。

12. 咨询在合作项目场所中工作的妇女，以确保考虑她们的看法观点，并保证尽可能调整她们的工作条件以满足其特殊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此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中国强调将性别主流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关键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可望成就未来良好势头。

中国已经开展了住房、供水系统、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很多项目。调查结果显示，本文两个案例研究中的工人绝大多数为男性。就此而言，一般性的服务设施如安全清洁的卫生间是提供给所有人的，妇女同样能从中受益。缺失的是，男女收入公平的规定，以及缺失改善女性员工现场工作环境的日托设施。

妇女是发展中国家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在评估发展合作项目的相关结果及影响时，她们需要被着重加以考虑。在执行倡议时，还必须考虑到安全措施的落实，以确保妇女参与时其身心完整性不受威胁。例如，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确保这些项目能够让妇女可以使用安全的卫生设施，修建人行道及安装路灯等，使妇女能获得信贷及托儿服务。如果中国期望促进将性别融入发展合作的主流，就必须在与受援国的谈判开始之初即着手落实。所有各方应共同促进性别平等及妇女女童赋权，并因地制宜地虑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国负责发展合作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鼓励妇女作为同等重要的角色参与政治对话，在发展合作的相关谈判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确保社会性别的主流化，使其体现在发展合作项目从规划到监测及评估的所有阶段。

与此同时，虽然中国要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但加勒比各国政府不应在这一过程中退居为被动代理人，旁观中国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责任。此类立场只会加强历

史上困扰加勒比地区（实际上是全球范围内的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在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中的捐助国 - 受援国依赖综合症。我们督促受援国在发展合作中，有责任提出本国性别平等议程。因此，我们认为加勒比国家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是积极推进对外关系的能动者，有能力塑造和影响发展项目的性质与内容，不管是与中国开展的发展合作项目，还是与其他国家开展的发展合作项目。这意味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倡议的举措中满足妇女的需求、关注妇女受到的影响，这些问题应该在国家层级的发展合作进程中得到协调和解决。国家层级的性别政策需要囊括性别正义与经济正义、性别与贸易以及性别与投资之间的多种联系，这方面的考量应在发展战略中加以明确阐述。

在与合作伙伴（例如与中国）的发展合作框架之下设计的项目，必须采纳对平等和包容议题更加敏感的措施，包括阐明最佳实践的创新方案。对实现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有政策及服务来帮助妇女平衡家庭责任与外部工作。具体来讲，应该为在此类项目中工作的妇女及其代表方，例如工会、职业协会（例如护士协会），提供协商机会。并且应在实际操作方面的案例研究中一直强调此点。

只有做到如上所述，在与中国的发展合作实践中，才能有意义地将妇女的需求整合、反映到从规划到实施的全过程。

（翻译：孙李娜；校对：冯媛；核稿：张玉婷）

注释

① Joycelin Massiah 教授是西印度大学（现为 SALISES，亚瑟刘易斯爵士社会与经济研究院）社会和经济研究所（东加勒比）的第一位女性主任。此外，她还是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加勒比办事处的前区域主任。

② WICP 是 1979 年至 1982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项目。在 Joycelin Massiah 博士的领导下，该项目对加勒比地区的妇女进行了最广泛的深度研究（Barriteau, 2003 年）。

③ 上海建工（加勒比）有限公司是上海建工的子公司。上海建工是世界建筑行业领导者之一，是一家多数股权由中国政府持有的国有上市公司。2022 年，在《工程新闻记录》评选出的全球 250 家最大工程承包商中排名第 8 位，在世界 500 强企业中排名第 321 位（2023 年 2 月 27 日，对上海建工（加勒比）有限公司

的采访)。

④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UDeCOTT)是一家国有企业。

参考文献

M. J. · 亚历山大(M. J. Alexander)、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1997年。《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与民主未来》。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索尼娅·安德玛尔(S. Andermahr)、特里·洛弗尔(T. Lovell)、卡罗尔·沃尔科维茨(C. Wolkowitz)。2000年。《女权主义理论词汇表》。伦敦：阿诺德出版社。(A 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 London: Arnold Publishers.)

帕特里夏·安德森(P. Anderson)。1986年。《结论：加勒比妇女》，载于《社会经济研究》第35卷第2期，第291-324页。(Conclusion: Women in the Caribbean,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35 (2), pp. 291-324)

恩丁·巴里托(E. Barriteau)。1995年。《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化与英语加勒比地区的发展政策与实践：巴巴多斯案例》，载于玛丽安妮·H·马钱德(Marianne H. Marchand)、简·帕帕特(Jane Parpart)主编《女权主义 / 后现代主义 / 发展》，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142-158页。(Postmodernist Feminist Theorizing and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Anglophone Caribbean: The Barbados Case, In Marianne H Marchand and Jane Parpart [ed.] Feminism/ Postmodernism/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pp. 142-158)

恩丁·巴里托(E. Barriteau)。2003年。《加勒比女权主义话语中从“妇女到性别”的理论转变：创造知识的权力关系》。载于恩丁·巴里托主编《性别理论化：加勒比的跨学科视角》，金斯顿：西印度大学出版社，第27-45页。(Theorizing the Shift from “Women to Gender” in Caribbean Feminist Discourse: The Power Relations of Creating Knowledge, In Eudine Barriteau [ed.], Confronting Power, Theorizing Gender: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 the Caribbean, Kingston: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Press, pp. 27-45)

蔡一平、李英桃。2021年。《从性别角度看全球中国》，载于 IDEES。第52期。“世界危机前的中国”。(Global China from a Gender Lens, IDEES. No. 52. “China

before a World in crisis” .) <https://revistaidees.cat/en/global-china-from-a-gender-lens/>
(2023年3月14日访问)

约翰·W·克雷斯威尔(J. W. Creswell)。2007年。《定性研究和调研设计：文献综述五步法》。赛奇出版社。(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S·埃布尼亚米尼(S. Ebneyamini)、M. R·萨德吉·莫加达姆(M. R. Sadeghi Moghadam)。2018年。《案例研究框架的制定》，载于《国际定性方法杂志》，第17卷：第1-11页。(Toward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Conducting Case Study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Volume 17: pp. 1-11. Available at: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1609406918817954> (2023年3月14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大使馆。2019年。《宋玉民大使在庆祝中国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建交4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6月23日。http://tt.china-embassy.gov.cn/eng/sgxw/201906/t20190623_4203138.htm 2023年3月14日访问)

J. 法兰西(J. French)。1994年。《击中痛处：危机中的牙买加妇女生计问题》。载于帕梅拉·斯帕尔主编《抵押按揭妇女的生活：女权主义对结构调整的批判》，伦敦：赞德出版社，第165-179页。(Hitting Where it Hurts: Jamaican Women's Livelihood in Crisis, In Pamela Sparr [ed.], Mortgag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Critiqu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London: Zed Books, pp. 165-179)

R·冈萨雷斯·文森特(R. Gonzalez Vicente)、A·蒙图特(A. Montoute)。2020年。《加勒比对中国 - 加勒比关系的视角：全球国际关系、依附与后殖民状况》，载于《第三世界季刊》，第42卷第2期，第219-238页。(A Caribbean perspective on China-Caribbean relations: global IR, dependency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42:2, pp. 219-238. DOI:10.1080/01436597.2020.1834841

R·冈萨雷斯·文森特(R. Gonzalez Vicente)。2021年。《也需跨越丘陵和山谷：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载于弗洛里安·施耐德(Florian Schneider)主编《全球视角下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区域连通确保能动性》，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第171-194页。(Over Hills and Valleys To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Caribbean, In Florian Schneider [e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serting Agency through Regional Connectivit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p. 171-194.

C. · 胡珀 (C. Hooper)。2000年。《转型中的男子气概：全球化中的案例》，载于 载于玛丽安妮·H·马钱德 (Marianne H. Marchand)、A·鲁尼安 (A. Runyan) 主编《全球结构重建中的性别议题》，奥克森：劳特利奇出版社，第59-73页。(Masculinities in Transition: The Case of Globalization, In Marianne H Marchand and A. Runyan [ed.], Gender in Global Restructuring, Oxon: Routledge, pp. 59-73.

J·拉瓜迪亚·马丁内斯 (J. Laguardia Martínez)。2022年。《中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存在 (1950-2020)》，载于穆基恩·阿德里安娜·桑本 (穆基恩·阿德里安娜·桑本) 主编《中国在大加勒比地区的存在：昨天和今天》，加勒比研究中心。圣多明各，第681-745页。ISBN 978-9945-22-193-0 (La presencia china en Trinidad y Tobago (1950-2020), in Mukien Adriana Sang Ben [eds] La presencia china en el Gran Caribe: Ayer y hoy, Centro de Estudios Caribeños (PUCMM), Santo Domingo, pp. 681-745. ISBN 978-9945-22-193-0

J·马西亚 (J. Massiah)。1990年。《让不可见变成可见：加勒比妇女发展的规划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凯夫山：社会经济研究学院 (东加勒比)。(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Indicators for Planning for Women in Caribbean Development. UNESCO Project, Cave Hill: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Eastern Caribbean).

J·明托 (J. Minto)。2019年。《中国政策性银行在加勒比地区的贷款实践研究 (2000-2018)》，载于恩里克·杜塞尔·皮特斯 (Enrique Dussel Peters) 主编《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融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学联盟：墨西哥城，第153-176页。(Examining the Lending Practices of Chinese Policy Banks in the Caribbean (2000-2018), in Enrique Dussel Peters [ed.], China's Financing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ión de Universidade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iudad México, pp. 153-176.

A·蒙图特 (A. Montoute)。2013年。《加勒比 - 中国经济关系：有何启示？》，载于《加勒比国际关系与外交杂志》，第1卷第1期，二月，第110-126页。(Caribb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Caribb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Diplomacy, 1:1, February, pp. 110-126) <https://journals.sta.uwi.edu/ojs/index.php/iir/article/view/344/304> (2023年3月14日访问)

C. · 奈多匹尔 (C. Nedopil)。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北京，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Countr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ijing, IIGF Green BRI Centre) <https://green-bri.org/countries-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bri?cookie-state-change=1604336748828> (2023年3月14日访问)

《新闻日报》(Newsday)。2023年。《12名商家已经入驻凤凰公园工业区》，2月11日。(12 tenants secured for Phoenix Park Industrial Estate, February 11. <https://newsday.co.tt/2023/02/11/12-tenants-secured-for-phoenix-park-industrial-estate/>) (2023年3月14日访问)

J. · 帕帕特 (J. Parpart)。2010年。《男子气概、性别和新战争》，载于《北欧男子气概研究期刊》，第5卷第2期，第85-99页。(Masculinity, Gender and the New Wars, in Nordic Journal of Masculinity Studies, 5(2), pp. 85-99)

J. · 帕帕特 (J. Parpart)。2014年。《探讨将性别主流化纳入国际发展机构的变革潜力》，载于《国际发展杂志》，第26卷第3期，第382-395页。(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6(3), pp. 382-395)

M. 罗利 (M. Rowley)、佩吉·安特罗布斯 (P. Antrobus)。2007年。《新时代妇女的女权主义愿景：佩吉·安特罗布斯访谈》，载于《女权主义研究》第33卷第1期，第64-87页。(Feminist Visions for Women in a New Era: An Interview with Peggy Antrobus, in Feminist Studies 33 (1), pp. 64-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http://zw.china-embassy.gov.cn/eng/zgj/202112/t20211216_10470559.htm (2023年3月14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9月19日。http://english.scio.gov.cn/2019-09/20/content_75226098_2.htm (2023年3月14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6/12/01/content_281475505407672.htm#:~:text=China%20values%20the%20articulation%20in,development%20on%20an%20equal%20basis (2023年3月14日访问)

J. · 韦德伯恩 (J. Wedderburn)。2006年。《性别、贸易自由化和加勒比共同体单一市场和经济：民间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选择》，载于《加勒比季刊》第52卷第2-3期，第138-155页。(Gender,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CARICOM Single Market and Economy: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 Civil Society, in Caribbean Quarterly 52 (2-3), pp. 138-155)

M. · 威廉姆斯 (M. Williams)。2001年。《性别主流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者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手册》。伦敦：英联邦秘书处。(Gender Mainstreaming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 Handbook for Policy-mak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新华社。2018年。《中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承诺务实合作》。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5/14/c_137178759.htm (2023年3月14日访问)

余虹。2019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载于《中国：国际期刊》，第17卷第4期，十一月，第8-23页。(Reflection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China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7(4), November, pp. 8-23) <https://muse.jhu.edu/article/742817> (2023年3月14日访问)

附录1 – 访谈问题列表

访谈对象：国家机关 / 公司

访谈问题：

1. 是否就建立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进行了一般性协商，特别是与妇女和妇女团体进行了协商？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影响评估和需求分析？

如果问题1回答为“否”，请问原因是什么？

如果问题1回答为“是”：

(1) 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什么？

(2) 这些举措的目标群体是哪些？

(3) 是否考虑到，或正在考虑妇女的需要及其对妇女的潜在影响？如果有考虑到，请问以何种方式实现？

(4) 协商 / 参与、需求分析和影响评估的结果如何？

(5)需求分析 / 影响评估的结果是否得到了落实? 如果是, 在多大程度上, 以及怎样实施或正在实施的?

2. 哪些群体已经或正在受到该项目的影响(正面或负面)? 请解释他们已受到或正受到的影响。

3. 本文调研的两个项目对具体妇女群体(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如何?

4. 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哪些机会 / 途径, 以使其受惠于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项目并从中受益?

5. 具体为妇女提供了哪些机会 / 途径, 以使其受惠于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项目并从中受益?

6. 总体来看, 如何通过调研的两个项目和中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发展合作项目, 促进、提升和 / 或加强妇女的参与?

7. 这两个在建项目, 和中国总体发展合作项目中, 可以 / 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以确保妇女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并实现赋权?

访谈对象: 妇女组织 / 社会运动 / 活动家团体

访谈问题:

1. 在中国发展合作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实施中, 妇女与性别议题在多大程度上被考虑在内?

2. 在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项目的设计、开发和施工的任何阶段, 您和 / 或您的组织是否有被咨询过?

3. 如果问题 2 回答为“是”:

(1) 您知道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什么吗?

(2) 您表达了什么观点?

(3) 您知道需求分析和影响评估的产出是什么吗?

(4) 您是否知道需求分析 / 影响评估发现了什么? 如果知道, 您知道它们是否有落实实施吗?

(5) 这些协商的产出结果是什么?

(6) 您知道这两个项目的设计和开发阶段, 是否进行了需求分析和影响评估?

4. 中国发展合作项目对妇女与性别平等的影响是什么, 即它们如何为妇女赋

权，或去权？特定妇女群体如何受到 / 正受到影响（正面或负面影响）？为妇女提供了哪些机会 / 途径，使她们能够受惠于这两个项目并从中受益？

5. 妇女如何看待调研中的这两个项目对她们生活的影响？您对这两个项目的设计 / 开发有何看法？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是否 / 如何对特定妇女群体产生（正面及负面）影响？如果是，以何种方式？您对中国发展合作项目的总体看法是什么？

6. 中国的发展合作应该如何设计及执行，以促进妇女与性别平等的赋权和能动性？如何促进、提升和 / 或加强妇女参与中国发展合作项目的设计和开发？中国合作项目的设计、开发和实施应考虑哪些因素，以确保妇女的赋能赋权？

附录 2 – 受访机构名单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贸易与工业部
- E TecK 有限公司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
- 北京建工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建工（加勒比）有限公司

中国的参与在 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影响： 汤加和瓦努阿图的 “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 案例研究

瓦塞马卡·鲁图 (Vasemaca Lutu)



汤加和
瓦努阿图

引言

从基础设施角度分析观察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存在两种途径：首先，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的发展利益；其次，与全球性强国和地区性大国竞争重点相关的安全利益，这些国家在争夺可能用于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的基地以及其他资源。双边和多边外交、官方发展援助、技术援助和用于主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等方式，都在这两种方法中发挥作用（PANG，2022）。全球范围内，美国一直是主导力量，并在太平洋地区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冷战时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形成的安全联盟，积极奉行“战略遏止”的政策，通过在20世纪70年代的殖民主义，使苏联远离太平洋地区，并伴之以外交手段、地区性组织、经济控制和支票外交（Crocombe，2007）等策略。直到21世纪初，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一直在使用这些策略和手段，由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介入，资金由其背后的强国提供，用以支持这些国家对太平洋岛国（PICs）发展的控制，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①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全球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BRI），随后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这两项倡议都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开展金融和技术合作提供了框架。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和扩展。因此，美国和澳大利亚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所罗门群岛在2022年初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两国均担心中国可能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②

尽管中国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受到欢迎，但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对性别问题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探讨。因此，本文基于以下两个主要的研究问题，对中国参与汤加和瓦努阿图两个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全面分析，并特别突出这些项目的性别影响：

（1）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项目，是否有助于汤加和瓦努阿图实施支持性别平等、妇女权利和发展的本国计划？在这些投资项目中，性别平等的目标是否得到体现？还是说，这些投资是否仅仅为了满足中国自身的利益，或只服务于这两

个国家的当地精英？

(2) 性别问题在太平洋岛国的发展融资中发挥什么作用？在汤加和瓦努阿图性别平等问题上，中国与其他主要援助国的投资政策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异体现在哪里？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首先，讨论研究方法。其次，介绍太平洋岛国与国际发展合作的背景。第三，讨论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合作。第四，重点分析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国际合作中性别平等的现状。第五，对案例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最后，提出一些结论性意见和建议。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支持蔡一平(2021)和陆海娜(2019)的观点，即人权和性别应该被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全球性事务中，并应与其性别平等的承诺保持一致(蔡一平和于音2022)。本案例研究审视了在国家层面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所采取的方法，并且讨论了这些举措取得的成就，明确了主要挑战和建议。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增强，人们关心其在一带一路项目和海外投资中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政策和框架是否一致。还需要确定中国在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的性别政策和操作指南，是否有助于太平洋岛国促进本国妇女发展。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汤加和瓦努阿图，本研究分析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两国均严重依赖中国，因此两国基础设施项目对性别的影响是相似的。

本次研究采用了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包括主要和次要数据来源。主要数据收集包括关键知情者的访谈、审阅者的反馈以及作者研讨会。来自汤加和瓦努阿图政府的工作人员、妇女和残疾人群体、民间社会组织(CSOs)，还有两名研究性别平等、残疾和社会融合的独立顾问参与了此次研究。由于作者本人无法前往这两个太平洋岛国进行研究，因此访谈采用了电子邮件、电话和网络会议(Zoom)通话的方式。如果无法通过Zoom进行在线采访，关键的被访问者也可以选择填写一份或多份问卷。

此项研究共联系了十四名个人和组织作为关键受访者参与本次研究，其中只有七人提供了反馈^③。次要数据来源包括对学术文章、期刊、在线新闻以及非政府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报告进行的案头调查。本文引用

的所有信息均来自主要和次要来源，在调研过程中，研究者充分保护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努力维护整个研究中采用的为当事人保密的道德标准。

2. 太平洋岛国与国际发展合作

太平洋岛国面临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土面积小、地理上远离主要岛屿和市场，在水源、能源、农业、矿产、基础设施和技术资源等方面供应有限，并且面临气候变化影响的高风险。此外，另一个发展挑战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太平洋岛国希望在上述领域寻求更大的发展伙伴提供援助。

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是太平洋岛国主要的传统合作伙伴。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退出了太平洋地区，其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于1992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关闭，和平队志愿者撤回（Beck 2020）。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后介入，填补了美国留下的角色。由于区域政治动荡不安，比如所罗门群岛（1998年至2000年）的种族冲突以及斐济多次政变等，澳大利亚从安全角度考虑将太平洋视为一个必须维持“稳定”而非关注商业往来的区域。自2006年斐济政变以来，一直在搅动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因素是太平洋岛国更加自信的姿态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由于对中国崛起和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的担忧，美国重新回到了南太平洋，恢复了USAID项目；澳大利亚提出了“太平洋跃升（Pacific Step Up）”倡议，新西兰推出了“太平洋重启（Pacific Reset）”战略。这三个国家还通过增加双边援助，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PIFS）和南太平洋委员会（SPC）^④等地区组织，将关注的重点分散在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等国家。显然，为了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这三个西方国家已经恢复或做出了新的承诺，以改善和增加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

3.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合作状况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在相互理解和协作下，通过南南合作形成的，旨在共同努力，促进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北京已在太平洋地区援助了100

多个项目，包括提供健康、农业、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专业知识^⑤，培训了约一万名本地专业技术人员，并在汤加和斐济设立了大使馆^⑥。从1992年到2021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贸易平均增长了13%，中国企业在太平洋岛国的投资超过200亿美元^⑦。在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继续向太平洋各国政府提供有吸引力的贷款，并已实施了近500个完整的工程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技术支持和实物援助，以帮助当地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⑧。

在2013年11月举行的中国 - 太平洋经济发展与合作论坛第二次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宣布，从1970年到2013年11月，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总额达到了14.8亿美元，而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约10亿美元的商业贷款，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发展（Zhang 2018）。中国还转变资金方式，向太平洋地区国家提供赠款，希望继续保持在该地区的主要出资国地位。

然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并非没有遭到质疑。有关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以及中国在该地区推行“债务陷阱”外交的指控接踵而至。例如，在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断绝了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随后，北京被指试图通过提供发展资金向所罗门群岛议会议员贿赂，来诱使他们的外交关系转变方向^⑨。2022年4月，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允许中国安全部队在首都霍尼亚拉^⑩的请求下维护社会秩序，这令马莱塔群岛^⑪人民感到不安，他们拒绝接受从台北转向北京的外交变化。据报道，当地社区表示，中国国有企业追求与本国领导人进行投资交易，却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关切和利益^⑫。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前总统大卫·帕努埃洛（David Panuelo）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指责中国进行政治战争并（以向政府成员赠送礼物和现金的形式）笼络本国精英。现今，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和图瓦卢是仅有的几个仍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⑬。考虑到中国在该地区受到诸多关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指控和争论，这些较小的国家选择继续与台湾地区结盟，这样更透明的合作伙伴是他们的首选。

对中国参与经济发展的另一项批评，则涉及其低质量的基础设施和导致负债的贷款，这似乎隐含着“乞丐不能挑三拣四”的态度。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展开南南对话被视为具有战略目的，希望各国将彼此视为有着相同经历的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家”^⑭。中国因使用债务而非援助方式，在国际发展金融市

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受到批评，这使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承担偿还贷款的巨大负担，从而引发重大的公共财政管理问题。

此外，2022年5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太平洋地区之行，希望达成一项多边协议，以加强与该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关系¹⁵。然而，由于在安全协议方面未获得太平洋岛国的足够支持，王毅的努力未能取得成功。尽管遇到了挫折，中国仍在和太平洋岛国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灾害管理、卫生、农业、贸易、旅游、技术进步和民航等问题¹⁶。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受到这些国家内部政治和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的严重影响，尤其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竞争。尽管针对中国的批评一直存在，但因为中国能带来实际利益，太平洋岛国仍然视中国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伙伴。虽然近年来中国在文化交流和“软实力”推广手段方面有所增加，例如设立孔子学院、提供奖学金和培训项目机会，但太平洋岛国与中国的交往似乎更加偏向经济和外交层面。

4. 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国际合作中的性别平等

太平洋岛国于1994年通过了第一个促进性别平等的区域性政策，即《提高妇女地位和性别平等太平洋行动纲要》(PPA)。该纲要在2004年进行首次修订，并在2013年再次修订，现在演变为《2018-2030年太平洋性别平等和妇女人权行动纲要》¹⁷。新框架纳入了现有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区域性和国际性政策，例如2012年《太平洋领导人性别平等宣言》(PLGED)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PLGED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度。

此外，太平洋岛国论坛(PIFS)还发布了《蓝色太平洋大陆2050战略》，旨在促进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赋权和积极参与¹⁸。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该地区的性别平等政策和法规取得了显著进展。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消歧公约》)、《北京行动纲领》(BPfA)、《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相关地区协议已经确立了促进性别平等的规范和指标。然而，这些政策在当地的影响和实施进展相当缓慢；例如，太平洋地区妇女的政治代表性在过去二十年中仅增加了百分之四¹⁹。2022年6月举行的太平洋岛屿论坛女性领导人会议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呼吁太平洋国家从空谈转

向行动。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支持性别平等方面秉持坚定的立场，目前尚不清楚其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是否真正在海外项目中得到切实履行。《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合作》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指出，在促进妇女发展方面，中国通过实施各种母婴保健项目，例如提供医疗物资、医务人员和培训计划，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临床服务，赋予妇女权力并保护妇女的权益。此外，还通过能力发展和技术培训项目等援助，以提高妇女就业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参与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为了支持前述立场，中国邀请太平洋岛国的妇女机构和组织参加相关活动，如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的大会和妇女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2019 年 10 月，中国成功举办了汤加妇女经济能力建设研讨会；2021 年 5 月，全国妇联组织了“中国 - 所罗门群岛”视频对话，主题是“妇女与减贫”^⑩。

5.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的性别分析：两个案例研究

本节将重点介绍中国与两个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的现状，基础设施对妇女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为何选择汤加和瓦努阿图作为本研究的两个案例国家，并阐述主要发现。

5.1 中国与汤加及瓦努阿图的关系

中国自 1998 年同汤加建交，在贸易、政治、商业、基础设施、渔业、医疗、教育、农业和旅游等关键领域提供援助。近年来，中国在汤加大力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集中在供水与卫生、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电信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多年来，中国商务部（MOFCOM）为汤加资助了多项赠款形式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为 2019 年太平洋运动会修建了体育场^⑪。

因为高度易受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汤加在灾害风险方面排名世界第三（《世界风险报告》2021）。该国最著名的自然灾害发生于 2022 年 1 月，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引发了海啸，导致全国多地的房屋、道路和基础设施损毁。为应对灾害，中国提供了后勤支持、预制房屋、拖拉机等必要的设备。

自1982年，中国与瓦努阿图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多年来，在社会发展、贸易和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援助都有所增加，包括应对新冠疫情（COVID-19）的影响。北京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贷款和赠款，两国之间签署了十多份关于基础设施、技术、民航、海事事务和渔业的合作文件^{②②}。大多数中国项目都是以赠款形式资助的，包括总理办公室和科曼体育场^{②③}。

在2023年2月底和3月初，瓦努阿图连续遭受了两次飓风（朱迪和凯文）侵袭，随后又发生了一场地震，导致许多公共设施、住宅建筑和财产损失。中国做出了响应，提供了价值约1亿瓦努阿图瓦图（译者注：瓦图为瓦努阿图货币，简写为VUV）的人道主义援助^{②④}。救灾物资包括急救包、帐篷和折叠床。此外，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分别向瓦努阿图提供了50万美元和1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②⑤}。瓦努阿图政府希望利用这些赠款帮助所有受飓风影响的人^{②⑥}。

这两个太平洋岛国的政府都认为，基础设施发展对于建设可持续和繁荣的社会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活动，提高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交流和互联互通。因此，由于中国提供的诱人优惠以及对援助和发展的快速反应，中国一直是首选合作伙伴。

5.2 汤加和瓦努阿图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

汤加于1995年签署了《北京行动纲领》，在2020年《北京+25》国家报告中将性别主题视为抗灾及减灾项目的核心要素。在地区层面，汤加于2012年通过了《太平洋地区领导人性别平等宣言》。在性别平等国家层面的承诺方面，主要包括《汤加战略发展框架（II）2015-2025》^{②⑦}和《汤加国家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与行动战略规划2019-2025》（WEGET）。内政部下属的妇女事务与性别平等司（WAGED）是国家妇女事务机构，负责监测、评估和实施《汤加国家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与行动战略规划2019-2025》中关于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

然而，2015年3月，一些教会团体的妇女公开反对汤加政府，批评汤加政府通过了《消歧公约》，她们担心该条约可能破坏社会规范。由天主教妇女联盟领导的多次抗议和请愿活动，声称签署《消歧公约》将促进同性婚姻和堕胎^{②⑧}。一位汤加的关键受访者表示，政府需要与宗教团体保持独立，不允许教会支配或误导人民，政府应专注于其议程和承诺，根据《消歧公约》，保护妇女和其他受影响的群体（2023年3月11日的采访）。

2018年,汤加女性的就业率为38.4%,男性为56.2%(汤加统计局2018)。性别差距相当明显,经济部门的就业情况也是如此。据报道,尽管女性较少参与农业、渔业和林业方面的劳动,但众所周知,汤加女性在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2021年,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季节性用工计划^{②9},许多汤加男性前往国外工作,共有22.1%的家庭是女户主。在传统上,由于“法户(fahu)”制度^{③0},女性一般在社区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该制度下,长姐或其他被选定的姐妹在家庭内担任受人尊敬和体现权威的职务。

然而,实际上大多数汤加人仍然认为男性是主要的决策者,担负领导责任。在2021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75名候选人中有12名女性(占16%),但无一当选。在议会26席议员中,有一名女性非民选议员,因此议会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为3.7%^{③1}。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四次选举中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率都均未超过8%^{③2}。

瓦努阿图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于1995年签署了《北京行动纲领》,并于2019年提交了《北京+25》国家审议报告,明确了需要解决的关键领域,如为妇女发展提供优质教育和培训。在地区层面,瓦努阿图于2012年签署了《太平洋地区领导人性别平等宣言》,由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于2016年发布的区域性调查显示,该国在妇女参政、性别平等和残疾人相关数据收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瓦努阿图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国家承诺包括《2016-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2020-2030年国家性别平等政策》以及《2020-2025年执行计划和监测评估战略》。这些承诺旨在促进所有年龄和行为能力的男女之间的平等、尊重、机会和责任。司法和社区服务部(MJCS)下属的妇女事务部(DWA)是瓦努阿图的国家妇女事务机构,负责监测和评估其国家性别政策。

在瓦努阿图,影响性别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包括:通过宗教、传统权力结构以及“卡斯塔姆(Kastam)”制度引入的父权价值观^{③3}。截至2022年3月,由于缺乏竞选席位所需的财力和资源^{③4},没有女性成为国会议员(自2012年以来一直如此)。瓦努阿图妇女事务部于2011年对《市政法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以确保在市政议会中为妇女保留一些席位,并建立妇女参与地方政府选举的配额制度。

瓦努阿图是世界上灾害风险评级最高的国家(《世界风险报告》2021年)。这是由于该国极易受到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此类灾害影响弱势群体,如妇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妇女也是儿童和老年人的主要照顾者,因此当

灾难发生时，她们的工作量可能会增加。

5.3 基础设施对妇女发展的重要性

尽管落后的基础设施对男性和女性均产生影响，但由于服务获取水平、财务困难和性别不平等，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在太平洋地区，女性花费大部分时间进行家务劳动并照顾家庭成员。例如，在汤加，据估计超过50%的女性每周在非经济活动上工作的时间比男性长，这些活动包括家务劳动、烹饪、照顾儿童和老年人(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2016)。

当地的风俗和限制，再加上落后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加剧许多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已经面临的不平等，从而使她们在灾害期间更容易受影响(Morgan等2020)。自然灾害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了不利的负面作用，影响她们的粮食安全、生命安全、健康和生计。在瓦努阿图，妇女通常负责为整个家庭提供食物，并承担63.6%的无偿再生产劳动(Williams2020)。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互通性和设计，尤其在农村或贫困社区，可以帮助妇女更好地获得卫生和交通服务。例如，更好的道路通达性，使妇女能够更轻松地到达卫生中心；在道路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这可能变得更困难。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农村中，妇女(以及女孩、男孩和男人)不得不走很长的距离或渡河，才能赶上公共汽车或卡车。在清晨或黄昏行走时，妇女更容易面临安全风险。因此，在基础设施设计和建设中，必须考虑满足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需求，以减少这些不利因素并确保妇女受益。

选择汤加和瓦努阿图作为研究案例，因为它们都积累了大量债务，前者海外债务的60%、后者海外债务的50%，其债主都是中国³⁵。自2008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向汤加提供了两笔重要的优惠贷款，分别于2008年11月和2010年3月开始。第一笔贷款约为7200万美元，而第二笔贷款约为4800万美元(Dornan和Brant2014)。这两笔贷款的期限为二十年，宽限期为五年，利率为2%³⁶。截至2022年底，瓦努阿图对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的债务总额约为1.37亿美元，政府当局自2018年以来已偿还部分贷款，2021年偿还了20亿瓦图，这是基于中国减少贷款优惠的背景下发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瓦努阿图，2023年)。

5.4 汤加和瓦努阿图性别分析案例研究的主要发现

本节将讨论基础设施项目对当地社区、妇女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帮助汤加和瓦努阿图促进性别平等。这些案例还将以中国和其他发展伙伴为参照，阐明性别在发展融资中的作用。

5.4.1 汤加

中国资助了汤加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包括2018年在首都努库阿洛法进行的人行道建设，价值约550万美元，以及2015年圣乔治政府大楼的建设，价值约1330万美元³⁷。前一个项目由基础设施部与广东东莞市合作完成，后一个项目由则上海建工集团建设。这两个项目的完成使当地居民拥有更好的道路和安全的建筑条件。多年来，东莞市为汤加提供了各种捐赠和其他实物援助，包括二十台船只引擎（2023年3月）³⁸、拖拉机、计算机（2022年1月）以及为面临水源短缺弱势家庭提供的500个水箱（2021年9月）³⁹。

一位关键受访者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救济、技术装备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但一些项目也存在着质量问题，向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捐赠的计算机的使用寿命也不到一年。此外，该受访者补充说，“汤加大部分的一带一路项目都会雇佣中国工人，使用中国生产的材料，当地人被雇佣，主要是担任工地的保安”（2023年3月16日的采访）。博扎托（Bozzato 2017）指出，中国对外援助通常是有条件的，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所涉及的建设项目，其承包商必须是中国本土公司，建筑材料约有50%要从中国采购。就实际参与建筑物、道路等项目的建设阶段而言，汤加很少有女性在这些项目中就业。女性往往以支持服务的形式发挥间接作用，例如为项目现场的工人做饭（2023年3月20日的采访）。

此外，中国在灾害救援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2021年海底火山爆发后，中国在72小时内作出响应，提供医疗物资，派遣医疗人员，并捐赠集装箱作为临时住房。该受访者表示，这些集装箱是否到达了最脆弱的地区，是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这与中国无关，而是与负责分配这些资源的汤加管理机构有关。

来自中国的资金，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政府间框架内运作的。资金通常直接面对政府各部门，然后由其向公众（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妇女和残

疾人团体等)通报哪些资金和方案是可用的。然而,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基于它们感兴趣的优先领域)也可以直接向中国驻汤加大使馆提出财政援助或请求。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请求获得桌子和打印机等办公用品。该受访者还表示,中国的援助和操作指南并不明晰:“在我们申请援助时,他们没有明确指定应该优先考虑的领域”。除了中国,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以及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MFAT)也会提供资金和援助(2023年3月20日的采访)。

汤加民间社会论坛(CSFT)下的各个妇女团体,在妇女事务和性别平等司(WAGED)或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等发展伙伴的资助下,在各自的社区发起提高性别平等意识项目;然而,该受访者并不了解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现状,也不清楚这些项目对汤加妇女发展的关注程度(2023年3月20日的采访)。这种说法可能表明民间社会组织、中国公司和相关机构之间缺乏联系或合作。

关于边缘群体,Lavame'a Ta'e'iloa 残疾人协会约60%的成员是女性。该受访者表示,残疾人仍然被忽视。在包容性方面,有关管理机构与残疾人群体之间存在广泛的脱节:资金和项目并没有直接惠及残疾人,因为他们并未参与决策过程。此外,“2016年,有10100名残疾人在内政部登记,但是仅有2520名残疾人在2022年初的火山爆发后得到了帮助。”(2023年6月21日的采访)。该受访者不确定在未得到帮助的残疾人中有多少是女性。他重申,因为缺乏相关支持,也未开展调查以更新统计数据,所以并不清楚受影响的人群是否得到了必要的帮助。此外,根据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承包商建造的一些建筑并不总是“对残疾人友好”,例如并未设计修建坡道(2023年2月24日的采访)。

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奖学金和工作交流项目,为太平洋岛屿的学生和成年人提供教育和文化交流机会。据受访者称,中国向妇女事务和性别平等司捐赠了30台笔记本电脑,以帮助该部门在社区和外岛为妇女团体进行社区培训。此外,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中国还先后将25名汤加政府工作人员送至中国,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培训。因此,妇女组织能够学习如何撰写报告,申请资助。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和文化交流也得到加强。中国对妇女事务和性别平等司的支持符合汤加政府《汤加国家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与行动战略计划2019-2025年》政策的目标三:“平等参与经济和就业”,也契合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文互通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两大目标。通过中国的支持,妇女能够提高其技术水平和写作技能,体验新的环境,学到新的技能,也因此能够加强性别包

容、提高经济前景，增强妇女在资源获取方面的权益。然而，在基础设施部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决策过程中，妇女的参与度明显不足（2023年4月6日收到的电子邮件回复）。

5.4.2 瓦努阿图

塔纳和马拉库拉公路修复项目由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价值约5200万美元^{④0}。该项目由中国土木工程建设总公司牵头，瓦努阿图财政和经济管理部协助。已建成的道路将村庄和社区连接起来，当地人经常称之为“希望之路”。《中国日报》网站分享的一则故事指出，在塔纳岛上，一名种菜的农户曾经每天花费七到八个小时在去出售农产品的路上，现在只需45分钟就能到达市场。此外，在该工程的前两个阶段，该项目雇佣了约400名当地工人^{④1}。

自公路项目完成以来，生活在塔纳和马拉库拉岛上的尼 - 瓦努阿图民众受益匪浅。交易市场和其他公共服务触手可及，这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健康、安全、食品和营养状况。工程的实施为当地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无疑提升了他们的收入和照顾家庭的能力，他们也学到了新的建筑技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足够的可用数据说明当地女工就业的人数，以及关于这些中国公司的性别政策的信息，即便是有的话，也不完整。还有一个问题引人关注，有公务员指责称，前基础设施部长在没有咨询社会服务领域意见的情况下，就与中方达成了该项目的非正式协议（Dornan 和 Brant2014）。

为达成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文互通目标，中国每年向瓦努阿图提供大约2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和数百个培训机会^{④2}。从中国援助获得的收益，符合瓦努阿图的《2016-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三大支柱目标，包括社会（优质教育、社会包容）、环境（食品和营养安全）和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社区、创造就业和商机）^{④3}。“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于2021年发起的一项旨在引导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倡议，它与瓦努阿图《2016-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对接仍在进行中。

然而，有些一带一路项目也遭受了一些批评。2017年6月，在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翻修马拉波阿学院的瓦努阿图工人声称，他们的中国雇主烟建集团（Yanjan Group）违反了瓦努阿图的劳动法。他们声称工作时间过长，工资使用现金支付且没有工资单。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他们与中国管理人员之间存在语言障碍，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④4}。这表明有必要监督并促使中国承包商遵守瓦

努阿图的劳动法，以确保本地工人的权利、安全、保障和福祉。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包括女工在内任何工人都没有遭受剥削。

此外，根据一位受访者的说法，“来自中国的资金与妇女的关系微乎其微；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的项目并不是由中国直接资助的，而是通过本地的相关政府机构和 / 或发展伙伴组织而获得的——是一种政府对政府的行为。”除了学校建筑、道路和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外，受访者表示并没有看到任何支持社区层面性别平等的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公司与当地妇女和女童的接触并不多(2023年3月21日的采访)。

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医院等辅助服务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村庄，为瓦努阿图提供了巨大帮助。然而，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女性并没有直接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但她们确实在一些项目现场提供食物和餐饮服务(2023年4月19日的采访)。另一位关键受访者重申，在基建项目中，妇女通常在垃圾处理、清洁和烹饪支持服务等方面担任辅助岗位(2023年5月9日的采访)。

当被问及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时，尤其是在两个案例研究中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位汤加受访者指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部分居民就业方面给予了很大帮助……提供了更好的道路通行条件，由于港口 / 码头的升级和建设，与外岛之间的互联互通得到了改善；然而据我了解，在这些一带一路项目中，妇女和女童似乎并未给予优先考虑”(2023年6月21日的采访)。一位瓦努阿图受访者也重申了类似的观点，表示“中国的优势在于对瓦努阿图的基础设施支持；然而，推动和实施他们的性别平等政策不足可能是其弱项”(2023年6月28日的采访)。

这两位受访者表示，相比之下，他们都曾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合作，在各自社区就性别平等意识的提高和实施开展工作。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和汤加、瓦努阿图政府的性别发展政策是一致的，都以提高当地社区的性别意识为目的。然而，一位汤加受访者指出，尽管在一些社区进行了宣传活动和培训，但捐赠组织很少进行后续工作或与当地居民互动(2023年6月28日的采访)。另一位关键受访者则提到，“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发展项目上的性别分析似乎只是流于表面，并没有分析这些项目为当地社区带来的直接影响——他们是否与当地妇女互动并寻求她们的反馈意见了呢？……看起来这些组织并不擅长协调这样的对话”(2023年5月9日的采访)。人们对性别平等有很大兴趣；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人民并没有看到其价值。这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评估这些项目的影响，以及从长远来看，这些项目是否真的惠及妇女（2023年5月12日的采访）。

结论与建议

基础设施发展在太平洋岛屿的社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引入，是整个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毫无疑问这些项目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尽管太平洋岛国政府面临着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等其他主要援助国的广泛质疑，它们还是更愿意与中国这个援助国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还重申致力于在全球舞台上追求性别平等，并认为加强妇女能力和保护妇女健康，将最终为经济和政治发展营造繁荣稳定的环境。在2021年1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合作》白皮书中，强调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其核心倡议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些目标，其中尤为重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五——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然而，尽管中国承诺在全球推动性别平等，但从本文的两个国家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中国似乎还没有将这些政策纳入其一带一路项目中。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和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发展伙伴和资助方，已经在太平洋岛国的投资项目中纳入了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五的性别框架和政策。亚洲开发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性别和发展的政策，作为其性别和发展活动的框架。该政策将性别主流化作为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的重点。此外，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在基础设施方案中，将性别平等主流化纳入领导能力培训中，旨在吸引妇女和女童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通过提供能力建设项目和教育机会（如奖学金和助学金等）来推行其“软实力”政策，但是在这两个案例研究中，中国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残疾人等少数群体之间缺乏合作、理解和沟通。很显然，中国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色，并认为这对汤加和瓦努阿图来说更重要，因为通过道路、桥梁、港口等实现互联互通，这些比两个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平等问题更为优先。

这两个太平洋岛国的不在政府部门内任职的受访者重申，中国的发展援助项

目中，捐助者的协调和安排都只是在“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框架下才存在的。一些观察者指出，中国援助和投资的实施并未惠及社区层面的预期受益人。因此，受援国政府当局和财政部等负责机构，确实影响了中国援助在当地的有效性和实施效果。考虑到这些机构与政治领导人的密切联系，他们是否有能力对项目影响做更进一步的深入评估变得至关重要（Dornan 和 Brant 2014）。尽管关键受访者不愿指名道姓说出谁是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中实际受益的“当地精英”，但他们承认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从访谈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实施性别平等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在建立更透明的流程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虽然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有性别发展框架，但与中国一样，它们在性别平等方案的实施阶段及其对妇女的长期影响方面也存在短板，只是中国的程度更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省级和国家规划以及独立工作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阻碍了瓦努阿图的性别平等进展（MJCS 2019）。

要提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性别平等政策制定和实施落地，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 与当地的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妇女团体和其他边缘群体保持开放的沟通和对话。这些参与者在与社区和基层妇女接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 重新审视将妇女的能动性和发展纳入项目范围的迫切需求。
- 更加强调和实施执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五，特别是对中国企业承揽的一带一路项目，确保项目遵守并符合国家性别平等政策和战略。
- 提高获取性别平等操作指南的便捷性，以及实施过程的透明度，例如将中文官方文件翻译为英文，以便当地部门和社区更好地理解 and 获取这些文件。
- 提高媒体认知，开展宣传活动，鼓励当地妇女和女童获得更多机会，尽可能参与项目建设阶段的技术领域的工作。
- 提升对中国援助优先领域的更多认识，如性别发展议题上有哪些优先领域，以便计划申请项目的当地潜在合作机构和妇女团体更加了解情况。
- 开展可行性研究，了解在何处以及如何帮助妇女，例如征求在项目实施区域的妇女团体对项目可行性的看法。这可以跟当地政府机构合作进行。
- 解决语言障碍问题，考虑雇佣更多本地工人，尤其是女性。
- 制定一个关于项目对妇女直接和间接影响、预期产出的框架，同时确定项

目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SWOT分析)。

- 定期与政府机构沟通，跟进了解财政、医疗和技术援助的分配和供应情况，以评估相关政策框架是否真正惠及妇女。

- 在建造建筑物等时，考虑为妇女和弱势群体(例如残疾人士)提供合理的便利设施，例如设置坡道。

至关重要的是，太平洋岛国应积极将性别平等列在基础设施发展需求的优先位置，并与中国及其他援助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这一重要领域的进展。管理机构需要更加透明地监督、评估和协调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涉及到与中国私营公司签订合同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在两国的妇女事务和基础设施部门，加强人员能力建设，使其在所有由捐助方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能够提供建议并监测性别主流化的推行，这一点同样重要。此外，太平洋国家政府应制定关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性别影响的进展和年度报告，与国家妇女团体、民间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和其他目标群体共享，并在网上公开。妇女团体的独立研究和宣传活动，可以帮助推动基础设施领域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倡议。最后，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部门、妇女团体和公民社会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进行有效协调，以创建一个框架，帮助评估一带一路项目对性别平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翻译：赵瑾娜；校对：韩扬、李悦；核稿：张玉婷)

注释

① Naidu, V., Lutu, V. and Asi, C. (V. 奈都, V. 鲁图及 C. 阿斯) (2022). Regional Report on Pacific geopolitic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 four-country study for PANG (Pacific Network on Globalisation, Suva (Not yet publicly released)) (《太平洋地缘政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地区报告：太平洋岛国全球化网络四国报告》，尚未公开发布)。

② Westcott, B. (B. 韦斯科特) (2023). Why US and China Compete for Influence with PI Nation (为什么中美两国在太平洋国家竞争影响力).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7-11/how-us-china-seek-influence-with-solomons-and-other-pacific-island-nations> (2023年7月15日访问)

③ 参与的主要受访者有：汤加民间社会论坛(执行主任)、妇女事务部

和性别平等司—汤加（监测和评价官员）、汤加拉瓦米阿塔伊洛阿残疾人协会（主席）、瓦努阿图全国妇女理事会（执行主任）、瓦努阿图互联网治理论坛主任（“智能姐妹倡议”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女孩在瓦努阿图信息通信技术（ICT）部门就业的能力）和两名独立的 GEDSI 顾问。

④ 同注释①。

⑤ Bozatto, F. (F. 博扎托) (2017). ‘Gifts That Bind: China’ s Aid to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s’ (《“绑定的礼物：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Asia Japan Journal 12, p. 19

⑥ Zhang, D. (张登华) (2022). China’ s influence as a Pacific donor, Lowy Institute (中国作为太平洋资助国的影响).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hina-s-influence-pacific-donor> (2023年1月22日访问)

⑦ 王毅 (2022). China stands ready to build six new platforms for cooperation with PICs (《中国愿打造同岛国合作的六个新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wshd_665389/202205/t20220531_10695001.html (2023年3月1日访问，此链接已经失效。)

⑧ 出处同上。

⑨ Petersson, L (L. 彼得森). (2022). ‘China’ s growing influ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Uttryck Magazine. <https://www.uttryckmagazine.com/chinas-growing-influence-in-the-south-pacific/> (2023年2月25日访问)

⑩ 所罗门群岛首都。

⑪ 所罗门群岛人口最大的省份。

⑫ Kemish, I (I. 凯米施). (2022). Great powers and small islands: An update from the Pacific and its engagement with Australia (《大国和小岛：太平洋地区发展进展和与澳大利亚的合作》), Observer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great-powers-and-small-islands-an-update-from-the-pacific-and-its-engagement-with-australia/> (2023年3月1日访问)

⑬ Pohle-Anderson, C. and Staats, J (C. 波勒-安德森, J. 施特兹). (2023). Pro-Taiwan Pacific Island Leaders Show Cracks in China’ s Appeal: Some local and national leaders are calling for greater scrutiny of China’ s activities (《亲台的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吸引力的质疑：一些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呼吁对中国的活动进行更严格的审查》）。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3/05/pro-taiwan-pacific-island-leaders-show-cracks-chinas-appeal> (2023年5月20日访问，此链接已经失效。)

⑭ Ratuva, S (S. 拉古瓦)。(2022)。Pacific Agency: A Devalued Political Capital? (《太平洋地区的能动性：被低估的政治资本》)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pacific-agency-a-devalued-political-capital/> (2023年5月11日访问)

⑮ Staats, J (J. 施特兹)。(2022)。Four Takeaways from China's Tour of the Pacific Islands (《中国环太平洋岛国访问的四大收获》)。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2/06/four-takeaways-chinas-tour-pacific-islands> (2023年5月8日访问，此链接已经失效。)

⑯ Kinabalu, K (K. 基纳巴鲁)。(2022)。Visit to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ractice of China's equality-based diplomacy, boosts common development (《太平洋岛国访问展现了中国以平等外交为实践，促进了双方共同发展》)，Chinese FM. Xinhua. <http://www.chinaview.cn/20220606/66b2bd3a6b874384b8f1aa1a034b9b81/c.html> (2023年5月15日访问)

⑰ The Pacific Community (太平洋共同体, SPC) 2018. Pacific Platform for Action o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Human Rights 2018-2030 (《太平洋性别平等和妇女人权行动平台》)。 <https://www.spc.int/sites/default/files/wordpresscontent/wp-content/uploads/2017/09/PPA-2018-Part-I-EN2.pdf> (2023年2月19日访问)

⑱ Bester, E (E. 百斯特)。(2022)。Wro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Pacific (《太平洋地区权力的错误失衡》), Lowy Institute.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wrong-balance-power-pacific> (2023年3月1日访问)

⑲ 出处同上。

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清单》。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2649_665393/202205/20220524_10691917.html (2023年2月11日访问，此链接已经失效。)

㉑ Hughes, L (L. 休斯)。(2019)。Tonga: Between an Irresistible Force and

an Immovable Object (《汤加：在不可抗拒的大国力量和不可动摇的国家之间》).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https://www.futuredirections.org.au/publication/tonga-between-an-irresistible-force-and-an-immovable-object/#:~:text=A%20report%20published%20in%202017,aid%20to%20the%20Pacific%20Islands>. (2023年2月13日访问, 此链接已经失效。)

②② Ati, M. and Haicheng, Z (马克·阿蒂, 周海成). (2022). 《中国和瓦努阿图共同踏上新征程》, China Daily Global.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203/22/WS6239227da310fd2b29e5265d.html> (2023年2月15日访问)

②③ 新华网. (2018). 《中国援助推动了瓦努阿图的发展：大使》.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4/23/c_137131384.htm (2022年11月16日访问)

②④ 中国驻瓦努阿图大使馆. (2023). 李名刚大使就中瓦建交41周年发表署名文章《新起点 新机遇》

http://vu.china-embassy.gov.cn/eng/sgdt/202303/t20230326_11049250.htm. (2023年3月27日访问)

②⑤ 出处同上。

②⑥ Vanuatu Daily Post (瓦努阿图每日邮报). (2023). VT59M Grant from China for Emergency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中国提供5900万里亚尔赠款用于紧急人权援助》). 2023年4月15日, https://www.dailypost.vu/news/vt59m-grant-from-china-for-emergency-humanitarian-assistance/article_83feb4b5-9a0a-5165-9084-bd3f9c2ac240.html (2023年5月25日访问)

②⑦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Tonga (汤加内务部). (2019). National Women's Empower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Tonga Policy 2019-2025 (《2019-2025年汤加国家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 SPC. https://hrsd.spc.int/sites/default/files/2021-07/WEDGET_STRATEGIC_PLAN_OF_ACTION_2019_2025_Final.pdf (2023年2月20日访问)

②⑧ Radio NZ Pacific (新西兰太平洋广播电台). (2015). Tonga government steps away from CEDAW ratification (《汤加政府拒绝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283057/tonga-government-steps-away-from-cedaw-ratification> (2023年5月25日访问)

②⑨ Tonga Statistics Department (汤加统计部). (2021). Tonga Household

Listings 2021 (《2021 年汤加家庭名单》), Tonga-Household-Listing-2021.pdf (2023 年 2 月 23 日访问)

③⑩ “法户 (Fahu)” 制度赋予家庭内部的决策权, 某些情况下将姐妹列在兄弟之前。

③⑪ Guttenbeil-Likiliki (古滕贝尔-里奇里奇), (2021). No women elected in Tonga: time to change the story (《汤加没有女性当选: 是时候改写故事了》), DevPolicyBlog, 2021 年 11 月 19 日. No women elected in Tonga: time to change the story - Devpolicy Blog from the Development Policy Centre (2023 年 3 月 5 日访问)

③⑫ 出处同上。

③⑬ 卡斯塔姆 (Kastam) 实践体现了社区和传统的概念, 在瓦努阿图各地并非完全一致, 而是依据位置和特定的尼-瓦努阿图群体文化而有所不同。

③⑭ 联合国妇女署. (2022). 《瓦努阿图性别平等简报》, https://asiapacific.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2/UN_WOMEN_VANUATU.pdf (2023 年 2 月 14 日访问)

③⑮ Greenfield, C. and Barrett, J (C. 格林菲尔德, J. 巴雷特). (2018). Payment du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red as debts to China mount (《到期付款: 太平洋岛国由于欠中国债务增加而出现赤字》),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acific-debt-china-insight-idUSKBN1KK2J4> (2023 年 2 月 14 日访问)

③⑯ AID Data (援助数据). <https://china.aiddata.org/projects/37748/> (2023 年 6 月 20 日访问)

③⑰ Li, C (卡罗尔·李). (2022).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Oceania: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一带一路倡议在大洋洲的影响: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与参与》). The BRI in Oceania,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https://www.cfe-dmha.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FaplgGeo2ps%3D&portalid=0> (2023 年 3 月 5 日访问)

③⑱ Matangi Tonga Online (汤加群岛新闻网站“汤加风”). (2023). Tonga receives 20 boat engines from Dongguan City (《汤加从东莞接收 20 台船用发动机》). <https://matangitonga.to/2023/03/31/tonga-receives-20%20boat%20engines%20>

[from%20China](#) (2023年4月28日访问)

③⑨ Matangi Tonga Online (汤加群岛新闻网站“汤加风”)。(2023)。China donates 500 water tanks for families vulnerable to water shortage (《中国向面临水源短缺弱势家庭捐赠500个水箱》)。<https://matangitonga.to/2021/09/23/china-donates-500-water-tanks-tonga> (2023年4月28日访问)

④⑩ Li, C (卡罗尔·李)。(2022)。The BRI in Oceania (《大洋洲“一带一路”倡议》),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https://www.cfe-dmha.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FaplgGeo2ps%3D&portalid=0> (2023年3月30日访问)

④⑪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2023)。China-aided road project builds hope in Vanuatu (《中国援建的公路项目在瓦努阿图燃起希望》), http://en.cidca.gov.cn/2023-03/02/c_865431.htm (2023年3月5日访问)

④⑫ Ati, M. and Haicheng, Z (马克·阿蒂, 周海成)。(2023)。China, Vanuatu embark on new journey together (《中国和瓦努阿图共同踏上新征程》)。<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203/22/WS6239227da310fd2b29e5265d.html> (2023年3月28日访问)

④⑬ Vanuatu National Review Report (《瓦努阿图国家审议报告》)。(2019)。Review o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审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3336Republic_of_Vanuatu_VNR_2019.pdf (2023年4月12日访问)

④⑭ Radio New Zealand (新西兰广播电台)。(2017)。Vanuatu workers claim mistreatment by Chinese firm (《瓦努阿图工人声称遭到中国公司不公对待》), 2017年6月30日。<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334191/vanuatu-workers-claim-mistreatment-by-chinese-firm> (2023年2月24日访问)

参考文献

C.·贝克(C. Beck)。2020年。《“安全挑战”, 专题:“太平洋”如何融入“印太”?》第16卷, 第1期, 第11-16页。区域安全研究所。(‘Security Challenges’, Special Issue: How does the ‘Pacific’ fit into the ‘Indo-Pacific’? Vol. 16, No. 1, pp.

11-16.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ecurity)

F. 博扎托(F. Bozzato)。2017年。《绑定的礼物：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载于《亚洲日本杂志》第12期。(‘Gifts that Bind: China’ s Aid to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s’ . In Asia Japan Journal 12.)

蔡一平、于音。2022年。《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对性别影响的分析框架》。苏瓦：DAWN。(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the Gender Impact of China’ s Global Engagement in the Global South. Suva: DAWN.) <https://www.dawnfeminist.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20230202-China-Analytical-Framework.pdf> (2025 年 1 月 21 日访问)

R. G. 克罗克姆勃(R. G. Crocombe)。2007年。《亚洲在太平洋群岛：正在取代西方》。IPS，南太平洋大学，苏瓦。(Asia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placing the West) , IPS, USP, Suva

M. 道南(M. Dornan)、P. 布伦特(P. Brant)。2014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太平洋岛国政府的能动性、有效性和角色》，载于《亚太政策研究》，威利出版亚洲有限公司。(Chinese Assistance in the Pacific: Agency, Effectiveness and the Role of Pacific Island Governmen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Wiley Publishing Asia Pty Ltd.)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chinese_assistance_in_the_pacific.pdf (2023 年 5 月 18 日访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瓦努阿图工作人员报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Report Vanuatu)。2023年2月27日。《2023年第四条款咨询工作人员报告——债务可持续性分析》。(Staff Report for the 2023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Debt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27 February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23/03/20/Vanuatu-2023-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Staff-Report-and-Statement-by-the-531181> (2023 年 5 月 21 日访问)

卡罗尔·李(C. Li)。2022年。《“一带一路”倡议在大洋洲的影响：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与参与》。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系。(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Oceania: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University of Hawai’ i at Manoa,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https://www.cfe-dmha.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FaplgGeo2ps%3D&portalid=0> (2023 年 2 月 15 日访问)。

汤加政府。2013年。《汤加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2013-2023年》。(‘Tonga NIIP 2013-2023’ .PRIF, <https://www.theprif.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onga-National-Infrastructure-Investment-Plan-2013-2023.pdf> (2023年2月23日访问, 此链接已经失效。))

瓦努阿图司法和社区服务部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Community Services)。2019年。《“北京+25”瓦努阿图国家评估报告》。(Beijing +25 National Review Report Government of Vanuatu) [https://www.asiapacificgend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Vanuatu%20\(English\).pdf](https://www.asiapacificgend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Vanuatu%20(English).pdf) (2023年2月27日访问, 此链接已经失效。))

G. · 摩根 (G. Morgan)、A. · 巴杰帕伊 (A. Bajpai)、P. · 塞皮 (P. Ceppi)、A. · 阿尔海奈 (A. Al-Hinai)、T. · 克里斯滕森 (T. Christensen)、S. · 库马尔 (S. Kumar)、S. · 克罗斯基 (S. Crosskey)、N. · 奥里根 (N. O’ Regan)。2020年。《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基础设施》, UNOPS, 丹麦哥本哈根。(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 UNOPS, Copenhagen, Denmark.) <https://content.unops.org/publications/UNOPS-Infrastructure-for-Gender-Equality-and-the-Empowerment-of-women.pdf> (2023年5月10日访问)

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集团 (Pacific Region Infrastructure Facility, PRIF)。2016年。《性别和基础设施评估》, PRIF 协调办公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Review of Gender and Infrastructure, PRIF Coordination Office, NSW, Australia)

太平洋岛国全球化网络 (PANG)。2022年。《蔚蓝之海: 太平洋地区的资源、港口和地缘政治》, 苏瓦。(All That Blue: Re-sourcing, Port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Pacific (Pacific Network on Globalisation), Suva.)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631e7e482f2ed14cbe31c1ac/t/635602eaa667d879afab4b3a/1666581232162/All+That+Blue+Briefing+Paper.pdf> (2023年5月13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SCIO)。2021年。《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http://english.scio.gov.cn/node_8021417.html (2023年5月15日访问)

汤加统计部 (Tonga Statistics Department, TSD)。2018年。《汤加劳工调查》。(Tonga Labour Force Survey) <http://2018-Labour-Force-Survey-Report.pdf> (2023年2月20日访问, 此链接已经失效。))

张登华 (D. Zhang)。2018年。《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 最新发

展、动机和影响》。太平洋事务部。(China, India and Japan in the Pacific: Latest Developments, Motivations and Impact. Department of Pacific Affairs) http://dpa.bellschool.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2018-09/dpa_dp2018_6_zhang_final.pdf (2023年2月11日访问, 此链接已经失效。)

M. ·威廉姆斯(M. Williams)。2020年。《关于热带旋风哈罗德的快速性别分析》, 关怀国际, 2020年4月14日。(Tropical Cyclone Harold Rapid Gender Analysis, Care International, 14 April 2020. <https://www.careevaluations.org/wp-content/uploads/TC-Harold-Rapid-Gender-Analysis-14.04.20.pdf> (2023年2月3日访问, 此链接已经失效。)

全球风险报告(World Risk Report)。2021年。德国发展援助联盟大学博鲁姆分校——和平与武装冲突国际法研究所。(Bündnis Entwicklung Hilft Ruhr University Bochum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and Armed Conflict, IFHV)

厄瓜多尔及秘鲁 的中国矿业项目： 性别影响和妇女的能动性

黛安娜·卡斯特罗·萨尔加多 (Diana Castro Salgado)



厄瓜多尔
和秘鲁

引言

本文探讨了秘鲁的拉斯班巴斯 (Las Bambas) 和厄瓜多尔的里约布兰科 (Rio Blanco) 两个采矿项目对当地社区妇女的影响，以及她们在捍卫自然和土地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两个采矿项目分别自2014年和2013年起由中国公司控制，拉斯班巴斯项目由MMG公司控制，其主要股东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里约布兰科项目由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 (Ecuagoldmining) 控制，其所有者为中国的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在这两个案例中都存在潜在的环境和社会冲突，而且妇女在这些抗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参与拉丁美洲采矿业的背景，并对中国采矿业对外投资指导方针中的性别方法进行了反思。第二部分通过简要的历史概述介绍了这些项目，并探讨了采矿活动对妇女生活的影响，以及妇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捍卫大自然和她们的土地。第三部分是比较分析和主要结论。

1.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矿业开采

在所有的自然资源开采活动中，采矿业尤其加剧了父权文化，加深了性别不平等 (Ulloa 2016, 第124页)。拉丁美洲的妇女研究者和女权主义者 (Abnal 2015, Aliaga 等 2021, Guzman 2022, Pérez 等 2019) 发现，由于该行业吸引了男性就业，造成男性人口增加，因此在矿业开采的主要地区有非常严重的男性化现象。男性霸权的利益和价值观所带来的变化重新构建了社区。因此，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更直接地感受到了矿业活动的影响，因为她们的传统角色直接关怀生命——包括对人类、动物和自然的关怀。此外，她们还面临着不断加剧的物质上的和象征性的暴力的不同影响。

卡特里娜·安德森 (Katrina Anderson) 在她最近的研究《在危机中建立力量：妇女对采矿业的应对》(2022) 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不仅是结构性的，植根于制度体系和社会实践，而且是多维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经济、环境、政治和

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本研究从这些方面分析了采矿项目对妇女的影响。

1.1 中国采矿业的背景和特点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大宗商品热潮 (commodity boom)”时期，中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业务不断增加。它最初是由中国工业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推动的，如今也受到了维持全球矿产供应链正常运转（如能源转型所需的铜、锂等）的紧迫性影响。

根据恩里克·杜塞尔 (Enrique Dussel) 在 2022 年编制的关于中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数据库，2000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通过外国直接投资 (FDI) 进入拉丁美洲国家的近 1720 亿美元中，近 40% 流向了采矿和金属行业，这其中有 56% 是通过兼并和收购以前由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公司运营的采矿项目获得的。

拉丁美洲在全世界矿产储量中拥有很高的比例：锂储量的 61%、铜储量的 39%、银储量的 32%、锡储量的 25%、铝土矿和氧化铝储量的 18%、镍储量的 32%、钼储量的 25% 以及铁储量的 15% (Bárcena 2018)。厄瓜多尔和秘鲁在中国在该区域的矿业扩张中扮演着战略性角色。在秘鲁，诸如 Toromocho、Mina Galeno、拉斯班巴斯、Marcona 和 里约布兰科等项目尤为突出；厄瓜多尔的 Mirador、San Carlos Panantza 和里约布兰科等项目也同样重要。最近，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因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锂储量而备受关注。

尽管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在矿业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公司的行为并无明显不同 (Valderrey 和 Lemus 2019, 第 398 页)；但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中国公司的运营展现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鲁本·冈萨雷斯-维森特 (Rubén González-Vicente) (转引自 Sacher 2017, 第 137-140 页) 认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有三个特点。

首先，由于中国企业在所有权方面的“混合”性质 (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它们相对有别于私人股东和短期盈利需求。这使它们有余地采取西方同行不愿采用的方式运营并承担其中的风险 (Sacher 2017, 第 140 页)。

其次，在矿业并购的同时，中国企业也会商洽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合同，以建设公路、铁路、港口、发电和电力输送系统等，这使它们能够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联盟和财团，并控制供应链 (Sacher 2017, 第 138 页)。因此，紫金矿业集团、铜陵有色金属集团、中国五矿集团、江西铜业、天齐锂业、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首钢总公司和中国铝业公司等公司都在矿山的勘探、开采、加工和提炼阶段进行投资，同时也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投资。据国际包容性发展组织 (IDI 2021) 称，中国的政策和商业银行提供了稳定的长期融资来源，进一步推动了这些投资活动。

第三，如本文分析，中国公司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当地社区在透明度、问责制、人权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冈萨雷斯 - 维森特 (González-Vicente) 认为^①，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公司“在中国不需要面临来自‘公民社会’的压力”，因此可以避开公众舆论 (Sacher 2017, 第 139 页)。所以企业缺乏进行尽职调查、全面风险评估、对话和赔偿等有效机制。

关于最后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3 年至 2020 年期间，非政府组织“商业与人权信息中心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re)” (2021) 在全球范围内记录了 679 起与中国海外商业行为有关的侵犯人权投诉。其中，76% 涉及采掘业，其中 35% 涉及金属采矿业。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诉涉及中国矿业公司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冲突以及环境影响。拉丁美洲是报告案件数量最多的地区 (43%)。此外，在“中国投融资、人权与环境共同体 (Collective on Chinese Finance and Investment,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CICDHA)” 主持的 2022 年和 2023 年度报告中，分别曝光了 12 个和 6 个采矿项目，这表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业务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侵犯人权和重大环境影响的投诉。

1.2 性别与中国颁布的采矿业准则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监管机构和商业协会发布了越来越多的规划和指南，以促进中国公司在海外经营中取得良好表现。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国立法者的关注点、优先事项和政治意愿，往往标志着中国开始加强监管进程。

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国际化，这些指南越来越多地提及遵守国际规则 and 标准，如《世界人权宣言》、《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经合组织 (OECD) 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责管理指南》和《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其中都包含有关性别问题的重要指标和指南。这标志着“中国政府、企业和金融部门对其干预项目的结果愿意承担越来越多的共同责任” (Garzón 2020)。

在过去的五年中，虽然在最相关的国际业务准则中基本没有专门针对性别问题的规定，但在矿业领域，主要由于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CCCMC)发布的准则，情况有所改善(表1)。这两份矿业行业准则都至少在风险评估、劳动歧视、减少负面影响、尽职调查、性别暴力和侵犯人权等方面提到了性别或妇女问题。遗憾的是，就其性质而言，这些指导方针并不具有约束力，而且与其他企业协会一样，CCCMC也没有强制执行这些指导方针的监管权力，这就在条文与现实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执行鸿沟。拉丁美洲的案例，尤其是本文所分析的项目，就说明了这一点。

表 1. 2017–2022 年中国在矿业领域开展国际业务的主要适用准则

名称	发布年份	发布实体	参考国际框架	特别提及性别或妇女的情况
普遍准则				
《针对海外中国公司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指南》	2017	中国国际承包商协会与大公国际信用评级	《国际金融公司 (IFC) 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性表现标准》	在工人权利和利益部分提到，禁止基于种族或性别的就业歧视(3.1.2–8)。
《规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合作的通知》	2018	商务部，外交部，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无	无
《关于促进境外项目承包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9	商务部及其他19个部门	“国际规范和标准”	无
《对外投资合作与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	2022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和商务部办公厅	“国际承诺”，“国际惯例”，“国际标准”	无
矿业行业准则				
《海外矿业投资的社会责任指南》	2017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在中德双边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支持下	《2030年议程》 《联合国指导原则》 《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不得因性别等原因歧视工人(3.5.3) 2030年议程 进行社会影响评估[...]并制定全面计划以减轻[...]与性别相关的[...]负面影响(3.8.1) 制定[...]针对性别暴力的计划(3.8.10)

名称	发布年份	发布实体	参考国际框架	特别提及性别或妇女的情况
《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职调查准则》第2版	2022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联合国指导原则》 《经合组织（OECD）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指南》	尽职调查与风险成比例。这意味着“考虑这些风险如何影响不同群体 [...] 并从 [...] 性别角度进行尽职调查”（4.3）“... 由诸多因素引起的（性别暴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矿业活动对社区健康与安全的风险 [...]”（6.2.2.20）认定“由强迫迁移引起的人权侵犯 [...] 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不良影响”（6.2.2.19）

* 数据来源：根据拉丁美洲可持续发展组织（LAS）监测和传播工作的指导方针。

有趣的是，2023年5月，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发布了《采矿业和矿产价值链调解磋商机制》，其草案版本向国内和国际组织征求意见。拉丁美洲可持续发展组织（LAS）与一些非政府组织——金砖政策中心（巴西）、合作行动（CooperAcción，秘鲁）、环境与自然资源基金会（FARN，阿根廷）和自我支持组织（Sustentarse，智利）——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反馈并指出，该机制的建立表明，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有兴趣提供一个空间，解决受中国海外采矿业务影响的人们的申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妇女是在参与过程中特别脆弱和受排斥的群体。然而，该机制需要以促进性别视角、尊重遵守人权为重点，而不仅仅是为各方参与者之间提供一个谈判空间。

2. 妇女和秘鲁和厄瓜多尔的采矿项目

合作行动组织（CooperAcción）的尤瓦娜·马马尼（Yovana Mamani）和昆卡大学（Universidad de Cuenca）的安娜·加布里埃拉·卡斯特罗（Ana Gabriela Castro）合作撰写了本节内容，她们对采矿项目所在的农民社区妇女进行了七次深入访谈，其中拉斯班巴斯项目访谈了四名妇女，里约布兰科项目访谈了三名妇女。出于匿名原则受访妇女的姓名均有改动。所有受访者都亲身经历了采矿作业的直接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环境冲突，她们都是积极的妇女活动倡导者和抵抗运动的领导者。

2.1 拉斯班巴斯项目

拉斯班巴斯项目是一个露天铜矿，位于秘鲁南部海拔4000米的阿普里马克（Apuhima）大区。2016年，该项目开始商业生产，巩固了其作为秘鲁最大铜矿和世界十大铜矿之一的地位。据估计在2022年该铜矿产量占世界铜产量的2%，并贡献了秘鲁国内生产总值的1%（LAS 和 Schmidt 2022）。

跨国公司对该矿的勘探始于20世纪90年代。2014年，中国公司MMG（由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控股）、国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组成的财团以5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该采矿项目（合作行动CooperAcción 2015）^②。这是当时中国公司收购外国矿业资产的最大一笔交易（中国国资委SASAC 2014）。收购资金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银行（BOC）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提供的70亿美元银团贷款。

拉斯班巴斯项目的特点是与社区存在潜在冲突，2014年MMG的进入加剧了这种冲突。这主要是因为是在没有与公众事先、自由和知情协商的情况下，没有对变化进行研究的情况下，中国公司的项目就被当局批准，并且这个项目改变了矿物的运输方式和路线：它放弃了采矿管道项目，建立了由公路和铁路组成的复合式采矿运输。公路穿越150多个村庄，建在公有土地和公共道路上（Leyva 2018）。这一变化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妇女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项目直接影响的地区是历史上属于十八个农民社区的原住民领地。科塔班巴斯省（译者注：阿普里马克大区下辖的行政区）总人口为50656人，其中男性占53%，妇女占47%。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国家统计局和INEI 2017）。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与照料、小规模农业劳动，以及在本地进行农产品贸易和交换。男性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也是采矿作业中非技术工种的主要劳动力。

采矿项目对妇女的主要影响

- 经济影响

拉斯班巴斯等采矿项目往往因其创造的就业机会而得到推崇；然而，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采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通常是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是如何重新建构了性别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受到的影响最大（Pérez 等 2019）。妇女至

少在三个方面受到影响：土地权、生活成本增加和就业机会。

采矿活动中固有的个人和经济利益进一步加剧了历史上土地保有权的不平等。为扩大采矿业务就要不断买卖土地，这意味着妇女越来越难以获得她们日常活动所依赖的社区土地。此外，在科塔班巴斯等社区，土地所有权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属，妇女没有决策权（Pérez 等，第 50 页）。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家庭和社区关系的分裂和瓦解。玛蒂尔德（Matilde）不禁问道：“在你出生的村子里，就因为你是妇女，你就没有土地权？这不公平”。她接着说，“……以前，虽然我们很穷，但我们很快乐；那时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很多自私自利”。她的证词反映了科塔班巴斯许多妇女的处境；她们在自己的社区没有土地权，更不用说在丈夫的社区了；她们在社区决策中没有发言权。

采矿项目周边地区的生活费用不断上涨，这对负责家庭照料和养家糊口的妇女来说是一个问题。随着采矿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当地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而当地工人大多是男性。例如，维罗妮卡（Verónica）说，采矿活动影响了家庭的食物成本：“……在矿业公司工作导致所有东西都非常昂贵；不像以前可以买到便宜的食物”。她还说，“……不仅是家里的食品，衣服、药品也是如此”。

在就业方面，Pérez 等人（2019，第 23 页）的研究表明，在拉斯班巴斯等采矿业的环境中，妇女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男性。尽管他们发现 MMG 已努力将妇女纳入价值链，但传统的性别角色却被加深了，妇女扮演着确保工人及其家庭得到照顾的角色（第 25-26 页）。换句话说，妇女是采矿活动的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提供者，拉斯班巴斯大型项目建设阶段的动工，即宣布妇女开始承担“三重负担”：家庭内的劳动、照顾家人和家庭外的工作（第 42 页）。

此外，即使受过所需教育的妇女，也很难在矿山从事工作。2021 年，在拉斯班巴斯的直接劳动力中，妇女仅占 8.9%（Energiminas 2021）。那些找到工作的妇女表示，工资不足以支付生活开销，因为她们往往从事清洁和做饭等收入较低的工作（Pérez 等 2019，第 25 页）。玛蒂尔德（Matilde）说：“我们没有工作；对于这里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是妇女，情况会更糟”。对于维罗妮卡（Verónica）来说，不仅是面临生活困难，而且还面临着歧视：“在查华丘（Chalhuahuacho）地区，矿业公司不要妇女。……当他们给我们工作时，这里的工资，在矿业公司旁边，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此外，就业机会与受教育程度

无关：“有时，看到我们地区发生的情况，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年轻妇女，但她们没有工作”。

- 环境影响

采矿项目对环境与健康造成了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每天有 370 辆重型卡车经过 169 个居民点运输矿产品，造成持续噪音、水源和牧场污染、震颤和粉尘（中国投融资、人权与环境共同体 CICDHA 2022）。尽管这些影响总体上影响到所有村民，但对妇女的影响却有所不同，因为她们从事的家庭照顾和生计活动主要依赖于水、土地和动物等自然资源。

玛蒂尔德（Matilde）对此表示担忧：“由于破碎机产生的粉尘，绵羊、奶牛和小羊驼都死了……我想知道他们如何给我们解决污染问题”。她还说，“如果我们卖肉，他们会问肉从哪里来；如果我们说是奇卡维（Chicñawi）^③ 的，他们就不想买了，因为他们说肉被铅污染了”。她提到，在采矿活动之前，他们没有这些问题。胡安娜（Juana）也担心：“他们制造的灰尘和噪音……从环境方面来说，对农业和畜牧业造成严重影响”。维罗妮卡（Verónica）说，“原来在我们的溪流里有鳟鱼……，但不幸的是，由于水受到污染，我们几乎再也没有鳟鱼了”。

- 政治影响

2015 年至 2016 年间，运输方式的改变所引发的冲突夺去了四名社区成员的生命，三名妇女倡导者被定罪（Bueno 2019）。这些冲突的特点是，中国公司与私人保安公司签订了合同，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刑事定罪和施加迫害。有些孤儿寡母完全被国家和公司遗弃。玛丽亚（Maria）的情况就是这样，她的丈夫被杀害了。她说：“我非常痛苦，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杀害我的丈夫……我无法工作，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另一位妇女的证词也表明了绝望：“我的儿子死了，我以前都是依靠他……我再也不能工作了，我没有力气耕种土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吃的，我没有牲畜，我没有水，我所在的社区不再下雨。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庄稼”。另一位寡妇说：“我丈夫像动物一样被杀害了。国家和 MMG 都没有帮助我们……我希望他们能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我们的痛苦”。^④

此外，刑事定罪一直是国家和公司用来迫害和威胁抗议者的工具。虽然大多

数指控都是针对男性的，但对妇女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面对威胁，妇女通常会放弃抵抗（Vargas Díaz 2017）。在受访的四名妇女中，有两名妇女因担任领导职务和要求实现权利而遭到投诉。例如，胡安娜（Juana）说：“有关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在前期咨商时就被告知，我因为声讨这个环境权利而遭到了谴责”。维罗妮卡（Verónica）仅仅因为在抗议活动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被矿方以“严重抢劫罪”告发。此外，四名受访者中有三人曾受到威胁或成为这些冲突的受害者。对玛蒂尔德（Matilde）来说，这些威胁与该公司的领地、人口和信息控制战略如影随形。她断言，“矿山收买了所有人，人们无处申诉，当局也被矿山收买了，那些公开反对矿山的人受到了威胁或金钱的诱惑”。

尽管妇女站在投诉和抗议行动的最前沿，但没有任何空间鼓励她们代表自己积极参与决策或与中国公司的对话。劳动负担沉重、性别角色定型的深化、信息的缺乏、社区结构和规范的限制、受教育机会不足、遭受歧视以及其他因素加剧了这种状况。很多信息都没有使用他们原住民的盖丘亚语（Quechua language），他们也无法接触到这些传播信息的渠道。维罗妮卡（Verónica）说，“我们几乎没法参与，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改变，我们缺乏更多关于我们权利的知识，我们需要更多领导能力，才能去参与对话”。

- 社会文化影响

拉斯班巴斯的采矿活动为男性人口带来了经济收入，导致了严重的酗酒、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遗弃和家庭关系破裂的比例增高。胡安娜（Juana）说，“当他们有钱的时候，就会专注于喝酒和其他活动，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出现了很多酗酒、大男子主义和暴力行为”。妇女意识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家庭和社区中的歧视和排斥越来越严重，让她们在社区参与活动中受到限制。正如玛蒂尔德（Matilde）提到的，“你的亲哥哥告诉你，你没有权利；那个多嘴的人又在说三道四”。

此外，为了与社区建立联系，MMG 建立了双边对话空间，在其直接影响范围内的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对话。在每个地区就产生了关于是否谈判以及采矿带来的利弊得失的对抗分歧，这削弱了基层社会组织和社区，破坏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因此，这也影响到了在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关系，正如玛蒂尔德（Matilde）所说的那样：“……我们女人没有登记，家庭中意见分歧严重，我的兄

弟不想把我那份土地分给我……这一切都是因为采矿和野心”。

采矿活动还加剧了性别分工。采矿活动中男性人口的增加导致该地区男性化，从而引发了针对妇女的性暴力。据一名社区妇女称，“哪里有矿山，哪里就有人口贩运；妇女被当作性玩物”。维罗妮卡(Verónica)还提到：“我受到其他组织的歧视……他们把我们女人当作物品”。

妇女在面对采矿项目时的能动性

在拉斯班巴斯项目中，社区的主要诉求不是中止项目，而是履行矿业公司与政府之间进行相关补偿的协议，例如重新安置、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破坏和土地使用进行补偿的协议。社区通过示威和封锁等非正式机制以及对话圆桌会议等正式机制进行抗议(LAS 和 Schmith 2022)。

尽管妇女面临结构性限制，但通过制定权利议程，妇女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她们能够向更广泛的地方社会组织和当局提出要求。妇女在省一级具有代表性，有一些妇女领导人在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她们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妇女的参与非常有限，所有受访者都认为，有必要增加妇女担任权力和决策职位的机会。

早在2000年，拉斯班巴斯就成立了妇女组织，但在随后的十年中，这些组织被削弱，有些甚至由于农民组织的分裂而消失(Cuadros 2010，第40页)。在MMG公司进驻后，这些组织重新开始行动，如今，妇女根据共同利益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组织、联合会和农业委员会。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妇女的参与仍需得到丈夫的同意。维罗妮卡(Verónica)讲述了她作为领导者的担忧：“……有时妇女为了能够参加会议……会说，‘我要和我丈夫谈谈’，这就好像是说我要征求他的同意”。她还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加强妇女和联合会的自主权：“作为联合会，我们正在考虑创建一个制衣项目和另一个养鳟鱼的项目，在社区里养豚鼠，从而能够利用一切资源，为我们的家庭带来生计”。

2.2 里约布兰卡项目

里约布兰卡(Rio Blanco)采矿项目位于厄瓜多尔南部，海拔3900米，毗邻被宣布为拉姆萨遗址^⑤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卡哈斯国家公园(Cajas National Park)。该项目是厄瓜多尔五个大型采矿项目之一。

跨国公司于 1998 年开始勘探该矿。2013 年，由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组建的中国财团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南美分公司(Ecuagoldmining South America S.A.)公司收购了该项目，并于 2016 年开始矿山建设工作(Calle 2019)。2017 年，中国公司不遵守劳动协议和剥夺土地的行为增加了社区对他们的诉求。2018 年 5 月，莫勒图罗(Molleturo)社区以侵犯事先、自由和知情协商权为由，通过法院要求中国公司采取保护行动并暂停该项目。当地法院做出了有利社区的裁决，下令暂停采矿活动(Quizhe 2020, Quizhe 和 Vallejo 2022)。2020 年，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向厄瓜多尔国家提出了 4.8 亿美元的“国际仲裁争议”，2022 年 10 月，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国 - 厄瓜多尔投资条约》这一双边协议，以缺乏保障投资者为由提出索赔。直至作者进行本研究时，社区和妇女的抗争一直在持续。

莫勒图罗(Molleturo)行政区的农村人口为 7166 人，其中 49% 为妇女，51% 为男性(拉美核工业工人工会 SIN 2023)。该行政区有 72 个社区，其中三个社区一直与采矿项目保持联系：里约布兰科(Río Blanco)、科查潘巴(Cochapamba)和圣佩德罗德尤马特(San Pedro de Yumate) (PDOT 2021) (Plan de Desarrollo y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土地使用规划文件 2021)。里约布兰科社区是受采矿活动影响的主要社区，该社区土地所有权的特点是，土地更多集中在男性手中。男性拥有 38% 的土地，而妇女只拥有 17% 的土地。其余的所有者是社区或法人，他们拥有约 45% 的土地(Torres 2022, 第 107 页)。

采矿项目对妇女的主要影响

- 经济影响

里约布兰科项目的采矿活动将个人和集体土地(paramos)商品化用于采矿，这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结构(Carpio 2022)。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自进驻以来已获得 600 多公顷土地，其中大部分是公共土地，骡夫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穿过这些土地。这限制了妇女的行动自由，导致土地重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Torres 2022, 第 107 页)。伊丽莎(Eliza)说，在采矿公司到来之前，“这是一个集体所有的公社，采矿公司买下后说，现在这是私人财产，我们不能穿过这些土地”。米里亚姆(Miriam)也断言，“公司不承认我们是原住民社区，因此他们有理由购买土地”。

- 环境影响

勘探和施工阶段对环境的影响造成了水源和土地的广泛破坏和污染。用伊丽莎(Eliza)的话说,“由于失去了许多溪流,现在水源相当匮乏……如果自然受到影响,我们妇女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在土地上劳作;当然,也有男人在土地上劳作,但种地的大多数是女人”。

妇女注意到采矿活动之前与现在的不同。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由于钻探活动,某些集体土地(paramos)已经干涸或受到污染。米里亚姆(Miriam)说:“这让我们对饮用水产生了担心;我们真的很害怕水被许多化学物质污染。这太可怕了。想象一下,用这样的水种植庄稼,灌溉庄稼。这种情况真不好,对健康也有害”。伊丽莎(Eliza)还谈到了克鲁兹洛马(Cruz Loma)泻湖不可逆转的干涸问题:“加拿大公司使泻湖干涸,而中国公司则用碎石填满泻湖。因此,这就是采矿留下的冲突;如果我们让情况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会变成一片沙漠”。

- 政治影响

采矿活动引发了支持项目的社区和抵制项目的社区之间的对抗,导致两极分化和内部社会关系的破裂,也引起了社区与国家军队、社区与中国公司利益一致的私人保安之间的对抗。根据这些妇女的证词和经历,警察和军队对她们进行了身体和精神上的攻击。莫妮卡(Monica)回忆道:“警察想攻击我们;他们对付我们不择手段。他们想开车碾过我们,但我没有给他们让路”。

妇女在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参与一直深受父权制历史逻辑的浸润,随着采矿活动的出现,父权制进一步加深。在社区空间中,男性说了算。对发言妇女的污名化导致一些妇女退出了反抗活动。伊丽莎(Eliza)证实了这一点,她说:“矿业公司说,因为你是妇女,所以你不能领导;因为你是妇女,所以你不能发言,你不能大声说话……在社区中,男性不能接受妇女的领导,他们不接受有一个妇女组织”。伊丽莎补充说,“如果公司开会,只有男人去;女人即使去了,她也只能保持沉默,低着头,不能发表意见”。

- 社会文化影响

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破裂是里约布兰科社区现实中的一部分。建筑工地提供的工作岗位是家庭和社区之间众多冲突的根源。男人们为工作而争斗,这加剧了妇

女、女童和青少年的不安全感(Carpio 2022)。伊丽莎(Eliza)提到,采矿活动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对抗或挑衅,甚至发生在我们家庭之间。对我们来说,在自己的家人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表兄弟或叔伯之间、同一社区的邻居之间产生分歧是很棘手的”。

采矿冲突还导致妇女因各种刑事诉讼而长期离家,从事组织和行政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她们的女儿或祖母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而这份工作在经济或社会上却很少得到认可。

此外,该地区的男性化也导致了不安全局势以及针对妇女的象征性和人身暴力。阿娜·卡斯特罗(Ana Castro)和史蒂文·塞瓦略斯(Steven Cevallos) (2023)对“辛奇瓦尔米妇女抵抗组织”(Mujeres en Resistencia Sinchi Warmi)的妇女中发生的这些事件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60% 以上的妇女在采矿过程中受到了影响(遭到歧视、侮辱、羞辱或殴打等)。此外,采矿项目使针对妇女的暴力增加了 86.7% : 情感暴力(80%)、身体暴力(66.7%)、象征性暴力(33.3%)、性暴力(13.3%)和经济暴力(13.3%)。

许多妇女受到矿工和私人保安的性骚扰。恐惧和威胁使她们不敢报案。伊丽莎(Eliza)回忆说:“当我开始在矿上工作时,我也受到了骚扰……当我告诉他我要举报他时,他告诉我‘去举报吧,但这里的老板也这样做’”。她还证实,矿工们“开始想建立一个卖淫妇女之家项目,但被阻止了”。

最后,2018年采矿活动的暂停导致非正规团体的进入和非法采矿,给妇女带来了不安全。妇女指责公司自己的私人警卫将武器交给了社区里的男人。莫妮卡(Mónica)说:“公司在离开时将男人们武装起来。公司武装了社区。公司告诉那些男人们,‘我们要走了,但你们要留在这里保卫矿区’”。冲突不断升级,导致2022年一名孕妇被杀害,此案件仍在调查中(Paz Cardona 2022)。

妇女在面对采矿项目时的能动性

妇女在抵制里约布兰科项目中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作用吸引了众多研究人员的关注(Carpio 2022, Zibechi 2019, Quizhpe 和 Vallejo 2022, Torres 2022, Castro 和 Cevallos 2023)。一位当地居民认为,“没有妇女就没有对采矿的抵抗,也就没有社会运动”,而另一位居民则补充道,“该组织的最大价值在于妇女”(Zibechi 2019),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妇女一直站在抵抗运动的最前沿。2018年村民接管营地时，妇女站在最前线。正如莫妮卡（Monica）所指出的，“我们男女各占一半，但我们女人在前线更加积极……因为我们女人更有抵抗力，我们不允许自己被征服，被公司欺骗……当然也有其他人这样做，但我们更有抵抗力”。Zibechi（2019）还强调，在那次事件中，“面对妇女的坚定态度，警察很快就放弃了”。

在这种冲突与抵抗的背景下，“妇女抵抗组织（Sinchi Warmi）”于2018年诞生。该组织由抵抗采矿活动的年轻妇女、农民、原住民妇女、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组成。Sinchi Warmi[®]在盖丘亚语中意为“坚强的妇女或反抗的妇女”，其主要目标是通过社区项目捍卫人权和自然，倡导恢复和振兴原住民领地的知识和智慧，加强来自不同反抗阵线的妇女之间的支持网络。

2018年，在社区提出的保护行动框架内，该组织参与了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活动，妇女在活动中用自己的语言详细讲述了她们在保卫领地过程中的经历。她们还在通过相互学习、加强妇女和青年的能力来推广采矿以外的替代性工作。她们的妇女社区艺术项目“Warmi Muyu”（盖丘亚语“播种的女人”）试图通过手工艺品创作，从而创造一种有尊严的经济选择。

3. 主要结论和反思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存在与采矿业密切相关，以确保自然资源的全球供应链，维持其工业发展和能源转型。尤其是采矿活动，从许多方面改变了社会，由于妇女与自然和生命关怀的直接关系，这些变革对妇女产生了不同的、不成比例的影响。领地的男性化和采矿产生的冲突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社区 - 家庭动态和妇女的日常生活。劳尔·齐贝奇（Raúl Zibechi）（2019）对此总结如下：“男人梦想的是工作。妇女的梦想是保护生命”。

尽管中国政府努力引导企业提高绩效，但拉斯班巴斯公司和里约布兰科公司的案例表明，这些努力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中国企业对妇女诉求的回应不力，反映出采掘活动中父权制的深化。公司的运作也显示出其风险承受能力（一些项目产生了社会冲突）和薄弱的尽职调查机制（一些项目没有开展自由、事先和知情协商程序或进行全面环境研究）。

在拉斯班巴斯和里约布兰科周围社区进行的访谈，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各种研

究，只是揭示了妇女在采矿环境中遭受的经济、环境、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影响的一小部分样本。尽管这些影响波及全体人口，但妇女对这些影响的感知和体验是有区别的，而且更加直接，因为这些影响加深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父权结构。

在经济领域，采矿项目通过有利于采矿项目的土地商品化改变了农业结构，损害了集体财产，导致更多的土地所有权掌握在男性手中。这阻碍了妇女获得生计和照顾的资源（作物、水和食物）以及相关服务（住房、安全 and 健康）。作为生命和社区的守护者，妇女还承担着修复或重建失去的一切的额外负担。在 Pérez 等人（2019）看来，家庭照料活动与采矿之间的这种联系与采矿链中的价值创造有关；也就是说，妇女从事的家庭照料活动维持了采矿活动，而在当地经济中这些家庭照料活动通常是不可见的。

在环境领域，妇女受到水源和土地的破坏和污染的影响，而水源和土地是家庭和社区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这影响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她们和社区的健康。

在政治领域，妇女，尤其是领导人和倡导者，在冲突和抵抗局势中受到迫害、威胁和刑事定罪。她们因积极参与和大声疾呼而遭受歧视和侮辱。此外，有证据表明，公权力和私人保安队与公司和政府结盟，大量地使用武力。

最后，在社会文化领域，主要影响是社会、社区和家庭结构的破裂。中国公司往往利用项目所在国力量薄弱，通过经济补偿机制、谈判和社会服务来控制人口和土地，从而破坏社会凝聚力，分化社区。反过来，土地的男性化又加剧了对妇女的歧视、不安全和暴力。在政府、公司和社区的努力下，上述情况在近年已经有所改变。

表 2. 两个矿业项目的比较：其影响及受到的抵抗

项目名称	拉斯班巴斯	里约布兰科
中方运营公司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国信国际与中信	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状态	运营中	已暂停
开采阶段	2016 年至今	2016 年至 2018 年
项目的影响		
经济方面	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生活成本和工作获取的增加	农业结构的变化，就业争议，女孩和老年妇女承担的工作量增加
环境方面	水源和土地污染，卡车交通持续的噪音、震动和灰尘	水源和土地的破坏与污染，克鲁斯洛马泻湖（Cruz Loma Lagoon）的干涸

项目名称	拉斯班巴斯	里约布兰科
政治方面	妇女倡导者面临刑事起诉和威胁，过度使用武力，参与方面的障碍，丈夫和父亲被谋杀	妇女倡导者面临刑事起诉和迫害，社区间的利益分化，使用武力和挑衅，参与方面的障碍
社会文化方面	男性化和性别角色的加剧，歧视和排斥，社会结构的破裂，威胁和暴力，劳动的性别分工加剧	男性化和性别角色的加剧，歧视妇女权利的捍卫者，带来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破裂、不安全感和暴力
妇女的能动性和对项目的抵抗		
妇女的诉求	履行关于获取水和土地的协议和承诺，政治参与，解决家庭饮食、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	争取他们作为原住民卡纳里人（Kañari）被认可，参与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协商，最终停止该项目
取得的成就	加强妇女组织，妇女领导人拥有极高的民众合法性，地方和市政组织中具有性别焦点的权利议程，妇女的个人和经济赋权项目	创建“抵抗中的妇女组织（Sinchi Warmi）”，妇女战斗在抗议和谴责活动的前线，他们实现了保护行动和项目的暂停，开展替代性生计的活动和相互学习

除了对项目周边社区妇女的影响之外，采矿活动也为妇女领袖和妇女社会运动的出现和巩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妇女发挥了自身的能动性，重新配置和占据了社会环境中的新空间，从而采取行动改变了她们面临的秩序或习俗，而她们在历史上一直被排斥在这种秩序或习俗之外。

因此，正如瓦尔德里（Valderry）和莱姆斯（Lemus）（2021年，第404页）所精辟指出的那样，妇女“……为捍卫公共财产、社区权利、更好的工作条件或尊重环境而大声疾呼。她们提出了一种理解人类、工作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同模式”。因此，她们对历史上支撑跨国采矿活动的采掘型父权制模式提出了一种范式上的挑战，而中国现在正是这跨国采矿活动的一部分。

（翻译：韩扬、李悦；校对：赵瑾娜；核稿：张玉婷）

鸣谢

如果没有合作行动（CooperAcción，秘鲁）的尤瓦娜·马马尼（Yovana Mamani）和昆卡大学（Universidad de Cuenca）（厄瓜多尔）的研究员安娜·加布里埃拉·卡斯特罗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这项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她们的经验以及她们与当地社区和妇女的亲密关系为这项工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者对此深表谢意。

注释

① 有关其他地区类似案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缅甸的案例以及莱帕当铜矿项目，网站链接：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files/documents/SRI_The_Social_Responsibility_of_Chinas_OFDI_and_NGOs_Engagement.pdf。另外，请参阅张兢兢的论文。网站链接：<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interview-with-environmental-lawyer-zhang-jingjing-on-the-need-for-legal-requirements-for-chinese-overseas-investments/>

② 尽管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以来，公司的许多高管和董事保持不变。这解释了无论公司的国籍如何，不良实践的连续性。

③ Chicñawi 是个农民社区，玛蒂尔德 (Matilde) 就来自那里。它隶属于科塔班巴斯 (Cotabambas) 省的查华华丘 (Challhuahuacho) 区。这个社区位于矿场直接影响范围内，且靠近矿石加工厂。

④ 这两个证词来自于在2022年11月由合作行动 (CooperAcción) 和拉丁美洲可持续发展 (Latinoamérica Sustentable) 两个非政府组织在秘鲁库斯科举办的研讨会上，与受影响地区居民进行的记录。

⑤ 这片湿地是根据《湿地公约》(又称拉姆萨公约) 认定的全球重要湿地。拉姆萨公约旨在促进湿地的保护和科学明智利用。该公约为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国际框架，强调了湿地生态系统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水资源供应、气候调节以及为人类提供休闲和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价值。全球各地的湿地，无论是天然或人工的，永久性或暂时性的，淡水或咸水的，都在公约的保护范围之内。

⑥ “Sinchi Warmi” 在盖丘亚语中意味着“坚强的女性”或“抵抗中的女性”。在盖丘亚语中“Sinchi”意味着“坚强的”或“有力的”，而“Warmi”则是“女人”的意思。这个词语体现了女性力量和抵抗精神的象征。

参考文献

C. 阿利亚等 (C. Aliaga, et. al.). 2021年。《在 Abya Yala 对抗采矿业的女性捍

卫者们》，拉丁美洲女性社会与环境权利捍卫者网络。(Mujeres contra el extractivismo minero en el Abya Yala defensoras, Red Latinoamericana de mujeres defensoras de derechos sociales y ambientales) https://www.redlatinoamericanademujeres.org/mapa/wp-content/uploads/2021/11/Mujeres_contra_el_extrativismo_minero_en_el_abya_yala_defensoras_compressed.pdf

K. ·安德森(K. Anderson)。2022年。《在危机中的构建力量：女性对采矿业的应对》。赛奇基金会。(Building Power in Crisis. Women's Responses to Extractivism. SAGE Fund.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e04646f699bb070acdb6f3/t/648b194c9a89cd6d3f6d0398/1686837583849/Extract+Report_Long_Eng_LoRes_Final_6.6.23.pdf

K. ·布埃诺(K. Bueno)。2019年。《拉斯班巴斯的农村妇女状况》，拉丁美洲矿业冲突观察站。(La situación de las mujeres campesinas en Las Bambas, Observatorio de Conflictos Mineros de América Latina, OCMAL) <https://www.ocmal.org/la-situacion-de-las-mujeres-campesinas-en-las-bambas/>

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2021年。《负责任地“走出去”：中国全球投资的人权影响》。(‘Going out’ responsibly: The Human Rights Impact of China's Global Investments) 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2021_BHRRC_China_Briefing.pdf

D. ·卡莱(D. Calle)。2019年。《里约布兰科矿业项目及事前、自由、知情的咨询权的应用》。昆卡：阿苏艾大学。(El proyecto minero Río Blanco y la aplicación del derecho a la consulta previa, libre e informada. Cuenca: University of Azuay.) <http://dspace.uazuay.edu.ec/handle/datos/9516>

P. ·卡皮奥(P. Carpio)主编。2022年。《抵抗：矿业、影响与斗争》。昆卡，昆卡大学出版社。(Resistencia: minería, impactos y luchas. Cuenca, Universidad de Cuenca Press) <https://editorial.ucuenca.edu.ec/omp/index.php/ucp/catalog/book/19>

A. ·卡斯特罗(A. Castro)、S. ·塞瓦罗斯(S. Cevallos)。尚未出版。《论文：《2018-2023年期间，矿业生态领土冲突背景下“Sinchi Warmi”妇女组织经验分析》，昆卡州立大学。(Thesis: Análisis de la experiencia organizativa de mujeres “Sinchi Warmi” en el contexto del conflicto ecoterritorial minero, periodo 2018-2023. Cuenca State University)

中资融资与投资集体、人权与环境(Colectivo sobre Financiamiento e Inversiones Chinas, Derechos Humanos y Ambiente, CICDHA)。2022年。《拉丁美洲的人权与中国企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遍定期审查的中期报告。(Derechos Humanos y Actividades Empresariales Chinas en Latinoamérica. Casos de Argentina, Bolivia, Brasil, Chile, Colombia, Ecuador, México, Perú y Venezuela. Mid-term report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cicdha.org/wp-content/uploads/2023/08/HUMAN_RIGHTS_AND_CHINESE_BUSINESS_ACTIVITIES_IN_LATIN_AMERICA-EN-full_.pdf)

中资融资与投资集体、人权与环境(Colectivo sobre Financiamiento e Inversiones Chinas, Derechos Humanos y Ambiente, CICDHA)。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拉丁美洲企业活动的跨境人权义务报告》，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中国审查报告。(Informe: Las Obligaciones Extraterritoriales en Derechos Humanos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de China con Relación a Actividades Empresar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Report for the revie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s://cicdha.org/wp-content/uploads/2023/09/Informe-ENG-.pdf>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2016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圣地亚哥。(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antiago.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0213/S1600664_es.pdf?sequence=7&isAllowed=y

合作行动组织(CooperAcción)。2015年。《“拉斯班巴斯”案例：2015特别报告》。利马：合作行动组织。(Caso ‘Las Bambas’ : Informe Especial 2015. Lima: CooperAcción. <https://cooperaccion.org.pe/publicaciones/2114/>)

J. · 库阿德罗斯(J. Cuadros)。2010年。《矿业对安第斯南部男性和女性生活的影响：从性别和跨文化视角出发——拉斯班巴斯和提恩塔亚案例》。合作行动。(Impactos de la minería en la vida de hombres y mujeres en el sur andino. Una mirada desde el género y la interculturalidad. Los casos Las Bambas y Tintaya. CooperAcción. <https://cooperaccion.org.pe/publicaciones/impactos-de-la-mineria-en-la-vida-de-hombres-y-mujeres-en-el-sur-andino-una-mirada-desde-el-genero-y-la-interculturalidad-los-casos-las-bambas-y-tintaya/>)

E. 杜塞尔·彼得斯 (E. Dussel Peters)。2022年。《202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中國对外直接投资监测报告》，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Monitor de la OFDI chin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22. Mexico: Red ALC-China.) https://www.redalc-china.org/monito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37

能量源 (Energiminas)。2021年。《拉斯班巴斯直接工资单中的8.9%由女性组成》，载于《能量杂志》。(El 8.9 porciento de la planilla directa de Las Bambas está constituida por mujeres. Revista Energiminas.) <https://energiminas.com/el-8-9-de-la-planilla-directa-de-las-bambas-esta-constituida-por-mujeres/>

P. 加尔松 (P. Garzón)。2020年。《中国海外运营的环境与社会指南汇编》。厄瓜多尔基多。中国-拉美可持续投资倡议。(Compilación de Directrices Ambientales y Sociales Chinas para las Operaciones en el Extranjero. Quito, Ecuador: Iniciativa para las Inversiones Sustentables China-América Latina, IISCAL) <https://latsustentabl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Compilacion-de-Directrices-Ambientales-y-Sociales-Chinas-para-las-Operaciones-en-el-Extranjero.pdf>

包容性发展国际组织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2022年。《中国海外投资标准的发展》。(Development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Standards.) <https://www.followingthemoney.org/development-of-chinese-overseas-investment-standards/>

A. 莱瓦 (A. Leyva)。2018年。《无人批准的道路》。利马：合作行动组织。(Una carretera que nadie aprobó [A Road That Nobody Approved]. Lima: CooperAcción.) <https://cooperaccion.org.pe/wp-content/uploads/2018/08/Libro-Carretera-Las-Bambas.pdf>

国家信息系统 (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SIN)。2023年。《人口统计数据》(Population statistics)

国家统计与信息学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cs, INEI)。2017年。《2017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秘鲁。(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7. Peru.)

安德里亚·帕斯·卡尔多纳 (A. Paz Cardona)。2022年。《厄瓜多尔的非法黄金开采导致一名环境保护者丧生并引发暴力》。载于《蒙加贝新闻网站》。(Minería ilegal de oro cobra la vida de una defensora ambiental en Ecuador y desata violencia.

Mongabay.) <https://es.mongabay.com/2022/11/mineria-ilegal-de-oro-cobra-la-vida-de-una-defensora-ambiental-en-ecuador/>

土地使用规划文件(PDOT)。2021年。《莫莱图罗行政区的发展与土地使用规划》。(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Plan for the Parish of Molleturo.) <https://gadparroquialmolleturo.gob.ec/azuay/>

L. M. · 佩雷斯(L. M. Pérez)、L. · 德拉普恩特(L. De la Puente)、D. 乌加尔特(D. Ugarte)。2019年。《矿工的照顾者：科塔班巴斯的性别与大规模采矿》。研究论文第12号。利马：太平洋大学。(Las cuidadoras de los mineros: género y gran minería en Cotabambas. Research Paper No. 12. Lima: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https://repositorio.up.edu.pe/handle/11354/2491>

C. · 奎什佩(C. Quizhpe)、I. · 瓦莱霍(I. Vallejo)。2022年。《厄瓜多尔南安第斯地区水资源的管辖权和保护进程》。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厄瓜多尔。(Procesos de juridificación y defensa del agua en el sur andino del Ecuador. Flacso Ecuador.) <http://repositorio.flacsoandes.edu.ec/handle/10469/17783>

C. · 奎什佩(C. Quizhpe)。2020年。《主体性的商品化：厄瓜多尔阿苏艾省的矿业与里约布兰科及洛马拉尔加项目案例研究》。基多：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厄瓜多尔。(La commoditización de las subjetividades: la minería en la provincia del Azuay, Ecuador y los casos de los proyectos Río Blanco y Loma Larga. Quito. Flacso Ecuador.) <http://repositorio.flacsoandes.edu.ec/handle/10469/16552>

W. · 萨赫尔(W. Sacher)。2017年。《中国在安第斯山脉的大型采矿：对厄瓜多尔“公民革命”的剥夺和财富累积》。基多：阿布亚 - 亚拉出版社。(Ofensiva Megaminera China en los Andes. Acumulación por desposesión en el Ecuador de la ‘Revolución Ciudadana’ . Quito, Editorial Abya Yala.) <https://www.rosalux.org.ec/pdfs/Ofensiva-megaminera-china-en-los-Andes.pdf>

国务院国资委。2014年。《中国五矿集团以58.5亿美元收购秘鲁铜矿项目》。<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4/c3858517/content.html>

N. · 托雷斯(N. Torres)。2022年。《抗争中的女性：阿苏艾省的抵制活动中的性别框架与采矿业——采矿、影响与斗争》。昆卡：昆卡大学出版社。(Mujeres en Resistencia: configuraciones de género y extractivismo minero en la provincia del Azuay en Resistencia: minería, impactos y luchas. Cuenca: UCuenca Press.)

A. · 乌洛阿(A. Ulloa)。2016年。《拉丁美洲的领土女权主义：捍卫生命，反对采矿业》。载于《游牧者》第45期。哥伦比亚：中央大学。(Feminismos territor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defensas de la vida frente a los extractivismos. Nómadas, 45. Colombia: Central University) <https://www.redalyc.org/pdf/1051/105149483020.pdf>

W. · 瓦尔加斯·迪亚兹(W. Vargas Díaz)。2017年。《暴力、权力与秘鲁矿业：拉斯班巴斯如何加剧了压迫？》。《开放民主》2017年12月8日。(Violencia, poder y minería en Perú: ¿cómo Las Bambas ha agravado la represión? Open Democracy. 8 December 2017.)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s/violencia-poder-y-miner-en-per-c-mo-las-bambas-ha-agravado-la-r/>

杨洪波(音译)等。2021年。《中国海外发展融资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土地的风险》，载于《自然生态与进化》第5卷，第1520-1529页。(Risks to global biodiversity and Indigenous lands from China’ s overseas development finance’ .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Vol 5, pp. 1520-152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021-01541-w.epdf?sharing_token=08ECNj3wsigLUVaGdP3xd9RgN0jAjWel9jnR3ZoTv0NscWPi1Fg36lGcgGWwB0ZaLVE_xycQUcNIOp3vfP38d9GT-gShGSS6bGGHClygY_IY9AgArGKNJuFm4AA6vIQAjmfezNUo-Qm1OXgwYeh8C_R0v_1y1DbfPgZ74ISfejk=

R. · 齐别奇(R. Zibiechi)。2019年。《大地母亲的捍卫者们：社区反对采矿的斗争》，载于《抗争》。(‘Defensoras de la Pachamama. La lucha de las comunidades contra la minería’ [‘Women: Pachamama’ s Defenders. The communities’ fight against mining’]. Rebelión.) <https://rebellion.org/defensoras-de-la-pachamama/>

中国在非洲的矿业投资 和采掘主义的性别影响： 津巴布韦比基塔矿区研究

希比斯特·卡萨 (Hibist Kassa)

辛齐勒·芬古 (Zinzile Fengu)



1. 引言

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旨在重新配置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从而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实现自主发展（Moyo 和 Yeros 2011）。这一政策转变发生的大背景是对经济自由化的不满（Seddon 和 Zeilig 2005，Saul 和 Saunders 2005），这一政策也是因为那些为了纠正由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带来对土地的剥夺的政策遭到了失败。作为对这一本土化政策转变的回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以侵犯人权和政治压迫为由对津巴布韦实施了制裁（英国政府 2022，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2023），这些制裁限制了津巴布韦获得发展融资和投资的机会（Dendere 2022）。

津巴布韦的困境凸显了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在独立后仍受制于资本积累的全球体系，这削弱了它们重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迅速进行土地改革，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压力（Moyo 2018），更反应出在白人至上的体系下，黑人资产阶级与小农生产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Moyo 和 Yeros 2018）。

这是比基塔地区锂矿开采的背景，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都集中在土地冲突上。土地重新分配后，比基塔被指定为安置点，因为妇女的土地权被限制，她们受到的不利影响尤为严重。比基塔的妇女面临着采矿活动带来的多重挑战，这些活动对矿区所在社区的影响尤为严重。在比基塔，盛行个体手工开采锂矿，这些活动也再次复制了在脆弱环境中大规模采矿所存在的挑战。比基塔矿进一步加剧了土地权的有限、水源匮乏、边界争端和社会问题等综合难题。总而言之，这对健康、社会再生产以及粮食和水安全都产生了影响。

广义上讲，采掘主义（extractivism）泛指全球生产、再生产和贸易体系的不平衡的一体化，它使负责初级生产的国家创造的价值份额较低，而这些国家在环境、健康和劳动力成本（包括社会再生产劳动力）方面的负担较重。津巴布韦推行了矿业改革，以鼓励选矿（Chimwamurombe 和 Gona 2023），并作为社区更直接参与矿物开采的一种手段（Mathibela 2022）。这一改革增加了妇女参与矿产价值链的可能性（非洲矿产愿景 2009），并影响了锂矿开采。因为与黄金开采的矿石直接流入国有冶炼厂不同，锂矿开采不具备类似的加工能力。由于在锂提取和加工

方面缺乏这种能力，津巴布韦难以从矿产价值中获取更大的份额。

企业问责框架以自愿程序为主，在自愿程序中，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被期待“不造成伤害”和“尊重人权”而不是“保护”人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2011，Bernaz 2021 第 50-53 页）。这里的人权被理解为包括了获取公共商品的一种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政策下，“保护”人权这本应属于国家的职权范围，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背弃”（Gilmore 2022）。在实践中，投资者依赖于当地法律，而这些地方法律在政策真空中运作，违法行为就在其中发生。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和补救机制，违法行为就会被忽视，在极端情况下，违法行为还会得到国家的支持。矿产开采区的安全化（译者注：以加强安全的名义对其实施管控）就是这种情况的结果。

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支持津巴布韦渡过危机（郭少春 2022），这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性质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创造了扭转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新模式？本案例研究重点关注种族、性别和阶级不平等如何在资源开采地重现，并尖锐地凸显了这些矛盾。它评估了国家和现有的企业问责框架的性质，这些框架也为侵蚀妇女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西方投资者在这些条件下，以巨大的代价在矿区东道国和社区进行运营，但新的投资来源为加强监管能力和探索互利关系提供了机会。传统的西方投资者一直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以应对公民社会团体（尤其是原住民领导）的抗议和运动以及国际人权法。公司被认为是“责任承担者”，而其原籍国的国内法院则负责干预和起诉侵权行为（Bernaz 2021）。因此，如果有关国家不愿意干涉和起诉涉事公司，那么这样的机会就不存在。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将西方传统投资者奉为企业责任的典范。这些行为者依靠企业社会责任（Blowfield 2005），以及近来的本土化采购来获得其经营的合法性（Kassa 2020）。就他们本身而言，从长远来看这些做法对于保障企业的社会责任并没有起到效果。相反，本案例研究分析了性别不平等如何在资源开采领域被复制，以及搭建一个以自愿、事先、知情同意为框架的社区参与平台的重要性，这个平台与可以预测和预防公认的有害影响，与此同时，要加强国家机构预防违法行为的能力，并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对其进行起诉。国家必须被重建和重新定位，以确保人权和公平、公正的发展成果。

第一部分概述了指导本文的理论框架。我们借鉴了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 所著的《有组织的背弃》(Organised Abandonment) 一书, 分析了国家是如何在矿业监管中, 其保护人权的义务被架空。本节探讨了津巴布韦如何试图摆脱采掘主义, 以及中国作为战略伙伴的角色。本节还概述了采用的方法论和女权运动建设策略。第二部分探讨了比基塔的案例以及受锂矿影响的妇女的经历。基于案例研究的主要发现, 我们在最后的章节提出了一些反思和建议以改善治理和问责机制, 这些机制超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 强调加强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和受影响社区的参与来实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2.1 国家、性别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

提到锂矿开采,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强调了中国的投资如何“振兴了被西方公司长期闲置的资源”(郭少春 2022)。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投资如何刺激在白人至上主义统治下仍处于边缘地位的经济体的增长和积累的关注。刺激新的生产和积累领域的可能性, 及它对实现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广泛重要性, 尤为重要。在南部非洲, 由于土地被极度剥夺, 这一政治问题更加突出。

阿奇·马菲耶(Archie Mafeje 2003) 在分析欧洲式农业转型所面临的障碍时曾强调, 经济内部的积累受到价值生产者与统治精英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制约。在土地保有权制度和小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分配方面, 按性别划分的等级制度也再现了两性不平等。就津巴布韦而言, 呼吁将妇女的土地权利重点放在集体行动上, 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上, 从而加强了这一点(Manji 2006), 而另一些人则强调了一种战略, 该战略涉及如何确保妇女获得和维护其土地权利的能力(Goldman 等 2016)。由于津巴布韦的结构调整政策, 黑人资产阶级和小农生产者之间的阶级不平等日益加剧(Moyo 和 Yeros 2005), 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这些阶级关系也对津巴布韦的治理体系和国家性质产生了影响。

这些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造成了治理真空, 使得企业和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 2022, 第23页)所说的“‘反国家’的国家”能够“扰乱(disorganise)”生产系统和财产关系, 包括土地, 的运作(Gilmore 2007, 第28页)。从更广的视角来看, 这形成了由环境破坏、劳动力过度剥削、结构调整政

策和私有化等因素造成的不均衡发展(Gilmore 2022, 第64页)。“有组织的背弃”理论不仅论述了国家的缺失,还论述了国家如何进行干预以塑造市场化的方法并控制其结果。为了控制结构调整政策的后果,加强安全化是必要的。吉尔摩将技术官僚、企业和政党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有相似的利益,可以利用国家来实现目的。

在南部非洲极度被剥夺的历史背景下,资源开采的性质导致了对土地和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包括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CCCMC)在内的企业设定了全球问责制框架。《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确定了矿产供应链以及环境和社会治理,该准则本身是一个自愿框架,借鉴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尽职调查准则(Castillo 和 Purdy 2022)。

自我监管(self-regulation)的基本假设是,公司可以在确保承担社会责任和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间实现平衡。如果一个国家忽视其保护人权和监管公司实体的责任,就会产生侵权行为的真空地带。当国家本身代表企业利益或与企业利益一起侵犯权利时,这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Gilmore 2022)。另一方面,进步的人权方法借鉴国际法,寻求国内和国际法院的干预。在实践中,社区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记者是那些记录侵权行为,并通过具体案件寻求补救措施的人(Bernaz 2021, Kassa 和 Nyirongo 2020)。

治理真空导致了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无法反映小农生产者(尤其是妇女)的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背弃得以盛行,国家和私人行为者都在不同程度地施加这种有组织的背弃。它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交织在一起,侵犯了身体完整性和自主权、环境权、健康权、劳动权和财产权,以及结社权和迁徙权,这些正是本案例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2.2 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整个非洲大陆稀土矿产投资地图为指导。虽然主要投资来自中国,但纳米比亚、加纳和津巴布韦出现的关键原材料矿物出口禁令表明,非洲大陆的资源民族主义正在抬头。

对津巴布韦的关注源于该国一直以来的政策干预,这些政策强调经济本土化和促进手工采矿业的显著增长。虽然在纸面上津巴布韦试图摆脱采掘主义的政

策导向，但土地使用权安排、气候变化带来的脆弱性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都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不同的性别有着不同的影响。在政治不稳定、外部制裁、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粮食不安全的背景下，本案例研究显得至关重要，它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在津巴布韦这一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锂矿开采中的投资有何不同。研究中国投资的性质及其对性别问题的影响，对于提出政策建议尤为重要。

此次实地调查基于2019至2022年在津巴布韦马斯温戈(Masvingo)省比基塔收集的数据。我们与20名妇女进行了焦点小组讨论，并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确定了10名接受单独访谈的妇女。接受访谈的妇女年龄在25岁至46岁之间，她们提供了最有影响力的叙述和经历，并且，她们领导了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来改善妇女在比基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

矿业开采对妇女的影响不同与男性，因此她们经历了许多源自采掘主义父权制的创伤。在记录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我们试图让妇女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她们曾因遭受暴力而陷入沉默。为了避免采用掘取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通过治愈创伤来确保研究过程是互惠互利的，这是在社区中分享经验的前提条件。这一做法为勾勒发展目标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需要投资为我们做什么奠定了基础。我们还认为，通过这个平台，妇女们能够根据她们自己的条件、经验、世界观和视角来重新夺回权力。

焦点组讨论旨在了解比基塔妇女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们如何受到资源开采的影响。参加焦点组讨论的妇女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采矿活动的影响，包括失去土地、受到性侵犯、从事性工作或发生性交易关系，还有一些妇女的配偶在比基塔矿区受伤。焦点组包括了在治疗周期中讲述故事，让人们听到因资源开采而遭受痛苦的女性的声音，看到她们的面孔。

3. 主要发现及分析

3.1 持续的危机、矿业改革与中国在津巴布韦的投资

本节探讨了持续危机和矿业改革的背景，尤其是津巴布韦锂矿行业和中国投资。津巴布韦是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人口近1600万，国土面积390745

平方公里。该国的识字率为 86.5%。据津巴布韦国家统计局估计，有 300 万到 400 万津巴布韦人生活在国外(《纪事报》2023)。津巴布韦曾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但由于土地重新分配政策造成的混乱，该国正变得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

英国和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加剧了津巴布韦的经济衰退，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政治动荡，最终导致津巴布韦转向使用美元。2019 年，津巴布韦进入了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食品、药品和能源短缺(《经济学人》2020)。这些情况导致了政治孤立和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水平低下，而中国则凭借持续支持津巴布韦成为提供援助和投资的战略盟友。

快速土地改革(Fast Track Land Reform, FTLR)致使参加过解放斗争的退伍军人发起了征用土地，在大约二十年后，长期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以及对执政党的抗议导致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Patriotic Front，缩写为 ZANU-PF，简称民盟)的领导层发生更迭。民盟自 1980 年津巴布韦独立以来一直作为执政党，但由于内部派系争权夺利，该党的力量已被削弱，最终在 2017 年发生了针对罗伯特·穆加贝的政变。

埃默森·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领导下的新政府并未对民盟的统治做出重大改变(Vambe 2023)，但也做出了重大妥协。2020 年，政府同意对白人农民进行补偿，并重新安置在快速土地改革中占据农场的黑人农民(Chingono 2023)。非洲开发银行提出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为补偿提供资金(Gbane 2023)。

对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一直存在争议，它对津巴布韦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都产生着影响(Moyo 和 Yeros 2007, Bond 2007, Moyo 2011)，这些改革也对采矿业产生了影响。矿业部门的本土化表现为要求将外国公司和矿山 51% 的股权分配给指定实体，在矿业部门，这些实体往往是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Russel 2011, Nechena 和 Kurebwa 2018, Makoni 2014)。该办法最初寻求铂金和钻石矿的控股权，经过修订后，得以扩展至其他矿产(Veritas 2021)。

然而，在经历了许多不确定性和反弹之后(Motsoeneng 2019)，政府决定删除该修正案，以减轻投资者对其投资和资产的担忧(Kuyedzwa 2021)。尽管如此，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一直是矿业部门确保矿区所在社区的参与并保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工具。在实践中，由于政府要求公司给予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的 10% 股份并非由政府支付(或社区团体无法获得购买这些股份的资金)，而且社区

股份所有权信托在矿业运营治理中的作用也不明确，因此这只是象征性的。公司甚至没有义务向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基金支付分红，矿区所在社区也并不具备质疑矿业公司的法律地位(Nechena 和 Kurebwa 2018)。

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被并称为锂三角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锂矿资源也颇为丰富(Kaunda 2020)。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在津巴布韦比基塔矿投资了3.8 亿美元，该矿拥有 1100 万吨的锂矿石储量，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锂矿床(译注：目前业内公认的世界最大单体锂矿应是位于玻利维亚的锂矿床)。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扩大了矿物开采范围，从最初用于陶瓷和玻璃生产扩大到电池原料。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2005 年以来在津巴布韦运营的八十家中国国有企业之一，其价值达104.5 亿美元。津巴布韦另一个主要的锂矿开采企业是阿卡迪亚公司(Arcadia)，该公司也隶属于一家中国公司(Sydney Boyo 等 2023)。

津巴布韦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在本国加工锂，以保留更大的价值份额。2020年，津巴布韦是最大的锂生产国。手工采矿也为锂的价值链做出了贡献。2022 年颁布的基础矿物控制法禁止出口锂原矿，除非是正在开发的矿山以及在津巴布韦建立加工厂的情况(Philip de Wet 2022)。据推测，该法律旨在控制小规模手工采矿的走私活动。禁令影响了依赖手工采矿的生计(Sydney Boyo 等 2023)，包括锂的开采(Boyo 2023)。锂矿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对妇女和社区造成的社会后果也很严重，这将在下一节详述。

从2000到2018年，津巴布韦的主要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是南非、中国和毛里求斯(Chinyanganya 和 Sunge 2021，第150页)，其中中国自2021年以来一直是主要来源国(Sharara 2023)。根据津巴布韦发展署的数据，在来自中国的427 项投资中，有228 项投资在采矿业。主要的矿业公司有中矿资源集团、浙江华友钴业和深圳盛新锂能集团，它们都投资了锂矿和加工厂(Sharara 2023)。浙江华友在2022年以4.22 亿美元收购了阿卡迪亚矿。作为“确保和建立锂产业链”战略的一部分，华友宣布将投资3 亿美元建造一座加工450 万吨锂矿石的工厂(Banya 2023)。

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Zimbabwe Environmental Law Association, ZELA)和非洲环境法研究所(Africa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 AIEL)(译者注：AIEL是ZELA的分支机构)强调，中国的锂加工能力超过了其锂储量，这需要中国实

现锂的供应多元化。因此，控制锂矿开采对中国具有战略优势。尽管中国已有矿产加工能力，但必须考虑的是，中国如何应对津巴布韦建设国内加工能力的措施。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津巴布韦为锂投资设立了经济特区制度（译者注：经济特区政策指为投资者在特定行业的投资提供奖励措施），这意味着相关公司在2025年1月之前都可以免税（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和非洲环境法研究所 2023）。投资者一直对监管制度薄弱存在担忧，而中国在津巴布韦的投资和业务范围之广，又加剧了人们对此问题的担忧。中国投资者既有大规模投资方，也有手工采矿的买家（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和非洲环境法研究所 2023）。最近，比基塔矿的运营不得不短暂停止，以便政府对劳工管理和分包商进行检查（路透社 2023）。

3.2 津巴布韦的矿业改革和本土化

当前对关键矿产的抢购为重新制定连贯一致的区域战略议程提供了新的动力（Chikwanka 2023）。2022年7月，赞比亚、马里和几内亚与其他八个成员国一起批准了成立非洲矿产开发中心（African Mineral Development Centre, AMDC）的章程。非洲矿产开发中心（AMDC）将协调并监督非洲矿产愿景（African Mining Vision, AMV）的实施，确保建立机制推动其实施（非洲矿产开发中心，日期不详）。非洲矿产愿景也在接受评估，并将制定一项新的非洲绿色矿业战略作为补充（非洲自然资源管理和投资中心2022，津巴布韦环境律师协会2023）。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都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矿产开发政策，以在国家层面实现这一目标。

非洲发展愿景（2009）只是在妇女的采矿权和将妇女纳入价值链的问题上考虑到了妇女。而支持妇女参与采矿业需要解决产权方面的障碍，还需要承认既有的社会规范会阻碍、排除或限制妇女经营采矿业务，例如一些禁忌，还有要求妇女从事照料。这并不是说妇女无法克服这些障碍，或无法积极地挑战社会规范和政策。

然而，这仍然是一种个体主义的策略，仅仅涵盖了那些能够筹集到资本以获得经营许可、购买和管理采矿设备和劳动力的妇女。它将那些缺乏资产无法筹集到资源的妇女排除在外。而且，这两类妇女仍将受到损害妇女土地权的习惯法的制约。这是一种有限的方法，没有考虑到社会地位和生计受到损害的妇女，她们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影响治理进程的能力极其有限，而且风险很大。需要关注支持妇女塑造发展成果的明确治理机制（Kengne 日期不详）。在缺乏对明确机制的关

注这一点上，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2011，Bernaz 2021）。

虽然关注的重点往往集中在采矿业中令人震惊的侵犯劳工权利行为上，但也需要了解采矿业对环境 and 性别的相互影响。持续的气候危机不仅威胁着农业生计的活力，也加剧了采掘主义下的环境成本和采掘主义的性别化特质，因此必须对之加以考虑。比基塔锂矿所在的马斯温戈省凸显了这些问题的相互关联性。

3.3 比基塔矿业活动对环境和性别的影响

马斯温戈省位于津巴布韦东南部，由七个区组成，其中比基塔区的贫困程度最高（Viceisza 等 2020 年）。根据国际财富指数（International Wealth Index，IWI）按照资产、住房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打分，马斯温戈分数为 38.2，而津巴布韦全国平均为 44.1（全球数据实验室 2023）。比基塔是津巴布韦最贫穷省份之一中最贫穷的地区。

比基塔还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干旱、热浪和洪水直接影响农业活动，而农业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活动。不断恶化的卫生设施和道路网络也降低了生活质量和抵御这些恶劣条件的能力。饥饿和饥荒普遍存在，童婚现象日益增多（Chikoko 和 Chihiya 2023）。

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是部族的（communal），有些社区（wards）同时拥有部族和重新安置的社区，导致土地冲突，这一趋势在马斯温戈地区也很普遍（Mafukidze 2018）。自 2000 年代以来，津巴布韦面临经济衰退，许多人不得不从城市搬迁到农村地区，这导致了重新安置区的建立。经济危机还导致津巴布韦男性户主出国移民数量激增，妇女成为事实上的户主。

比基塔的一位 32 岁的妇女梅维丝（Mavis，2024 年的访谈），解释道：“这里地少人多，人口增长也导致了这个区域水危机严重，而矿业大量的用水进一步加剧了水危机。”

津巴布韦的重新安置区肇始于土地再分配改革计划，在该计划中，优先考虑并鼓励在公共牧场或可耕地上建立小块土地。而在实践中，国家的作用占主导地位，往往控制着农场一级的决策（Marongwe 2011）。妇女的土地所有权更多地取决于原住民的宇宙观、当地的文化和政治状况，而不是地契或许可证，因此她们并没有从土地改革中受益。这些多重排斥使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快速土地改革

的安置过程混乱，暴力频仍，导致妇女，尤其是单身或丧偶妇女很难有立足之地（Zvokuomba 和 Batisai 2020）。

在该地区的两个社区中，一个是重新安置区，另一个是锂矿特许开采区，这使得两个社区极易冲突。手工采矿业曾为贫困家庭提供了谋生手段，而手工采矿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获取和控制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和利益诉求。该地区的主要谋生手段是农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园艺和手工开采锂矿。

在津巴布韦经济体系中，手工采矿活动有了显著发展，尤其是在黄金行业，在津巴布韦 35 吨黄金总产量中，有 23.3 吨是由手工采矿者生产的（Moyo 2023）。在比基塔，手工采矿者还开采透锂长石，这些活动与比基塔矿场共存。锂的出口禁令表面上是为了阻止手工采矿者的走私，从而确保本地加工和增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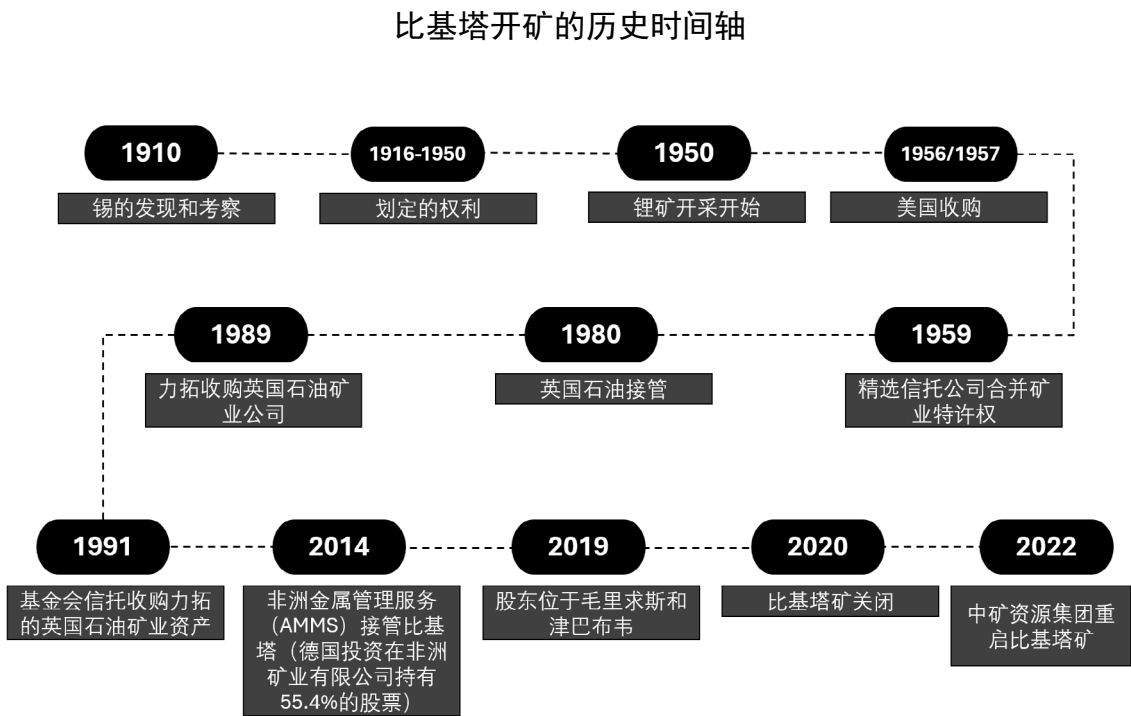
比基塔的手工采矿者还侵占和挖掘人们的田地，导致该地区成为死亡陷阱，耕地遭到破坏。梅维丝（Mavis，2024 年的访谈）解释说：“由于矿井没有得到良好的设置和支撑，曾发生过矿井坍塌的事故，这场意外造成了人员伤亡。”土地退化对比基塔的妇女造成了严重影响，因为她们的生计依赖于农业自给自足。手工采矿者作业的露天矿井还增加了妇女无偿护理受伤儿童和配偶的工作负担。

鉴于含锂的透锂长石储量可加工成碳酸锂，且全球对锂电池的需求不断增加，透锂长石作为一种矿藏已变得越来越有价值（Sitando 和 Crouse 2011）。在锂矿区大规模开垦土地和开挖深坑后，比基塔的土地和环境出现了退化。比基塔 45 岁的妇女莎伦（Sharon）强调说：“一些矿场位于我们用来耕种的土地上，这使我们的粮食短缺。由于粮食短缺，我们的学龄女生也变得更加容易受伤害”。

比基塔的大规模手工采矿活动造成了水、空气和土地污染。25 岁的妇女梅西（Mercy，2024 年的访谈）解释说，“缺水对我们的打击非常大，我们因为缺水而患上各类疾病的风险增高了”。大规模的采掘过程导致这些地质系统失衡，并可能对水资源和土壤健康造成灾难性后果（Adeel 等 2019）。

2017 年，工商企业与人权资讯中心（The 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2019）记录了关于比基塔运营中废物倾倒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指控。在中矿资源集团于 2022 年开始在比基塔运营（比基塔矿业公司 2017）之前，就存在劳工和环境违规的行为及其导致的不满情绪，比基塔的运营曾关停了两年。然而，在焦点组讨论和访谈中，大家一致认为，由于自 2022 年中矿资源集团运营以来，由于运营规模迅速扩大，局势进一步恶化了。下面的时间轴说明了英美公

司的历史主导地位。



中矿资源集团被指控侵犯劳工权利(路透社 2023)，以及没有认识到其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津巴布韦钻石和联合工人工会(Zimbabwe Diamond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秘书长称“中国矿工是新殖民者，他们的到来使本地工人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Mangirazi 和 Sithole 2021)。2017年，一份关于工人遭到中国矿山枪击和枪支威胁的报告唤起了人们对近期大屠杀(如在南非)的创伤记忆(Sinwell 和 Mbatha 2016)，以及历史上控制劳工的殖民策略(Laning 和 Mueller 1979)。

珍妮特(Janet, 2024年的访谈)和梅西(Mercy, 2024年的访谈)描述了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做法：“在就业方面，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女性是首选，她们的工资甚至比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同事要高”(Janet, 2024年的访谈)。“我们这些又胖又丑的人不会被录用，因为我们没有吸引力，这意味着我们甚至无法在矿上找到工作。这些中国人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他们破坏了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良好关系，使我们变得脆弱，生活状况比以前更糟”(Mercy, 2024年的访谈)。

由于中矿资源集团造成的污染，该公司与比基塔社区成员之间曾发生过冲突。该公司使用工业塑料划定一些作业区。这种材料很容易撕裂，并与矿产开采

中使用的化学品混合。2023年5月，中矿资源集团被迫暂停运营，接受政府检查（路透社b版，2023年）。

珍妮特（2024年的访谈）进一步解释道：“中国人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空气、土地和噪音污染之严重令人震惊。到处都是塑料，到处都是灰尘，一天到晚都在爆炸，一天到晚都在鸣笛。总之，这里没有安宁。”

要了解中矿资源集团的运营如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就必须考虑到比基塔目前的紧张局势。因为相互争夺土地所引发的冲突令人担忧。津巴布韦的土地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宪法》规定，津巴布韦的所有公有土地都归总统所有，总统应根据《土地法》批准土地的占有和使用。社区酋长是上述土地的监护人（津巴布韦宪法第71条）。这意味着总统和酋长可以任意决定土地的用途。

中矿资源集团管理着比基塔最大的锂矿，也是唯一获准在比基塔合法开采锂矿的实体。多年来，矿场不断扩大，占用的土地比最初宣布的更多。据观察，随着在比基塔发现更多的锂矿，矿场也在扩大。这种扩张是有问题的，因为津巴布韦宪法规定采矿优先于所有其他土地用途。

结果就是，哪里发现了锂矿藏，哪里的农业就会萎缩，而采矿业则获得优先，这造成了更多的冲突和混乱。在津巴布韦的社会和文化权利中，男性被赋予为土地的所有者，而女性则是土地的使用者。因此，在决定如何使用和分配土地时，妇女处于这套等级体系的最底层。由于上述条款的存在，改变土地用途的现象十分猖獗，女户主家庭所受的影响尤为严重。

与此同时，中矿资源集团并未就其运营与矿区所在社区进行有意义的接触，这对矿区所在社区造成了直接影响。自从中矿集团接管比基塔矿以来，梅维丝（2024年的访谈）说，“在我们这个地区，问题多于解决办法。他们每天都制定新的规则和法律，我们很难跟上。”

梅维丝（2024年的访谈）解释了中矿资源集团如何在未与社区协商的情况下任意划定区域：“之前我们从市场运来的货物会放在自己的家里，但现在由于特许区被封锁，我们很难把我们的货物运回来”。梅西（2024年的访谈）进一步描述了由此增加的性别暴力风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运输网络，现在我们把货卸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这使我们在灌木丛地区面临被抢劫和性侵犯的风险”。公司决策的随意性和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反映出，在实践中，矿业公司和国家在制造和维持有组织的背弃方面是同谋。

就环境影响而言，在矿物提取过程中渗入土壤和水源会导致化学酸浓度达到危险浓度，这些酸被植物和水生生物吸收，从而进入食品系统，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虽然利用微生物进行生物浸出技术取得了进展，但目前还无法实现工业规模的应用（Moazzam 等 2021）。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物将以酸性矿井排水的形式积聚在地下水系统中。

在这些社区，妇女承担着社会再生产的重担，无偿照料工作的增加直接影响到她们。她们的生计活动依赖于土壤和水资源，而这些资源在锂矿开采中被具有生态破坏性的浸出方法所污染。水污染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很大，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必须走很远的路才能为家庭取到干净的水，这也使她们面临性侵犯的风险，并影响到她们在日常家务上花的时间。

一些矿区靠近学校，导致高鲁罗（Gaururo）和古鲁瓦（Guruva）高中以及马林甘比齐（Maringambizi）中学关闭（Makado 和 Makado 2015）。与此同时，中矿资源集团为比基塔 - 法舒（Bikita-Fashu）中学建立了科学实验室，同时还为曼贡多（Mangondo）中学提供了电力变压器。马林达（Marinda）小学也实现了电气化。在奇瓦拉（Chiwara），其他学校和卫生设施也获得了供水（Maponga 2023）。

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加上比基塔妇女受教育程度低，使这里成为商业性性工作的中心，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性工作者被杀害的事件令人震惊。202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93% 的受访者认为性别暴力普遍存在，63% 的受访者认为性别暴力增加与干旱相关（Muto 2022）。

采矿作业（包括手工采矿和大规模采矿）距离学校太近，对年轻女孩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她们暴露在性虐待、杀害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 / 艾滋病的风险之中，以及青少年意外怀孕。在校女生因为还要承担家庭责任，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男人会让她们搭车上学，这让她们面临各种伤害（Gwarisa 2021）。由于这里粮食短缺的发生率很高，而且需要支付自己和兄弟姐妹的基本需求，女孩很容易进入性交易关系（Dziro 2020）。

出售矿石赚取收入的手工采矿者和从矿山赚取工资的矿工们创造了对商业性性工作的需求，这给妇女和女孩带来了风险，这些风险通常来自年长的男性和罪犯，并给家庭带来了动荡（Dziro 2020）。

传统领袖在处理学校关闭、边界争端以及确保当地人在采矿业就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Chanakira 等 2019）。《传统领袖法》（1988 年）通过将他们纳入社区

股份所有权信托基金董事会使传统领袖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其职责扩大到了重新安置区。早些时候，这一举措被描述为表面文章，实际上只是用来安抚社区，并不具有变革的可能性。尽管酋长们可能会动员起来确保当地就业（Chanakira 等 2019），但对于妇女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靠的盟友，妇女需要让渡出部分利益以获得酋长们支持她们的生计和土地权。

在某些情况下，酋长侵犯了妇女的权利，将属于女户主家庭的土地分配出去，因为妇女不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对谁有资格获得、控制和管理土地产生着影响。因此，国家政府政策和地方行政部门执行政策之间存在差距。酋长占据的政治区域也存在争议。这使得矿业投资的环境变得复杂、充满冲突，并倾向于将妇女边缘化。

像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这样的公司和一系列参与者合作，开发了一套广泛而复杂的战略来确定互利发展战略的伙伴。该公司表示，它采用空间分析来确定建设当地经济的方法（英美资源集团 2023）。然而，英美资源集团因在南美和非洲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而被追究责任（美洲环境保护协会 2021，工商企业与人权资讯中心 2020，大赦国际 2023），因此不能作为可复制的典范。与此同时，中矿资源集团在比基塔并没有执行的策略，除了一次对违反劳工法的调查外，没有任何机制追究他们的责任。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调查有什么结果或做出了任何改变。

重要的是要考虑到采矿作业，包括锂矿开采，对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这包括之前生产周期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基塔的开采可追溯到 1911 年。开采矿石和生产锂精矿的过程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周边采矿特许区以外的牲畜和耕地（Sierra Club 2021）。

为了强调这一点，珍妮特（2024 年的访谈）认为，失去土地使女孩“面临被操纵和虐待的风险”。年轻女孩受到中矿资源集团男工的虐待，这些男工既有国内移民，也有中国人，他们“利用我们的女孩，导致少女怀孕、辍学和性传播疾病。性传播疾病在社区内无休止地循环，令人恐惧”。

莎伦（Sharon，2024 年的访谈）解释说，造成这种脆弱性的根本原因是耕地稀缺，这导致竞争性采矿作业致使社区粮食短缺。这种脆弱性还延伸到妇女和女孩，使她们成为年长男子进行性交易的目标：“中国公司的到来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计”。梅维丝（2024 年的访谈）和梅西（2024 年）也描述了比基塔的矿工、性工

作者、未成年少女和妇女之间的感染循环。这进一步引发了性别暴力。未成年少女面临着来自中国工人的风险，他们“希望与这些年轻女孩发生关系，而且由于这里的贫困程度，这些女孩也很容易受到矿工和手工采矿者的虐待。中国工人称这些年轻女孩为‘小玛丽亚’。甚至使一个年轻女孩怀孕了，后来抛弃了这个女孩”（Mercy 2024年的访谈）。

正如前文强调的那样，比基塔的采矿业加剧了暴力，这里迫切需要为妇女创造空间以分享她们的经历，集中治愈创伤，并重建她们的生活和社区。在实践中，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咨询，还包括生计活动（WoMin 2021）。津巴布韦的强奸幸存者网络（Rape Survivors Network）就是一个例子。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接受咨询培训，这样她们就能为社区中的强奸幸存者提供支持。这些空间应该得到支持，用来指导制止基于性别的暴力、保护性工作者的权利，并为其他妇女和女孩提供社会支持的干预措施，避免她们受到男性工人的压力而陷入性交易关系。

4. 总结和反思

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通过鼓励选矿的政策来试图保留采矿业中的更大价值份额，来补救采矿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采掘业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其经济处于边缘地位。在这方面，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效的合作伙伴，在津巴布韦建立了加工能力，支持政府禁止锂原料出口。

尽管如此，在全球，一方面对矿产的需求不断增长，资源国希望可以借此机会获得更公平的矿产开采价值份额；另一方面，采矿业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在矿区，土地冲突、性交易关系、虐待儿童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加剧也引发了人们对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重现的进一步担忧。比基塔矿区的中矿资源集团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这家公司并非绝无仅有。相反，在自愿尽职调查框架和缺乏惩罚措施的情况下，有罪不罚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欧洲正在引入尽职调查法，但由于担心无法与中国竞争，这些法律也被淡化了。这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全球公司治理条款方面可以发挥战略作用，通过确保具有强制性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标准和引入惩罚措施来制定全球公司治理条款。

马蒂贝拉 (Mathibela 2022) 断言，如果不改革矿产资源治理，不促成自下而上的进程，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就不会得到解决。马蒂贝拉建议向地方社区下放权力。这需要确保有透明的程序，包括对严重伤害的起诉，追究企业在环境、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的责任，同时也为建设当地经济创造机会。此外，还应该建立一个透明的、包容妇女领导力的沟通流程，以此作为建立信任的手段，以增进公司对自己业务经营所在地区的背景的了解，例如像比基塔这样的地区的了解。

可以发挥社区股份所有权计划的作用，使之能够成为有效、有代表性和有意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以企业社会责任基金的形式运作。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任何纳入传统领袖、地方政府和矿区所在社区参与的问责机制或社区参与平台，都必须明确将妇女和女孩也纳入其中。

另一个关键的治理问题是津巴布韦采矿业的安全化和军事化特点。虽然相关问题在津巴布韦的钻石和黄金开采中一直备受关注，但安全化问题也同样适用于锂矿开采，在这里，非法资金流动、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正逐渐凸显出来 (Glass 2021)。在实践中，安全化一直是服务于采掘主义的重要工具。这并非津巴布韦或中矿资源集团所独有，而是各国有组织地放弃矿产治理的结果。一个核心问题仍然是需要“保障土地所有权” (Mathibela 2022)，以及支持例如强奸幸存者网络等平台作为干预模式。

然而，如果采矿业不考虑环境和社会成本，包括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可能会重现贫困女性化的模式。传统投资者已经开发了如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自愿问责机制等工具，但在实践中，这些工具并不能有效地满足当地对经济活动中应该做到公平、公正和环境可持续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中采用的狭隘的干预措施难以解决这些更广泛的资源治理问题。为了创造这些空间，各国必须提高对矿业公司的监督和监管能力，并辅之以负责任的地方治理体系，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并在侵权行为发生时确保采取有意义的补救措施。

(翻译：张帆；校对：蔡凌萍；核稿：张玉婷)

参考文献

M. · 阿迪勒(M. Adeel)、J. Y. · 李(J. Y. Lee)、M. 扎因(M. Zain)、M. · 里兹万(M. Rizwan)、A. · 纳瓦布(A. Nawab)、M. · 艾哈迈德(M. Ahmad)、M. · 沙菲克(M. Shafiq)、H. · 易(H. Yi)、G. · 吉拉尼(G. Jilani)、R. · 贾维德(R. Javed)。2019年。《稀土元素在自然资源和生物体上的隐秘足迹》，载于《环境国际杂志》，第127期，第785-800页。(Cryptic footprints of rare earth elements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ving organism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127, 785-800.)

非洲矿产开发中心(African Minerals Development Centre)。日期不详。非洲联盟。<https://au.int/en/amdc>

非洲自然资源管理和投资中心(Africa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Centre, ANRC)。2022年。《指导制定非洲绿色矿产战略的方法文件》。非洲开发银行。科特迪瓦阿比让。(Approach Paper to Guide Preparation of an African Green Minerals Strategy.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bidjan, Côte d' Ivoire.) https://www.afdb.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approach_paper_towards_preparation_of_an_african_green_minerals_strategy.pdf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2023年。《南非听取赞比亚儿童和妇女发起的历史性铅中毒集体诉讼》，2023年1月23日。(South Africa hears historic class action for lead poisoning launched by Zambian children, January 23, 2023)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3/01/south-africa-hears-historic-class-action-for-lead-poisoning/>

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2023年。《区域协同发展》(Collaborat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https://www.angloamerican.com/sustainable-mining-plan/collaborative-regional-development>

美洲环境保护协会(Inter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efence, AIDA)。2021年。《爱尔兰也对国有企业因购买煤炭和位于都柏林的矿业企业销售部门提起了类似的诉讼》，2021年1月19日。(Parallel complaints also filed in Ireland against state owned-company for purchasing) <https://aida-americas.org/en/press/oecd-to->

[investigate-human-rights-abuses-filed-against-the-owners-of-cerrejon-coal-mine](#)

N. · 班雅 (N. Banya)。2023 年。《中矿资源集团津巴布韦分公司恢复运营》。路透社。(Sinomine' s Zimbabwe unit resumes operation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sinomines-zimbabwe-unit-resumes-operations-2023-05-24/>

N. 贝尔纳兹 (N. Bernaz)。2021 年。《国际法中的企业责任概念化：商业与人权条约的模式》，载于《人权评论》，第 22 卷，第 45-64 页。(Conceptualizing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Models for a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reaty, Human Rights Review. 22:45-64.) <https://doi.org/10.1007/s12142-020-00606-w>

M. · 布洛菲尔德 (M. Blowfield)。2005 年。《企业社会责任——失败的学科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于《国际关系》第 19 卷第 2 期，第 173-191 页。(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The Failing Discipline and Why it Matter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2): 173–191) <http://ire.sagepub.com/cgi/content/abstract/19/2/173>

工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BHRRC)。2020 年。《英美资源集团在股东大会上面临南美人权和采矿活动的质疑》，2020 年 5 月 14 日。(Anglo American faces question at AGM human rights and mining activities in South America, 14 May 2020,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anglo-american-faces-questions-on-human-rights-and-mining-activities-at-from-ngos-at-agm/>

比基塔矿业公司 (Bikita Minerals)。2017 年。《对调查津巴布韦锂矿开采部门非法资金流动的回应》，载于《信任非洲》，2017 年 7 月。(Response to Investigating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in Zimbabwe' s Lithium Mining Sector, Trust Africa, July 2017) [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files/documents/Bikita Minerals_Response_PDF.pdf](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files/documents/Bikita_Minerals_Response_PDF.pdf)

帕特里克·邦德 (P. Bond)。2007 年。《对津巴布韦长期经济危机的不同解释》，载于《Safundi》第 8 卷第 2 期，第 149-181 页。(Competing Explanations of Zimbabwe's Long Economic Crisis, Safundi, 8:2, 149-181) DOI: <https://doi.org/10.1080/17533170701370976>

S. · 博约 (S. Boyo)、J. · 佩蒂特 (J. Pettitt)、S. · 鲍德温 (S. Baldwin)。2023 年。《为什么所有人都盯着津巴布韦的锂产业》，2023 年 3 月 29 日。(Why all

eyes are on Zimbabwe's lithium industry, 29 March 2023.) <https://www.cnbc.com/video/2023/03/09/why-all-eyes-are-on-zimbabwes-lithium-industry.html>

R. · 卡斯蒂略 (R. Castillo)、C. · 珀迪 (C. Purdy)。2022年。《中国在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关键矿产方面的作用：未来会怎样？》，利用透明度减少腐败项目。2022年7月。(China's Role in Supplying Critical Minerals for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What could the Future Hold. Leveraging Transparency to Reduce Corruption, LTRC. July 2022.)

D. L. · 查纳基拉 (D. L. Chanakira)、J. · 穆杰雷 (J. Mujere)、S. · 斯皮格尔 (S. Spiegel)。2019年。《津巴布韦铂金矿业的传统领袖和劳工招聘政治》，载于《采掘业与社会》第6卷第4期，2019年11月，第1274-1281页。(Traditional leaders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ur recruitment in Zimbabwe's platinum mining industry, The Extractives Industries and Society, Volume 6,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1274-1281)

W. · 奇科科 (W. Chikoko)、P. · 奇希亚 (P. Chihiya)。2023年。《气候变化与津巴布韦农村地区儿童的脆弱性：津巴布韦比基塔第14社区的案例》，载于《非洲社会工作杂志》第13卷第2期，第78-86页。(Climate change and vulnerabilities of children in rural Zimbabwe: The case of ward 14 of Bikita District, Zimbabwe. Afric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3(2), 78-86.) <https://dx.doi.org/10.4314/ajsw.v13i2.4>

N. · 奇克万卡 (N. Chikwanka)。2023年。《非洲清洁能源转型矿物开采的共同愿景》，载于《独行者日报》，2023年1月31日。(译者注：Daily Maverick 是南非的一家在线出版社和周刊报纸)。(Wanted-a common vision for mining clean-energy transition minerals in Africa. Daily Maverick. January 31, 2023.)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opinionista/2023-01-31-wanted-common-vision-for-mining-transition-minerals-in-africa/>

F. · 奇姆瓦穆隆贝 (F. Chimwamurombe)、L. · 戈纳 (L. Gona)。2023年。《基础矿物出口管制 (未精炼基础矿物矿石) 审查令》，2023年4月28日。(Review of the base Minerals Export Control (Unbeneficiated Base Mineral Ores) Order 2023. 28 April 2023.) <https://www.mondaq.com/export-controls--trade--investment-sanctions/1309576/review-of-the-base-minerals-export-control-unbeneficiated-base-mineral-ores-Order-2023>

N. · 钦戈诺 (N. Chingono)。2023年。《非洲开发银行建议对津巴布韦白人前

农民进行“快速”补偿》。2023年5月15日。(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proposes ‘fast track’ compensation for Zimbabwe white ex farmers, May 15,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african-devt-bank-proposes-fast-track-compensation-zimbabwe-white-ex-farmers-2023-05-15/>

K. · 钦扬加尼雅 (K. Chinyanganya)、R. · 孙歌 (R. Sunge)。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对津巴布韦增长的影响：来源重要吗？》，载于《非洲经济评论杂志》第9卷第4期。(Growth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Zimbabwe: Do Sources Matter?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Review, vol. 9(4), September) <https://ideas.repec.org/a/ags/afjecr/315818.html>

从全球数据实验室区域数据库获取的数据 (Data retrieved from the Area Database of the Global Data Lab)。 <https://globaldatalab.org/iwi/>, 版本4.2。

C. · 登德雷 (C. Dendere)。2022年。《津巴布韦：制裁的漫长阴影》，7月29日。(Zimbabwe: The Long Shadow of Sanctions. June 29.)

C. · 齐罗 (C. Dziro)。2020年。《津巴布韦比基塔地区青少年脱离非正式亲属寄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载于《始成年期杂志》第8卷第1期，第82-91页。(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xperienced by Young Adults Transitioning Out of Informal Kinship-Based Foster Care in Bikita District, Zimbabwe. Emerging Adulthood.) <https://doi.org/10.1177/2167696819870019>

B. · 弗里斯 (B. Fliess)、E. · 伊德萨 (E. Idsard)、R. · 罗苏 (R. Rossouw)。2017年。《非洲采矿业和矿物加工业的出口管制和竞争力》，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贸易政策文件，第204号，经合组织出版社，巴黎。(Export controls and competitiveness in African mining and minerals processing industries, Trade Policy Papers, No. 204,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1fddd828-en>

N. C. · 巴内 (N. C. Gbane)。2023年。《津巴布韦：非洲农业新动力》。(Zimbabwe: New African Agricultural Power House)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3/01/08/zimbabwe-new-african-agricultural-power-house/>

R. W. · 吉尔摩 (R. W. Gilmore)。2007年。《黄金古拉格：加州全球化下的监狱、过剩、危机和反对派》。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Golden gulag: Prisons, surplus, crisis, and opposition in globalizing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 W. · 吉尔摩 (R. W. Gilmore)。2022年。《废奴地理志：解放论》。布鲁克

林：维索出版社。(Abolition geography: Essays towards liberation. Brooklyn: Verso Books.)

F. C. · 格拉斯 (F.C. Glass)。2022年。《通过“有组织犯罪的微观地缘政治”(MGPOC) 框架预防环境犯罪和人类脆弱性：津巴布韦锂产业的案例》，载于《非法经济与发展杂志》第4卷第1期，第34-43页。(Preventing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Human Vulnerability through the MGPOC Framework: The Case of Zimbabwe' s Lithium Industry. Journal of Illicit Economies and Development, 4(1), p.34-43.)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Global Affairs Canada)。2023年。《加拿大对津巴布韦的制裁》，2023年3月。(Canadian Sanctions Related to Zimbabwe, March 2023)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nternational_relations-relations_internationales/sanctions/zimbabwe.aspx?lang=eng

英国政府。2022年。《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制裁》。2022年3月18日。(Financial Sanctions Zimbabwe, 18 March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inancial-sanctions-zimbabwe>

M. J. · 古德曼 (M. J. Goldman)、A. · 戴维斯 (A. Davis)、J. · 里特 (J. Little)。2016年。《控制属于自己的土地：坦桑尼亚北部的土地使用权和妇女赋权》，载于《农民研究杂志》，第43卷第4期，第777-797页。(Controlling land they call their own: access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Northern Tanzani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3:4, 777-797) DOI: 10.1080/03066150.2015.1130701

Y. · 格雷汉姆 (Y. Graham)。2022年。《对非洲矿业愿景的思考：支离破碎的非洲矿业治理》，载于《新议程：南非社会和经济政策杂志》2022年第83期，第15-18页。(Reflections on the African Mining Vision: The Fragmented Terrain of Mineral Governance in Africa. New Agend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2022 (83), 15-18.)

郭少春。2022年。《中国永远是津巴布韦发展道路上真正的朋友》。http://zw.china-embassy.gov.cn/eng/xwdt/202208/t20220823_10749341.htm#:~:text=In%20the%20fight%20for%20national,increasing%20the%20scope%20of%20cooperation

M. · 瓜里萨 (M. Gwarisa)。2022年。《长途跋涉让比基塔在校女生遭遇“金主爸爸”和意外怀孕》。(Long Distance Exposes Bikita School Girls to Sugar Daddies and Unintended Pregnancies) <https://healthtimes.co.zw/2021/03/01/long-distance->

[exposes-bikita-school-girls-to-sugar-daddies-and-unintended-pregnancies/](#)

C. · 休斯 (C. Hughes)。2023 年。《发展中的津巴布韦锂产业正在改变市场平衡》，CRU，2023 年 7 月。(Zimbabwe’ s developing lithium industry is shifting the market balance, CRU) <https://www.crugroup.com/knowledge-and-insights/insights/2023/zimbabwe-s-developing-lithium-industry-is-shifting-the-market-balance/> (译者注：CRU 是一家商业咨询机构，通过市场洞察、商品数据和价格评估、战略咨询等活动，为全球金属、采矿和化肥行业提供独立和专业的商业信息。)

珍妮特 (Janet)。与作者在比基塔的访谈。2024 年 2 月。

R. B. · 卡翁达 (R. B. Kaunda)。2020 年。《锂矿开采对环境的潜在影响》，载于《能源与自然资源法杂志》第 38 卷第 3 期，第 237-244 页。(Potenti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lithium mining. Journal of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Law, 38(3), 237-244.)

G. · 肯纳 (G. Kengne)。(日期不详)。《理解说不的权利》。(Understanding the Right to Say No.) <https://womin.africa/understanding-the-right-to-say-no/>

C. · 库耶兹瓦 (C. Kuyedzwa)。2021 年。《外国实体现在可以完全拥有津巴布韦的矿山》。新闻 24。(Foreign entities can now fully own mines in Zimbabwe following outcry, News24) <https://www.news24.com/fin24/economy/foreign-entities-can-now-fully-own-mines-in-zimbabwe-following-outcry-20210203-2>

G. · 兰宁 (G. Laning)、M. · 穆勒 (M. Mueller)。1979 年。《被破坏的非洲：矿业公司与非洲欠发达的历史》。哈蒙兹沃斯：企鹅出版社。(Africa undermined: a history of the mining companies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L. · 辛威尔 (L. Sinwell)、S. · 姆巴塔 (S. Mbatha)。2016 年。《马里卡纳精神：南非叛乱工会主义的兴起》。伦敦：冥王星出版社。(The Spirit of Marikana: the rise of insurgent trade unionism in South Africa. London: Pluto Press.)

J. · 马夫基泽 (J. Mafukidze)。2018 年。《让他们挨饿，这样他们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对马斯温戈地区穆山迪克小农灌溉计划未解决的土地占用和生计问题的不同看法》，载于《当代津巴布韦生计的政治经济学》(第 170-183 页)。劳特利奇出版社。(“Let them starve so that they ‘hear’ us” :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unresolved land occupations and livelihoods at Mushandike small-holder irrigation scheme, Masvingo District.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ivelihoods in Contemporary

Zimbabwe (pp. 170-183). Routledge.)

R.K. · 马卡多 (R.K. Makado)、E. 马卡多 (E. Makado)。2015年。《评估传统领袖在处理学校与社区冲突中被视为重要的代祷技能和能力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津巴布韦马斯温戈省扎卡和比基塔地区案例》，载于《国际人文与社会研究期刊》第3卷第12期，第75-85页。2015年12月。(An Assessment of Intercessory Skills and Abilities of Traditional Leaders Viewed as Important in Handling Conflict betwee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Education: A Case of Zaka and Bikita Districts. Masvingo: Zimbabw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tudies, 3: 12, pp 75-85. December 2015.) <https://www.internationaljournalcorner.com/index.php/theijhss/article/view/138375/97127>

梅维丝 (Mavis)。与作者在比基塔的访谈。2024年2月。

P. L. · 马科尼 (P. L. Makoni)。2014年。《国有化威胁对津巴布韦经济的影响》，载于《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第12卷第1期。(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isation Threat on Zimbabwe's Economy, Corporate Ownership & Control, Volume 12, Issue 1)

K. · 曼杜纳 (K. Manduna)、D. · 穆恰德尼卡 (D. Muchadenyika)。2021年。《津巴布韦采掘业的本土化政策：批判性思考》，载于《劳特利奇非洲公共政策手册》(第373-383页)。劳特利奇出版社。(Indigenisation policy in the extractive sector in Zimbabwe: A critical reflection.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in Africa (pp. 373-383). Routledge.)

G. · 马蓬加 (G. Maponga)。2023年。《比基塔矿业扩张创造了3000个岗位》，6月13日。(Bikita Minerals expansion to create 3000 jobs, June 13.)

N. · 马龙韦 (N. Marongwe)。2011年。《津巴布韦的土地再分配改革和减贫》。(Redistributive land reform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Zimbabwe.)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7a08ae4ed915d622c000985/60332_Zimbabwe_Land_Reform.pdf

莫里斯·陶内兹维·瓦姆贝 (Maurice Taonezvi Vambe)。2023年。《津巴布韦：从宝石级国家跌落》，载于《第三世界主题：第三世界季刊》第8卷第4-6期，第181-188页。(Zimbabwe: the Fall from a Jewel Status, Third World Thematics: A TWQ Journal, 8:4-6, 181-188)

梅西 (Mercy)。在比基塔与作者的访谈。2024年2月。

P. · 莫扎姆 (P. Moazzam)、Y. · 博鲁曼德 (Y. Boroumand)、P. · 拉比埃 (P. Rabiei)、S. S. · 巴格巴德拉尼 (S. S. Baghbaderani)、P. · 莫卡里安 (P. Mokarian)、F. · 莫哈盖吉安 (F. Mohagheghian)、L. J. · 莫哈迈德 (L. J. Mohammed)、A. · 拉兹姆朱 (A. Razmjou)。2021年。《锂生物浸出：从废锂离子电池中回收锂的新方法》，载于《化学圈》第277期。(Lithium bioleaching: An emerging approach for the recovery of Li from spent lithiumion batteries. Chemosphere, 277, 130196.) <https://doi.org/10.1016/j.chemosphere.2021.130196>

T. · 莫特索能 (T. Motsoeneng)。2019年。《津巴布韦考虑对采矿权采取“要么使用，要么放弃”的方针》，4月10日。(Zimbabwe Mulls Use it or Lose it Approach to Mining Rights, 10 Apri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zimbabwe-mining-idINKCN1RM1TR>

S. · 莫约 (S. Moyo)。2011年。《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三十年》，载于《农民研究杂志》第38卷第3期，第493-531页。(Three decades of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8:3, 493-531)

S. · 莫约 (S. Moyo)。2023年。《敦促手工采矿者提高项目的银行可担保性》，载于《纪事报》，4月。(Increase bankability of projects, artisanal miners urged, The Chronicle, April)

S. · 莫约 (S. Moyo)、P. · 耶罗斯 (P. Yeros)。2007年。《干预津巴布韦问题和两个左派》，载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5卷第3期，第171-204页。(Intervention the Zimbabwe question and the two lef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3), 171-204.)

S. · 莫约 (S. Moyo)。2018年。《与阿奇·马菲杰辩论非洲土地问题》，载于《农业南方政治经济学杂志》，第7卷第2期，第211-233页。(Debating the African Land Question with Archie Mafeje, The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2), 211-233.) <https://doi.org/10.1177/2277976018775361>

S. · 穆尼亚蒂 (S. Munyati)、B. · 钱迪瓦纳 (B. Chandiwana)、S. · 马哈蒂 (S. Mahati)、P. · 穆潘比雷伊 (P. Mupambireyi)、S. · 布祖兹 (S. Buzuzi)、W. · 马尚格 (W. Mashange)、T. · 莫亚纳 (T. Moyana)、S. · 格维尼 (S. Gwini)、S. · 鲁萨卡尼科 (S. Rusakaniko)。2008年。《津巴布韦八个地区孤儿和弱势儿童状况分析》，比勒陀利亚：HSRC。(Situation analysis of orphaned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in eight districts in Zimbabwe, Pretoria: HSRC.)

Y. · 穆托 (Y. Muto)。2020年。《马斯温戈比基塔区应对紧急情况中的性别暴

力》，国立科学技术大学发展研究所，8月。（Gender-Based Violence in Emergencies Response in Bikita District in Masvingo,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ugust）https://www.academia.edu/47763202/GENDER_BASED_VIOLENCE_IN_EMERGENCIES_RESPONSE_IN_BIKITA_DISTRICT_IN_MASVINGO

H. · 内切纳 (H. Nechena)、J. · 库雷布瓦 (J. Kurebwa)。2018年。《津巴布韦比基塔农村地区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的社区参与》，载于《国际人文与社会研究期刊》第5卷第9期，2018年，第30-40页。（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hare Ownership Trusts in Bikita Rural District of Zimbabw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 Volume 5, Issue 9, 2018, PP 30-40.）

新闻24 (News24)。《津巴布韦禁止未加工锂出口，要求进行选矿》，2022年12月29日。（Zimbabwe bans lithium unprocessed lithium exports demands beneficiation, 29 December 2022）<https://www.news24.com/news24/bi-archive/zimbabwe-bans-unprocessed-lithium-exports-demands-benefaction-2022-12>

P. · 纳斯 (P. Nex)、K. · 古德诺夫 (K. Goodenough)、R. · 肖 (R. Shaw)、J. · 金奈尔德 (J. Kinnaird)。日期不详。《非洲锂矿分布回顾》，金山大学，英国地质调查局，卓越与气象分析中心。（A review of lithium occurrences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Centre for Excellence and Meteorological Analysis.）<https://www.geolsoc.org.uk/~media/shared/documents/events/Past%20Meeting%20Resources/Lithium/Paul%20Nex.pdf>

S. · 恩卡拉 (S. Nkala)。2022年。《津巴布韦矿业部门的掠夺性政治、本土化和经济赋权政策》，载于《非洲评论》第14卷第3期，第277-304页。（Predatory Politics and the Indigenis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Policy in Zimbabwe's Mining Sector. Africa Review, 14(3), 277-304.）<https://doi.org/10.1163/09744061-tat00004>

H. · 奥乌苏 - 科兰腾 (H. Owusu-Koranteng)。2018年。《实施自主、事先和知情同意：矿业社区的案例》，在内罗毕非洲企业问责联盟 (African Coalition for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ACCA) 全体大会上的主旨演讲。（Operationalising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The case of Mining Communities, Keynote Address at ACCA General Assembly, Nairobi）https://accahumanrights.org/images/resources/reports/Operationalising_FPIC.pdf

史鹏飞、黄季焜。2023年。《过去四十年中国各地区的农村转型、收入增长和减贫情况》，载于《综合农业杂志》第22卷第22期，第3582-3595页。(Rural transformation, income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by reg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2(22), 3582-3595.) <https://doi.org/10.1016/j.jia.2023.10.037>

菲利普·德·韦特(Philip de Wet)。2022年。《津巴布韦已禁止出口来自其全球重要储量的锂原料》。新闻24，2022年12月29日。(Zimbabwe has banned the export of raw lithium from its globally-important reserves. News24. December 29 2022.)

Z·兰德里亚马洛(Z. Randriamaro)。2018年。《采掘主义之外：非洲社会和性别平等发展的女性主义替代方案》，载于《女权主义反思》。(Beyond Extractivism: Feminist Alternatives for a Socially and Gender Just Development in Africa, Feminist Reflections)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mosambik/15208-20190325.pdf>

路透社 a 版(Reuters a)。2023年。《中矿资源集团因当局担忧而暂停津巴布韦锂业务》，5月15日。(Sinomine suspends Zimbabwe lithium ops over authorities' concerns, May 15.)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sinomine-suspends-zimbabwe-lithium-ops-over-authorities-concerns-2023-05-15/>

路透社 b 版(Reuters b)。2023年。《中矿资源集团津巴布韦分公司恢复运营》。2023年5月24日。(Sinomine's Zimbabwe unit resumes operations)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sinominer-zimbabwe-unit-resumes-operations-2023-05-24/>

A·拉塞尔(A. Russel)。2011年。《津巴布韦在国有化问题上的强硬路线》，载于《金融时报》4月15日。(Zimbabwe's tough line on nationalisation, Financial Times, published April 15) <https://www.ft.com/content/9ca62a74-6775-11e0-9138-00144feab49a>

J.S·索尔(J.S. Saul)、R·桑德斯(R. Saunders)。2005年。《穆加贝、葛兰西与津巴布韦的25年》，载于《国际期刊》2005年秋季，第60卷第4期，《非洲：迈向持久和平》(2005年秋季)第953-975页。(Mugabe, Gramsci and Zimbabwe at 25, International Journal, Autumn, 2005, Vol. 60, No. 4, Africa: Towards Durable Peace (Autumn 2005), pp. 953-975) <https://www.jstor.org/stable/40204093>

D·塞登(D. Seddon)、L·齐里格(L. Zeilig)。2005年。《非洲政治经济

评论》第32卷103期,《帝国主义与非洲社会形态》(2005年3月),第9-27页。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2, No. 103, Imperialism & African Social Formations (March 2005), pp. 9-27) <https://www.jstor.org/stable/4006907>

K. · 沙拉拉 (K. Sharara)。2023年。《中国现在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6月1日。(China now Zim's largest FDI source, June 1)

莎伦 (Sharon)。在比基塔与作者的访谈,2024年2月。

塞拉俱乐部 (Sierra Club)。2021年。《锂矿开采和挖掘指南》,2021年11月13日。(Guidance on lithium mining and extraction, November 13 2021) <https://www.sierraclub.org/sites/www.sierraclub.org/files/Lithium-Mining-Guidelines.pdf>

O. · 西坦多 (O. Sitando)、P. · 克劳 (P. Crouse)。2011年。《加工津巴布韦钾长石以获得碳酸锂》,载于《国际矿产加工杂志》,十月,第102期。(Processing of a Zimbabwean petalite to obtain lithium carbon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 Processing, October. No 102.) <https://doi.org/10.1016/j.minpro.2011.09.014>

J. · 斯密茨 (J. Smits)、R. · 斯滕迪克 (R. Steendijk)。2015年。《国际财富指数》,载于《社会指标研究》第122卷,第65-85页。(The International Wealth Index (IWI). Soc Indic Res 122: 65-85)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4-0683-x>

《纪事报》(The Chronicle)。2023年。《2022年,在南非的津巴布韦人汇出了大部分汇款》。(Zimbabweans in South Africa sent bulk of remittances in 2022) <https://bulawayo24.com/index-id-news-sc-national-byo-227532.html>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20年。《津巴布韦出现了十多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载于《经济学人》2020年7月9日。(Zimbabwe's worst economic crisis in more than a decade. The Economist. 9 July 2020.)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0/07/09/zimbabwes-worst-economic-crisis-in-more-than-a-decade>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2011年。《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纽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A. · 维塞萨(A. Viceisza)、K. · 阿夫拉加(K. Aflagah)、J. · 艾伯纳(J. Abner)、K. · 希波吕忒(K. Hippolyte)。2020年。《津巴布韦的贫困与营养不良：马斯温戈省的调查结果》。研究技术援助中心：华盛顿特区。(Poverty and Malnutrition in Zimbabwe: Findings from Masvingo Province. Research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re: Washington, DC.)

非洲妇女联盟(WoMin)。2021年。《枪支、权力和政治：研究报告》(Guns, Power and Politics: Research Paper) https://womin.africa/wp-content/uploads/2020/09/Zimbabwe_Report-FINAL.pdf

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和非洲环境法研究所(Zimbabwe Environmental Law Association & Africa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 ZELA & AIEL)。2023年。《津巴布韦锂矿开采热潮的影响：法律发展分析》，2023年2月。(Implications of the Lithium Mining Rush in Zimbabwe: Analysis of Legal Developments, February 2023.)

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Zimbabwe Environmental Lawyers Association)。2023年。《利用非洲矿业愿景释放可持续发展红利》。2023年2月24日。(Leveraging the Africa Mining Vision to Unlock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vidend. 24 February 2023.) <https://zela.org/leveraging-the-africa-mining-vision-to-unlock-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dividend/>

津巴布韦国家统计局(Zimbabwe National Statistics Authority)。2022年。《人口与住房普查：初步报告》。(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Preliminary Report)

赋权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女性： 评估中国－尼日利亚 农业合作对女性小农户生计、 能力建设和社会规范转变的影响

李明德 (Ishola Itunu Grace)



尼日利亚

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应对粮食短缺的经验使其成为非洲农业发展合适且杰出的伙伴（Brautigam 和 Tang 2009）。中国凭借其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几个经济快速增长领域的投资和发展援助方面的成功方法，支持了很多致力于复制“中国发展模式”的非洲国家。先前的研究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农业合作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包括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ATDC），提供技术培训和奖学金以促进技术和知识转让、土地投资、开办合资企业，以及在东道国、中国国有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公平关系（Brautigam 和 Tang 2009，Harding 等 2021，Gu 等 2016，FOCAC 2009）。这些农业合作模式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双边协议、三边合作和公私伙伴关系（PPP）（Olasehinde 等 2023，Ebula 和 Qi 201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期不详）。

这些模式在诸如中非合作论坛（FOCAC）、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之类的合作机制中得到了体现。《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促进了中非农业合作。中国承诺向不同的非洲国家派遣 100 名农业专家，提供农业领域的培训和专业技术，促进粮食安全和发展。包括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和科技部在内的中国政府机构和部委被指派与非洲同行合作，提供专业知识，并与东道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为了促进与非洲不同国家的可持续农业合作，中国采取了“一省一国”合作模式——一个中国省份作为发展伙伴服务一个非洲国家，在一次竞标中巧妙地一举完成政治和商业任务。这一模式的重要特征是自 2006 年以来，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 24 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Harding 等 2021，Liu 和 Peter 2023，Buckley 等 2017，Jiang 等 2016，Amanor 和 Chichava 2016）。

2003 至 2014 年间，在全非洲启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之前，通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南南合作项目（UNFAO-SCC），尼日利亚接待了大约 650 名中国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接受了 200 多种农业技术。其中许多驻扎在农村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引进了非传统农业技术，为小农户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并加强了当地的农业实践，极大地改善了许多尼日利亚小农户的收入和生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9）。Sun（2011）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增加了对非洲农业投资的力度并非偶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中国希望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增加生物燃料的生产，以满足能源需求，同时确保国内粮食安全。

特别是，非洲生产许多制造生物燃料的主要作物，这为中非农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渠道。例如，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薯出口国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薯进口国。对生物燃料原料不断增长的需求为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创造了途径，有助于抵消一部分中非的贸易失衡。

国家、企业和大学都是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在尼日利亚农业援助项目的实施者包括中国大使馆、中国商务部、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以及一些研究机构，他们与尼日利亚联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预算与国家规划部、联邦妇女事务部等政府部门合作，在尼日利亚实施项目。2022年，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与尼日利亚农业大学合作发起了“菌草技术工作坊”，旨在建立一个占地20公顷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专门用于规划和培训尼日利亚农业技术人员（Oyoyo 2022）。虽然中国农业专家及企业在尼日利亚引进杂交水稻、玉米、小米和木薯变种的目的是帮助尼日利亚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安全，但许多当地农民对此褒贬不一（Ibrahim 2020, Otung 2014）。然而，由于在评估教育、培训、农业投入、推广服务和信贷设施方面存在文化和制度障碍，人们对小农特别是妇女，如何从该计划中受益知之甚少（世界银行2022, Ogunlela 和 Mukhtar 2009, Olaosebikan 等 2019）。

尽管关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模式、前景和挑战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有关妇女的角色，以及中国农业合作对尼日利亚农业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影响的研究却十分匮乏。因此，本文旨在从性别视角研究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重点关注对女性小农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如何影响尼日利亚女性小农的权利和性别平等？中国主导的培训项目如何影响尼日利亚女性小农的收入和生计？在尼日利亚农业领域追求经济和社会赋权的同时，妇女采取了哪些策略来克服性别规范？

本研究以女性主义视角和微观分析为基础，有助于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农业领域参与情况。它提供了一个视角，显示了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在尼日利亚粮食生产以外对女性小农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中国农业援助项目中的现有制度规定在促进尼日利亚农业领域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和定性研究法，评估了尼日利亚的一家中国公私合营农业企业——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GAWAL）。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是中国在尼日利亚开展农业培训的推动者，也是中国在阿布贾捐助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唯一实施者。作为

一家在尼日利亚运营的中国公私合营农业企业，它展示了中非农业合作的混合模式。中国通过将商业战略与援助倡议相结合，努力使其援助项目在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Jiao 2014）。本研究通过性别视角揭示了该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业务运营情况。受访者对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培训计划的想法表明，这些计划影响了数百名参与计划的尼日利亚小农的生计和福利。然而，有关这些计划在改善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方面影响的信息却很少，因此需要关注并探讨培训设计中的性别主流化。

本文结构如下：开篇部分介绍了中非农业合作的背景以及本案例研究的目标和贡献；第二部分回顾了有关妇女参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现有文献、指导本研究的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结果和讨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2. 检视妇女在中非农业合作中的作用

本节回顾了有关中非农业合作、妇女参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指导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及其方法的现有文献。

2.1 中非农业合作

关于中非合作影响的近期报告，依据多项实地调查的数据，显示了中国在农业领域的援助对非洲国家的各项社会经济成果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中非农业援助有效性的研究文献集中于这一合作对农村发展和减贫（Gubak 和 Samuel 2015, Paulin 2017）、青年赋权和创造就业（Akinnifesi 和 Setshawelo 2014）、以及农民生产力和收入水平（Olasehinde 等 2013）的影响。其他学者，包括 Ebula 和 Qi (2011)、Jiao (2015) 和 Bakare (2019)，通过强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公私伙伴关系视角，探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性质、影响和挑战。然而，Gu 等人 (2016) 持有不同观点，他们将中国在非洲的农业参与描述为一种混合模式，这种模式模糊了捐助方（国家）和投资者（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并创造了一种共生关系——受助者与捐助者之间的“发展合作”。然而，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主导的农业干预措施在非洲受援国的性质和效果的细节，但它们并没有触及几个核心议题，包括女性小农的角色。

女性农民身处农业一线，是乡村发展的关键角色（Ogunlela 和 Muktar 2009）。尽管如此，各种障碍包括风俗、信仰、无偿家务劳动影响了妇女获得贷款、教育和健康服务，限制了她们的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前景（Ogunlela 和 Muktar 2009）。Velu 等（2009）认为，宗教信仰妨碍了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压低了她们的收入，促使许多女性小农户寻求其他收入来源。此外，Das 等（2023）发现，尼日利亚限制性的性别规范、职业隔离和地区差异影响了妇女在农业企业价值链培训项目的选择，加深了男性和女性农业企业创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经济不平等。

尽管妇女在农业中举足轻重，但一些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研究却未能将女性农民的参与纳入分析与结论中（Gubak 和 Samuel 2015，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9，Olasehinde 2023）。上述文献几乎没有揭示中国农业援助对妇女的影响，以及发展援助如何影响性别平等和缩小非洲农业领域的收入差距。此外，最近才开始出现探讨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的混合模式的文献，这些文献对该模式在中国企业具体案例中的应用及其对生产力、收入和性别平等的实际影响见解有限。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探讨女性小农在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中的参与情况来填补这些研究空白。由于认识到混合模式是中国农业参与南南合作（SSC）的关键因素，本文对在尼日利亚运营的中国农业企业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进行了案例研究，调查其活动，包括培训和技术转让，如何影响女性参与者。这一方法揭示了中国参与尼日利亚农业的具体机制，为有关农业中的妇女和中非合作的本地化影响的研究做出贡献。

2.2 概念框架

本研究整合了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DAWN）提出的性别、经济和生态正义（gender,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justice, GEEJ）框架，探讨了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和可持续生计方法对性别的影响。GEEJ 框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性别、经济和生态正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它将这些领域联系起来，探索性别与全球化、发展和气候变化等社会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它还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及其如何影响东道国的人权、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创造了一个性别意识的视角（蔡一平和于音 2022）。

虽然 GEEJ 框架有助于阐明性别与上述因素之间的联系，但使用该框架分析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需要深入的理论基础，以微观分析的方式探究性别相关问题结果背后的多方面动态。因此，本研究也采用了罗伯特·钱伯斯 (Robert Chambers) 和戈登·康维 (Gordon Conway) 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钱伯斯和康维 (1992)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了生计的概念，强调了人类的行动和行为背后的复杂性，因为这些行为都受制于特定时间以及所能获得的机会。本研究采用了钱伯斯和康维对生计的定义，即“满足基本所需充足的流动或储备的食物与现金”。当一个人能够管理和应对各种挑战，增加对未来需求的持续供应时，生计才是可持续的 (钱伯斯和康维 1992 年，第 5 页)。司康尼斯 (Scoones 1998) 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转化为一个用于分析的概念框架，描述了实现可持续生计所需的不同资源、个人策略以及那些影响着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结构。作者所认为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或政治资本，而结构则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法律、文化和制度。

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和技术的崛起，一些学者扩大了资本的范围来分析其他领域和学科的各种案例和研究 (Odero 2006, Horsley 等 2015, De Haan 2011)。Odero (2006) 在该框架中加入了信息资本，认为信息在个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战略中至关重要。为了全面理解所研究的现象，本研究采用了六种资本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信息资本) 的框架来评估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对女性小农收入和生计的影响。在这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水平和各种农业实践的能力；自然资本是指获得土地和水的机会；物质资本包括农业机械和用于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各种资产 (将农作物运往市场的卡车或储存农作物的仓库)；金融资本包括现金和获得信贷、贷款和赠款的机会；社会资本指社会和政治关系、农民组织成员资格以及朋友和合作伙伴网络；信息资本指个人获得与其农业实践相关的信息的机会，如培训、推广服务和 (价值链的) 市场准入。

2.3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评估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对尼日利亚女性小农收入和生计的影响，以及对尼日利亚小农中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提升的影响。这种方法超越了尼日利亚粮食生产和在尼日利亚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的范围这些以往的研究议题。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从半结构式访谈、政策文件、学术期

刊、书籍和新闻报道中获取第一手和第二手数据。访谈在2023年10月至12月期间通过 WhatsApp、微信和音频电话进行。访谈围绕着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受访者采取开放式讨论，分享了他们在尼日利亚参加中国主导的培训活动的经历及其对收入和生计的影响。

本研究共有14名受访者，其中男性5人，女性9人，包括一位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代表、一位尼日利亚农业部的代表、一位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三边合作的区域主任，以及2019年9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阿布贾参加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主办的农业培训活动的两位男性和九位女性农民。这些受访者的背景广泛，他们为了解不同培训阶段和时期项目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整体视角。2023年培训的受访者尚在从参与培训中获取知识的阶段，而2019年培训的受访者已在他们的农业实践中采用了获得的技能，并可以讨论培训对其产量、收入水平和生计的影响。研究人员采用了“滚雪球”抽样的方法，请受访者介绍其他愿意参加研究的培训参与者。研究人员在选择受访者时采用了一种旨在获得最大变异性样本的方法（Creswell 2007）。这一选择是为了通过受访者的真实经历了解所研究的现象，而不是为了突出受访者的代表性。由于现场采访受限，研究人员与受访者进行了网上访谈。所有从受访者处收集或披露的数据都会保密，访谈数据不包含受访者的个人身份信息，如姓名、地址或电话号码。

3. 性别差距抑或妇女赋权：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尼日利亚农业合作

本节介绍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研究结果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项目对尼日利亚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影响；农业培训项目对尼日利亚女性小农收入和生计的影响；以及妇女的谈判能力和策略对尼日利亚农业部门中性别规范的变化。

3.1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中的公私伙伴关系模式

从性别视角审视尼日利亚的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这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2021年的贸易额超过130亿美

元。2023年第一季度，农业约占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国家统计局2023年)。农业雇佣了35%的劳动力，其中约一半是女性小农(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2003年以来，尼日利亚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接待了约650名中国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这些专家每人花两年时间对尼日利亚小农户、推广代理和其他当地农业专家进行培训，教授更具成本效益的中国农业新技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9年)。因此，中国-尼日利亚农业合作不断发展，涉及许多利益相关方，包括中国大使馆、在尼日利亚运营的国有和私营企业以及同乡会和友谊协会。这些新的参与者执行了中国的混合发展援助模式，并成为中国-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联络方。本研究聚焦于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GAWAL)，这是一家公私合营的农业企业，由中地海外集团(原名中地海外建设集团)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在尼日利亚成立。

中地海外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入尼日利亚，看重的是其农业技术专长和该国的市场前景、有利的农业条件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总经理王森强调，该公司致力于将其商业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目标结合起来，并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对其声誉以及尼日利亚的可持续增长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Li 2021)。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业务包括大规模种子生产、农业机械和设备销售、农产品加工、培训和咨询，以及在尼日利亚(凯比和阿布贾)建设和运营农业产业园。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还与多家中国农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与种子生产相关的研究、培训和知识交流。^①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是尼日利亚联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发起的“增长促进支持计划”(Growth Enhancement Support, GES)和“锚定借款人计划”(Anchor Borrowers' Programme, ABP)的战略合作伙伴和杂交水稻种子供应商。该公司在尼日利亚凯比州经营着一个2025公顷的机械化示范农场，并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设有运营办公室。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为尼日利亚政府官员和农民提供农业培训，执行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援助项目，并在阿布贾的布瓦里运营尼日利亚唯一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② 本研究之所以研究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是因为它是中国混合援助模式的缩影——在与尼日利亚的农业合作中，由国家和独立企业共同开展商业项目和援助项目，两者相结合(Harding等2021, Brautigam和Tang 2009)。此外，在2016年，作为中国援助项目，它在尼日利亚开展了首次农业培训，自那时起培训了超过400名农民和政府半官方人员(张2016, GAWAL

2023)。

3.2 谁参与了什么？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对尼日利亚小农的农业培训

中国和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一个核心特点是技术转让和农业相关的技术援助。本研究发现，能力建设、粮食安全、可持续农业企业和耕作机制已牢牢嵌入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农业合作中(Gubak 和 Samuel 2015)。中国通过各种机制组织培训和技术援助，包括双边和三边协议以及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中国政府资助了多个农业和技术培训项目，引进中国农业技术，促进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技术转让。多年来，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组织了八次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培训项目，帮助尼日利亚小农掌握杂交种子、农业机械使用、农药和化学品应用、加工以及农业企业价值链知识等方面的尖端技能。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尼日利亚 - 中国农业合作主要为农户和推广人员提供农业培训不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9, Olasehinde 2023)，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为这些团体和政府官员提供有关中国农业技术的培训。2016年至2019年，该公司培训了400多名政府官员、小农户和技术人员，并在尼日利亚各州成立了7个种子生产合作社，拥有约5000名成员，以传播中国农业技术，促进尼日利亚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③除了在尼日利亚实施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外，该公司还与尼日利亚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预算与国家规划部、联邦妇女事务部等部委和政府机构合作，为其农业培训项目招募学员。然而，如公司记录所示，因为特定作物和价值链的性别隔离、计划信息传播不畅以及依赖地方部委招募学员等因素，导致男性参与培训的比例高于女性。每次培训的男女学员比例平均为30 : 9，女性学员不到学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见附录中的表1)。

农业培训计划没有规定男女参与者的比例而导致了性别失衡。虽然受访公司的代表强调他们有意招募更多的女性小农，但他们指出，由于负责招募的部委拥有参与者的酌处权，并且这一决定和程序缺乏正式的政策或指导方针。此外，没有任何公告明确规定培训计划参与者的招募程序、资格标准或性别分布。虽然一些受访者表示，成为注册农民协会或合作团体的成员是参加培训的先决条件，但研究发现了一些例外情况。这表明，负责招募的部委使用其他要求和指标来确定培训参与者的资格。因此，需要重新评估招募方法，以增加女性小农对培训项目的参与。

此外，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有效实施了农业援助项目，并通过将部分种子生产外包给当地农民来维持业务。本研究中的男性小农户表示，他们被邀请担任水稻外包工，帮助生产杂交水稻种子，并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给公司。受访者六解释说：“在（上一个）雨季，公司发给我们种子，让我们为他们生产。他们把种子免费提供给农民，然后在生产之后，无论农民生产多少，他们都会买回所有种子，哪怕价值十亿（奈拉）。”

虽然这意味着该公司可以将生产本地化，帮助小农实现收入多样化，并提高对中国制造的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率，但这也带来了妇女参与不足的问题。

此外，与中国在尼日利亚主导的其他农业培训计划一样，培训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杂交水稻和木薯的种植和加工、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以及农业机械和设备的操作（Osheinde 2023, Guhbak 和 Samuel 2015）。在尼日利亚，男性小农主宰了水稻和用于种植的木薯的销售（Umeh 和 Atarboh 2006，转引自 Omiunu 2014；Aboaba 等 2019；Olaosebikan 等 2019），这阻碍了许多女性小农参与此类农业培训计划。因此，包括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在内的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实施者，在设计和实施培训项目时，应考虑尼日利亚农业中的性别角色、规范、文化和职业隔离。通过提供传统上由妇女种植的作物（如块茎作物和蔬菜）的课程来促进包容性。

此外，培训方案采用 80/20 原则，即 80% 的理论和 20% 的实践，这使得学员在大部分培训中实际体验所学技能的机会有限。公司代表承认，由于空间限制和参与者的人口结构，他们在 2022 年之前的培训计划缺乏足够的示范。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培训方式：给政府官员提供更多的理论信息，而给小农户和当地农业专家更多的示范。该代表解释说，自 2022 年 12 月开始使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设施以来，公司在培训计划中增加了实践环节。

此外，尽管在培训初期理论和实践知识不平衡，但本研究发现，学员们采用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包括杂交水稻种子和病虫害防治技术，这表明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成功地转让了中国农业知识和技术，提高了作物产量。受访者五表示：“使用改良水稻种子（GAWAL R1 和 Faro 44）^④ 和更好的推广服务后，农民在旱季耕作的低洼地区每公顷的水稻产量达到三至五吨，甚至可达到六吨。米农发现，他们很难用粟米^⑤来取代当地小米，当地的珍珠粟品种 sosat 和 super sosatvi 非常好。不过，他们利用小米种植技术的信息，这让他们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

产量。”

这一发现证实了 Olasehinde 等人 (2023) 的研究, 该研究认为, 虽然农民从培训中获益, 但农民之间培训资源和信息分配仍然存在不平衡。与没有类似背景和经济激励的其他人相比, 大多数培训参与者拥有相对较高的财务和社会资本 (Olasehinde 等 2023)。没有数据证据表明有妇女参与了由中国农业专家在尼日利亚奥贡州组织的为期 6 个月的活动。本研究分析了男性和女性小农在参加培训后的差异, 以填补这一空白。

3.3 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对尼日利亚女性小农收入和生计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了培训后小农户的生计和收入情况, 重点关注四项指标: 农产品和产量、收入多样化、获得信贷的途径以及生产单位 (劳动力、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调查结果表明, 相对于产量, 受访者对培训项目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一位受访者最初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 产量很少, 只能养家糊口, 她说 (参加培训后) 作物产量提高了, 能够养家糊口, 还能将剩余部分出售或换取其他商品和服务。但是, 该受访者没有具体说明用额外收入购买了何种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是教育、健康产品、牲畜以及有形和无形资产, 这些资产可能会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计、生活水平以及农村的整体发展 (DFID 1999)。

本研究还发现, 培训后学员决定通过利用新获得的技能使收入来源多样化。受访者二指出, 虽然她学会了用芝麻榨油用于个人消费, 但买不起用于自己农场大规模生产杂交水稻的秧苗。如果在培训后向这些农民提供足够的信贷和资金, 就可以在尼日利亚的农产品加工业中利用已有的芝麻油制造技能。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代表表示, 这是一个挑战, 一些学员由于缺乏资金购买农业材料和技术, 因此无法在其日常的农场经营中运用到培训期间获得的大部分知识。此外, 受访者五指出, 在索科托, 改良水稻种子和更好的推广服务帮助将水稻产量提高到每公顷 6 吨左右, 即使是在干旱季节。

不过, 研究发现, 培训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与女性小农相比, 男性农民在培训后的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的机会显著增加。据男性小农报告, 他们的农业产量提高了约 30%, 他们参与了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外包种植计划, 并获得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信贷服务, 这些都有助于在培训后增加他们的收入。受访者六解释说, 公司为他提供了参加外包种植计划的机会, 他在该计划中

为该公司生产水稻种子，赚取额外收入。此外，培训结束后，他还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笔贷款，用于扩大自己的农业综合企业，他计划购买一台收割机^⑦并租给其他农民，以获得更多收入。相比之下，女性小农在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时面临着资金限制。她们经营小生意，包括出售牛肉、绵羊肉和山羊肉、加工农产品、做裁缝、买卖饮料和小家电，从而实现收入多样化，并将利润再投资于农业经营。

在预算分配和获得信贷、培训以及作物和价值链推广支持方面的性别失衡，使女性小农与男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除了阻碍女性小农获得可提高其农业收入和生计的机会的制度性障碍外，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性别规范和职业隔离也使一些女性小农无法种植谷物、咖啡、可可和各种块茎作物等有价值的作物。女性农民将这些作物归类为“男性作物”（世界银行 2022 年，第 33 页），不愿意种植这些作物。

此外，尼日利亚农业中男女之间的权力动态极大地影响了妇女经营的农场的生产力和农业产量。性别角色影响了妇女在作物选择、土地获取、农业投入、机械和体力劳动方面的决策，塑造了男性和女性小农之间的权力结构。九号受访者指出，在她所在的社区，男性小农主导了水稻种植，少数种植水稻的女性小农的农场规模要小于男性小农。七号受访者解释了妇女面临的挑战，包括没有经济能力租用大面积农田，因为她们经常将生产时间用于在丈夫的农场上耕作。此外，男性小农户通常通过继承来控制土地资产，导致许多妇女无法获得土地。受访者一主要种植水果和蔬菜，而不是玉米、大米、小米或其他谷物，她回答说，妇女需要男性同伴帮助她们在机械租金、体力劳动工资以及化肥和其他农用化学品等投入上讨价还价。她解释说：“即使你对种植水稻感兴趣，你也不能独自做：这需要大量资本。此外，妇女可以在农业领域工作，但不管我们说什么，农业领域仍是男性主导。因此，身为女性，你只被期待在后方工作，而不是农场运营的一线。你需要一个男人来管理农场。我的手下有一些员工，我知道作为妇女想要发号施令的滋味。是的，你可以下达指令，但女性这么做要比男性面临更多挑战。”

现有的文献研究也印证了上述情况，即已婚女性农民需要更多的激励或动力才能投入时间和资源到她们的农田，因为她们花费大量时间在丈夫的农田工作或做家务（Pierotti、Friedson-Ridenour 和 Olayiwola 2022）。虽然妇女在尼日利亚农业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但资源和较高的农业价值链主要由男性农民控制（Ogunlela 和 Mukhtar 2009，世界银行 2022）。这种影响男女小农之间社会经济

不平等的现象说明了 Scoones (1998) 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强调的结构和过程的转变。它解释了私人和公共制度、政策、法律和文化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的生计。

总体而言，仅靠培训和提高技术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带来预期的结构性变革。这可能是由于培训计划很难快速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动态的转变，而这些社会经济动态在文化与宗教上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普遍存在的权力差距也会阻碍获得技术培训，从而造成周而复始的挑战。这些发现具有互补性。一方面，在不解决权力差异的情况下获取技术知识和技能，会使女性小农在获得农业相关机会方面继续面临障碍。另一方面，在没有提供培训的情况下重构权力动态，可能会导致错过取得有意义的社会经济进步的机会。尽管如此，长期的变化是可能的，这体现在本研究中女性小农的行为变化上，她们从事水稻种植，并愿意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包括大量种植生姜和花生。此外，女性农民的农业产量提高也增加了可支配收入。经济独立又提高了女性小农的自主性，使她们在涉及农业实践、家庭支出和社区发展的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3.4 通过获取资本改变性别规范

本研究发现，女性小农参加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影响了她们所在社区对现代农业实践的采用，从而导致农业领域性别规范的转变。培训后，更多的女性小农种植了大量水稻和其他主食，增加了她们的收入和社区的粮食安全。受访者还讨论了她们与社区、朋友和农民协会成员，尤其是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由妇女领导的合作社成员，分享新的耕作技术和方法。因此，可以确定两个受益群体：参加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农业培训的直接受益者和间接受益者，后者包括受训者的家庭成员、同一农民协会的成员、朋友和整个社区。在9位女性受访者中，有5位是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她们指出，她们将培训中获得的知识与各自合作社中的约300名妇女分享。受访者七说：“作为我所在社区的农民合作社社长，我参加了培训，记下了要点，然后回去培训其他农民。这些妇女还在更小的村子里培训其他农民。”

这一信息共享过程对联邦妇女事务部来说至关重要，它要求受益人向所在农场协会和社区中的其他小农授课。通过妇女事务部招募的受访者表示，农民协会中的领导角色、语言能力以及培训其他农民的意愿构成了培训资格标准的一部

分。参与者被要求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其中包括举办“阶梯式”培训(“step-down training”)®的照片、参与者名单、培训中的挑战和社区对培训的反馈意见。尽管规定了制度来解决小农在获得农业培训机会时可能面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但研究发现，针对如何监测不同地区“阶梯式”培训计划的执行，仍然缺乏必要的政策和框架。各部委仅仅依靠报告和图片，而没有系统的措施来衡量培训计划对社区小农的影响和可持续性。

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产生了连锁效应，即，一名女性小农参加农业培训，启发了其他无法直接获得培训的女性小农，从而缩小了尼日利亚经济作物和主食种植中的性别差距。根据 Farnworth 等人(2020)的观点，这一发现表明，采用新技术可以重构农业中男女的权力动态。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率、农场产量和收入，提高妇女在家庭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及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Farnworth 等 2020)。

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利用信息资本制定生计战略以实现预期成果的有效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是通过职业和个人关系获得农业培训信息的。受访者八提到，她从一个熟人那里获得了培训信息，这位熟人是她所在州州长的特别顾问。这位受访者认为，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参与者对培训的选择。参加培训的人既精通英语，又能用豪萨语或其他土著语言进行交流，从而有效地为其所在社区的农民开展培训。Olasehinde 等人(2023)强调，一些农民更喜欢从其他农民那里学习，因为他们对该个人、其语言和文化都熟悉(Olasehinde 等 2023)。在这种非正式的环境中，女性小农可以学习新的农业技术，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农场，提高产量和收入。

此外，研究还表明，尼日利亚的许多女性小农对她们在农业中遇到的文化、政治和制度障碍有所意识。作为回应，她们利用自身的能动性制定战略来消除或减轻这些限制，包括收入多样化和参与社区领导。土地资产对大多数女性小农来说意味着财务稳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生产资料和抵押品。在妇女土地所有权受限制的地区®，她们采取的策略包括通过父母、亲戚或男性子女获得土地。例如，一位未婚女性受访者通过父母获得了农田，她承认自己独立获得田地会遇到困难。经济拮据进一步促使女性小农依赖贷款、继承、父母或配偶的支持来投资资本密集型资产，包括土地和农业机械。在尼日利亚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农业盛行的北部地区，由于宗教或文化信仰，大多数妇女无法拥有或继承土地(Veliu

等 2009)。

同样，Umaru Baba 和 Van der Horst (2018 年)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妇女一直在通过各种关系，包括婚姻和其他社会网络，谈判她们拥有牲畜和财产的权利。这与社会资本是可持续生计的资产这一理论不谋而合，社会资本使个人能够获得土地、牲畜和农业设备等物质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金融资本。许多妇女积极挑战限制她们生产能力和收入的性别规范。她们依赖于各种网络，包括宗教、同乡和农民协会，获得知识共享和资金支持。这项研究表明，妇女赋权有助于解决具有限制性和歧视性的文化规范。知识和经济赋权让尼日利亚农业领域的妇女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使她们能够运用主动性和谈判力，购买更多资产，并参与家庭和社区的决策。

4. 结论和建议

这项关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及其对女性小农影响的案例研究，评估了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计划对被招募的女性小农的收入和生计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中国的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主导的农业培训，在促进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面临的挑战体现在培训招募机制，尼日利亚特定作物和价值链现有的性别隔离，以及项目信息传播不畅，导致女性受训者少于男性。此外，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没有制度规定，为更多女性小农参加培训提供配额。同样，研究也表明，与女性小农相比，男性小农在培训后报告的作物产量更高，并带来收入增加。不过，培训有助于女性小农改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产量，采用新技术，并增进与其他小农的社会凝聚力。此外，该研究还提供证据表明，女性小农接受更多的农业培训可促进农村地区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和工艺，从而增强粮食安全和尼日利亚农村的发展。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首先，研究范围仅限于参加两个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培训计划的尼日利亚小农样本。这些因素凸显出，在其他培训计划项目和该公司执行的项目以外的地区，其他受访者的经验缺失的问题，从而对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作为一项先导研究，希望引起学者、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对本文所讨论问题的关注，并为后续通过性别视角开展农业发展合作研究奠定基础。未来的研究可以与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类似培训项

目，不管是中国主导的还是其他国际机构主导的项目，进行比较分析，以得出跨文化和跨地区的见解。

建议

(1) 在设计培训方案时应考虑性别因素，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举办的培训种类应多样化。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水稻种子生产，他们可以邀请其他农业培训专家对园艺、块茎作物和其他尼日利亚女性小农传统种植的作物开展培训。这将为那些无法转而种植“男性作物”的妇女提供机会，并使她们掌握更好的方法来改进其在当下价值链中的农业实践。

(2) 去除农业领域中的性别定型化。从历史上看，虽然妇女对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她们并不被视为农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也较少获得土地、信贷和推广服务等重要资源。因此，政府应颁布新的包容性政策，去除农业领域中的性别定型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农业领域的性别平等化，使妇女可以参与决策并获得必要的服务，促进农业的生产和转型。

(3) 采用“小而美”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这一概念描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小型项目。该模式强调项目的有效性和可观收益。在中国-尼日利亚农业培训和项目中采用这一模式有助于解决社会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项目由政府主导，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目的；这些项目可能无法惠及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农民。相反，结构合理的“小而美”项目可以改善小农户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发展农业技能的机会。

(翻译：张帆；校对：蔡凌萍；核稿：张玉婷)

注释

①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公司代表于2023年10月3日提供的信息。

② 信息来自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网址：<https://gawal123.com/>（访问日期：2023年11月6日，网站链接已经失效。）。

③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代表于2023年10月3日提供的信息。

④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生产并销往尼日利亚市场的杂交水稻种子品种

名称。

⑤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生产并销往尼日利亚市场的杂交小米种子品种名称。

⑥ 尼日利亚当地采购的小米种子名称。

⑦ 收获季节用于收集作物的机器。

⑧ “阶梯式培训”是农民协会和招聘部门对当地农民和合作社领导人开展的农业培训的称呼。在阶梯式培训中，接受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农业培训的第一手受益者使用尼日利亚的一些土著语言，在非正式场合传授从培训中获得的知识和技术。

⑨ 在尼日利亚不同地区，尤其是北部地区，妇女通过配偶、男性子女和亲戚获得土地。研究表明，尼日利亚的一些地区因妇女的宗教地位而禁止她们继承或拥有土地。例如，北部的穆斯林妇女和非穆斯林妇女拥有土地的机会和权利不同(见 Velu 等 2009)。

参考文献

H. 阿卜杜勒拉赫曼(H. Abdulrahman)。2023年。《部长将向农村女性小农发放26000吨杂交水稻》。尼日利亚联邦广播公司(FRCN)。(Minister will distribute 26,000 tons of hybrid rice to rural women farmers. The Federal Radio Corporation of Nigeria, FRCN) <https://radionigeria.gov.ng/2023/10/12/minister-to-distribute-26000-tons-of-hybrid-rice-to-rural-women-farmers/> (2023年10月14日访问)

K. O. 阿波巴等(K. O. Aboaba et al.)。2019年。《尼日利亚奥贡州稻农家庭疾病负担的决定因素》，载于《农业和农村发展杂志》第9卷第2期，第264-273页。(Determinants of disease burden among rice farming households in Ogun state, Nigeria. I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9(2), pp.264-273.)

F. K. 阿金尼费西(F.K. Akinnifesi)、L. L. 塞沙韦洛(L.L. Setshawelo)。2014年。《南南合作为尼日利亚农民赋权》，载于《每日信托》。(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gric is empowering Nigerian farmers, Daily Trust.) <https://dailytrust.com/south-south-cooperation-in-agric-is-empowering-nigerian-farmers/> (2023年10月10日访问)

K. S. 阿玛诺(K.S. Amanor)、S. 奇查瓦(S. Chichava)。2016年。《南南合

作、农业综合企业和非洲农业发展：巴西和中国在加纳和莫桑比克的合作》，载于《世界发展》第81期，13-23页。（South-South cooperation, agribusiness, and Afric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razil and China in Ghana and Mozambique, World Development, 81, pp.13-23.）

M. · 巴卡雷 (M. Bakare)。2019年。《农民的呻吟，因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北部抢占土地》，载于《黄金时报》。（Farmers groan as Chinese firm grabs land in northern Nigeria, Premium Times.）<https://www.premiumtimesng.com/agriculture/agric-news/343566-farmers-groan-as-chinese-firm-grabs-land-in-northern-nigeria.html?tztc=1>（2023年10月10日访问）

黛博拉·A·布劳蒂加姆 (D. A. Bräutigam)、唐晓阳。2009年。《中国在非洲的农业“下乡”》，载于《中国季刊》第199期，第686-706页。（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n agriculture: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The China Quarterly, 199, pp.686-706.）

蔡一平、于音。2022年。《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对性别影响的分析框架》。苏瓦：DAWN。（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the Gender Impact of China's Global Engagement in the Global South. Suva: DAWN.）<https://www.dawnfeminist.org/wp-content/uploads/2023/01/20230202-China-Analytical-Framework.pdf>

罗伯特·钱伯斯 (R. Chambers)、G·康维 (G. Conway)。1992年。《可持续的乡村生计：21世纪的实践观念》。发展研究所 (IDS)，英国。（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K.）

S·达斯等 (S. Das, et al.)。2023年。《农业中的职业性别隔离：尼日利亚性别规范和社会情感技能的证据》，载于《农业经济学》第54卷第2期，第179-219页。（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in agriculture: Evidence on gender norms and socio-emotional skills in Nigeri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4(2), pp.179-219.）

L. J·德·哈恩 (L. J. De Haan)。2012年。《生计方法：批判性的探索》，载于《地球科学》，第345-357页。（The livelihood approach: A critical exploration. Erdkunde, pp.345-357.）

英国国际发展部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UK)。1999年。《可持续生计指导手册》。DFID，伦敦。（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DFID, London.）

M. · 埃格布拉(M. Egbula)、Q. · 郑(Q. Zheng)。2011年。《中国和尼日利亚：强大的南南联盟》，载于《西部非洲的挑战》第5期。2011年11月。Sahel和西非俱乐部秘书处。(China, and Nigeria: A Powerful South-South Alliance. West African Challenges No. 5 November 2011. Sahel and West Africa Club Secretariat, SWAC/OECD.) <https://www.oecd.org/china/49814032.pdf> (2023年10月10日访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日期不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中国开展抗击饥饿合作40周年》。(FAO and China mark 40 years of hunger-fight cooperation. <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FAO-and-China-mark-40-years-of-cooperation-in-hunger-fight/>) (2023年10月13日访问)

C. R. · 法恩沃斯等(C.R. Farnworth, et al.)。2020年。《不平等的伙伴：尼日利亚男女玉米种植者之间的权力、能动性和利益之间的联系》，载于《性别、科技与发展》第24卷第3期，第271-296页。(Unequal partners: associations between power, agency and benefits among women and men maize farmers in Nigeria. 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24(3), pp.271-296.)

李瑞康(音译) (R. Li)。2021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如何适应当地环境》。(How Chinese companies in Africa adapt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https://news.cgtn.com/news/2021-03-08/Chinese-companies-in-Africa-look-to-shape-positive-image-VOH8zBurdK/index.html> (2023年11月6日访问)

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2023年。《尼日利亚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Nigeria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Q1 2023.) <https://nigerianstat.gov.ng/elibrary/read/1241325> (2023年11月6日访问)

国际劳工组织(ILO)。2021年。《农业就业率(占总就业的百分比) (以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计) —尼日利亚》，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库。(Employment in agriculture (% of total employment) (modeled ILO estimate) - Nigeria, World Bank Open Data.)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19年。《激励、包容与创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2009-2019 年) 》。(Inspiration, Inclusion and Innovation: FAO-Chin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rogramme (2009-2019).)

中非合作论坛(FOCAC)。2009年。《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后续行动》。(Implementation of the follow-up actions of the Beijin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http://www.focac.org.cn/eng/ljhy_1/dscbjhy/FA32009/200911/t20091117_7976734.htm (2023年10月20日访问)

谷靖、张传红、阿尔西德斯·瓦兹(A. Vaz)、兰顿·穆克韦雷扎(L. Mukwereza)。2016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重新思考国家和企业在中国非洲发展合作中的作用》，载于《世界发展》第81卷，第23-34页。(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business in Chines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81, pp.24-34.)

H. D. · 库巴克(H.D. Gubak)、M. · 塞缪尔(M. Samuel)。2015年。《中国在尼日利亚农业部门的贸易和投资：批判性分析》，载于《美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第2期，第277-287页。(Chin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Nigeria’ s agricultural sector: A critical analysis.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4, No. 2, pp.277-287)

J. · 霍斯利(J. Horsley)、S. · 普劳特(S. Prout)、M. · 汤斯(M. Tonts)、S. H. · 阿里(S. H. Ali)。2015年。《矿业经济中的可持续生计和地区发展指标》，载于《矿业和社会》第2卷第2期，第368-380页。(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indicator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ining economies.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2(2), pp.368-380.)

M. A. · 伊卜拉欣(M.A. Ibrahim)。2020年。《尼日利亚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与可持续粮食安全》，载于《正宗农业国际杂志》第1卷第1期，2020年6月，第42-54页。(Development of Hybrid Rice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in Nig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thentic Agriculture. Volume 1, Number 1, June 2020, pp. 42-54)

Y. 焦(音译) (Y. Jiao)。2014年。《中国农业企业在非洲的创业：加纳和尼日利亚案例研究》，载于《政策简报2015年第5期》。2014年8月。(Chinese Agri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in Africa: Case Studies in Ghana and Nigeria. Policy Brief 05/2015, August 2014.)

K. K. · 奥德罗(K. K. Odera)。2006年。《信息资本：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第六项资产》，载于《发现与创新》第18卷第2期，第83-91页。(Information capital: 6th asset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Discovery and Innovation, 18(2), pp.83-91.)

Y. I. · 奥基纳尔多(Y.I. Ogunlela)、A. A. · 穆赫塔尔(A.A. Mukhtar)。2009年。《尼

日利亚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性别问题：妇女的角色》，载于《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第1期，第19-30页。(Gender issues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Nigeria: The role of women. Humanity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4(1), pp.19-30.)

O. · 奥拉塞比坎等(O. Olaosebikan, et al.)。2019年。《在尼日利亚奥约州和贝努埃州，基于性别的制约因素影响男性和女性对生物强化木薯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载于《生理和分子植物病理学》第105卷，第17-27页。(Gender-based constraints are affecting biofortified cassava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among men and women adopters in Oyo and Benue States, Nigeria.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Plant Pathology, 105, pp.17-27.)

托巴·斯蒂芬·奥拉塞欣德(T.S. Olasehinde)、Y. · 金(音译)(Y. Jin)、乔方彬、毛世平)。2023年。《中国在尼日利亚农业技术转让的边际收益：谁受益更多？》，载于《中国经济评论》第78期，第101935页。(Marginal returns on Chines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 Nigeria: Who benefits more? China Economic Review, 78, p.101935.)

O. G. · 奥米努(O. G. Omiunu)。2014年。《调查尼日利亚女性稻农面临的挑战》，载于《开放图书馆杂志》第1卷第6期，第1-14页。(Investigat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women rice farmers in Nigeria.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6), pp.1-14.)

I. A. · 奥通(I.A. Otung)。2014年。《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卡拉巴尔的热带人文环境中评估六个中国玉米品种》，载于《全球农业研究杂志》第2卷第3期，第10-16页。(Evaluation of Six Chinese Maize (ZEA MAYS) Varieties in the Human Tropical Environment of Calabar, Southeast Nigeria. Glob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2(3), pp.10-16.)

I. · 奥约约(I. Oyoyo)。2022年。《粮食安全：非盟发展署—发展新伙伴计划将菌草技术本土化》，载于《领导力新闻》。(Food security: Auda-NEPAD to Domesticate Juncao Technology, Leadership News.) <https://leadership.ng/food-security-auda-nepad-to-domesticate-juncao-technology/> (2023年10月20日访问)

S. · 帕金森(S. Parkinson)、R. · 拉米雷斯(R. Ramirez)。2006年。《利用可持续生计方法评估信息和传播技术对发展的影响》，载于《社区信息学杂志》第2卷第3期。(Using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to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ICTs in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Community Informatics, 2(3).)

R. S. · 皮耶罗蒂 (R.S. Pierotti)、S. · 弗里德森 - 里德诺 (S. Friedson-Ridenour)、O. · 奥拉伊沃拉 (O. Olayiwola)。2022年。《妇女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时间限制如何影响尼日利亚西南部已婚妇女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载于《世界发展》第152卷，第105800页。(Women farm what they can manage: How time constraints affec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bour for married women' 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outhwestern Nigeria. World Development, 152, 105800.)

I. · 司库恩斯 (I. Scoones)。1998年。《可持续的农村生计：分析框架》。发展研究所工作论文第72期。(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DS working papers 72.)

F. · 苏 (F. Su) , U. · 赛吉亚 (U. Saikia)、I. 海 (I. Hay)。2018年。《生计风险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中国石羊河流域案例研究》，载于《可持续性》第10卷第2期，第509页。(Relationships between livelihood risks and livelihood capitals: A case study in Shiyang River Basin, China. Sustainability, 10(2), 509.)

H. L. · 孙 (H. L. Sun)。2011年。《了解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中国在非洲项目不定期论文第102期。南非国际事务研究院 (SAIIA)。(Understanding China' 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in Africa. China in Africa Project Occasional Paper No. 102.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AIIA).)

S. · 奥马鲁 · 巴巴 (S. Umaru Baba)、D. · 范德霍斯特 (D. Van der Horst)。2018年。《尼日利亚北部卡诺农村地区妇女在土地和牲畜方面的家庭内部关系和环境权益》，载于《环境》第5卷第2期，第26页。(Intrahousehold re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entitlements of land and livestock for women in rural Kano, northern Nigeria. Environments, 5(2), 26.)

A. · 韦利 (A. Velu)、N. · 杰赛斯 (N. Gessese) , C. · 瑞格萨 (C. Ragasa)、C. · 奥卡利)。2009年。《关于越南东北部和尼日利亚水产养殖价值链的性别分析》。世界银行。(Gender analysis of aquaculture value chain in Northeast Vietnam and Nigeria.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Bank)。2022年。《缩小差距，增加机会：尼日利亚妇女经济赋权的报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Closing Gaps,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A Diagnostic on Women' s Economic Empowerment in Niger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hdl.handle.net/10986/37225> (2024年2月10日访问)

张保平。2016年。《尼日利亚首次举办中国援助农业培训》，新华社（First Chinese-aid agriculture training held in Nigeria, Xinhua.）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6-06/16/c_135442229.htm（2024年1月5日访问）

保林。2017年。《探究尼日利亚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信任：以农业合作为例》。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海方、皮埃尔。2023年。《大变局时代的国际发展援助——以中国援助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为例》，载于《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1), 第14-17页。

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年。港媒：“小而美”成为“一带一路”投资新偏好。<https://www.yidaiyilu.gov.cn/p/266404.html>（2023年10月31日访问）

附录

表 1：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在2016年至2023年期间组织的农业培训清单

	年份	农业技术培训项目的种类	资金提供者	合作方	周期	参与者数量	女性参与者数量
1	2016	综合农业技术培训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	尼日利亚农业部	7天	40	15
2	2017	综合农业技术培训	中国商业部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45天	21	7
3	2017	综合农业技术培训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	尼日利亚农业部	7天	40	6
4	2018	综合农业技术培训	中国商务部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45天	103	18
5	2018	综合农业技术培训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	尼日利亚农业部	7天	40	15
6	2018	综合农业技术培训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尼日利亚的不同农业组织	2天	74	15
7	2019	综合农业技术培训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	尼日利亚农业部	7天	40	5
8	2023	花生品质评价及加工利用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和尼日利亚农业研究委员会	1天	70	未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司代表提供的数据绘制的表格）

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对 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中国－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与 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 的比较案例研究

帕特里夏·桑戈·波拉德 (Patricia Sango Pollard)



所罗门群岛

引言

2019年是所罗门群岛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这一年，所罗门群岛结束了与台湾长期的外交关系，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一外交转变发生的背景是，该国政府似乎想急切改变国家的走向以竭力满足民众需求。2021年3月，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加剧了人们对中国是否计划通过军事力量来扩大在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疑虑。

这个转变可能影响无数领域，本研究着重探讨在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影响。我们旨在解答一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与传统发展伙伴澳大利亚相比，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对所罗门群岛妇女的处境以及在她们在和平建设和安全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何影响？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采用了两种信息搜集方法。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文件、学术论文、新闻报道和在线公共论坛等。其次，进行了非正式访谈，包括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和当地妇女。共邀请了15人进行采访，其中只有7名妇女做出了回应。鉴于事件在国内的敏感性，对未回应者作者并未再次邀请采访。所有受访者都要求匿名。为适应不同受访人群，采访问题(见附录1)有所调整。

本研究聚焦于所罗门群岛，背景涉及该国最近面临的棘手问题、对外部安全援助的需求、妇女的地位及其在建设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从承认台湾到承认中国的“外交转变”等等方面。本文的正文讨论了以下领域的研究结果：对《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签署及其执行情况看法；该协议对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所引发的担忧；与澳大利亚在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所提供援助的比较；以及在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下，促进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的时机。

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使用的性别(gender)和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是指女性和男性经历的社会建构。

1. 背景

1.1. 所罗门群岛简况

所罗门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位于澳大利亚东北约2000公里处，陆地总面积为28466平方公里（南太平洋委员会2023，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2022）。它的900多个岛屿组成了9个岛屿省份。首都霍尼亚拉（Honiara）位于最大的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岛上（南太平洋委员会2023）。该国属于热带气候，位于珊瑚三角带，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查普曼2021）。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生物多样性不断受到伐木活动的威胁。同时，该国也首当其冲地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化等不利影响（查普曼2021）。

所罗门群岛总人口744407人，主要由美拉尼西亚人组成，也包括波利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①、中国人、其他亚洲人以及欧洲人（南太平洋委员会2021）。在文化上，大多数所罗门群岛人过着一种集体生活，对自己的亲属群体、部落、土地和省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主要使用英语和皮金语^②，另有大约70种主要语言和许多其他当地方言（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2022）。

该国经济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主要包括林业、农业和渔业，采矿业近年来也开始发展，有金矿、铝土矿和镍矿等。2021年，该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为2305美元（所罗门群岛中央银行2021）。约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主要依靠农业和渔业维持生计。该国的制造业规模相对较小，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需要依赖进口（Gay 2016，第3页）。政府预算和发展项目严重依赖国际双边和多边伙伴的海外援助。

所罗门群岛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保护地，于1978年获得独立，采用威斯敏斯特议会民主制度，以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总督是其代表。总理是政府首脑，负责监督由23名成员组成的内阁，这些成员构成了政府的行政部门。该国在政治上被划分为5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代表，一院制的国民议会就由这50名代表组成，议员们按“简单多数制”选举产生（Ace 项目2014）。

所罗门群岛是联合国成员国，与许多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对该国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家均与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日本。后三者是该国目前最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与该国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和发展援助关系。澳大利亚是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双边捐赠国，通过其外交贸易部（DFAT）开展工作，并在应对新冠（COVID -19）疫情的过程中努力重新加强了双边关系；自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通过在司法、卫生、教育、农业、治理、性别和安全领域的各种发展计划，共计为所罗门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23 年）。

1.2. 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从台湾地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转变

所罗门群岛 1983 年和台湾地区建立外交关系，36 年来所罗门群岛从中受益匪浅。这种外交关系于 2019 年结束，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有双重外交承认（Maizland 2023）。历史上，台湾地区与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几个国家均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期在全球舞台上，特别是在联合国获得承认。在保持外交关系期间，台湾向所罗门群岛提供了多领域的支持，包括通过农村选区发展基金（RDCF）向议员提供自主支配资金（Nanau 2015，第 441-450 页）。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成为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出口市场，2017 年吸纳了所罗门群岛出口总额的 65.2%，价值 3.26 亿美元（Agorau 和 Zhang 2019）。

2019 年 9 月 20 日，所罗门群岛政府与中国签署联合公报，致使关于该国准备将外交关系从台湾转向中国的猜测达到了高潮。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议员指责，此举过于仓促，公众咨询不足，并且没有充分遵守议会程序（所罗门群岛议会反对党 2019）。然而，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却表示，由于中国是联合国成员，这一转变使所罗门群岛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从而承认并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Iroga 2020）。两国达成的共识之一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2018）。近年来，这种合作关系快速发展，中国为太平洋岛国主要体育赛事——2023 年太平洋运动会——的设施建设提供了主要支持，该运动会于 2023 年底首次在所罗门群岛举办（所罗门国家通讯社 2021）。

1.3 政治不稳定、暴力和安全协议

所罗门群岛长期存在政治不稳定和内乱，这些问题持续不断地威胁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法律秩序。不信任投票屡见不鲜，并且时有成功，导致政府的迅速

更迭和政策实施的中断。1998年至2003年，所罗门群岛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种族冲突”，其根源是由于腐败、资源分配不公和土地纠纷等深层次的原因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这场冲突在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和马莱塔（Malaita）这两个较大省份的武装团体之间发生，导致100多人死亡，人权遭到侵犯，人民流离失所。在由澳大利亚的主导下、太平洋论坛成员国参与的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团（RAMSI，下面简称区域援所团）进行了干预，这场骚乱于2003年结束，强力推动了和平进程。尽管有区域援所团的存在，首都霍尼亚拉（Honiara）在2006年还是爆发了一场骚乱，导致唐人街严重损毁。这场骚乱的导火索是对斯奈德·里尼（Snyder Rini）当选总理的不满，他被指与华人社区关系密切，而华人则被指控制了该国大部分经济活动（鸚鵡螺研究所 2006）。

区域援所团于2017年6月结束了其行动，随后于8月，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条约。该条约允许澳大利亚警察、国防部队、相关文职人员和第三国力量在需要时，迅速部署到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17）。该条约的书面文本已公开，以便公众了解其内容（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23）。

1.4 所罗门群岛性别平等、妇女、和平与安全

所罗门群岛的父权制度，在21世纪仍然阻碍着妇女的进步。尽管五个主要岛屿有着母系社会结构，但这并未带给妇女在政治和社区的领导角色（Caso 和 Pollard 2023）。目前议会的50个代表中，仅有4名妇女成员。在土地和财产所有权等利益分配方面，妇女缺乏平等对话的权利。尽管妇女地位有所改善，但她们仍然经常遭受亲密伴侣的性暴力和身体暴力，并且容易面临失业和分娩死亡（Caso 和 Pollard 2023）。在1998年至2003年的种族冲突期间，妇女经历了许多暴行，包括强奸、强迫婚姻，也缺乏获取医疗和司法服务的机会（所罗门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 SIG-MWYCFA 2017，第12页）。同样，2021年首都发生的骚乱加剧了妇女的安全风险，并破坏了依赖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妇女的生计。

尽管如此，所罗门群岛拥有强大的妇女事务网络和运动，在政府的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Ministry of Women, Youth,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MWYCFA）、全国妇女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NCW）的主持下，加上其他主要民间组织，致力于倡导性别平等，改善影响妇女的各种问题。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负责监督《性别和平等和妇女发展》（Gender and Equalit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GEWD),《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 EVAWG)政策、《国家妇女和女童经济赋权战略》(National Women and Girls Economic Empowerment Strategy , NWGEES)。所罗门群岛还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以下简称《消歧公约》)的缔约国,通过了《北京行动纲领》(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和其他支持改善妇女和女童处境的各种区域性承诺。在澳大利亚、联合国妇女署和其他发展伙伴的大力支持下,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些框架下的政策和行动,并逐渐促进变革。

在各种危机期间,妇女通过与交战各方和执法部门互动,通过媒体开展宣传活动,在和平进程的推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种族冲突时期,妇女利用习俗和基督教教义发挥调解作用,包括援引传统法则(坦布)来调解,并向武装分子施加压力促成其解除武装”(SIG-MWYCFA 2017, 第12页)。同样,在2006年骚乱期间,妇女网络联合起来,并利用公开媒体,要求变革。然而,妇女对重建和平的贡献从未得到充分承认。解决种族冲突的谈判中,为和平而孜孜努力的妇女被沦为旁观者。同样,区域援所团也没有为妇女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其能为和平进程做出贡献。2006年骚乱期间,区域援所团人员曾建议著名妇女代表希尔达·卡利(Hilda Kari)不要与骚乱者对话,就是例证之一(乔治2018,第1340页)。2015年,政府通过当时的民族团结、和解与和平部(Ministry of National Unity,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 MNURP)推出了所罗门群岛国家和平建设政策。该政策依然未能重视对妇女的保护,也忽视了对重建和平的贡献(所罗门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2020)。

这些经历促使所罗门政府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于2017年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UNSCR1325),以及《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2017-2021》,并得到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联合国妇女署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该战略借鉴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30号一般性建议,呼吁承认妇女全面、平等参与和平建设进程的作用(所罗门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2017)。该战略为妇女参与社会事务,并在涉及自身安全 and 国家安全问题上考虑她们的权利铺平了道路。

下一章节将仔细研究《中国-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解读它与妇女、和平与

安全的关系。此外，还对所罗门群岛与传统合作伙伴澳大利亚的类似合作进行了比较，并强调了《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和《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可能带来的机遇。

2. 中国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与《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

2.1. 对《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及其实施的解读

《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具体通过日期从未完全对外披露。根据一份在推特上发布的泄露协议副本，该协议允许所罗门群岛请求“在获得同意时，部署中国警察、武警、军事人员和其他执法部队，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道主义援助，并允许中国船只在该国停靠和过境，以及允许相关的中国军事力量在必要时保护中国在当地的人员和项目”（美国广播公司 2022）。

2022 年 5 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该协议阐明了三项原则：尊重所罗门群岛的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稳定，与该国已缔约的区域安全协议和其他安全计划并行运作。此外，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对外贸易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External Trade, MFAET）常任秘书表示，该协议旨在应对内部安全威胁和气候变化，而非针对外部威胁，并且只有在其他措施都无效的时刻才会启动（Kekea 2022）。然而，该协议的最终文本尚未对外公布。

太平洋地区和国际社会对该协议的非透明表达了意见，包括该协议可能允许中国在该国建立海军基地，以及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能渗透到一个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地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在多个平台上强烈否认了建立海军基地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对此做出了回应，增加了对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和国防援助，自 2021 年骚乱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在该国保持军事存在（澳大利亚外交部 2022）。美国也重新关注所罗门群岛，重启了已关闭了三十年的大使馆。同时，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还对所罗门群岛进行正式访问，向当局介绍其最新的安全协议，即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Doherty 和 Hurst 2023）。作为回应，所罗门群岛和中国都对核扩散的风险以及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表示关切。

然而，在当地，《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仍然处于神秘状态，只有中国

和所罗门群岛两国政府掌握其具体内容。根据2023年2月进行的非正式采访，所罗门群岛民众并不了解该安全协议的全部内容，因为最终条款从未对外发布，这种情况与2017年签订的《所罗门群岛 - 澳大利亚安全条约》不同。协议内容的保密性引发的恐惧有：该国屈服于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会进而破坏国家民主进程、原则和机制（所罗门群岛全国妇女委员会《消歧公约报告》2023）。言论自由受到威胁的证明之一，是2022年5月安全协议签署后，媒体被禁止报道中国代表团与所罗门群岛政府的会面（国际记者联盟 2022）。

另一些观点认为，签署该安全协议并非必要，因为该国并未面临外部安全威胁，而是存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高失业率、商品和服务交付不力、政府治理和执法不善、以及腐败增加等。而这些问题均可以通过健全的政策和立法得到更好的解决（受访者 2023）。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向警察提供枪支和其他战术训练以平息骚乱，可能会成为一种用来镇压那些要求政府承担责任的民众的有效手段，因为在这个国家，近年来的公众抗议和示威活动已经受到大量警察管制和例行镇压（Aqorau 2022）。

另一位受访者（2023）表示，由于没有与公众进行有效协商，安全协议可能是本地精英谋求自身利益并将之合法化的一种手段，并为政客及其亲中国的朋党提供保护，使其免受所罗门群岛人民日渐增长的抵抗情绪的影响。然而，有其他受访者（2023）认为，安全协议及随后在该国开展的警察和国防能力建设是及时的，因为可以迅速应对持续的骚乱，这些破坏活动会导致群众丧生和经济活动损失。总而言之，安全协议及其随后的事态发展在公众中引起了诸多猜测，这种猜测在阿福加（Afuga）于2022年4月18日在Yumi Tok Tok论坛上发帖所引发的反应中可见一斑，该论坛设立在Facebook平台上，发帖内容主要围绕所罗门群岛国内问题。

2.2. 关注《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对妇女、和平和安全的影响

《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2017-2021》清楚地概述了支持妇女参与和平建设和安全的关键因素，包括：

- （1）参与——在各个层面扩大妇女在和平与安全中的参与、代表和决策。
- （2）保护——保护妇女的人权，使其免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威胁。
- （3）预防——所罗门群岛积极预防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冲突和暴力。
- （4）恢复、康复与和解——在所有发展和和平建设活动中重视妇女、女童的

优先事项和权利(所罗门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 2017, 第7页)。

2020年,所罗门群岛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该战略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并尊重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2017-2021》包括的所有内容(所罗门群岛政府 2020, 第22页)。

与所罗门群岛一样,中国也是《消歧公约》的缔约国,并一直就“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和保护妇女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进展”定期提交执行公约的报告(蔡一平、于音 2022)。中国还建立了打击性暴力的框架,并报告其在遵守包括普遍定期审议(UPR)在内的联合国人权机制、履行人权义务的情况(蔡一平、于音 2022)。最近,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未来十年(2021-2030年)的妇女和儿童发展纲要,涵盖了妇女在健康、教育和经济等方面的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3)。自2015年以来,中国致力于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号决议,在逐步削减军费、裁军、增加联合国妇女维和人员数量、参与打击贩卖妇女和女童等方面取得了进步(郭、韩 2022, 第284-292页)。

尽管中国做出了上述承诺,但在《中国-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起草和制定过程中,并未咨询该国主要妇女组织的意见。负责该协议制定的外交与对外贸易部(MFAET),警察、国家安全和惩教部(Ministry of Police,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rrectional Services, MPNSCS)等部门,也没有与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部咨询并听取建议。这表明尽管在国家框架中规定要向妇女咨询,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落实。中国对“妇女、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也没有在该安全协议中得以体现。在签署协议后,该国所有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总机构妇女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NCW),与所罗门群岛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Solomon Islands, TSI),对该协议不透明的谈判方式提出担忧,因为它完全没有征求来自妇女、青年、儿童或残障人士群体的意见(Podokolo 2022)。这些担忧与蔡一平和于音在前述报告(2022)中提出的问题相呼应,即中国外交政策有时会以“不干涉原则”的名义,将妇女权益让渡给其他优先事项。

同样,所罗门群岛妇女无论在骚乱冲突期间或冲突之后的和平建设和安全努力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安全协议由于缺乏与妇女的协商沟通,这个重要的历史传承被削弱了。这个安全协议,重复了过去的老路,并强化了所罗门群岛妇女总是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的看法。例如,政府代表告知所罗门群岛妇女委员

会，不鼓励该委员会就安全协议与媒体接触（受访者 2022）。这种压制言论自由的细微表现，也被指是与中国相关（大赦国际 2022）。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向警察提供枪支和弹药，使其实现装备军事化。澳大利亚对中国援助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Royal Solomon Islands Police Force, RSIPF）做出了反应，共提供 60 支 MK18 步枪和 13 辆车辆，其中一些将配备给新成立的贵宾移动保护小组（Maka' a 和 Wright 2022）。所罗门群岛最近的历史表明，因警察和普通人持有枪支导致了针对平民的暴行，对妇女和儿童产生了严重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种族对抗的紧张局势中，“各部门的警察被指控侵犯人权”（大赦国际 2000：第 9-16 页）。在法律和秩序崩溃期间，多个地方的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分子的枪口威胁下遭到强奸（Fangalasuu 等 2011，第 19-28 页）。

在区域援助所团行动初期，所罗门群岛在枪支大赦活动中已收缴并销毁了近 4000 件武器。最近，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加快了以建立社区关系为基础的社区警务计划，社区协助参与维护和平与安全，防止非法活动发生（Denoon 2014, RSIPF 2016）。枪支的重新使用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他们担心当局可能批准使用枪支来镇压民众，并忧心可能再次引发暴动。反对派领导人担心，所罗门群岛可能正走上军事化国家的道路，而该国的真正问题是缺乏健全的经济政策，这是枪支措施无法解决的（Kusu 2022）。然而，索加瓦雷总理对这些援助表示欢迎，声称这是“保护该国所有人民生命、福利、自由和财产”的责任（Maka' a 和 Wright 2021）。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转移了人们对该国各种紧迫问题的关注，包括妇女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政府当局、反对派团体和一些省级政府之间的政治争斗，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主导了公众舆论，从而掩盖了该国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匮乏，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恶化且不足，无法支撑人员和市场流动，大规模城市移民和失业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妇女和边缘群体的困境。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妇女将本国和中国的合作同太平洋运动会基础设施建设和警察行动联系在一起，但对其更广泛的影响认识有限。2023 年 7 月 7 日，社交媒体平台 Yumi Tok Tok 论坛的一则帖子引起关注，内容指出，中国用于太平洋运动会综合体建设的 5 亿所罗门群岛元（SBD）可能是中国的优惠贷款，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赠款。政府媒体从未完全披露其真实状况，引发了人们对子孙后代可能承受还款影响的担忧。同时，针对中国警察在驻地周边社区

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功夫培训的宣传，也引发了评论，询问这是否属于安全协议实施的内容（受访者 2023）。在这个国家中，15 岁至 49 岁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 64%（国际冲浪救援组织 2021），这种培训看似为妇女赋权，但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忽视了施暴者对妇女根深蒂固的偏见。此外，妇女生育健康仍未得到优先考虑；孕产妇死亡率很高，宫颈癌和乳腺癌是目前妇女的主要死因。所罗门群岛孕产妇死亡率是澳大利亚的 17 倍，宫颈癌死亡率是其 11 倍（国际冲浪救援组织 2021）。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反应非常缓慢。

所罗门群岛因与中国的新关系而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那么，像澳大利亚这样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的传统伙伴，在向所罗门群岛提供安全援助中，是如何让妇女参与进来的？了解这一点是很有用处的。下一章节将讨论这些内容。

2.3. 比较澳大利亚对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考虑

截至 2021 年，澳大利亚就推动所罗门群岛性别平等发展投入了 3480 万美元。这些资金通过区域性机构、联合国机构、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等渠道进行分配（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16）。在随后的几年中，澳大利亚对该国妇女的援助主要集中在消除暴力，提升妇女领导力、决策权上，这些项目是在“太平洋妇女塑造太平洋发展（Pacific Women Shaping Pacific Development）”（现已被“太平洋妇女领导（Pacific Women Lead）”所取代）框架下进行的（Caso 和 Pollard 2023，第 3 页）。

目前，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③性别平等的承诺包括“结束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促进妇女的经济赋权、提升妇女的领导力、增加妇女和女童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和影响力，包括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服务，并实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23）。澳大利亚《2022-2031 年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包括四个重要目标，即：

- （1）支持妇女和女童有意义地参与冲突预防及和平进程，并满足其需求；
- （2）减少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 （3）支持复原、危机反应、安全、法律和司法等努力，以满足所有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和权利；
- （4）展示对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领导力和责任感（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21)。

这一国家行动计划将通过各部门和各机构在伙伴国的项目中实施。

澳大利亚一直以其作为所罗门群岛的主要合作伙伴而自豪，他们扮演了推动当地性别平等和“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角色。尽管澳大利亚对妇女、和平与安全做出了书面承诺，但这些承诺在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2017年安全条约中并未得到体现，协议内容未提及联合国安理会1325号决议或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Caso和Pollard 2023, 第3页)。在这些表现上，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做法完全相似。一位受访者表示，在澳大利亚主导干预2021年骚乱时，也没有关注性别问题。尽管澳大利亚对“妇女、和平与安全”作出承诺，这可以被视为支持制定政策来解决家庭暴力，提拔妇女在警察部队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并通过赋权妇女机构以机构参与的方式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但涉及军事安全议题时，他们并没有为妇女提供机会，使她们在谈判桌上拥有一席之地。同时，澳大利亚未经协商沟通就为所罗门警察提供颇有争议的武器援助，也将妇女降于边缘位置。澳大利亚与中国为确保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的做法如出一辙。

本文最后一章将讨论在《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下一些可能的机会。

3. 促进妇女、和平与安全的机会

前文详细阐述了所罗门群岛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可能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促成了该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随后双方签署了安全协议。该协议签署后，所激发的反应迅速升级，导致了中国与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 and 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这些政治斗争对一直存在的妇女、和平与安全承诺的影响，则表现为在此过程中几乎未考虑妇女的声音。尽管如此，这也为所罗门群岛扩大妇女在“妇女、和平与安全”中的声音创造了机会，并提供替代的外交政策和指导方针，即致力于满足社会需求，并促进公平、性别敏感、合乎道义的可持续发展。

本章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1) 促进妇女参与国家安全和安全协议的讨论；(2) 建立并加强与中国的积极的外交关系，促进妇女发展；(3) 获得外部支持，解决导致本国内部争端的根源问题，从该地区日渐加剧的地缘政治中获益；(4) 加强

国家安全政策，确保所罗门在该地区不稳定的形势下取得最佳成果。

3.1 促进妇女参与国家安全和安全协议的讨论

首先，所罗门群岛妇女应继续要求有意义地参与国家安全协议实施的讨论。《所罗门群岛国家安全战略》和《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为妇女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对政府实施这些计划问责，使妇女的声音在国家安全层面得到倾听。同样，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框架，及其《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译者注：中国目前尚未制定《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也为所罗门群岛妇女提供了寻求和获得支持的机会，从而完善和实施所罗门群岛本国《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此外，可以敦促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女权主义外交政策，使“国家拥有和平建设的手段，推动性别正义和妇女赋权，将其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Caso 和 Pollard 2023，第4-5页）。这种外交政策在决策时将考虑到外交政策的结果对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影响，从而减少使用军事手段。鉴于妇女在所罗门群岛建设和平努力中的作用，妇女应被视为知识拥有者，她们对关键安全决策的贡献不应被忽视。

3.2. 建立与加强与中国的积极外交关系，促进妇女发展

尽管谈及所罗门政府与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安全协议，相关讨论都充斥着忧心忡忡，但这两项承诺都可能成为寻求额外援助的机会，以提高所罗门的经济利益，并改善与妇女相关的基础设施。澳大利亚已经对所罗门群岛妇女发展作出了承诺，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有益的补充，并且，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主要参与者的经验也值得所罗门群岛借鉴，中国可以为所罗门群岛的政策实施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援助，从而为妇女就业、创业以及获得信贷和金融服务创造机会。中国驻霍尼亚拉大使馆已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妇女代表举行会议，介绍中国妇联的职责，并探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受访者 2023）。同样，对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的大规模投资，将使人们——特别是妇女，更容易获得各种便利，包括健康、教育、司法、市场和其他关键服务。此外，妇女还可以从中国数字技术的进步中受益，以保护她们免受网络欺凌和拐卖等新威胁，并从中国的医学进步中获益，支持妇女健康设施和类似领域发展。

3.3. 从地缘政治局势中受益

自与中国建交及签署安全协议以来，所罗门群岛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已成为其他世界大国关注的焦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加强了多部门联动的支持，包括为太平洋运动会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所罗门群岛政府 2022）。美国和英国重新激活了与所罗门群岛延续几十年的合作关系，美国增加了新的投资并重开大使馆；同样，英国也扩大了双边合作领域，包括在贸易方面开展全新合作的前景（所罗门政府外交与贸易部 2023）。这些变化带来的承诺为改善该国状况提供了机会。所罗门群岛政府坚持“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的形势（所罗门政府外交与贸易部 2022）。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为大力发展本国的卫生、基础设施、教育、投资和就业等方面的需要而寻求支持，并为社会发展获得常规性援助，这可能有助于解决导致该国内部动荡的根源。在安全方面，政府会将其关注范围扩大至《国家安全战略》中所涵盖的一系列安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气候变化、卫生安全、免受外国干预的国家安全、边境安全、种族冲突、跨国犯罪、网络威胁、恐怖主义、土地争端、政治和社会动荡、害虫侵袭、腐败、失业、外国人涌入、环境安全和经济安全等（所罗门群岛政府 2020）。然而，这些工作需要格外谨慎地进行，要接纳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社区团体，并尊重所罗门群岛民主的价值观、原则和制度。

3.4. 加强安全政策的实施

自《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和《所罗门群岛国家安全战略》等关键安全政策颁布以来，所罗门群岛面临着这些安全协议和向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供应武器所带来的新的安全问题。因此，该国现在应该对这些政策进行修订，以指导新任务的开展，确保民众受益并得到保护。《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2017-2021 年）》需要进行修订，当务之急是纳入确保妇女积极主动参与和考虑国家安全事务的条款。同样，鉴于所罗门群岛目前向警察提供枪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而且该地区军火扩散引发担忧等现实，该国应限制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枪支，防止对合法行使抗议权的民众滥用武器。该国已经承认关于核不扩散的国际和地区性条约与协定，要坚定不移地履行其在相关协议中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南太平洋无核区拉罗通加条约》（Rarotonga Treaty on the 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 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 等(所罗门政府外交与贸易部 2016)。此外, 政府履行其职责时应该符合民众的利益, 不损害国家主权。

结语

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视角审视《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可以发现, 所罗门群岛妇女尚未将此事及其对她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联系起来, 而是对其实施方式表示担忧。总而言之, 尽管政策中有相关规定, 但在国家安全讨论中并没有出现妇女的声音, 也未承认妇女在和平建设和安全努力中的领导作用, 而且军备供应引发了人们对枪支可能像以往那样被滥用于普通民众的担忧。虽然澳大利亚依然是所罗门群岛最重要的双边伙伴, 但其最近的军事化做法, 包括所罗门群岛警察军事化, 参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等行为仍然令人担忧。所罗门群岛妇女和政府可以探索从这种形势中受益的方法, 包括让政府和外交伙伴为实施性别平等和“妇女、和平与安全”框架承担起责任, 让妇女参加讨论, 并与中国合作, 通过与妇女组织磋商合作, 共同促进妇女发展。鉴于当前各个世界大国对该国的兴趣和采取军事化手段的风险, 所罗门群岛必须谨慎行事, 以确保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最弱势群体不会进一步被边缘化。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加剧的局势下, 所罗门群岛是否有能力开辟自己的道路, 尚有待观察。

(翻译: 赵瑾娜、校对: 冯媛、核稿: 张玉婷)

致谢

本文作者诚挚感谢为这项研究提供宝贵意见的相关人士。对你们的贡献不胜感激。

注释

① 皮金语 (Pijin) 是英语和当地方言的混合体。所罗门群岛皮金语是三种美拉尼西亚简化语之一 (另外两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克皮金语和瓦努阿图的比斯拉马语), 它们或多或少是 19 世纪初太平洋贸易术语的直接分支。

② 所罗门群岛的密克罗尼西亚人是 1950 年代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 重新定居在所罗门群岛的基里巴斯人的后裔。主要定居点位于所罗门群岛西部的瓦吉纳和提香娜群岛 (Tabe 2011, 第 20 页)。

③ 印太地区 (Indo-Pacific Region) 这一术语是美国在对抗中国战略中的新地缘战略名称。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下建立了关系, 对话重点是海上合作, 并解决印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健康问题。这种关系最近有所加强, 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Smith 2021)。

参考文献

美国广播公司 (ABC)。2022 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新西兰广播。(‘China and Solomon Islands sign security pact’ . [online] Radio New Zealand.) <https://www.rnz.co.nz/news/world/465534/china-and-solomon-islands-sign-security-pact> (2023 年 3 月 3 日访问)

B. 阿夫加 (B. Afuga)。2023 年。《索加瓦雷与中国的秘密军事协议》。【脸书页面】Yumi Tok Tok 论坛。2023 年 4 月 2 日。(Sogavare’s military deal with China-Secrecy [Facebook Post] Yumi Tok Tok Forum. 2nd April 2023.)

ACE 项目。2014 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工具包：可持续发展教育导论》。(ESD Toolkit: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aceproject.org/main/english/es/esd01.htm> (2023 年 4 月 20 日访问)

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2000 年。《所罗门群岛：被遗忘的冲突》。大赦国际索引：ASA 43/05/00，第 9-16 页。(Solomon Islands: A forgotten conflict AI Index: ASA 43/05/00. [online], pp. 9-16)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43/005/2000/en/> (2023 年 5 月 5 日访问)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2022年。中国报告。 <https://www.amnesty.org/en/location/asia-and-the-pacific/east-asia/china/report-china/> (2021年4月21日访问)

T·阿克劳(T. Aqorau)。2022年。《对所罗门群岛安全的再思考》，载于《发展政策博客》。(‘Rethinking Solomon Islands Security’ 。[online]. Devpolicy Blog.) <https://devpolicy.org/rethinking-solomon-islands-security-20220404/> (2023年5月4日访问)

T·阿克劳(T. Aqorau)、张登华(音译)。2019年。《所罗门群岛的外交转变：与台湾地区和中国的关系》，载于罗伊研究所出版的网络期刊《译介者》。(‘Diplomatic switch in Solomon Islands: Relations with Taiwan or China’ [online]. Lowy Institute - The Interpreter.)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iplomatic-switch-solomon-islands-relations-taiwan-or-china> (2023年5月4日访问)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日期不详。《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Australia-Solomon Islands Bilateral Security Treaty.) <https://www.dfat.gov.au/geo/solomon-islands/bilateral-security-treaty> (2023年4月20日访问)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2022年。《所罗门群岛国家简报》。(Solomon Islands Country Brief.)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2021年。《澳大利亚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2021-2031年》。(Australia’ s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2021-2031)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australias-national-action-plan-on-women-peace-and-security-2021-2031.pdf> (2023年5月5日访问)

蔡一平、李英桃。2021年。《从性别角度看全球中国》，载于 IDEES。第52期。“世界危机前的中国”。(Global China from a Gender Lens, IDEES. No. 52. “China before a World in crisis” .) <https://revistaidees.cat/en/global-china-from-a-gender-lens/> (2023年5月2日访问)

蔡一平、于音。2022年。《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对性别影响的分析框架》。苏瓦：DAWN。(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the Gender Impact of China’ s Global Engagement in the Global South. Suva: DAWN.)

F·卡索(F. Caso)、P·波拉德(P. Pollard)。2023年。《和平建设与女权主义

外交政策：澳大利亚能否重建与所罗门群岛的关系？》，载于《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联盟》第11期，第1-4页。（‘Peacebuilding and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Can Australia rebuild relations with Solomon Islands?’ [online] Australian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coalition: issue number 11. pp. 1-4）<https://iwda.org.au/resource/peacebuilding-and-feminist-foreign-policy/>（2023年4月9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Solomon Islands, CBSI）。2021年。《年度报告》第2页。（Annual Reports. [online]. p. 2. <https://www.cbsi.com.sb/publications/annual-report/>（2023年4月20日访问）

A. · 查普曼等（Chapman, A. et al.）。2021年。《气候风险，国家概况：所罗门群岛》。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第1-2页。（‘Climate Risk, Country Profile: Solomon Islands’ [online] Washington: World Bank Group, DC. p.p1-2.）<https://climateknowledgeportal.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country-profiles/15822-WB-Solomon%20Islands%20Country%20Profile-WEB.pdf>（2023年2月4日访问）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与所罗门群岛政府关于向所罗门群岛部署警察、武装部队和其他人员的基础协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Solomon Islands Concerning the Basis for Deployment of Police, Armed Forces, and other Personnel to Solomon Islands.）<http://www.austlii.edu.au/au/other/dfat/treaties/ATS/2018/14.html>（2022年12月访问）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2021年。《让澳大利亚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更强大，更有影响力》。（Australia Stronger and More Influential in a Contested World. [online] Foreign Minister of Australia.）<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penny-wong/media-release/making-australia-stronger-and-more-influential-contested-world>（2023年4月17日）

D. · 德农（D. Denoon）。2014年。《所罗门的枪支特赦：令人惊叹的成果》。（Solomon’s guns amnesty a stunning achievement）

B. · 多赫蒂（B. Doherty）、D. 赫斯特（D. Hurst）。2023年。《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潜艇交易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载于《卫报》。（What is the AUKUS submarine deal and what does it mean? [online]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mar/14/what-is-the-aukus-submarine-deal-and-what-does-it-mean-the->

[key-facts](#) (2023年5月2日访问)

方加拉素, 等 (Fangalasuu et al)。2011年。《Herem kam : 这是我的故事。妇女向所罗门群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的意见书》。(Herem kam: story blong mifala olketa mere. Women' s Submission to the Solomon Island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https://www.ictj.org/sites/default/files/Solomon-Islands-TRC-Submission-Sept-2011.pdf> (2023年4月21日)

D. · 盖伊 (D. Gay)。2016年。《所罗门群岛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联合国经济社会部。CDP 背景文件第31号。第5-7页。(Productive Capacity and Trade in the Solomon Islands. [onlin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CDP Background Paper No. 31. pp.5-7.)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publication/CDP-bp-2016-31.pdf> (2023年2月4日访问)

N. · 乔治 (N. George)。2018年。《性别、安全和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支点：停滞不前和根基不牢》，载于《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第73卷第3期，第213-218页。(Gender, Security and Australia' s Pacific Pivot: Stalled Impetus and Shallow Root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 73 (3) pp. 213-18)

N. · 乔治 (N. George)。2021年。《所罗门群岛部署：澳大利亚必须履行对妇女的义务》，载于罗伊研究所出版的网络期刊《译介者》。(Solomon Islands deployment: Australia must meet obligations to women. [online]. Lowy Institute – The Interpreter.)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solomon-islands-deployment-australia-must-meet-obligations-women> (2023年4月2日访问)

郭延军、韩志立。2022年。《通过预防性外交实现持久和平》，载于《亚洲区域合作研究》第6卷，第284-292页。(Achieving sustaining peace through preventive diplomacy. [online]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Studies. Vol. 6. pp. 284-292)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epdf/10.1142/11868> (2023年5月12日访问)

国际记者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2019年。《所罗门群岛媒体被禁止报道中国部长访问》。(Solomon Islands media restricted from attending China ministerial visit.) <https://www.ifj.org/media-centre/news/detail/category/press-releases/article/solomon-islands-media-restricted-from-attending-china-ministerial-visit.html> (2023年4月18日访问)

R. · 伊罗加 (R. Iroga)。2020年。《转向中国使所罗门群岛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载于《所罗门群岛商业杂志》(网络版)。(China switch puts Solomon Islands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Online] Solomon Islands Business Magazine Online.) <https://sbm.sb/china-switch-puts-si-on-the-right-side-of-history/> (2023年4月20日访问)

T·卡布托拉卡(T. Kabutaulaka)。2022年。《中国-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与大洋洲影响力竞争》,载于《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杂志》。(China-Solomon Islands Security Agreement and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in Oceania. [onlin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gjia.georgetown.edu/2022/12/02/china-solomon-islands-security-agreement-and-competition-for-influence-in-oceania/> (2023年5月6日访问)

G·凯其亚(G. Kekea)。2022年。《所罗门官员表示需要与中国合作来保护“国内安全”》,载于《卫报》。(We needed China deal to protect ‘domestic security’, says key Solomon Islands official. [online]. The Guardian.)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n/14/we-needed-china-deal-to-protect-domestic-security-says-key-solomon-islands-official> (2023年6月3日访问)

F·库苏(F. Kusu)。2022年。《沃尔猛烈抨击澳大利亚对所罗门群岛提供枪支》。所罗门群岛广播公司。(Wale slams Australia’s guns supply to Solomon Islands. [online] Solomon Islands Broadcasting Cooperation (SIBC) Online.) <https://www.sibconline.com.sb/wale-slams-australias-guns-supply-to-solomon-islands/> (2023年6月2日访问)

P·利盖乌拉(P. Ligaiula)。2022。《所罗门官员表示需要与中国合作来保护国内安全》。太平洋群岛联合新闻社。(We needed China deal to protect domestic security, says key Solomon Islands official. Pacific Islands News Association.) <https://pina.com.fj/2022/06/14/we-needed-china-deal-to-protect-domestic-security-says-key-solomon-islands-official/> (2023年4月23日访问)

G·玛卡阿(G. Maka’a)、S·怀特(S. Wright)。2021年。《随着竞争升级,中国和澳大利亚向所罗门群岛警方提供装备》。自由亚洲电台。(China, Australia give equipment to Solomon Islands police as rivalry escalates. [online]. Radio Free Asia.)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pacific/solomons-11042022133221.html#:~:text=China%20and%20U.S.%20ally%20Australia,chaos%20only%20two%20decades%20ago> (2023年4月21日访问)

L. · 迈兹兰 (L. Maizland)。2023 年。《为何中国与台湾岛的关系如此紧张》。国际关系委员会。(Why China-Taiwan relations are so tense. [onlin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taiwan-relations-tension-us-policy-biden> (2023 年 8 月 9 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中国敦促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核废料处置采取负责任的态度》。https://www.fmprc.gov.cn/eng/zxxx_662805/202205/t20220526_10693195.html (2023 年 5 月 26 日访问, 网页链接已失效。)

G. · 纳瑙 (G. Nanau)。2015 年。《所罗门群岛政治应超越“抢椅子游戏”》, 载于《圆桌会议》第 104 卷第 4 期, 第 441-450 页。(Moving Beyond the Musical Chairs of Solomon Islands Politics. The Round Table, 104(4), pp. 441-450.) <http://repository.usp.ac.fj/8581/1/moving-beyond-the-musical-chairs-of-solomon-islands-politics-20151110.pdf> (2023 年 4 月 20 日访问, 网页链接已失效。)

作者不详。2022 年。《所罗门群岛: 索加瓦雷否决不信任动议》。新西兰广播。(Solomon Islands: Sogavare defeats no-confidence motion. [online] Radio New Zealand. <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57372/solomon-islands-sogavare-defeats-no-confidence-motion> (2023 年 4 月 3 日访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2018 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格局中的作用》。(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landscape.) <https://www.oecd.org/finance/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in-the-global-trade-investment-and-finance-landscape.pdf> (2023 年 4 月 24 日访问, 网页链接已失效。)

M. · 波多科洛 (M. Podokolo)。2022 年。《妇女领导人希望取消安全条约》) 海岛太阳新闻社。(‘Women leaders want security treaty cancelled’ [online]. Island Sun Online.) <https://theislandsun.com.sb/women-leaders-want-security-treaty-cancelled/> (2023 年 8 月 23 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 (Royal Solomon Islands Police Force, RSIPF)。2016 年。《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与社区合作防止非法活动》。(‘RSIPF Working with the Community to Prevent Unlawful Activities’ . [online] Royal Solomon Islands Police Force-Polis blo iu.) <https://www.rsipf.gov.sb/?q=node/2345#:~:text=Police%20>

[work%20together%20with%20the,in%20maintaining%20law%20and%20order](#) (2023 年 4 月 21 日访问)

S. · 萨德 (S. Sade)。2021 年。《苏伊达尼总理呼吁马莱塔自治》，载于《所罗门时报》。(‘Premier Suidani Calls for Self-Autonomy for Malaita’ . [online] Solomon Times Online.) <https://www.solomontimes.com/news/premier-suidani-calls-for-self-autonomy-for-malaita/11345> (2022 年 12 月 2 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政府。2020 年。《所罗门群岛国家和平建设政策》。(Solomon Islands National Peacebuilding Policy.) <https://solomons.gov.sb/wp-content/uploads/2020/02/SI-National-Peacebuilding-Policy.pdf> (2023 年 2 月 16 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政府。2021 年。《所罗门群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更多合作文件，深化双边关系》。(Solomon Islands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epened Relations with the Signing of Mor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https://solomons.gov.sb/solomon-islands-and-peoples-republic-of-china-deepened-relations-with-the-signing-of-more-development-cooperation/> (2023 年 2 月 5 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政府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 (SIG-Ministry of Women, Youth,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 MWYCFA)。《2017-2021 年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霍尼亚拉：所罗门群岛政府。第 12 页。(Solomon Islands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National Action Plan 2017-2021. Honiara: SIG. p. 12.) <https://solomons.gov.sb/wp-content/uploads/2020/02/Women-Peace-and-Security-National-Action-Plan-2017-2020.pdf> (2022 年 11 月 5 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国家通讯社 (SIG-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Press)。2022 年。《索加瓦雷欢迎澳大利亚对 2023 年太平洋运动会的援助》。所罗门群岛政府。(Sogavare Welcomes Australian SPG2023 Assistance. Solomon Islands Government) <https://solomons.gov.sb/sogavare-welcomes-australian-spg2023-assistance/> (2023 年 6 月 4 日访问)

S. · 史密斯 (S. Smith)。2021 年。《印度 - 太平洋四方会谈：要了解什么》。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Quad in the Indo-Pacific: What to Know’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in-brief/quad-indo-pacific-what-know> (2023 年 8 月 28 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政府外交和外贸部 (Solomon Islands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External Trade, SIG-MFAET)。2016年。《所罗门群岛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Solomon Islands Ratifies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http://www.mfaet.gov.sb/media-center/press-releases/foreign-affairs-news/383-solomon-islands-ratifies-comprehensive-nuclear-test-ban-treaty.html> (2023年4月24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议会反对党(Solomon Islands Parliamentary Opposition)。2019年9月15日。《基尼洛里亚对总理感到失望,称没有必要急于做出转换决定》。(‘Kenilorea disappointed with PM saying there’s no need to rush switch decision’. [Facebook Post] Solomon Islands 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Group Page.) (2023年6月5日访问)

所罗门群岛政府(Solomon Islands Government)。2021年。《高层访问反映了“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的政策》。(High-Level Visits Reflect ‘Friends to All, Enemy to None’ Policy.) <https://solomons.gov.sb/high-level-visits-reflect-friends-to-all-enemy-to-none-policy/> (2023年4月24日访问)

南太平洋委员会(South Pacific Council, SPC)。日期不详。《所罗门群岛统计报告》。太平洋社区。(Solomon Islands Statistics. Pacific Community.) <https://sdd.spc.int/sb> (2023年3月5日访问)

国际冲浪救援组织(SurfAid)。2021年。《所罗门群岛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for women in Solomon Islands.) <https://surfaid.org/surfaid/posts/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for-women-in-solomon-islands> (2023年5月28日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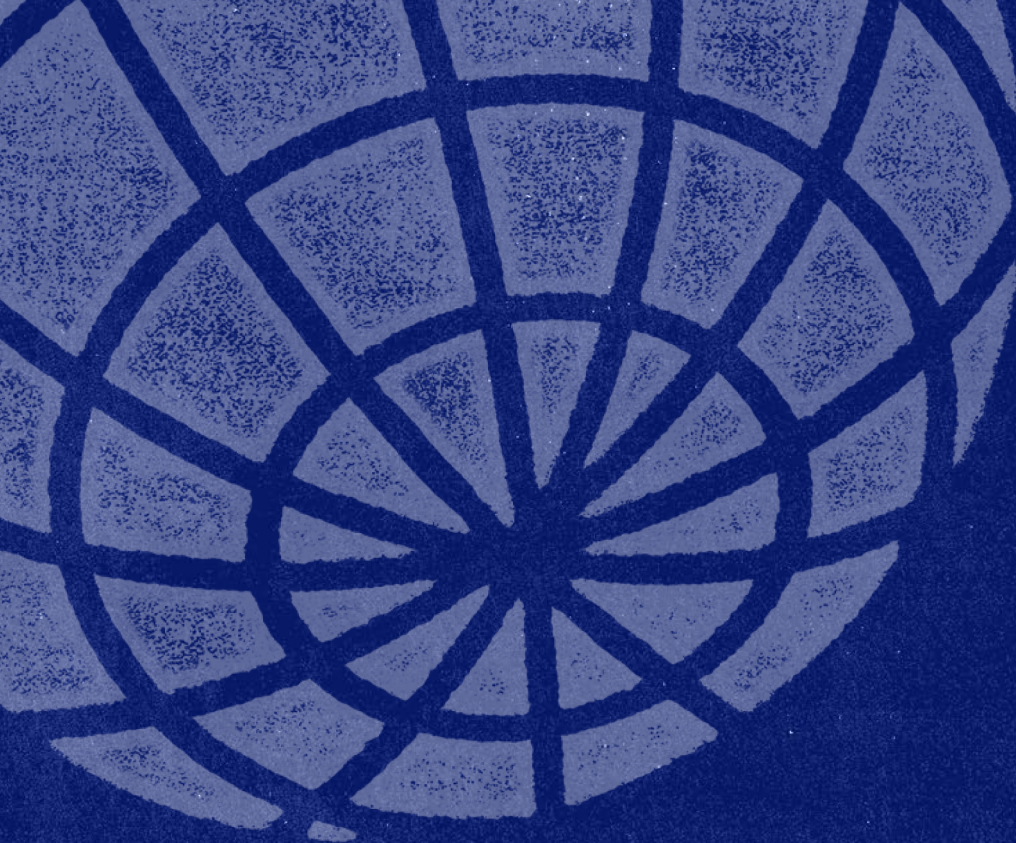
T·塔贝(T. Tabe)。2011年。《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社区的研究》。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A study of the I-Kiribati community in Solomon Island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https://scholarspace.manoa.hawaii.edu/server/api/core/bitstreams/71c69704-c293-4bba-a258-a33236249612/content> (2023年3月7日访问)

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 C.)。2023年7月7日。《所罗门群岛体育场——赠款或优惠贷款》。《Yumi Tok Tok 论坛》脸书页面。2023年6月4日。(‘Solomon Islands Stadium – gift or concessional loan’. [Facebook Post]. Forum, 4 June 2023.)

新华社。2021年。《中国强调妇女和儿童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http://english.www.gov.cn/policies/latestreleases/202109/27/content_WS61516ea9c6d0df57f98e0f0f.html (2023年4月20日访问)

附录1 访谈问卷

1. 你对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有何了解？此协议对地区和国际有何影响？
2. 你对政府 / 相关政府部门执行本协议的情况有何分析？
3. 你是否了解安全协议中支持 / 涉及本国妇女、和平与安全的任何条款 / 活动？
4. 该协议对所罗门群岛有哪些消极和积极影响？
5.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促进这项协议对妇女、和平和安全产生积极影响？
6. 你是否了解其他发展合作伙伴对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 软实力参与中的性别问题

高文·克尔卡尔 (Govind Kelkar)

丽都·阿格瓦尔 (Ritu Agarwal)

引言

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人们越来越关注软实力的重要性及其在塑造全球南方对中国文化、政体和经济的正面感知中的强大作用。中国是如何展现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观、繁荣的经济发展和吸引力，从而使其他国家倾向于接受中国的价值观和实力，且减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反对意见？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借助软实力参与全球南方事务的做法，试图探索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政策和实践。本文首先简要论述中国软实力的一些显著特征，特别指出了中国参与全球南方事务的主要方式。在这些机制和方法的制定过程中，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这一因素长期缺失。然而，在联合国及世界性会议等多边平台及国家规划中，中国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问题给予了一些政策关注，但这些政策声明很大程度上依然只停留在政策意原上。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性别平等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中国政府网 2021），通过法律、政策等战略性措施倡导妇女的平等权利，确保妇女平等地获得经济资源，参与家庭与社会经济发展，如倡导和支持“男女共担家务”，承担照顾家人等家庭责任（中国政府网 2021）。这类政策声明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创建一个具有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理念的文化经济软实力平台过程中，中国领导层发挥着什么作用？

主要由于本文涉及的范畴有限，我们对中国软实力的构思具有一些局限性。我们的分析没有纳入软实力的两个方面：一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如“非爱不可”（一个津巴布韦的华人华侨爱心妈妈群），以及私营的市场参与者，如华为公司；二是意义更加重大的在全球南方的一带一路倡议。诚然，上述方面令当地群众被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吸引并产生了向往。不过，这种影响需要从公共外交角度进行专门的全面分析。

为了理解中国的软实力，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渠道收集数据：（1）过去二十年来，我们频繁造访中国农村，这有利于我们开展参与式观察；（2）我们定期与泰国亚洲理工学院、印度尼赫鲁大学和中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开展交流；（3）我们系统收集了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综述，包括当地有关女性主义活动和

地缘政治研究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开展实地研究，是因为我们尊重隐私和确保匿名，谨慎地建立起了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们仔细分析了自身田野调查笔记及当地媒体的语境分析和报道。本研究一以贯之的主要论点是：社会性别是理解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而这一维度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因为以往对中国的软实力的研究中，往往对其加以男性化的解读。

1. 定义中国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在其2011年的研究中描述了两类类型的实力。硬实力是指通过胁迫、威胁和引诱等手段，使他人违背自身最初的偏好和策略而行事的能力（Nye 2011，第11页）。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是“使他人期望达到你的目的”并“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胁迫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Nye 2004，第5页）。约瑟夫·奈的论述揭示了三种软实力的主要来源：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然而在中国，“软实力”一词强调的是文化维度，更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历史、道德、经济治理相结合。中国语境下的软实力不同于约瑟夫·奈的解释。中国的软实力概念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的，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赋能的。在中国，软实力被认为与政治稳定和社会凝聚力相互关联（Repnikova 2022，第52页）。例如，中国媒体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与新市场不断拓展相关，与中国大学不断增长的收入相关。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Pu 2019）。在强调自身成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主动出击和积极回应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热爱和平、不具威胁的形象。这些回应包括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的批评（Edney 2014）。这些信息通过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及智库、研究机构、公关公司等对外传播。这些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定强制性，针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批评意见会时不时地出现或消失在公众视野中（Shambaugh 2015）。

1.1 中国学界对中国软实力的讨论聚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王沪宁分析指出，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一个要素，“其力量来自扩散性”，并认为软实力来自于文化等无形资源。因此，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

是一种权力，或者一种实力，可以影响他国的行为(王 1993)。《光明日报》于 2013 年所发表的文章提到：

作为一个拥有 5000 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中国如果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那么中国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事实上，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软实力”，它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①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中国应控制或影响有关软实力的主流话语。丹尼尔·林奇(2020)指出，软实力的概念很大程度上由西方把控，用以服务其自身议题，因此中国正提出自己的软实力模型，提出要恢复其文明自信，并在世界政治中创造一个面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

2013 年 1 月，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成立，并在过去几年中举办了国家软实力研究工作坊和会议。在最近召开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工作坊上，该中心主任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软实力发展，并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提出要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 cfau.edu.cn)，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中外学者营造更多学术交流的机会。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旨在成为中外社科人文交流的高层平台，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hqu.edu.cn)，重点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确保世界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

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崛起将不会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因为中国经济的腾飞遵循了基于西方的市场价值观。因此，中国必须比以往更加坚定地遵循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观(王义桅 2016)。还有人认为，中国独特的历史遗产及价值观是一股能够挑战西方规范的文明力量。因此，中国不应保持低调，而应努力打造自身国家形象，向世界全面讲述中国故事(Lynch 2020, 第 49 页)。中国的战略政策强调有意识地向世界打造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热爱和平、以人为本、包容自信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软实力正是这一政策的核心(Guo 和 Hua 2007)。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②

应当注意，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用中国

一句古语来说，当“形于中而发于外”。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规划制定中国软实力，且这一中国模式将用于对外宣传中国文化价值观中蕴含的中国力量，这种力量“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与经济和政治互相交织”（李 2008，第2页）。

1.2 通过减贫项目与经济繁荣增强中国的吸引力

作为经济繁荣的典范，特别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脱贫方面，中国一直吸引着全球南方国家。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中国7.7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扶贫减贫工作开展之初，中国曾接受来自世界银行的援助，同时得到了资金投入、知识转让、技术援助等方面的支持，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广泛合作。而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

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惠及发展中国家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在亚洲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乡村基层社区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在非洲地区，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水利基础设施、职业技术学校、社会保障住房、医院等设施。在拉丁美洲地区，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当地民众摆脱贫困，合作设立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等机构。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前身为中国扶贫基金会^③，成立于1989年，是中国扶贫领域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之一，其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已在缅甸、尼泊尔、埃塞俄比亚设立海外办公室。基金会致力于向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和营养食品，重点覆盖母婴儿童，同时提供奖学金，协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开展旅游、商业、小额信贷等项目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当地社区民生。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通过开展能力建设项目，启动贫困妇女职业支持项目，提供牲畜饲养、创办小企业等相关技术培训。2019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向158名尼泊尔贫困妇女提供了每人5万尼泊尔卢比的贷款，旨在通过创收活动改善她们的生活。^④显然，人们认为贫困人口中包含妇女，认为扶贫计划将自动使女性获得和男性同等的福利。然而研究表明这并非事实，男性依然控制且拥有资源，并通过这种扶贫计划获益，而女性依然需要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正如在其他发展项

目中的情况那样(邓肯和李 2001, 克尔卡尔 2016, 联合国妇女署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013)。就尼泊尔而言, 我们没有关于如何确保当地妇女能够从此类项目中受益的详细信息。在争取妇女的资源权利和决策自由方面, 这些扶贫项目采取了只针对妇女的方法。

2. 在中国软实力中纳入社会性别因素

要分析中国软实力的社会性别维度, 我们需要探究在中国的对外宣传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软实力工具中是否关注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问题。我们希望了解, 在中国的国内政策中, 为减少或消除针对妇女的不平等及解决社会性别关系问题制定了何种政策措施, 此类政策措施是如何对外发布或传达的。它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强国和经济强国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2.1 中国革命议程中的女性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持续存在的封建父权社会关系不断加以批判, 并修正政策赋予妇女社会和经济权利, 如财产权、摆脱家庭控制的自由和外出就业的权利等, 举例如下:

早在1948年, 中共中央委员会就颁布法令, 规定以家庭为单位, 不分男女, 统一平均分配土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新的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负有抚养子女的义务, 在继承权和子女监护方面作出了有利于妇女的改变, 削弱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土地改革法》赋予妇女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的权利(详见克尔卡尔 1990)。但上述法律颁布实施后, 妇女自杀或被谋杀案件层出不穷。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鼓励妇女参加劳动, 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一部分。斯泰西(1983, 第214页)指出, “截至1959年, 农村地区共建立了约498万家托儿所和幼儿园及超过360万所食堂”。然而这种情况仅仅维持了几年, 因为当地男性要求“在家吃上热饭热菜”。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展全国性运动, 旨在实现:(1)更加平等的工分评定机制, 包括将“同等工作”重新定义为同等价值的工作, 而非相同的工作;(2)男性分担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3)提倡从妻居, 认为从夫居是传统婚姻实践和家庭结构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宋庆龄, 载于《人民日报》1975; 克尔卡尔 1990,

第124页)。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妇女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女性以男性为标准，提出“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然而有证据表明，妇女在这场“极左”运动中仍处于弱势地位(王政 1997)。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支持下，部分职业妇女组织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变化，要求在经济分配制度中建立男女平等的关系(克尔卡尔 1985，诺兰 1983，山东省妇女联合会 1986)。中国妇女对要求妇女重新安排时间兼顾家务劳动和农业或副业承包生产的政策建议提出了反对。她们对“妇女应做贤妻良母”的传统道德观提出批判，并向政策制定者建议，如果男性能够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责任，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就会享有更加平等的地位(克尔卡尔 1990，第131页)。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王 2013，张等 2015)。

2.2 在全球层面的一贯承诺

中国革命建设之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制定政策，旨在提高妇女地位，打破传统父权结构，消除社会和政治领域对妇女的歧视。历史上这些对社会性别平等关系的关注，是否属于中国为构建双边和多边关系进行的软实力谈判的一部分？在全球层面，中国于1980年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于1995年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签署了《北京行动纲领》。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成果性文件《北京行动纲领》，明确体现了中国为在全球层面实现妇女赋权所作出的努力。大会筹备期间，一些研究人员撰写材料，记录妇女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及妇女为争取在资源、财产和决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会后不久，中国各大学及智库与国际民间社会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性别相关的项目。部分学者指出，妇女研究之所以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国家 and 省市层面落地生根，离不开两股力量的推动：一是妇女运动的推动，试图解决与妇女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二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学者和专业人士，她们就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撰写了有关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李小江和李辉【音译】2003)。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其谋求和平与发展。重要的是,通过联合国中国雇员被选举担任联合国及众多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键职位,中国成功地提升了自身形象。这种隐性力量在中国参加出席国际会议、发表讲话时得到体现。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平台上对社会性别平等的立场保持一致,因为中国政府将这种“话语权力”视为其国际力量的关键(帕尔默 2023)。此外,中国还签署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包括目标5——促进性别平等,以及旨在确保妇女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和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的相关目标。

中国承诺将为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女童提供医疗保健、职业培训、教育投资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新兴世界研究中心 2018)。据报道,中华女子学院为发展中国家妇女开设了在职学历学位项目。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在尼泊尔开展了丰富多样的能力建设项目,培养妇女企业家,促进妇女就业。作为中国和尼泊尔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尼泊尔全国妇女联合会开设了一个广播项目,旨在加强农村地区妇女能力建设。

2020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妇女的“半边天”作用,并提出了以下主张:(1)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歧视、暴力,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2)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消除暴力、歧视、贫困等旧有问题,并在解决性别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上有所作为,提高妇女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代表性。

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中国已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就实现性别平等、维护妇女权利作出承诺(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制定了全面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承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性别平等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充分发挥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半边天’作用”(中国政府网 2021)。在后文中,我们将探讨中国软实力运行机制中对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承诺。

3. 中国软实力的运行机制

3.1 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推动中国软实力战略的重要机制。孔子学院致力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学和文化，成立孔子学院的目的主要是吸引海外学子学习汉语及相关课程，从而弘扬中国文化，并通过中国艺术、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塑造国家形象。2020年6月1日发布的官方报告指出，中国已在162个国家和地区成立541所孔子学院，设立1170家孔子课堂（Repnikova 2022，第11页）。但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作用和职能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解读。部分人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孔子学院视为“学术恶意软件”，认为孔子学院是权力不对等、文化强加的一部分，以软实力理念为名，行政治目的之实（Hartig 2014，Shahlin 2008）。尽管如此，人们仍普遍认为孔子学院有力地推动了大众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然而，孔子学院也面临教学质量、对中国的描述过时以及忽视当地文化背景等问题（詹春燕、卢梦亚 2019）。一般来说，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在海外非华人群体中推广中国语言文化。部分有关亚洲国家孔子学院的现有资料显示，学生学习的内容包括中国语言和文化（如艺术、音乐和传统舞蹈）（Qiao 2024）。虽然我们尚未掌握确切资料，证明孔子学院如何讲授中国文化中有关妇女角色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内容，但我们可以推测，有关妇女权利和社会性别平等的内容并未出现在孔子学院的课堂上。在本文的女性主义分析中，我们注意到，儒家文化中吸纳了有关社会等级制度和妇女家庭义务的内容，这些对妇女的传统性别规训有可能反映在语言文化课程中。

3.2 中国教育的国际化

中国将高等教育视为拓展其影响力范围的工具，既用于增强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又用于确保中国商品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标（Romi Jain 2021）。此外，高等教育通过推广中国文化、汉语言和中华文明价值

观，也可能有助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21世纪初，中国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极具吸引力的国际知识产出和培训中心。1978年至2018年，在华留学生人数从1236人增长至49.22万人(Shi和Hu 2019)。《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显示，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201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和亚洲的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

中国已成为南亚学生重要且极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国。2016年，在华学习的孟加拉国留学生人数达4900人(是该国留学印度人数的三倍)，在华缅甸留学生人数是其留印人数的17倍。目前，在华尼泊尔留学生超过6400人。在华巴基斯坦留学生总数已超18000人，学生学成归国后进入各类公立及私营研发机构工作。目前，为加强文化合作，中国政府将向尼泊尔学生提供100份中国政府奖学金。

耐人寻味的是，自费留学生(包括全球南方国家的自费留学生)的教育资金所得对中国教育部和国内众多高校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虽然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和短期访问者在离开中国后仍对中国保持欣赏之情，但仍有部分人质疑中国将文化和市场逻辑相融合，并批评中国存在教育质量和种族歧视问题(Romi Jain 2018)。

3.3 媒体：中国的对外传播平台

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毛泽东时代，洪若诗(Joshua S. Horn, 1914-1975)的《扫除一切害人虫——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在人民中国：1954-1969》(Away from All Pests: An English Surgeon in People's China 1954-1969)及韩丁(William Hinton 1919-2004)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等书籍和纸媒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发生了重大转变。1996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开始组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主要负责对外发行书籍期刊和运营多媒体内容。

中国通过出版一系列书籍、期刊、杂志搭建起推动交流的知识平台，从而加深海外对中国软实力的认识。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于2009年在湖南成立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以文化软实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心出版发布《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报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等软实力相关学术专著24部，发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国经济崛起为主题的期刊论文400篇。

全国妇联机关刊《中国妇女》(英文)杂志在构建社会主义妇女文化阵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讲述妇女能动性背后故事的场所”,这些故事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女性主义斗争至关重要。《中国妇女》杂志不断引导中国社会了解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致力于改变中国大众看待国内外政治事件的世界观,因而备受关注(王政2010)。

2009年,中国政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中文媒体广播“中国之声”和《环球时报》(英文)(隶属于人民日报社)为重点。截止到20世纪末,新华社海外分社达101个(姜飞、张楠2019),并推出国际新闻栏目。2013年,《中国日报》亚洲版在尼泊尔发刊,《亚太日报》尼泊尔版创刊,由新华社主办。

1978年,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探索国际传播的可能性。1981年,《中国日报》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英文日报,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随后,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及不断增长的国际传播网站逐渐构筑起中国主流媒体“走出去”矩阵。2011年至2016年间,我们多次到访中国,并在故宫等旅游景点注意到,中国年轻女性打扮靓丽,穿着中国女性时装,展示她们的身材和美貌。时尚杂志将其解读为中国现代化时期女性自信的体现(Xu和Ge2016)。这改变了时尚品牌的宣传广告,也带来了女性对作为市场商品的美丽身材的内在渴望。

为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北京逐渐被打造成面向全球视听产业的区域中心。北京四达时代(Star Times)在非洲开展数字广播电视业务以来,已逐步建立起可覆盖数千万用户的庞大网络体系。目前,四达时代已在非洲3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数字电视用户总量达1300万,网络视频用户总量达2700万,社交媒体粉丝总量达1300万,已成为非洲知名视听品牌。中国成功借助软实力向世界讲述混合了中国政治与经济元素的文化,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3.4 体育盛事与博览会

大型活动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中国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也包括频繁举办区域性峰会和多种多样的“一带一路”主题活动。此类峰会及贸易博览会虽耗资巨大,但均面向国际受众,旨在宣传中国的政治理念,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信任。例如,中国举办上海

世博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展现中国在过去六十年中取得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将此类活动作为开展国内教育的平台，向中国公众传递自豪感和“中国的伟大：过去、现在和未来”（Hubert 2017，第17页）。不可否认，此类大型活动也受到部分外国记者和中国青年的批评，批评其采取自上而下的活动组织形式，并限制外国记者报道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级媒体也批评西方记者“不了解真实的中国”（Latham 2009，第34页）。

耐人寻味的是，国内因素也被纳入了中国软实力考量范围之内，尽管这些因素往往比较微妙。规模宏大的世博会和体育盛会向中国民众展示了新中国的强盛。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吸引力及中国强盛的国力将增强中国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胡锦涛主政时期，中国提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文化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自我认同，因此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吸引力。

结论

诚然，中国已实现其软实力目标，即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故事。研究表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成为具有自身文化和政治特色的世界大国，获得了赞赏。中国的软实力战略通过外交支持、投资、高等教育交流和孔子学院给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已成为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学生接受海外高等教育（包括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目的国（Hussain 和 Mehmood 2018）。

尽管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表明，期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自动实现性别平等是不现实的。上述经验反而表明，妇女正在努力解决因性别而处于从属地位，以及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决策过程之外的问题。如果在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包括在减贫项目中还存在着性别盲点，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不改变结构性的父权制，充其量只会让妇女既定的性别地位发生微不足道的变化，象征性地实现非歧视和性别包容，治标不治本。

中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妇女将无法摆脱家庭束缚，所有为构建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都可能无法如愿以偿。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对妇女的规训——妇女要尽职尽责、“宜室宜家”、妇女要恭顺、承担抚育照料之责，这些很可能会强化中国国内及全球南方伙伴国家的传统父权制结构和妇女的不平等。学者对此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看看这些原则是否发生了改变或被替代，包括妇女掌握资源的权利，以及她们是否摆脱了传统家庭制度中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受到的歧视。

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一种将中国呈现为追求性别平等的典范，而另一种则是对妇女持传统看法，将中国妇女置于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使其囿于传统儒家价值观。中国各级妇联积极推动建设文明家庭、平安家庭、和美家庭的国家目标，从化解婚姻和家庭中的矛盾纠纷入手，增强家庭成员协作。互联网、妇女组织、法律服务的新型组合让中国开始创建一种新的家庭模式，其中，妇女承担照顾家庭的大部分责任。在提升妇女社会角色方面，浙江省妇联推动建立妇女儿童服务中心，让妇女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角色和责任。除提供妇女创业和就业指导等基本服务外，妇联还开办了照顾儿童、帮助特殊群体的培训班，促进家庭和谐的家庭教育课程，以及处理婚姻纠纷的心理咨询课程。

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加速，这一现象使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应采取何种策略提高中国的出生率。为提振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四川省近期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允许非结婚的人口给他们的新生儿进行出生登记，引发广泛讨论。四川省有关部门随后澄清，此举并非鼓励非婚生育，而是为了保护未婚先孕群体的权益。

由于中国一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高速增长上，对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问题的关注在中国政治经济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2011年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提供了中国城市职场中存在社会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现象的诸多细节(Fan 2014)。中国尚未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定义对妇女的歧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女性；五位国务委员中目前有一位女性，即谌贻琴，她于2022年秋季履新前为贵州省委书记。

全国人大代表中妇女所占的比例不足25%，而在国际上，女性代表在国家议会中的平均占比为25.9%。女性收入不足男性的70%，但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11)。

尽管中国在国家发展规划中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作出了明确承诺，但其软实力政策并未体现这一点，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目标5。社会

性别问题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议题中一直饱受争议(蔡一平、李英桃 2021)。一些系统性障碍阻碍着社会性别平等及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不公平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企业的攫取、土地与资源掠夺、气候变化、无处不在的父权制和原教旨主义等。

虽然存在着中国社会政治层面对社会性别平等的忽视,但也有证据表明,中国妇女的能动性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全国妇联提出党和国家应支持妇女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利,并严厉打击性别暴力和针对妇女的性虐待(Zing 2014, 克尔卡尔 2016)。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贸易谈判中并未涉及社会性别平等问题。与社会性别平等、妇女和女童权利保障相关的问题被认为可能有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之嫌,从而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⑤相悖。

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国内及国际多边平台的政策声明中致力解决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和边缘化现象。但父权制影响下的社会准则和习俗使这些政策的约束力大打折扣,难以落到实处。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别等级观念和此类社会习俗,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希望近乎渺茫。应当作出的根本性改变包括:(1)不再将实现男女平等视为减贫或经济发展的次要目标;(2)创造能够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策和实践的良好环境,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体系以及贸易谈判中明确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也要求实现男女平等,尊重妇女尊严,在家庭中和治理结构中摆脱大男子主义的态度。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未来是否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取决于妇女的能动性是否不断增强,取决于妇女是否能够直接(而无需通过其家庭及男性户主)获取资源、参与政治决策,还取决于妇女是否能够摆脱暴力、掌控自己的生活。

(翻译:杨欣妍、校对:付蕾、核稿:张玉婷)

注释

- ① 引自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3-07/26/nw.D110000gmrb_20130726_4-15.htm。
2024年2月16日访问。
- ② 引自 <https://www.workercn.cn/255/201907/09/190709111352331.shtml>。
2024年2月16日访问。
- ③ 请参阅其网站：<http://en.cfpa.org.cn>。
- ④ 请参阅其网站：<http://en.cfpa.org.cn/index.php?file=article&cmd=show&artid=242>。
- 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和平共处。

参考文献

-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21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
<https://fegw.sh.gov.cn/type3/20211228/a528ce531dd04f29a842bfd68bb6819c.html>
- S·布拉西斯(S. Brazys)、A·杜卡尔斯基斯(A. Dukalskis)。2020年。《中国的信息机器》，载于《民主杂志》第31卷第4期，第59-73页。(China's message machine.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4) pp. 59-73)
- 蔡一平、李英桃。2021年。《从性别角度看全球中国》，载于 IDEES。第52期。“世界危机前的中国”。(Global China from a Gender Lens, IDEES. No. 52. “China before a World in crisis”。) <https://revistaidees.cat/en/global-china-from-a-gender-lens/>
(2023年2月20日访问)
- 陈良斌。2019年。《新时代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载于《新华日报》2019年7月9日。<https://www.workercn.cn/255/201907/09/190709111352331.shtml> (2023年2月3日访问)
- 陈音颐。2016年。《“女性力量”与中国的流行女性杂志》，载于《国际传播学期刊》第10卷，第2831-2852页。‘Power Femininity’ and Popular Women’s

Magazin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pp. 2831-2852)

中国政府网。2021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软实力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华侨大学举行。<https://www.hqu.edu.cn/info/1212/75690.htm> (2022年10月3日访问)

伊丽莎白·克罗尔(E. Croll)。1978年。《中国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詹妮弗·邓肯(Jennifer Duncan)、李平。2001年。《中国妇女与土地权：海南省东方县妇女土地权利研究》。农村发展研究所，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Women and land Tenure in China: A study of Women's Land Rights in Dongfang County, Haiman Provinc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Seattle, Washington, USA.)

K.·埃德尼(K. Edney)、S.·罗森(S. Rosen)、朱瑛(音译)(Y. Zhu)主编。2020年。《中国特色软实力：赢得感情与思想的中国运动》。伦敦：劳特利奇，泰勒和弗兰西斯出版社。(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Campaign for Hearts and Minds,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K.·埃德尼(K. Edney)。2014年。《中国宣传的全球化：国际力量与国内政治凝聚力》。纽约，帕尔格雷夫·马克米兰出版社。(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Campaign for Hearts and Min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巩育华。2020年。《中国主流媒体“走出去”之路》，载于《群言》第11期。第21-23页。<https://www.mmzy.org.cn/qunyan/jcwz/dxmb/102480.aspx> (2023年3月1日访问)

郭苏建、华世平主编。2007年。《中国外交政策新维度》。英国：列克星敦出版社。第112页。(New Dimens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K: Lexington Books, 2007, p. 112)

F. 哈蒂格(F. Hartig)。2014年。《新旧公共外交的碰撞：以中国及孔子学院为例》，载于《新全球研究》第8卷第3期，第331-352页。柏林。(New Public Diplomacy Meets Old Public Diplomacy: The Case of China and Its Confucius Institutes. New Global Studies; Berlin, 8(3) pp. 331-52)

何嫒、任意。2021年。《结束的2020：过半女性对现状不满意，对未来不乐观》。

2021年1月27日。<https://freewechat.com/a/MzI5MDEwNzMwMQ==/2247488733/1>

贺文萍。2021年。《构建后疫情时代更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https://news.gmw.cn/2021-01/03/content_34513185.htm

胡键。2019年。《软实力研究在中国：一个概念演进史的考察》。<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9049.html> (2022年12月2日访问)

J. · 哈伯特 (J. Hubbert)。2017年。《回到未来：上海世博会的文化政治》，载于《国际文化研究杂志》第20卷第1期，第48-64页。(Back to the Future: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t the Shanghai Exp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 (1) pp. 48-64)

湖南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2009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蓝皮书：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年度报告》(英文版)。

H. · 胡赛因 (H. Hussain)、S. · 马哈茂德 (S. Mehmood)。2018年。《分析中国软实力对巴基斯坦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载于《马来西亚国际关系杂志》第6卷，第47-66页。(Chinese Soft Power Approaches Towards Pakistan: An Analysis of Soc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acts, Malay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pp. 47-66)

R. · 贾因 (R. Jain)。2021年。《中国软实力与南亚高等教育：原因、策略与启示》，载于《劳特利奇亚洲教育与社会研究》)。‘China’ s Soft Power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 Asia: Rationale,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 Routledge Studies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Asia.)

R. · 贾因 (R. Jain)。2018年。《中国在南亚的软实力目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尼泊尔学生的经历》。ETD 档案，1061。(‘China’ s Soft Power Aims in South Asia: Experiences of Nepalese Students in China’ s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 ETD Archive. 1061.) <https://engagedscholarship.csuohio.edu/etdarchive/1061>

姜飞、张楠。2019年。《中国对外传播的三次浪潮(1978-2019)》载于《全球传媒学刊》，转引自《虎嗅》。<https://m.huxiu.com/article/325011.html> (2023年3月6日访问)

K. A. · 约翰逊 (K. A. Johnson)。1983年。《妇女：中国的家庭和农民革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高文·克尔卡尔 (G. Kelkar)。1985年。《家庭联产承包制对中国农村妇女的影响》，载于《经济政治周刊》第20卷“妇女研究评论”，4月27日。(‘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XX, Review of Women’ s Studies, 27 April)

高文·克尔卡尔 (G. Kelkar)。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中国的妇女与土地问题》，载于《中国报道》第26卷第2期，第113-131页。(‘The PRC at Forty: Women and the Land Question in China’ , China Report, Vol. 26, No. 2, pp. 113-131)

高文·克尔卡尔 (G. Kelkar)。2016年。《在抗议与政策之间：中国和印度农村妇女对农地的权利诉求》。(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论文)，2016年第10号，日内瓦。(‘Between Protest and Policy: Women Claim their Rights to Agricultural Land in Rural China and India’ , UNRISD, working paper, 2016-10, Geneva.)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06年。《知己知彼：加强中国软实力研究》国情报告第九卷，第238-260页。

K. · 莱瑟姆 (K. Latham)。2009年。《媒体、奥运与寻找真实的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专题》，载于《中国季刊》第197期，第25-43页。(Media, the Olympic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Real China: Special Section on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s. China Quarterly, 197, pp. 25-43)

李明江。2008年。《中国讨论软实力》，载于《中国国际政治季刊(英文)》第2卷第2期，第287-308页。(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2, Issue 2, pp. 287-308)

李小江、李慧 (音译)。1989年。《中国的女性研究》，载于(《全国女性研究杂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第1卷第3期，第458-460页。(Women’ s Studies in China, NWSA Journal,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ol. 1, No. 3, pp. 458-460)

许亮。2019年。《工厂、家庭与产业边界：南非纽卡斯尔中国服装企业的社会经济研究》，载于《发展中地区经济历史》第34卷第3期，第300-319页。(Factory, family, and industrial frontiers: A socio-economic study of Chinese clothing firms in New Castle, South Africa. 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 34:3, pp. 300-

319)

D. C. · 林奇 (D. C. Lynch)。2020年。《中国崛起的终结：中国对软实力的争论产生的影响》，载于 K. · 埃德尼 (K. Edney)、S. · 罗森 (S. Rosen)、朱颖 (音译) 主编《中国特色软实力：赢得感情与思想的中国运动》，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The End of China’ s rise: Consequences for PRC debates on soft power’, Edney, K., Rosen, S. and Zhou, Y. (eds)., 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s campaign for hearts and minds, New York: Routledge.)

P. · 诺兰。1983年。《1979-1982年中国农业去集体化：长期视角》，载于《经济与政治周刊》，8月6日。(De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1979-82: A Long Term Perspe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August 6.)

约瑟夫·S. · 奈 (J. S. Nye)。2004年。《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Soft power: The Means of Success to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约瑟夫·S. · 奈 (J. S. Nye)。2011年。《权力的未来》，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蒲晓宇。2019年。《中国再定位：全球秩序变动中的地位信号》，加利福尼亚帕罗阿尔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Rebranding China: Contested Status Signal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彭乔 (音译)。2024年。《孔子学院在印度尼西亚汉语发展中的作用：以玛琅国立大学为例》，载于《社会科学开放期刊》第12卷第2期，第31-46页。(Confucius Institute’ s Role in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A Site Study at State University of Malang,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12 No.2. 31-46.) DOI: 10.4236/jss.2024.122003.

M. · 雷普尼科娃 (M. Repnikova)。2022年。《中国软实力》，剑桥大学出版社。(Chinese Soft Power, Elements in Glob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 · 萨林斯 (M. Sahlins)。2018年。《孔子学院：学术恶意软件与冷战》。(Confucius Institute: Academic Malware and Cold Warfare) 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8/07/26/confucius-institutes-function-propaganda-arms-chinese-government-opinion

沈大伟 (D. Shambaugh)。2015年。《中国软实力的追求：寻求尊重》，载于《外

交杂志》第94卷第4期,第99-107页。(China's Soft-Power Push: The Search for Respect. Foreign Affairs 94 (4). pp. 99-107)

山东省妇女联合会。1986年。《农村妇女在生产中的技术开发》,在农业和农村妇女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黄县(今为龙口市),1986年5月。‘The Technological Exploitation of Rural Women in Prod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Women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roduction, Huangxian, May 1986.)

宋庆龄。1972年。《中国的妇女解放》,载于《北京周报》第6期,第11页。(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Beijing Review, No. 6, p. 11)

J.·斯泰西(J. Stacey)。1983年。《父权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UN Women and OHCHR)。2013年。《实现妇女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源的权利》,联合国。(Realizing Women's rights to land and other productive resources, United Nations.)

王沪宁。1993年。《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91-96页,第75页。

王义桅。2016年。《论软实力悖论及其中国超越》,载于《文化软实力研究》第1卷第2期,第9-17页。

王政。2010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战线创建过程中的中国妇女(1949-1966)》,载于《中国季刊》第204期,第827-84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Creating a Socialist Feminist Cultural Front Women on China (1949-1966),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4, pp. 827-8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迈克尔·巴尔(石竹芳译)。2013年。《为什么中国需要软实力》,载于《光明日报》2013年7月26日。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3-07/26/nw.D110000gmrb_20130726_4-15.htm
(2022年12月18日访问)

徐累(Xu Lei)、葛明复(Ge Mingfu)(音译)。2016年。《1987年至今的中国都市女性时尚》,载于《国际艺术与商业期刊》第5卷第7期。(Urban Feminine Fashion in China From 1987 to No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Commerce, Vol. 5 No. 7.

许少民。2014年。《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的软实力》。<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37958846959543980.html>

姚改改。2022年。《浙江妇联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妇儿驿站”让群众享受家门口的幸福》https://www.women.org.cn/art/2022/11/18/art_20_171058.html（2023年8月13日访问）

詹春燕、卢梦亚。2019年。《孔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的困境与优化分析》，载于《现代教育论丛》第230卷第6期，第60-68页。

跨国民间组织 针对中国在全球南方 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倡导行动中 的性别问题：机遇和挑战

劳拉·特拉杰贝尔·韦斯比奇 (Laura Trajber Waisbich)



引言

2018年，肯尼亚律师兼活动家奥马尔·埃尔马维（Omar Elmawi）在推特（Twitter）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如果中国因环境和健康问题关停了其国内的103座煤电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可以在非洲建设煤电厂并正常运转呢？”^①当时，埃尔马维及其同事正在等待肯尼亚法院的裁决，是否暂停在肯尼亚的拉穆（Lamu）建设一座中国投资的煤电厂。正如推文所示，在肯尼亚法院质疑该项目的同时，像埃尔马维这样的活动人士同样没有对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

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南方国家以何种方式参与和抗争中国支持的项目，这仍然是研究全球中国（Global China）政治中未被充分研究的一个维度。相应地，对公民社会行动中由女性领导的行动和性别考量所知更少。本文通过引用东南亚和东非的例子，重新审视公民社会对中国所支持（资助、建设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抗争的典型事例，有助于填补这些空白。重新审视的案例包括湄公河流域的两起反水电运动——针对缅甸的密松（Myitsone）大坝和柬埔寨的柴阿润（Cheay Areng）大坝，以及肯尼亚拉穆（Lamu）的一场反煤电运动。2010年期间的这些动员行动成功地在实际运营开始之前阻止了项目，出于对当地居民和环境潜在负面影响的共同担忧，民间社会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本文之所以选择分析这些倡导活动，是因为它们在文献中被表述为公民社会跨国动员的“非常积极”和“成功”的实例（Kirchherr 2018，Yeophantong 2020，Chheat 2022），不仅实现了预期目标，还有助于改变中国与负责任的外国能源投资有关的政策和业务实践（Tang 2015）。通过重构这些运动的由来、优先考虑的主要问题以及其中的性别因素，本文不仅补充了日益丰富的关于全球中国的性别、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形成和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发展议题中的公民社会行动。

这一重构工作主要依赖于案头研究（包括回顾相关文件、文献和媒体评论），辅之以十次半结构化和非正式访谈进行三角测量，主要是为了收集中国相关方的观点。关键知情人有目的性抽样，主要选取了那些了解这些运动、性别问题或这些地区的中国海外发展倡议和投资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代表。其他利益相

关者(包括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观点通过媒体和文献回顾收集。访谈于2018年至2023年在中国境内和远程方式进行。绝大多数关键信息来源是中国公民和女性。为了保护隐私访谈数据均为匿名。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概括介绍了在全球中国背景下的公民社会动员。第二部分审视了所选择的动员实例,突出了一些交叉特征。第三部分聚焦于原本被认为成功的运动中的盲点,包括被忽视的性别问题。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一些与倡导相关的结论性思考。

1. 监测全球中国: 针对中国发展合作的社会动员

进入21世纪以来,南南合作(SSC)再次兴起,其中关于中国作为全球发展行为体的崛起众说纷纭(Mawdsley 2012, 谷靖等2016)。关于发展合作的“南方提供者”(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及其新的发展合作方式(通过技术合作、政策和知识交流、发展融资和投资)能否改变现有的北方和西方主导的援助模式,激辩不断。尽管南南合作的研究迅速扩展,但许多涉及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辩论一直都是,并且现在仍然如此,沉浸在简单化的价值观叙述中(Fourie 等2019)。

全球南方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草根组织和专业倡导团体、独立学者和记者,是提供南南合作知识并参与实地南南合作倡议的重要参与者(Pomeroy 等2016, Shipton 和 Dauvergne 2021)。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的参与为南方主导的发展合作的政策制定、实践和影响提供了扎实的、细致入微的和另类的观点,既挑战了南方政府对“双赢”(南南合作优于发展援助)关系的过度积极的描述,又拒绝了西方媒体和政策人士对这一关系过度轻视的说法(韦斯比奇2021a)。

我在这里所称的南南合作监测运动的对象,既包括对大型的南南合作的供应方(如中国、巴西和印度),也包括开展南南合作项目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监测在2010年代扩大了规模(韦斯比奇2021b)。然而,近年来,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已转向监测全球中国(谢世宏2022, 韦斯比奇2022)。对中国的关注和担忧,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方面的主导地位,这种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合作模式传统上被认为将会引发社会环境影响,从而激发社会动员(韦斯比奇2021b);其次,因为中国通过双边合作和投资以及“一带一路

倡议”(BRI)和“全球发展倡议”(GDI)等多边倡议,展现出日益自信的外交政策和不断增强的全球发展角色。在这些新兴监测运动的背景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发展交流中的各种议题,如劳工条件、治理、腐败和环境恶化等,已经被广泛讨论(Mohan 2014, Yeophantong 2020, 阿马尔 等 2022)。然而,学术界、政策圈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对性别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蔡一平、李英桃 2021)。

公民社会对全球中国的监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基层动员到政策倡导、与项目相关的活动,以及独立的知识生产和报道。这些动员既可以在中国境内展开(由中国或总部设在中国的组织领导——有关这些组织的更详细描述请参阅本文第三节),也可以在中国境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传统发展监督机构(watchdog)所在的全球北方展开。通常,监测依赖于跨国行动主义网络(Keck 和 Sikkink 1998),汇集了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学者和记者的代表,围绕特定的“原则性问题”展开行动(Guarnizo 和 Smith 1998)。一方面,南南合作监测运动效仿了现有(通常是北方主导的)网络和资源,将之用于与发展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倡议相关的内部和外部倡导工作(Fox 和 Brown 1998)。另一方面,监测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中的大国,在制定适合南方主导的发展合作倡议特点的新动员策略和行动方式也在创新。解读中国并按照他们的方式与中国行动者和机构接触,对于成功地动员公民社会参与、努力促成变革甚或停止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韦斯比奇 2022)。

2. 在东南亚和东非监测中国支持的能源项目

中国目前是全球南方能源基础建设的主要双边融资方,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水电大坝、燃煤电厂、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等可再生能源。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Zhou 等 2022)。大型能源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因为它们的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均也一直成为争议的根源(Tan-Mullins 等 2017)。当地社区不成比例地承担了社会环境成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妇女,影响到她们的权利、生计和健康,以及性别不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暴力(Castañeda Carney 等 2020)。近年来,国际大型能源项目融资者如中国,面临着更多的压力,要在当前全球(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的三重危机中寻求平衡,既要迫切地发展经

济，又要确保公平、正义和可持续未来。

本节探讨了过去公民社会动员叫停中国支持的东南亚和东非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实例。这些海外项目的争议性不仅揭示了实现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和共同繁荣愿景作为中国对外行动的一个核心部分所面临的挑战，也揭示了发展是什么以及如何追求发展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多重争议。

湄公河地区水力发电面临的挑战：密松水坝和柴阿润水坝的案例

在2006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参与了东南亚41%的大型水电设施建设（Middleton 2022）。在湄公河流域，自2000年代以来，在双边捐助国和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提供的资金减少的背景下，一场水电大坝建设热潮（Kirchherr 2018）在南方国家（如中国）和韩国的资助下展开（Tan Mullins 等 2017）。尽管中国与其地区伙伴之间不平等的互相依赖关系日益加剧，但各国政府欢迎这种不带太多附加条件的替代资本来源，包括对借款方较弱的社会环境约束（Laporte 2017, Gong 2021）。与此同时，湄公河上的大坝建设在其国内和地区层面都面临着来自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对（基尔赫尔 2018，约番东 2020，The Rupture Project 2022）。

密松水电站于2006年由中缅双边宣布发起，中方作为资金提供者和承包商。该项目计划建在缅甸最长的河流——位于克钦邦（靠近中国的云南省）的伊洛瓦底江上。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负责融资，该水电站将通过一个合资公司运行，即上游伊洛瓦底江汇流盆地水电有限公司（the Upstream Ayeyarwady Confluence Basin Hydropower Co., Ltd）。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电力投资（China Power Investment, CPI）将持有其80%的股份。预建设工作于2009年开始，但很快遭遇了公民社会的抵制。

抗议从当地开始，由克钦人带头，他们发表公开信、散发传单，并在项目附近制造爆炸事件。反对声音从2010年开始高涨，并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动员行动，这场名为“拯救伊洛瓦底江”的活动汇集了环保活动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当时的缅甸民主象征人物昂山素季也加入了这场运动。争议的关键问题围绕着对克钦人和伊洛瓦底江下游社区（包括约12000人的转移和重新安置），以及与该流域有关的更广泛的国家文化和遗产问题（Chan 2017, Kirchherr 2018）。由缅甸组织，如缅甸河流网络（Burma Rivers Network）领导的反大坝动员也得到了

国际关注和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s)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例如突出环境影响评估研究中的管理不善问题(Gong 2021)。

2011年6月, 克钦爆发了一场内战, 时任总统登盛(Thein Sein)不顾中方的反对宣布暂停该项目。这导致中国政府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CPI)加大努力说服缅甸政府恢复项目, 包括通过公共关系活动和邀请缅甸非政府利益相关方(包括公民社会组织、记者、反对党和克钦代表)访问中国(Mogensen 2017, Chan 2017, Gong 2021)。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The China NGO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NIE)举办了一系列民间人士活动(Hsu 2017, MFA/PRC 2012)。^②

位于北京的全球环境研究所(GEI)也参与其中, 为缅甸官员进行培训, 在项目暂停后与各利益相关方举行闭门会议, 并与中国承包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合作, 调查如果大坝建设重新开始将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和管理(GEI 2015, 季、张 2016, Yeophantong 2020)。虽然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全球环境研究所在与中国政府进行紧密对话中各自发挥了不同的“公民外交”和技术专家咨询角色(Tang 2015, Yeophantong 2020), 但其他中国组织, 如云南的环保组织绿色流域(Green Watershed)采取了不同的路线, 用行动“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可持续发展”(于 2012)。绿色流域进行了自己的缅甸研究之旅, 在现场监测中国在当地的投资项目。他们的访问同样旨在通过了解项目的影响并听取基层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促进中缅两国的联系。尽管中国进行了种种外交和准外交努力, 但大坝建设从未恢复。

柴阿润(Cheay Areng)水电站计划建在柬埔寨的保护区豆蔻山脉(Cardamom Mountains), 这个地区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主要居住着冲族(Chong)和高棉(Khmer)族。中国进出口银行保障项目资金, 建设工作交给了中国南方电网、中国国电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一系列中国企业。建设工程在2013年左右加速进行, 随后遭遇了当地的抵抗, 因为大坝的建设将迫使靠耕种、捕鱼和采集森林产品为生的1500人离开当地(Hensengerth 2017)。受影响的社区拒绝了补偿并发起了阻止水电站建设项目的运动。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环境的破坏、对传统生计和当地社区福祉的影响。当地的抵抗得到了独立僧侣社会正义网络(Independent Monks Network for Social Justice)等一系列异见僧侣组织以及其他柬埔寨组织的支持, 包括柬埔寨青年网络(Cambodian Youth Network)、Samreth 律

师团 (Samreth Law Group)、柬埔寨自然之母 (Mother Nature Cambodia)、柬埔寨河流联盟 (Rivers Coalition in Cambodia) 和 3S 河流保护网络 (3S River Protection Network)。国际环保组织如国际河流组织 (International Rivers)、地球权利国际组织 (Earth Rights International) 以及保护国际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也参与其中 (Yeophantong 2020, Chheat 2022)。^③ 2015 年, 活动人士向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提出申诉。申诉主要集中在该项目的环境风险和对原住民权利的侵犯。它还提出了社会和性别问题, 包括对妇女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 因为她们传统上负责取水和种植粮食等活动。^④ 2015 年 2 月, 洪森首相暂停了大坝的建设, 并于 2017 年无限期地搁置了项目。而且至今仍未恢复。

这两场反大坝运动显示了共同点, 两者都将社会运动学者所称的“穷人的环保主义” (Martinez-Alier 2014) 与由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国内的和跨国的倡导活动相结合 (如前文所述)。动员行动是由权利被剥夺的当地民众 (通常是原住民) 来推动的, 他们站出来保护自然, 反对企业和与国家抗争。他们的主张围绕着环境和社会正义问题, 包括争取承认、获得参与的权利, 以及其他人权考量。无论是在缅甸还是柬埔寨, 这些由社区领导的动员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东道国和中国政府未能因地制宜, 采取特定背景的社会环境和人权保障措施来防止对当地社区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当地动员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然后在国际范围内扩大, 并且因为环境问题越来越被关注。

国内政治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项目被取消是因为活动人士通过将他们的主张融入已经动荡的政治舞台, 成功地挑战了在关键栖息地、保护区和原住民土地上建造大型水坝的适当性。在这两种情况下, 地方斗争升级为国内斗争, 将争议从边缘转移到了国内政治的中心。国际行动者也发挥了作用, 从区域层面开始, 例如在法律动员方面为国内活动人士提供帮助, 并且对外宣传他们的主张。公开参与运动的区域和国际行动者包括来自邻国的非政府组织, 如拯救湄公河联盟 (Save the Mekong Coalition), 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 如国际河流组织。

在这两个案例中, 领导国际运动的活动人士并没有强调中国资金提供者和建设者的角色, 也很少在法律和宣传动员中利用中国为斗争场所。这种战术选择反映了人们的共识, 即中国的资金提供者和承包商难以影响 (Cheathh 2022, Laporte 2017)。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 首先, 中国现有的企业和金融部门海外投资指南具有广泛性和自愿性; 其次, 中国对东道国体系的尊重, 再加上中国本身就

水电对当地社区影响的评估缺乏充分的标准；第三，中国的政策侧重于慈善事业而不是解决冲突，而且在整体政策执行上存在差距（Garzón 2018 [2014]，Tang 2015，Tan-Mullins 等 2017，蔡菲菲等 2017，Gong 2021）。活动人士也较少关注去影响中国的行动者，这大概与中国的社会组织（例如 CNIE、GEI 或绿色流域）没有公开加入阻止这些项目的努力有关，尽管这些组织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两个案例。

最后，有关性别影响的问题在这些反对大坝建设的跨国运动中并没有被凸显，这些跨国动员集中在环境和海洋生物的保护以及社区权利和移民安置议题上。据熟悉该地区的受访者称，湄公河地区与水电相关的民间社会动员以及政府和企业的风险评估中，并非完全忽视性别问题，并且性别议题也影响着公民社会的行动，然而，性别议题很少被单独列出，或以全面的方式处理。^⑤我将在本文稍后部分再次讨论这一点。

挑战肯尼亚化石燃料发电厂：拉穆煤电厂的案例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停止资助海外煤电厂，以此表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承诺。截至2022年4月，已有十五个海外煤电项目被搁置或取消。尽管对于已处于预建阶段的项目、专门为电力工业区建造的工厂以及已融资的电厂退役前景仍不明朗（Clark 等人 2022），但国有建筑公司已开始退出煤炭项目，着眼于扩大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Chen 和 Shen 2022）。

然而就在习近平主席做出承诺的几年前，中国参与了东非的一个备受争议的煤炭相关的项目，由于强大的民间社会反对而被迫停止。2014年，肯尼亚政府启动了在拉穆县建设肯尼亚首座煤电厂的项目，该县靠近与索马里的边境。一个由肯尼亚和中国能源公司联合成立的阿木电力公司（Amu Power Company）赢得了这个投标，中国工商银行（ICBC）及其他国际融资机构，如非洲开发银行（AfDB）将为项目提供60%的融资。煤电厂计划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附近，这是一个重要的海岸红树林森林生态区。原计划于2015年12月开始建设，但到2016年中期，项目已经面临延迟和激烈的国际动员行动。2019年，根据法院裁决该项目被暂停。

在拉穆的一些组织包括“拯救拉穆（Save Lamu）”、“穆赫里穆斯林人权组织（Muslims for Human Rights - Muhuri）”和“Kwasasi Mvunjeni 农民自助组织

(Kwasasi Mvunjeni Farmers Self-Help Group)”，在“卡迪巴协会(Katiba Institute)”、“350 肯尼亚(350 Kenya)”和“非煤炭化组织(deCOALonize)”等更大的国家级组织的带领下，领导了动员行动。社区关注的核心是环境和土地，及生计、文化和健康问题。这些问题由肯尼亚更大的组织提出，并得到了非洲内外的国际行动者的支持，这些支持来自区域和国际的环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如“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绿色和平(Greenpeace)”、“问责理事会(Accountability Counsel)”和“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the Heinrich Böll Stiftung)”，以及联合国机构，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这些多样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共同反对煤电，并在肯尼亚和东非推广替代性的、公正的和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未来发展(UNEP 2018, Zhu 2020)。

在拉穆最初的街头抗议活动中，拉穆妇女在领导当地反对该电厂以及更广泛的反煤炭运动中，凸显出了重要作用(拯救拉穆 2018, EJ Atlas 日期不详, Patel 2021)。然而随着动员的扩大，在运动进程中，对性别的影响和妇女组织参与的关注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在更加对外的舞台上淡化性别问题，并没有阻止拉穆妇女动员起来并提出她们的关注点，例如通过由“350 非洲(350Africa.org)”和“非洲妇女联盟(WoMin)”等组织主办的国家和区域研讨会(350 非洲 2017)来发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或来自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公开参与了反对该煤电厂项目的运动，然而，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某些中国的行动者确实进行了一定程度上谨慎的或私下的外交和倡导努力，包括在幕后联合起草信件和其他背景资料，以协助国际倡导工作。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办公室等组织，即使相隔甚远也参与了监测拉穆的中国投资，除了煤电厂外，还涉及拉穆港 - 南苏丹 - 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项目(Lamu Port-South Sudan-Ethiopia Transport Corridor Project, LAPSET)(Le 2016, 韦斯比奇 2021b)。^⑥拉穆的争议也受到了独立的中国记者和活动人士的报道，这些记者和博客，如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和熊猫爪子龙爪子博客(the Panda Paw Dragon Claw blog)，报道了全球中国的情况。^⑦

活动人士将政策倡导和法律策略结合起来，针对肯尼亚政府以及中国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工商银行)和其他融资方开展工作。^⑧2016年，这些组织向肯尼亚国家环境法庭提起诉讼，指控肯尼亚国家环境管理局和阿木电力公司违反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许可证要求。2019年，肯尼亚法官撤销了阿木电力公

司建设该工厂的许可证，并在环保团体不断施压下，非洲开发银行退出，导致该项目陷入停滞。2020年，中国工商银行也退出了。此案件目前正在上诉中。活动人士最初与中国驻内罗毕外交使团的接触并不成功，但在法院裁决后，他们与中国大使进行了会面。当时，大使表达了他个人并不支持煤炭项目，而活动人士则重申，他们并不是“反对发展”，而是“推动可持续且最大程度上不伤害拉穆人民和肯尼亚人民的发展”（拯救拉穆 2019）。他们还重申欢迎中国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等）（拯救拉穆 2019）。

与湄公河地区的运动一样，针对拉穆煤电厂的行动也成功阻止了中国支持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拉穆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东道国，即肯尼亚的活动人士和国家法院，发挥的作用，对一个有社会环境争议和风险的项目提出异议，并迫使政府和商业行为者们，包括其中一些中国机构，重新考虑投资计划和政策重点。拉穆案例还涉及到多边机构的行为者们更大程度地参与，包括共同融资机构如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专门机构。除了关注与中国有关的活动之外，这些机构的参与也是肯尼亚团体的跨国倡导活动的焦点议题（韦斯比奇 2021b）。肯尼亚活动人士主要从环境方面对该项目提出了质疑。活动人士主要瞄准了国内的舞台（并找到了行动空间），同时也想方设法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融资者。最后，这个案例再次说明，成功阻止一个中国支持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动员行动，既无需明显的性别影响相关的倡导策略，也不必公开依赖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

3. 分析这些成功的倡导行动中的盲点

在回顾了不同能源领域和不同地区的标志性公民社会动员之后，本节讨论了这些已经成功的行动中的两个盲点：即对性别问题的盲点和缺乏中国相关组织的参与这一盲点。分析这些盲点对于试图凸显在全球中国有关的跨国行动中性别问题的可见性，以及在未来有关中国参与全球南方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对话中吸引更多中国的声音，都至关重要。

社会性别盲点

尽管妇女活动家和妇女组织积极了参与案例所在地区的抗议和动员行动，但

性别盲点是这些动员行动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拉丁美洲针对中国支持的采矿项目的原住民社区抗议行动中也存在着，参见阿马尔等人 2022）。跨国活动家们表达了对中国支持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些担忧，但是在他们的叙述中性别问题往往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是看不见的。通常，激发冲突的主要问题是环境影响。虽然存在某些社会和人权问题，例如文化、生计和健康，但这些议题对于活动家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与此同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包括项目对女性的具体影响，项目对男女的不同影响，以及项目带来的更广泛的性别不平等問題，往往被忽视或被低估了。

性别问题的缺失并非是上述倡导活动独有的，这些倡导活动针对的是具体的项目，倡导目标明确地指向东道国政府。性别因素在针对中国利益相关者的跨国倡导活动中也同样不可见。^⑨ 例如，全球 260 多个组织在 2020 年签署的一封信，呼吁中国确保将新冠疫情（COVID-19）的救助资金用于“高质量”而非“高风险”的一带一路项目。在定义风险项目时，签署者强调对当地环境、社区和生计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森林、海洋、沙漠、河流或其他日益脆弱但仍完整的生态系统及其中赖以生存的人们”所带来的伤害和破坏。虽然对人的关切肯定存在，但这封信并未包含与女性和性别相关的具体建议。从列出的六十个有问题的项目清单中，只有一个项目（喀麦隆的一项棕榈油倡议）明确提到了对女性权利和生计的具体限制。^⑩

将具体项目的行动与政策倡导活动放在一起，揭示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模式，即让中国利益相关者参与环境问题，呼吁中国不断增长的“软法律”体系。^⑪ 这包括承诺、倡议、金融工具、政策和法规，如“绿色一带一路”和 2021 年《海外投资与合作绿色发展指南》。^⑫ 当然，那些在中国境外和境内同时开展的动员行动，战略性地依赖（并有助于扩大）现有的环境和气候问题政策空间（韦斯比奇 2022）。然而，这样做的同时，他们无意中造成了社会和性别问题的边缘化。接下来的段落将通过描绘中国境内的组织在全球中国中的动员活动概况来进一步讨论这一陷阱。

全球范围内，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话题。中国法律界定了三种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通常称为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人们还可以找到在中国运营的其他类型的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基层（草根）组织、政府运营的非政府组织（GONGO）、智

库和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本文中，我使用“中国和中国境内的组织 (Chinese and China-based organisations)”这一术语来指代在中国运营并与全球中国有关的多元化组织。在这个广泛的类别中，这些社会组织不仅专业领域和身份不同，它们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也各异（即一些已在2016年慈善法下正式注册，而另一些没有），因此它们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关系也不同。这种多元化，使它们受到国家管控的形式不同，并使得它们参与和接触政策和企业决策的层次也不同。

现有的学术研究将大多数中国社会组织描述为非政治性的，大多是服务性组织。然而，中国也有一些社会组织从事政策相关的研究、动员和倡导工作，其中许多是针对环境问题的（Ho 和 Edmonds 2008，Tian 和 Chuang 2022）。尽管过去十年社会组织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Deane 2021），但与人权和性别问题相比，环境问题对于草根动员、倡导工作和新闻业来说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更安全”（雷普尼科娃 Repnikova 2022）。对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等国内环境问题的动员和报道，以及涉及全球中国的环境影响来说都确实如此（韦斯比奇 2022）。

在与国内和全球中国的相关问题上，环境问题的倡导活动通过大型的“非对抗性的”、“建设性的”和“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方式进行（Ho 和 Edmonds 2008，雷普尼科娃 2022）。在监测全球中国时，中国环保组织的工作以合作为中心，体现在与政府和海外经营企业一起，在政治上可接受的问题和框架下采取行动。这些政治上可接受并且已被接受的概念包括：改善中国海外企业在当地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表现，降低海外项目的财务和声誉风险，并改善中国的全球形象（韦斯比奇 2022）。

具体而言，中国的组织寻求影响政策制定者和银行业，以加强海外投资与合作的社会环境政策和法规，并监测中国企业当地的社会环境表现。通过这样的做法，他们还帮助提高中国企业的“社会适应”，宣传国际标准、最佳实践和经验，并支持他们加强社会环境政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社会组织经常使用有关风险、声誉、绩效和负责任经营相关的财务管理和企业语言。例如，全球环境研究所将其在缅甸密松大坝的工作描述为“帮助建立公司与地方政府、商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之间的非正式沟通平台”（季、张 2016，第19页）。位于北京的社会资源研究所（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SRI）对其监测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工作也给出了类似的描述，称其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社会责任发展”，并协助中国和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实现双赢”(蔡菲菲等 2017，第67页)。亚洲基金会是监测全球中国的中国组织的主要资助伙伴，它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来“支持中国建设性的全球参与”，并“与中国合作伙伴合作，建立相互理解，鼓励对环境负责的行为并提高合规能力”(亚洲基金会 2016)。

尽管这种嵌入式行动主义(Ho 和 Edmonds 2008)使得中国的组织能够扩大与全球中国的接触，但也对其自身工作带来一些影响。首先，这些组织主要通过内部策略而不是外部策略(或通过两者结合)来行动，因此，他们避免对政治敏感问题公开表态，并避免加入对抗性的动员行动，包括基层民间社会团体领导的动员(如前面提到的一些例子，后文将进一步对此展开讨论)。其次，这些组织“找到一种可接受的方式与中国政府和企业沟通，组织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蔡菲菲等 2017，第5页)，这种做法具有战略价值。且受益于中国政府对社会环境问题日益开放的态度，所以这些组织使用的语言以促进改进为核心，使他们的批评更容易被接受，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这种做法的结果之一是陷入李(2007)所总结的将问题描述为技术性的问题以去除其政治敏感性。^⑬另一种就是被那些希望一切照旧的人利用或拉拢。

对于那些在中国开展动员行动的人来说，这种权衡越来越明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环保行动“在触碰某些界限之前仍然是可以接受的”。^⑭一方面，正如两位受访者所描述的那样，在中国国内人们努力尝试“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工作和行动”。^⑮因此，民间社会行动者通过将问题去政治化的策略并采用有利于商业的语言，想方设法地将维护当地社区的福祉和尊严纳入议程(唐 2015)。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技术性和非对抗性的路线，使得各组织最终在其倡导策略以及与中国官员和公司的对话中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公开谈论政治议题，其中也包括性别问题。最终，据受访者所说，更激进的——或者用受访者的话来说^⑯，政治敏感的议题——重新安置、种族冲突和社会性别等问题，最终被边缘化了，或只是笼统模糊地纳入社会问题中被提及。因为这些社会议题被视为更具政治性，因此更具挑战性，推动起来更艰难。中国的组织于是陷入了一个实用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追求成功而驱动的陷阱，不断致力于解决那些看似更不具政治性，听起来更技术性和非对抗性的问题，比如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和降低碳排放问题。^⑰

导致性别问题被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中国境内积极监测全球中国的组织数量有限，其中大多数缺乏对社会和性别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专业知识。尽管越来越多

的社会组织从事扶贫工作(季、张 2016)并监督国家和企业的海外行为(如前所述),但很少有中国组织能够维持这项国际工作。至于就中国在全球发展的作用进行持续倡导工作的组织就更少了,而且他们的关注点大多是在亚洲。此外,更活跃的组织(例如全球环境研究所、绿创中心、绿色流域、社会资源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资源研究所、香港乐施会和亚洲基金会)他们似乎很难将两者兼顾,即通过与金融和银行系统的战略对话来影响中国的绿色发展金融政策,并监测中国在海外的项目,而且通常优先考虑前者而不是后者。^⑮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导致难以系统全面地关注性别问题。

受访者表示,在全球中国相关工作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常常是暂时性的且流于表面,有时是为了响应特定的国际资金的要求,或者是个人(而非机构)努力推进的结果。那些与政府和企业就海外项目进行接触的中国组织常常感到,将性别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研究性别和性问题的专家面对国内的问题已经感到分身乏术,且面临日益加强的国家管控,使得她们无法将精力转向全球中国。例如,Tian 和 Chuang (2022)认为,根据2016年《慈善法》,从事性别、社会和权利相关工作的社会组织受到的政治冲击更大。新法规也针对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那些设法保持开放的组织缩减了运营规模,并且最终资助领域可能包括全球中国与性别,却不一定足够。在这方面,福特基金会或许是个例外,它还在持续这两个领域方面的工作(蔡一平、李英桃 2021)。香港乐施会还寻求通过将性别观点纳入中国主导的多边银行(即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新开发银行)以及区域项目的主流来弥合这些领域,以及在区域项目中促进中国主导的价值链和私营部门投资更负责任和更具包容性(Tobing-David 2019)。然而,将性别因素纳入对中国发展合作总体监测的尝试仍然有限,这需要持续的投入,让具有性别专业知识的组织和个人与这一领域更活跃的团体(即环境组织)有合作空间,并推动这一议程在中国向前发展。

失踪的中国盟友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盲点:在针对中国主导的海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开批评的跨国运动中,中国组织的参与程度参差不齐。这里描绘的全景图显示,中国的公民社会团体在过去湄公河大坝相关的跨国运动中发挥着相对较小或更谨慎的作用,而在肯尼亚与煤炭相关的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这种现象并不是本

文讨论的运动所独有，中国的组织很少参与反对中国主导和资助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项目的公开跨国行动，这似乎是常态（韦斯比奇 2022，Shipton 和 Deauvergne 2022，谢 2022）。

中国的组织在这些运动中处于边缘，并不意味着可以低估他们参与社会动员所面临的挑战，也不意味着应该小觑他们为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所做出的努力。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组织并没有表现出冷漠，而是成功地积极拓展中国可以接受的关于全球中国讨论的界限，缓慢而稳步地扩大了现有的政治空间，为政府和企业海外行为的改变提供参考和建议。中国的人员和组织前往争议地点并与当地行动者接触，他们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从不同的视角提供了更关键的报道，为在中国引发新的政策讨论做出了贡献。他们对如何在当地展开项目提供了中国视角，有助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公司的绩效和多方面影响，特别是在湄公河流域等邻近地区。此外，作为中国人并身为专家，他们的资历有助于在中国利益相关者（公司和外交使团）和东道国的各个团体之间架起桥梁。

与此同时，他们的缺席，或者他们与当地伙伴仅有断断续续的接触（例如拉穆案例），以及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中国的发声中数量有限和缺乏多样性，这些都值得我们广泛地来讨论。首先，要了解复制跨国联合网络模式的局限性，这些网络依赖于资金和建设国组织的积极和直言不讳的参与。第二，在未来几年，要帮助形成包括中国的组织参与在内的跨国合作的替代模式。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从历史上看，跨国网络一直是东道国公民社会团体动员和挑战国际资助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核心部分。同样，本文研究的所有案例中，跨国网络为当地团体提供了额外的物质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向当地公司和政府施加压力，并最终与之谈判。中国日渐成为大型发展项目的主要资助者和建设者，东道国的公民社会团体需要调整和改进动员策略，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效仿传统上用于影响多边银行和西方资助方而采取的策略。

因此，只有让所有参与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国参与者）参与进来，动员行动才能够为当地社区取得更好的成果。但假设中国的团体能够或愿意采用某些类型的抵抗手段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即使他们对当地的问题有着类似的担忧，但由于公开抗议官方项目具有很大的成本和风险，他们也不会作为明面上的合作伙伴加入终止建设项目的行动。激进的抗议有不同的形式，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中国这一领域的许多行动者“正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激进行动”。^{②③} 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组织和专家正在与南方国家的同行进行接触，以帮助与当地的中国企业联络，影响中国在新的多边组织中的立场，并了解中国的政策和法规（余 2012，蔡菲菲等 2017）。^{②4}虽然双方的这些对外联系努力可能并不总能转化为持续的合作形式，但有关全球中国的丰富报道以及中国组织参与其中的更大政策空间，为让更多中国人在明面上讨论（包括那些具有性别专业知识和敏感性的声音）创造了新的机会。当地团体迫切需要中国合作伙伴来帮助了解中国支持项目的文化、组织、语言和政策细节。这种需求可能会增长，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发展的渴望。

结论

本文重新审视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民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成功地阻止了在东南亚和东非建设备受争议的中国（资金和建设）支持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通过社会动员的视角，本文分析了这些项目被成功阻止的主要框架、策略、组织动态和驱动因素。这种跨区域比较分析揭示了东道国组织在制定围绕环境问题为主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跨国运动方面的领导作用，并利用本国场域（包括对政治领导和国家法院的压力）叫停了这些项目。这里研究的案例还显示了国际盟友的战略支持，以及跨国舞台在超越国界开展动员的作用。在所有案例中，性别问题都是边缘问题，在公共话语建构中被忽视。尽管妇女组织及其关注点并未缺失，但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运动的领导人并未始终如一地提出、讨论或优先考虑性别问题。另一个缺失的元素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很少参与这些公开的更具对抗性的国际网络。这里需要重申，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组织完全缺席，而是强调其局限性，但同时这也是他们作出的选择，他们选择用其他方式和目标来监测项目。

总而言之，这些发现为那些寻求提高性别问题的可见性和赋权妇女而行动的人们，特别是开展全球中国相关动员行动的妇女组织来说，提供了重要的启发。第一点是要认识到，已经监测全球中国的民间组织需要与中国、东道国以及这些国家中关注性别问题和专业知识的组织加强联系，着力建立这些关系非常重要。更多更好的南南联系可以让中国和中国本土组织听取发展中国家团体的意见，了解他们在海外与中国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经验。指出项目落地中的问题，

从而使中国作出积极改变，东道国的组织因此可以帮助中国的社会组织“重新协商哪些因素构成‘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与有关发展的官方主导话语进行商榷”（Yeopanthong 2020，第104页）。与当地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和性别专家合作，也可能有助于这些中国组织挑战一些颇为盛行的观念，即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不会产生性别影响，或者性别问题是西方的发明。^{②5}

与此同时，加强南南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可以让东道国的民间社会团体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好地与当地的中国利益相关者接触。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组织更受中国公司信任（Tang 2015），^{②6}这有助于他们在解决冲突和谈判方面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总而言之，共同努力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切入点和倡导场域，产生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合力，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东道国政府、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制定负责任的政策以及制度和变革的机会。

第二个启发是认识到加强合作并非易事。建立联系可能需要时间和努力，包括开展外联活动、建立信任和共同制定战略。这需要中国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他们监督中国海外活动的意愿和国际行动的能力，包括了解亚洲等邻近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地方语言和当地环境。这还需要以开放的态度来应对“更大的对立、冲突和自治的力量”（Tang 2015，第22页），包括来自受项目影响的群体，并愿意寻找方法将当地的关注点（或他们基于权利的方法）纳入中国的倡导策略中，探讨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新方法。虽然这样做对所有各方都具有挑战性，但建立更加多元化的网络可以防止有关环境问题的批评，就像性别等问题那样，被挪用和去政治化，从而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促进公正和变革性的发展范式的讨论落地生根。这种多样性还可能激励监测运动批判性地评估迄今为止常用的倡导方法，比如强调保护自然和环境，聚焦于技术性解决方案，因而，在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中，不断推进政府和企业参与者更负责任的行为。

具体来说，这可能需要公民社会团体在针对特定项目的跨国运动中，采用不同的框架和语言并发挥不同的角色，有些相对更为明显，同时共同参与联合国等多边空间来提出与全球中国相关的交叉议题。虽然基于权利的倡导可能不会立即在中国的政策倡导工作中找到简单和直接的途径，但它肯定有助于在未来几年为性别议题创造一个更可见的存在空间。

总之，加强公民社会在性别相关问题上的跨国行动需要加强跨国联盟。由于历史、地理和组织的原因，东南亚地区为加强联系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在那

里，公民社会更加联合一致地跨国参与。中国已经在水电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采矿业和农业价值链上展开了海外发展项目。东南亚地区需要重振（主要是基于环境的）行动主义，同时需要与更具有性别敏感的相关组织重新开展对话。学习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全球中国跨国动员的形式也很有价值，这些地区很多敏感的领土越来越受到中国采矿业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影响（阿马尔 等 2022 年）。在过去的几年里，当地的草根组织和倡导团体，包括原住民和妇女团体具有针对大型发展项目开展跨国动员的悠久传统，已经开始在国家、区域和跨国层面（例如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进行协调，积极参与了对中国支持的项目给当地社区和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批评。^⑦ 由于远离中国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关注的主要圈子，拉丁美洲可能提供了一个（较不敏感的）替代性的场所，以培育能够在未来几年理解全球中国的性别影响并采取行动的南南公民社会网络。

（翻译：蔡凌萍、校对：张帆、核稿：张玉婷）

注释

① 请参阅 <https://twitter.com/OmarElmawi/status/999690933204672513>。

②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CNIE）成立于 2005 年，是一个由 300 多个中国组织组成的伞式组织，也是公民社会就全球发展问题与世界各地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接触的主要联络点。除了这里提到的与缅甸的“胞波情谊”活动外，CNIE 还主办了中非合作论坛、G20 和金砖国家等多边的民间社会活动。自 2022 年起，CNIE 还牵头联系其他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增加公众对中国主导的全球发展倡议 GDI 的支持（CNIE 2022）。

③ 请参阅国际河流组织关于柴阿润（Cheay Areng）大坝的信件：https://archive.internationalrivers.org/sites/default/files/attached-files/20130624-letter_to_guodian_re_cheay_areng_dam_english.pdf。

④ 请参阅向联合国提交的完整报告：https://earth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submission_to_special_rapporteur_on_hydropower.pdf。

⑤ 2023 年对一位中国发展专家的采访；2023 年对一位中国性别与发展专家的采访。

⑥ 2023 年对一位中国性别与发展专家的采访；2023 年对一位英国国际非政

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⑦ 请参阅 <https://pandapawdragonclaw.blog/2020/01/17/how-does-2020-bode-for-chinas-overseas-investment-a-chinese-lawyers-take/> ; 或者参见: <https://dialogue.earth/en/energy/lamu-kenyan-coal-project-chinese-investors-take-environmental-risks-seriously/> 访问日期: 2023 年 5 月 24 日。

⑧ 请参阅案例, 通用电气曾一度打算收购阿木电力公司的股份, 宗教组织致函通用电气, 要求其重新考虑对该项目的支持。网址: <https://www.asyousow.org/letters/joint-letter-to-ge>。

⑨ 一个例外是围绕中国的新多边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动员行动, 由金砖国家女权主义观察组织(BRICS Feminist Watch)大力领导(见韦斯比奇 2022)。

⑩ 信件的全文可以见网站: <https://foe.org/blog/chinese-covid-19-relief-to-investments/>。

⑪ 2023 年对一位英国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⑫ 该规定是对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 2013 年《环境保护与合作指南》的更新, 也是首次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制定标准。至少自 2008 年以来, 中国已存在有关海外项目和对外投资的规定。

⑬ 在中国与性工作者合作的基层组织中, 田、庄(2022)也发现了类似的动态。

⑭ 2018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⑮ 2018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2023 年对一位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⑯ 2019 年对一位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⑰ 感谢蔡一平在这一点上的见解, 特别是她对中国环保组织“成功”动员的背后带来的消极影响的看法。

⑱ 2023 年对一位中国的发展专家的采访; 2023 年对一位在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⑲ 2019 年对一位中国的性别学者的采访。

⑳ 2018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㉑ 2019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学者的采访; 2023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和

发展专家的采访。

②② 2023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和发展专家的采访。

②③ 2023 年对一位在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②④ 2019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2019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和发展专家的采访。

②⑤ 2018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2018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发展学者的采访；2023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和发展专家的采访。

②⑥ 2023 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发展专家的采访。

②⑦ 参见，例如：<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latin-america-14-cases-show-environmental-and-human-rights-violations-by-chinese-companies-report-for-un-says/>。

参考文献

非洲 350 组织 (Africa 350)。2017 年。《妇女为妇女：基图伊煤矿盆地的惨痛现实》，2017 年 5 月 26 日。(Women for Women: harrowing realities from Kitui coal Basin, 26 May 2017) <https://350africa.org/women-for-women/> (2023 年 7 月 11 日访问)

亚洲基金会 (Asia Foundation)。2016 年。《中国》，2016 年 11 月 23 日。<https://asiafoundation.org/publication/china/> (2023 年 5 月 5 日访问，网页链接已经失效。)

蔡菲菲、张甲林、陈继艳。2017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和 NGO 参与：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北京：社会资源研究所。

蔡一平、李英桃。2021 年。《从性别角度看全球中国》，载于 IDEES。第 52 期。“世界危机前的中国”。(Global China from a Gender Lens, IDEES. No. 52. “China before a World in crisis”.) <https://revistaidees.cat/en/global-china-from-a-gender-lens/> (2023 年 5 月 5 日访问)

I·卡斯塔内达·卡尼，等 (I. Castañeda Carney et al.)。2020 年。《性别暴力与环境的关联：不平等的暴力》，杰米·温 - 贝松 (Jamie Wen-Besson) 编辑，国际自然保护联盟。(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environment linkages: The violence of inequality. Edited by J. Wen.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陈翰、沈威。2022 年。《中国“停止修建境外煤电”承诺一周年：进展与展望》，

载于《中国对话》，2022年9月22日。(China's no new coal power overseas pledge, one year on, China Dialogue, 22/09/2022.) <https://chinadialogue.net/en/energy/chinas-no-new-coal-power-overseas-pledge-one-year-on/> (2023年5月5日访问)

S. · 查希特 (Sreang Chheat)。2022年。《中国在柬埔寨投资项目的争议：柴阿润水电站案例》，载于《亚洲研究评论》第46卷第1期，第19-35页。(Contesting China-funded Projects in Cambodia: The Case of Stung Chhay Areng Hydropower, Asian Studies Review, 46(1), pp.19-35.)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CINE)。2022年。《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概念文件。

A. · 克拉克 (A. Clark)、C. · 奈多匹尔 (C. Nedopil)、C. · 斯普林格 (C. Springer)。2022年。《中国与全球南方煤电厂提前退役前景》，2022年7月12日，中南项目。(China and the Prospect of Early Retirement of Coal Plants in the Global South, 12 July 2022, China Global South Project.) <https://chinaglobalsouth.com/analysis/china-and-the-prospect-of-early-retirement-of-coal-plants-in-the-global-south/> (2023年5月9日访问)

L. · 迪恩 (L. Deane)。2021年。《习近平时代是否会有公民社会？新政权下的倡导和非营利组织》，载于《中国制造杂志》，2021年7月15日。(Will There Be a Civil Society in the Xi Jinping Era? Advocacy and Non-Profit Organising in the New Regime, Made in China Journal, 15 July 2021.)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1/07/15/will-there-be-a-civil-society-in-the-xi-jinping-era-advocacy-and-non-profit-organising-in-the-new-regime/> (2023年5月9日访问)

《环境正义地图册》(Environmental Justice Atlas)。日期不详。《肯尼亚拉穆煤电厂》。(Coal Power Plant in Lamu, Kenya.) <https://ejatlas.org/conflict/coal-power-plant-in-lamu-kenya> (访问日期：2023年7月11日)

E. · 弗里 (E. Fourie)、W. · 瑙塔 (W. Nauta)、E. · 莫德斯利 (E. Mawdsley)。2019年。《导言》，载于 E. · 莫德斯利、E. · 弗里、W. · 瑙塔主编《南南发展合作研究：知识生产的政治》。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第1-11页。(Introduction, in E. Mawdsley, E. Fourie, and W. Nauta (eds) Researching South-Sout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11.)

J. · 福克斯(J. Fox)、L. D. · 布朗(L. D. Brown)主编。1998年。《问责的斗争：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和草根运动》。剑桥，马萨诸塞州；伦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The Struggle for Accountability: The World Bank, NGOs, and Grassroots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London: MIT Press

P. · 卡尔松(P. Garzón)。2018年(2014年第一版)。《中国对外贷款和投资的环境和社会指南手册：地方社区指南》(第三版)。基多：中国 - 拉美可持续投资倡议。(Handbook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Guidelines for Foreign Loans and Investments: A Guide for Local Communities. Third Edition. Quito: China-Latin America Sustainable Investments Initiative.

全球环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GEI)。2015年。《调查缅甸密松大坝对移民村庄的影响》，2015年7月15日。(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the Myistone Dam on an immigrant village in Myanmar, 15 July 2015.) <http://www.geichina.org/en/investigating-the-impact-of-the-myitsone-dam-on-an-immigrant-village-in-myanmar/> (2023年5月9日访问)。

谷靖、A. · 尚克兰(A. Shankland)、A. · 切诺伊(A. Chenoy)。2016年。《国际发展中的金砖国家》。巴星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The BRIC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龚雪。2021年。《适当性逻辑：解释中国金融机构对海外融资的监管薄弱》，载于《世界发展》第142期(6月)：105465。(Logics of Appropriateness: Explaining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eak Supervision of Overseas Financing. World Development 142 (June): 105465.)

L. E. · 瓜尔尼佐(L. E. Guarnizo)、M. P. · 史密斯(M. P. Smith)。1998年。《跨国主义的地点》，载于 M. P. · 史密斯和 L. E. · 瓜尔尼佐主编《来自底层的跨国主义》。新布伦瑞克：Transaction 出版社，第3-32页。('The Locations of Transnationalism' , in M.P. Smith and L.E. Guarnizo (eds)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p.3-32.)

何佩生、R. L. · 埃德蒙德斯(R. L. Edmonds)主编。2008年。《嵌入式行动主义在中国：社会运动的机遇与约束》。伦敦；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中国转型研究系列，30)。(China' 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Routledge studies on China in transition,

30)(译者注:此书有中文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J.Y. J. · 苏。2017年。《缅甸公民社会质疑中国在缅甸的发展援助》,载于《中国制造杂志》,2017年3月26日。(Burmese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Myanmar, Made in China Journal, 26 March 2017.)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7/03/26/burmese-civil-society-challenges-chinas-development-assistance-in-myanmar/> (2023年5月9日访问)

季琳、张经纬。2016年。《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现状、挑战及政策建议》。北京:全球环境研究所(GEI),2016年11月。http://www.geichina.org/_upload/file/report/NGO_Going_Out_CN.pdf

M. E. · 凯克(M. E Keck)、K. · 希克林克(K. Sikkink)。1998年。《跨越国界的活动家们》。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 · 拉波特(C. Laporte)。2017年。《发展领域的新兴捐助者们:在老挝的中国和韩国研究案例》,见I. 贝尔加马斯基(I. Bergamaschi)、P. · 摩尔(P. Moore)、A. B. · 蒂克纳(A. B. Tickner)主编《神话之外的南南合作:新增的捐助者,新的援助实践?》。伦敦: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第197-223页。(Emerging Donors on the Field: A Study Case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 in Lao PDR, in I. Bergamaschi, P. Moore, and A. B. Tickner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Beyond the Myths: Rising Donors, New Aid Practic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pp.197-223.)

董乐(Dong Le, 音译)。2016年。《中国在非洲的官方发展投资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以肯尼亚拉穆港项目为例》,载于《非洲经济与金融评论》第8卷第1期:第106-29页。(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of Chinese Official Development Finance in Africa: The Case of the Lamu Port Project, Kenya. Africa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8, no. 1: 106-29)

T. M. · 李(T. M. Li)。2007年。《改善的意愿:治理、发展和政治实践》。杜兰姆:杜克大学出版社。(The Will to Improve: Government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E. · 曼德斯利(E. Mawdsley)。2012年。《从接受者到捐助者:新兴大国和发展格局的变化》。伦敦:泽德出版社。(From Recipients to Donor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Changing Development Landscape. London: Zed Books.)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2年。《在仰光举行的中缅友谊活动旨在增进双边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馆，2012年5月17日。

C. · 米德尔顿 (C. Middleton)。2022年。《全面审视湄公河流域大型水电大坝的政治生态学》，载于《水资源替代方案》第15卷2期，第251-289页。(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large hydropower dams in the Mekong Basi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Water Alternatives, 15(2), pp. 251-289)

S. · 帕特 (S. Patel)。2021年。《为什么我们应该让妇女参与项目决策：以拉穆煤电厂为例》，载于去煤炭化(博客)。(Why we should involve women in project decisions: the case of Lamu Coal Plant, DeCOALonize [Blog].) <https://www.decoalonize.org/why-we-should-involve-women-in-project-decisions-the-case-of-lamu-coal-plant/> (2023年7月11日访问)

M. · 波梅尼 (M. Pomeroy) 等。2016年。《公民社会、金砖国家和国际发展合作：来自印度、南非和巴西的视角》，载于谷靖等主编《国际发展中的金砖国家》。英国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第169-206页。(Civil Society, B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erspectives from India, South Africa and Brazil, in J. Gu, A. Shankland, and A. Chenoy (eds.) The BRIC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pp. 169-206)

M. · 雷普尼科娃 (M. Repnikova)。2022年。《中国软实力》。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中国元素丛书)。(Chinese Soft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ements in Global China))

拯救拉穆 (Save Lamu)。2018年。《拉穆妇女反对建设煤电厂项目，讨论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拯救拉穆，2018年7月12日。(Lamu Women Opposing the Proposed Coal Power Plant Project, Discuss on the Effects that will be Caused as a Result of the Project, Save Lamu, 12 July 2018) <https://www.savelamu.org/lamu-women-oppose-proposed-coal-power-plant-project/> (2023年5月9日访问)

拯救拉穆 (Save Lamu)。2019年。《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吴鹏邀请去煤炭化组织成员参加会议，告诉他们，他个人不支持煤电厂》，拯救拉穆，2019年7月1日。(Chinese Ambassador to Kenya Wu Peng Invites DeCOALonize Members for a Meeting Tells Them, He Personally does not Support Coal Plants, Save Lamu, 1

July 2019.) <https://www.savelamu.org/chinese-abassador-to-kenya-wu-peng-invites-decoalonize-members-for-a-meeting-says-he-personally-does-not-support-coal-plants/> (2023年5月9日访问)

谢世宏(S. Shieh)。2022年。《公民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多方面反应》，载于《全球中国脉动》第1卷1期，第99-109页。(Civil Society's Multifaceted Respons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China Pulse, 1(1), pp. 99-109)

L. · 希普顿(L. Shipton)、P. · 多弗涅(P. Dauvergne)。2021年。《针对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全球南方的矿业项目的跨国倡导的政治》，载于《环境与发展杂志》第30卷第3期，第240-264页。(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gainst Chinese, Indian, and Brazilian Extractive Projects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30(3), pp. 240-264)

M. · 谭 - 姆林斯(M. Tan-Mullins)、F. · 厄班(F. Urban)、孟方桦(Grace Mang)。2017年。《评估中国利益相关方参与亚洲和非洲大型水电项目的行为》，载于《中国季刊》第230期，第464-488页。(Evaluating the Behaviour of Chinese Stakeholders Engaged in Large Hydropower Projects in Asia and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230, pp. 464-488)

戴安·唐(Diane Tang)。2016年。《自下而上的社会化——缅甸公民社会在促进中国采用公众参与规范中的作用》。博士学位论文，曼彻斯特大学。(Socialisation from Below – the Role of Myanmar Civil Society in China's Adoption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Norm.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断裂项目(The Rupture Project)。2022年。《湄公河地区的公民社会：我们可以从环境斗争中学到什么？》，载于《断裂项目》，2022年8月16日。(Civil society in the Mekong: What can we learn from environmental struggles?, The Rupture Project, 16 August 2022.) <https://www.newmandala.org/civil-society-in-the-mekong-what-can-we-learn-from-environmental-struggles/> (2023年5月9日访问)

田峰瑞(Tian Fengrui, 音译)、朱莉亚·庄(Julia Chuang)。(2022年。《去政治化的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制度的权力场域》，载于《中国季刊》250期，第509-530页。(Depoliticizing China's Grassroots NGOs: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as an Institutional Field of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250, pp. 509-530)

V. E. · 托兵 - 大卫(V. E. Tobing-David)。2019年。《东南亚的性别变革和负责

任农业投资项目：第一阶段评估报告》。英国乐施会。(The Gender Transformative and Responsible Agribusiness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programme: Phase 1 evaluation report. Oxfam GB.)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8年。《拟建的拉穆煤电厂对社区的影响：如果有人从燃烧化石燃料中受益的话，那么会是谁？》，载于去煤炭化组织(DeCOALonize)主办的出版物《视角》第31期。(The Impacts on the Community of the Proposed Coal Plant in Lamu: Who, if Anyone, Benefits from Burning Fossil Fuels? – By DeCOALonize, Perspectives, Issue No. 31)

L. T. · 韦斯比奇(L. T. Waisbich)。2022年。《我们想要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内外的中国和巴西行动》，载于 P. · 阿马尔(P. Amar)等主编的《热带丝绸之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190-203页。(‘The Bank We Want’ : Chinese and Brazilian Activism around and within the 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in P. Amar et al. (eds) The Tropical Silk Roa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90-203.)

L. T. · 韦斯比奇(L. T. Waisbich)。2021年 a。《参与、关键的支持和分歧：从公民社会视角看巴西与非洲关系》，载于 M. · 艾伦卡斯特罗(M. Alencastro)、P. · 西布拉(P. Seabra)主编)《21世纪的巴西 - 非洲关系》。斯普林格国际出版社，第113-132页。(Participation, Critical Support and Disagreement: Brazil-Africa Relations from the Prism of Civil Society, in and (eds) Brazil-Afric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113-132.)

L. T. · 韦斯比奇(L. T. Waisbich)。2021年 b。《将南南发展合作重新政治化：国内外的问责谈判》。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politicising South-Sout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egotiating accountability at home and abroa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 · 约番东(P. Yeophantong)。2020年。《中国与水电开发的问责政治：湄公河地区跨国倡导网络的是否有效？》，载于《当代东南亚》第42卷第1期，第85-117页。(China and the Accountability Politics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How Effective are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in the Mekong Reg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42(1), pp. 85-117.)

于晓刚。2012年。《中国 NGO 前往缅甸》，载于《中国发展简报》第53期(2012年春季。<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org/reports/chinese-ngos-travel-to-myanm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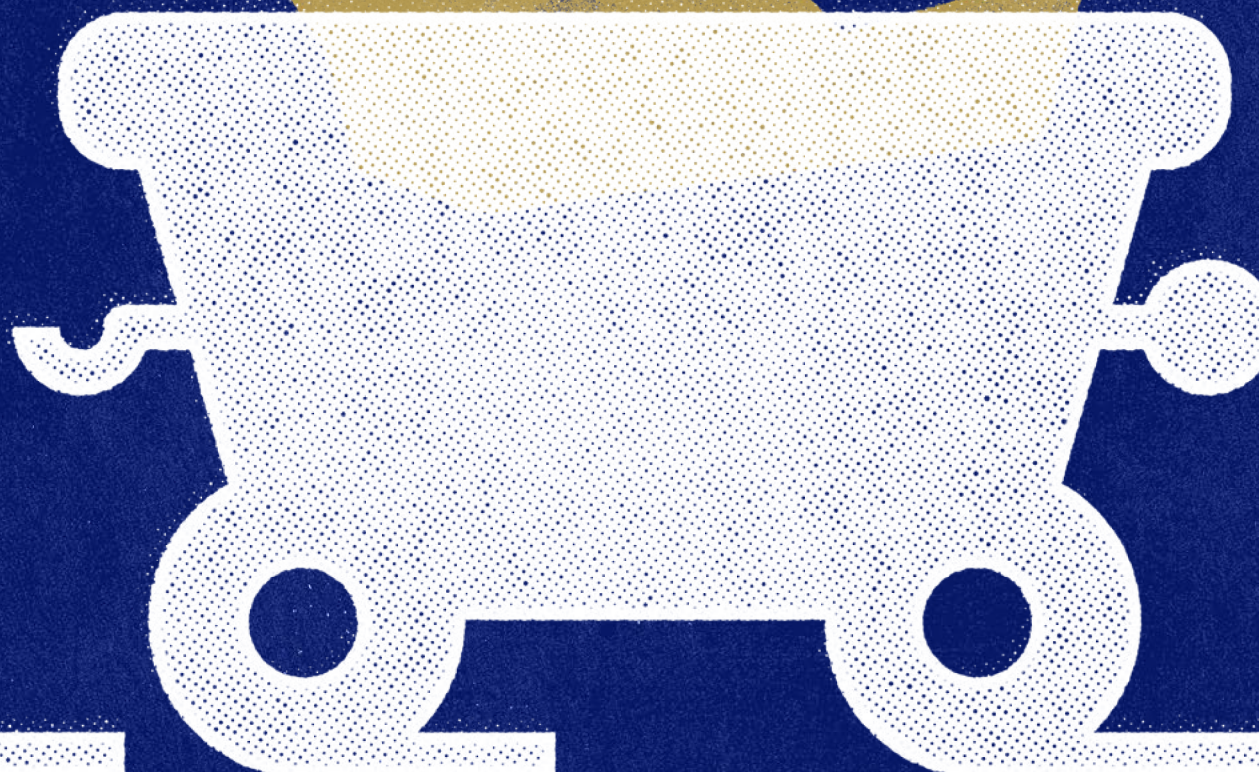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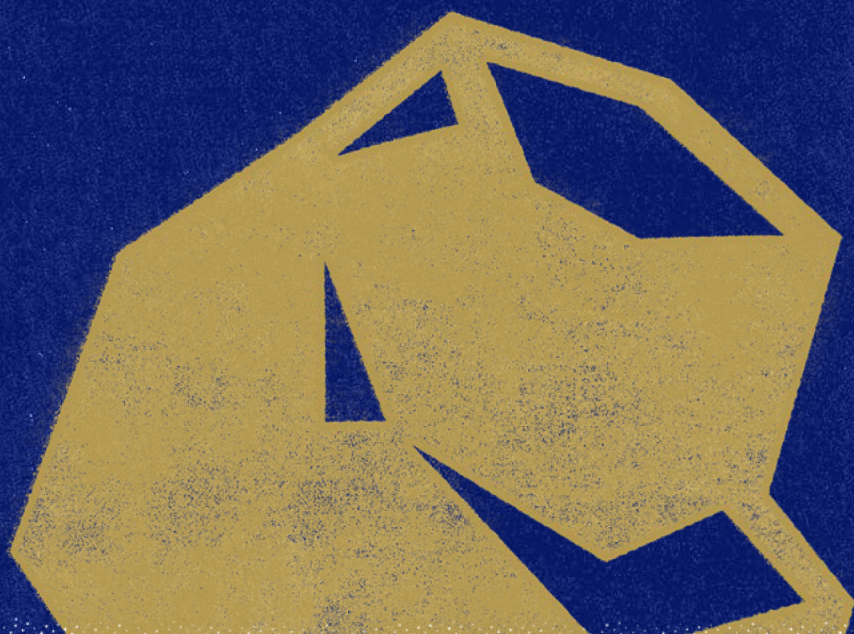
(2023年5月9日访问)

周李焕 等。2022年。《中国海外投资清单数据库》，世界资源研究所 [预印本]。

朱萸。2020年。《拉穆的去煤化：与奥马尔·埃尔马维(Omar Elmawi)的访谈》，德国歌德学院肯尼亚分院，2020年5月。(Decolonisation of Lamu. Interview with Omar Elmawi, Goethe Institut Kenya, May 2020.) <https://www.goethe.de/ins/ke/en/kul/dos/sus/21847312.html> (2023年5月9日访问)

结论与展望

蔡一平



这本关于全球中国及其性别影响的论文集，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我们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体反思和分析并非始于谋求共识。在这个研究项目的整个过程中，每个研究者都虚心接受批评和自我反思，并且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一过程要求我们尊重研究者的多样性，尊重他们不同的学科背景为这项研究带来的广泛专业知识。有些人专攻发展研究，有些人是中国问题专家，还有一些人来自国际关系领域，该领域的理论和框架以北方为主导。有些人有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背景。本书的作者们来自全球南方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们认为这是本研究的优势之一，因为它使所有参与者能够从自己独特的背景、经验和视角出发分享她们的见解和分析。因此，只要其研究方法切实可行，这种多样性并不会降低分析的可信度。事实上，本研究的发现揭示了将中国的全球参与简单化或概括化为“救世 vs 魔鬼”的二元框架并不准确。正如这些案例研究所展示的，中国的全球参与涉及各种不同的参与者，并且是一个动态过程。DAWN 感谢每一位参与者在这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提出真诚和建设性的意见、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及展现出的学术诚信与贡献。

DAWN 充分意识到本研究的主题——全球中国——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目标，这使得对该主题的任何研究都极具挑战性。DAWN 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为从性别视角重新构想南南关系提供思考，以促进中国和全球南方的积极改变。这个研究项目是南方女性主义知识构建的一个生动例子，即通过相互学习、互动讨论与坦诚对话进行合作。

本书中的这些实证案例研究通过关注地方与全球的联系以及优先考虑自下而上的方法，对中国的全球影响的宏观叙事提出了挑战。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广泛——从中国的软实力到女性、和平与安全议题，从公民社会的行动到在矿业、基础设施和农业方面的投资等均有涉及。这些论文考察了参与其中的各种部门、机构和利益相关方，包括从国家、商业部门和金融机构，到传统资助者和国际发展机构，还有地方社区、公民社会、女性组织及土著群体等。这些研究探究各个领域之间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从而描绘了中国的全球足迹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这些动态过程中展现出的正在变化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这些论文以女性的能动性为中心，而不是将女性仅仅视为被动的受害者或脆弱群体。同时，它

们既强调对中国的国家行为者和商业行为者的问责，也重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及其他发展行为者的谈判过程中的能力建设，呼吁中方与受援国之间的相互问责。

因此，这项探索性研究旨在探索一种新型南南关系的可能性，它挑战了关于中国作为崛起的一方而南方国家作为受害者一方的主流叙事和单一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常常受到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和“黄祸”叙事的偏见影响。作为一个新的发展行动者，对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的理解不应陷入原有的北方 - 南方国家的那种捐助国 - 受援国的窠臼，不应强化传统上困扰全球南方的发展伙伴关系中的捐助者 - 受援者依赖综合症。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应在中国的发展合作中被高度重视，并配置相应的操作指导方针和充足的财政资源。这种做法不应被视为与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交政策相矛盾。本书的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受援国一方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有责任在中国及其他发展合作伙伴执行的发展项目中推动自身的性别议程。唯有如此，重构南南关系和有意义的跨国女性主义对话才有可能实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方之间的内部倡导是必要的，这需要南南女性主义的合作。利用联合国的论坛和机制，例如北京 +30 的推动力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审查，这些都是推动倡导的可行途径。通过这些平台，各国可以分享经验、资源和策略，增强对性别平等的共识和行动力，从而推动更有效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这种合作不仅能促进女性的权利，还能实现整个南方国家在发展合作中的共同利益。

由于时间限制和其他障碍，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流动性有限，本研究项目无法全面考察有关全球中国及其与全球南方国家相关的所有重要的主题，例如，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体系中和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原材料开采方面的投资，那么中国国有资本的特殊性是什么？以利润优化为导向的中国资本与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传统私人资本（李静君 2017）对女性的影响有何不同？可以建立哪些机制来促进和维持全球南方女权主义的长期交流、运动建设和政策倡导？许多问题仍待探索。DAWN 希望通过这次南方女性主义合作进一步激发研究者的兴趣，促进在中国国际合作的性别与发展领域中不断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批判性分析。并且，DAWN 期待这一努力将引导中国的研究者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开展有意义且具有战略性的交流对话。

经历了二十年的全球参与的快速扩展，中国正面临以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围堵以及来自全球南方人民日益增长的抵制。与此同时，也逐渐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和人民的接纳和欢迎。因此，南方女性主义者需要回答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南南女权主义之间的对话和团结能否消除厌女症、父权制、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使我们重新构想一个以人权、尊严、自决以及性别、经济和生态正义为中心的女性主义议程？DAWN呼吁南方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共同携手、思考和行动。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